

# 目 录

序 言	.....	I
第一版序言	.....	IV
导 言	.....	1

## 第一篇 原理与概念

第1章 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研究：总的看法	.....	9
§1 其他 3/4 的人口如何生存	.....	9
§2 经济学与发展研究	.....	14
2.1 发展经济学的性质	.....	15
2.2 为什么学习发展经济学？一些关键性问题	.....	15
2.3 价值准则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	.....	18
2.4 西方经济理论的性质	.....	19
§3 传统理论有限的适用性	.....	20
§4 作为社会系统的经济：超出单纯经济学的范围	.....	24
§5 作为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 第三世界社会系统	.....	25
§6 提要与结论	.....	28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第2章 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结构和共同特点	.....	33
§1 多样性中的相似性	.....	33
§2 第三世界多样化经济结构概况	.....	38

# 目 录

序 言	.....	I
第一版序言	.....	IV
导 言	.....	1

## 第一篇 原理与概念

第1章 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研究：总的看法	.....	9
§1 其他 3/4 的人口如何生存	.....	9
§2 经济学与发展研究	.....	14
2.1 发展经济学的性质	.....	15
2.2 为什么学习发展经济学？一些关键性问题	.....	15
2.3 价值准则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	.....	18
2.4 西方经济理论的性质	.....	19
§3 传统理论有限的适用性	.....	20
§4 作为社会系统的经济：超出单纯经济学的范围	.....	24
§5 作为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 第三世界社会系统	.....	25
§6 提要与结论	.....	28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第2章 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结构和共同特点	.....	33
§1 多样性中的相似性	.....	33
§2 第三世界多样化经济结构概况	.....	38

2.1	国家的大小与收入水平	38
2.2	历史背景	39
2.3	物质与人力资源天赋	40
2.4	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比重	40
2.5	产业结构	41
2.6	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对外依赖	43
2.7	政治结构、权力和利益集团	44
§ 3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45
3.1	生活水平低	45
3.2	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56
3.3	高人口增长率和扶养重担	58
3.4	高水平的、不断增长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59
3.5	严重依赖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出口	61
3.6	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	64
§ 4	结论	66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附录 2.1 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名次	69
第3章	各种发展理论与发展的含义	92
§ 1	人人想发展, 但它的含义是什么?	92
§ 2	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 三种研究途径	93
2.1	线性阶段理论	94
2.2	新古典结构变动模型	99
2.3	国际依附模型	113
§ 3	二元结构和二元社会的概念	117
3.1	国际上的二元结构	118
3.2	国内的二元结构	120
§ 4	“发展”的含义是什么?	121
4.1	传统的经济衡量方法	121
4.2	经济发展的新观点	122
4.3	发展的三个核心含义	124

4.4发展的三个目标.....	126
§ 5 不发达与发展的多重因素：图解概要.....	128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附录3.1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评论.....	135
附录3.2 多种衡量发展的社会指标.....	145
<b>第4章 历史上的增长与当代的发展：教训和争论.....</b>	<b>152</b>
§ 1 增长竞赛.....	152
§ 2 增长经济学：资本、劳动和技术.....	153
2.1 资本积累.....	153
2.2 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	154
2.3 技术进步.....	156
2.4 结论.....	160
§ 3 历史记录：库兹涅茨提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 六个特征.....	160
3.1 高人均产量增长率和高人口增长率.....	161
3.2 生产力的高增长率.....	162
3.3 经济结构的迅速变革.....	162
3.4 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迅速变革.....	163
3.5 国际上的经济扩张.....	164
3.6 经济增长在国际间的有限扩散.....	164
3.7 结论：增长特征之间的相互联系.....	165
3.8 几点教训.....	166
§ 4 历史增长经验的有限价值：不同的初始条件.....	168
4.1 天赋资源（物质的和人力的）.....	169
4.2 人均收入和GNP的相对水平.....	169
4.3 气候差异.....	170
4.4 人口的规模、分布与增长.....	171
4.5 国际迁徙的历史作用.....	171
4.6 国际贸易对增长的刺激.....	176
4.7 基础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能力.....	177

4.8 政治、社会制度的稳定与灵活性.....	178
4.9 结论.....	179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附录4.1 创新的分类.....	182

## 第二篇 问题与政策

### 国内部分

增长、贫穷和收入分配.....	191
§ 1 关于增长的争论.....	191
§ 2 什么人,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	193
§ 3 几个基本概念、收入的规模分配和功能分配.....	198
3.1 规模分配.....	198
3.2 洛伦茨曲线.....	201
3.3 基尼系数与不平等的总量指标.....	203
3.4 功能分配.....	204
§ 4 实例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和绝对贫困... ..	206
4.1 不平等,各国的差异.....	206
4.2 绝对贫困,范围和程度.....	207
§ 5 贫困人口的经济特征.....	213
5.1 妇女与贫困.....	218
§ 6 经济增长与贫困的范围.....	219
§ 7 发展目标的重新确定,收入分配改善的增长.....	222
§ 8 经济分析的作用:从增长中实行再分配.....	223
8.1 增长与收入分配.....	223
8.2 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国发展和福利指数的片面性.....	225
8.3 设置社会福利的贫困加权指数.....	228
8.4 将增长经济学同分配结合起来.....	232
§ 9 政策选择的范围:一些基本考虑.....	233

9.1	干预的领域	234
9.2	政策选择	234
9.3	摘要和结论，需要配套的政策	238
9.4	最后的问题	239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附录5.1 生产要素报酬、储蓄与经济增长：数学图解	244
第6章	人口问题争论	248
§ 1	数字与争论	248
§ 2	基本问题：人口增长与生活质量	249
§ 3	从历史数字看人口增长的去、现在和将来	251
3.1	从历史看世界人口的增长	251
3.2	世界人口结构	253
3.3	出生率，出生率同收入水平、GNP增长率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258
3.4	人口增长潜力	263
§ 4	人口问题争论：一些冲突的见解	266
4.1	人口增长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267
4.2	人口增长确实是一个问题	270
§ 5	目的和目标：求大同存小异	272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第7章	人口经济学与发展	278
§ 1	人口过渡理论	278
§ 2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282
2.1	基本模型	282
2.2	对基本模型的批评	285
§ 3	生育率的微观经济理论	287
3.1	一般分析	287
3.2	发展中国家对儿童的需求	291
3.3	某些经验论据	292
3.4	发展和生育率的关系	293

§ 4 若干政策分析 .....	294
4.1 发展中国家能够做什么 .....	294
4.2 发达国家在其国内能够做什么 .....	300
4.3 发达国家怎样才能帮助各发展中国家实现人口计划 .....	301
§ 5 政策目标的争论、权衡与选择：若干结论 .....	302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第8章 失业：问题、现状与分析 .....	306
§ 1 就业问题：几个基本争论点 .....	306
§ 2 第三世界失业的现状：例证和概念 .....	309
2.1 就业和失业：趋势与对策 .....	309
2.2 劳动力的现状与未来 .....	311
2.3 劳动力利用不足的明确界限 .....	312
2.4 失业、贫困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 .....	314
2.5 工业产出落后于就业增长，1950和1960年代在确定重点 上的失误 .....	315
§ 3 就业决定的经济模式 .....	318
3.1 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型 .....	319
3.2 凯恩斯模型 .....	321
3.3 产量增长与就业增长：相互冲突还是一致？ .....	325
3.4 适用技术与就业产生，价格刺激模型 .....	328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第9章 城市化与国内和国际间的人口迁移问题 .....	336
§ 1 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困境 .....	336
1.1 城市化的趋势和前景 .....	337
1.2 城市的失业和就业不足 .....	345
§ 2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 .....	346
§ 3 发展中国家国内人口迁移的一般情况 .....	349
3.1 迁移过程 .....	349
3.2 迁移的特征 .....	350
§ 4 农村—城市人口迁移的经济理论 .....	351

4.1	托达罗模式的文字表述	352
4.2	某些政策建议	355
4.3	国际性人口迁移与世界难民问题	359
4.4	日趋严重的难民问题	366
§ 5	提要与结论：制订综合的移民与就业战略	370
§ 6	人口问题评论	372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附录9.1	托达罗劳动力迁移模式的数学公式	375
附录9.2	城市的非正规部门	379
第10章	农业变革和农村的发展	386
§ 1	农业进步和农村发展的迫切性	386
§ 2	在发展的几个10年中农业的停滞	389
§ 3	第三世界土地制度的结构	394
3.1	世界上农业的两种类型	394
3.2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统农业	396
§ 4	妇女的重要作用	411
§ 5	小规模农业的发展经济学：从自然农业向专 业化农业的转变	413
5.1	第一阶段 维持生存的农业，风险，不确定性和 幸存	414
5.2	第二阶段 向混合的和多种经营的农业的转变	419
5.3	第三阶段 从多种经营到专业化，现代化的商品化 农业	420
5.4	农业演进的各个阶段：小结	422
§ 6	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战略：一些主要的条件	423
6.1	改进小规模农业	423
6.2	农村发展的三个条件	426
§ 7	中国农村的发展：一条独特的道路	429
7.1	人民公社	426
7.2	贫困、就业和收入分配	430



7.3	中国的制度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六个重要因素	431
7.4	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发展的意义	433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附录10.1 中国最近的农业改革	440
<b>第11章</b>	<b>教育与发展</b>	<b>443</b>
§ 1	教育和人力资源	443
§ 2	发展中地区的教育概况	446
2.1	公共教育开支	446
2.2	注册在校人数	447
2.3	辍学率	449
2.4	文化普及程度	449
2.5	教育费用和收益	449
§ 3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基本问题	452
3.1	惰性和低效率	452
3.2	管理不善和被扭曲的刺激	453
3.3	初等教育与社会需要的失调	453
§ 4	高等教育的问题	456
4.1	影响学习能力的因素，某些原因和结果	457
§ 5	教育经济学和就业	458
5.1	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就业机会与教育需求之间的关系	459
5.2	社会和个人的成本与收益	464
5.3	压缩人为扩大的教育需求的政策，使个人与社会的收益和成本趋于一致	468
§ 6	教育、社会和发展：一些问题	470
6.1	教育和经济增长	471
6.2	教育、贫困和不平等	472
6.3	教育、国内人口流动和出生率	476
6.4	教育和农村发展	477
6.5	教育和国际性人口流动，在知识方面的依赖性和人	

材外流.....	481
§7 概括和总结：主要教育政策的选择 .....	484
7.1 教育系统外部的政策.....	485
7.2 教育系统内部的政策.....	486
注释 概念复习 问题讨论	

# 导言

## 本书的性质，研究范围和结构

本书是为集中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发展的课程而编写的，上述地区合在一起通常被称为第三世界。<sup>①</sup> 本书既是为那些在经济学方面受过一定基本训练的学生，又是为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正式学习过经济学的学生组织和撰写的。本书将在适当地方为后一部分学生说明那些看来对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具体政策结论有特殊关系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概念。这样，本书就会对目前吸引着或力求吸引各科大学生学习大学发展课程具有特殊价值。然而，在能使外行读者感到易懂并获得知识的同时，由于本书材料丰富，内容详实，仍然能够满足大多数大学本科和某些研究生对发展领域经济学的需要。<sup>②</sup>

在结构和倾向性方面，本书在各种发展问题的教科书当中是独特的。此外，本书在教学方法上有许多重要革新，体现了对本领域现有教科书的重大改进。其中，下列几点也许是最有意义的：

首先，本书在联系第三世界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争论时，专门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教学，集中注意“现实世界”的发展问题，比如贫困、不平等、失业和农村地区的停滞问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抽象的、往往是不现实的关于国家怎样才能发展的模式上，或者总合的经济行为的比较等这些枯燥无味的争论上。

第二，本书把视野集中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把它们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来看待，而且在他们彼此的相互关系中，以及

它们与富裕国家的相互作用中进行观察。

第三，本书认为，对于发达与欠发达问题既必须从经过适当修改的公认的“一般”的经济学原理、理论和政策的经济观点去观察，又有必要从制度、结构(即“非经济的”)的观点去看待。因而，我们试图把有关的理论与现实的制度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面临着类似的发展问题：普遍的贫困，收入与财产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人口迅速增长，文化水平低，营养摄入水平低，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停滞和与之相关的农村被忽视，不完善与不适宜的教育和卫生保健制度，僵化的体制和行政结构，受到外部不健全并且往往不适宜的经济、技术、文化的支配和依附外国的软弱性，在“现代化”与保留传统文化之间进行权衡时选择上的困难。这些以及其它问题是充斥第三世界普遍的现象，而且实际上往往决定第三世界各国的欠发达性质。

最后，本书把这么多的经济、社会和制度上的欠发达问题视为高度相关的，需要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结合起来探讨解决办法的问题。这样做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即，即使我们把经济发展解释为迅速增长和更为公平地分配国民收入及各种机会，它也只不过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问题在于，如果不把经济变量与社会政治体系和制度的现实完满结合起来，人们就不可能谈论什么发展的经济学。分析象贫困，失业和不公平这些所谓经济问题而忽视国内外的“非经济”因素，将会给学生造成重大危害。

### **结构和倾向**

本书由四篇组成。第一篇集中研究不发达的本质和含义，以及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表现。它还总结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增长经验，明确了这些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第二篇和第三篇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它们集中研究国内和国际的主要发展问题和政策。分析和考察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长，贫困和收入分配，人口，失业，迁徙，城市化，技术，农业和农业发展，教育，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外国援助，以及外国私人投资。最后，第四篇考察第三世界发展的可能性和发展的前景。本书在讨论发展计划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的作用

和作用限度之后，接着分析了发展中的80年代世界经济以及不发达国家在相互依赖不断增加，但非常不平等的全球体系中的地位。

本书四篇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什么样的发展最合乎需要？第三世界各国怎样才能靠一个国家单独的或者更理想地，通过彼此相互间的合作以及人们所希望的，从世界上较发达国家得到适当有成效的援助，来完满取得这些经济的和社会的目标。

我们在紧迫的发展问题的讨论和分析中提到了发展经济学家，其它社会科学家，计划工作人员和那些在第三世界政府内阁或各部门工作、实际处在“火线”上的人们的各式各样的，往往是冲突的观点。如果我们流露出一些倾向性的话，或许是我们总是试图把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和发展实践者的各种观点提出来，他们对发展含义的理解就是直到70年代才发表，而过去从未这样做。

对发展思想发生影响的智力基地正迅速从第一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二世界（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向第三世界转移。这些国家必须找出最终的答案并制订适当的战略。这些国家的国民将会对这些战略的形式和内容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然而，除非经济先进国家的学生对欠发达的真正含义及其在各式各样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表现形式具有广泛的知识 and 理解，否则发达国家对包括全球 2/3 以上人口的世界穷国实行开明政策的可能性比现在甚至还要渺茫。

在导言中似乎应当提出一个更为深刻的观点。在最后分析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所有人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是构成不断缩小的全球经济与政治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经济上的作用和影响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似乎肯定会增长。所以，彻底了解它们的经济问题和经济上的抱负的独特性质，了解这些问题与抱负和发达国家人民的幸福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应当是大学经济学学生教育中的一个基本组成

部分。我们希望，这本书在扩大学生视野方面贡献一点力量，希望它能引导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可能性和前景。

## 注 释

① 联合国143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会员国通常集体地将自己称为第三世界。它们这样做基本上是为把它们自己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世界）区分开。第三世界这个名称的准确由来虽然不清楚，但它已被经济贫穷国家自己普遍接受和使用，在它们与经济上的富裕国家就贸易、援助、能源、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世界粮食供给不断减少等紧迫的国际问题进行谈判时尤其如此。虽然这个名词用在不同集团的国家时，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些数字偶尔带有令人遗憾的优劣之分的含义。但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从努力形成和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性和目标日益统一这个全新的意义上广泛使用“第三世界”这个名称的也是事实。因而，当我们从整体上称呼发展中国家时通常将使用“第三世界”这个说法很清楚，我们是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特性和目标日趋一致的正面含义上使用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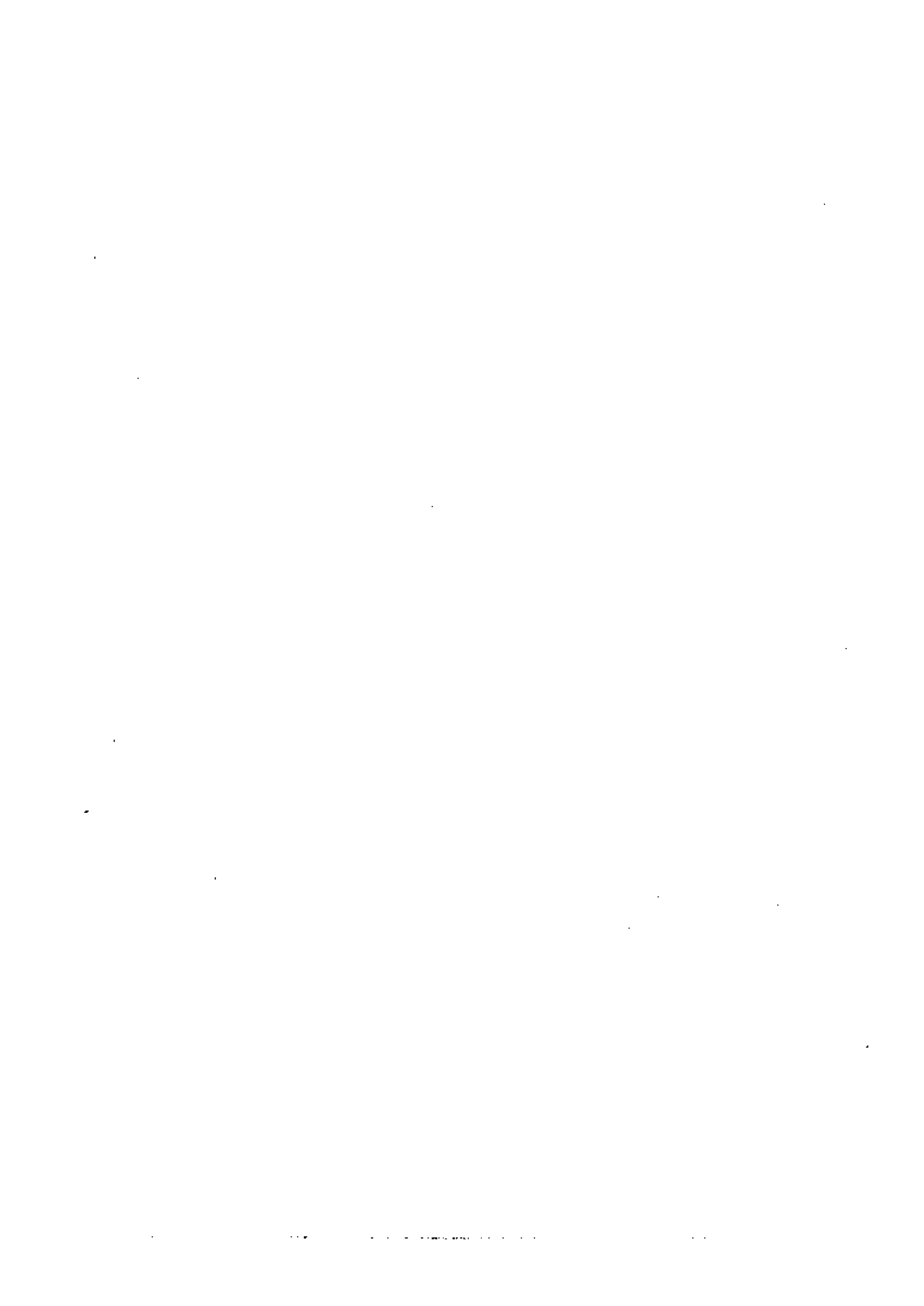
② 本书最后附有词汇集，列出本书使用的各种经济发展概念和机构的缩略词（例如，IBRD，ILO）的含义以供查阅。

③ 见帕德玛·德赛，《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在圣地亚哥》，《世界发展(1)》1973年第9号；《自力更生与国际改革》，《海外发展委员会公报》1974年第24号；马哈布瓦尔·哈克，《发展战略的危机》，《世界发展》1973年第1号；最后，见1975年1月作为在巴基斯坦卡拉奇举行的第三世界讨论会与参会者的发展中国家50名主要的经济学家所发表的第一个公报。





# 第一篇 原理与概念



## 第1章 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研究：

### 总的看法

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的〔76%〕，却仅仅靠世界收入的〔27%〕生存——而且这样微薄的收入的内部分配还不合理，使其人口的大多数处于悲惨的贫困之中。

《第三世界经济学家圣地亚哥宣言》

必须看到全球结构中的人类需要。

《第三世界社会科学家公报》

#### § 1 其他3/4的人口如何生存

当世界各地的人们每早醒来面对着新的一天时，他们的境况各异。一些人居住在房间众多的舒适家庭中，他们食品充足，衣着华贵，身体强健，并有合理的收入保障。其余那些占世界人口3/4（48亿）以上的人却非常不幸。他们几乎没有容身之处，缺乏充足的食物，健康状况恶劣；他们不识字，没有工作；他们对较好生活的希望是暗淡的，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考察一下全球生活水平的这些差异，颇有意义。

例如，如果首先观察北美一般水平的家庭，我们可能找到一个年收入大约2万至2.5万美元、有4口人的“核心（nuclear）”型家庭。他们居住一套相当舒适的城市公寓，或者是带有小花园

的郊外住宅。寓所之安逸，颇具特色，其中包括供两个儿童各自分住的寝室。室内摆满了消费品和电器设备，许多是由北美以外南朝鲜、阿根廷和台湾等遥远的国家和地区制造的。家中总是每日三餐，而且，许多食品是由国外进口的，有巴西、肯尼亚或哥伦比亚的咖啡，有秘鲁、日本及澳大利亚的鱼肉罐头和水果，还有中美洲的香蕉和其它热带水果。两个孩子都很健康，并在学校念书。他们可望完成中等教育并上大学，挑选各种自己所喜爱的职业，平均能活到72至75岁。

这是许多富裕国家中的典型家庭，它表面看来似乎相当幸福。父母有幸受过获取固定工作所必要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抚养、教育子女，并为日后的生活积蓄。但是，与这些“经济”的收益相对应，也总会有“非经济”的代价。为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各种竞争压力是巨大的，而且，在通货膨胀或衰退时期，要想按社会公认的必需水平来供养家庭，精神上的紧张与压力会损害父母双方的健康。他们那种自我放松、享受乡间漫步的纯朴乐趣，呼吸新鲜空气、啜饮净水和观赏绯红色夕阳的可能性，正随着经济进步的冲击和环境的污染而迅速地消失。不过总起来说，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看来仍是世界上千百万其他不幸的人所羡慕的。

现在考察一下亚洲农村典型的“延续(extended)”型家庭。亚洲的家族可由十多个人组成，包括父母亲、5至7名子女、祖父母及一些姑舅叔姨。他们的年收入合在一起约150—200美元，其中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实物”形式的（即消费他们自己耕种的一部分农作物）。作为大农村庄园的佃农，他们共同居住在一所只有一间房的陋室里，而庄园则归住在附近城市的地主所有。父亲、母亲、叔叔及大一点的子女，必须整天在土地上劳作。成年人中无人识字，五岁的学龄儿童仅有一人能经常上学，但他也不能指望受三、四年以上的小学教育。家里每天只吃一顿饭，这很

难改变，而且不能解除孩子们持续饥饿的痛苦。住房没有水、电和卫生设备。这里疾病丛生，而合格的医护人员却在遥远的城市服从那些较富裕家庭的需要。这里烈日炎炎，劳动艰辛，人们对于较好生活的渴望不断破灭。在世界这一地区，人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日常斗争，唯有在他们的宗教传统中才能得到缓解。

现在转到世界的另一地区，假定我们要去游览座落于南美洲的一个美丽的沿海大城市。该市不同城区之间居住条件的鲜明对照，立即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沿着闪闪发光的白色海滨，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和宽阔的林荫大道连绵延伸，但仅几百米远，在陡斜的小山上和山背后，就有许多肮脏的简陋小屋歪歪斜斜地拥挤在一起。

如果考察两个有代表性的家庭——一个是出身于当地统治阶级的富裕家庭，另一个是世代务农的家庭——他们个人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别，无疑也会使我们大为惊异。在一座俯瞰大海的现代化大厦的顶层，富裕之家住在间数众多、设备齐全的套房中，而在这座大厦背后的小山上，那个农民家庭却挤在贫民窟中一个临时凑合的小棚屋里。

为了讲明白，我们设想一个典型的周末之夜，两家都在准备晚餐。在富裕之家的高层公寓中，仆人正往餐桌上摆放昂贵的进口瓷器、高质量的银餐具和精细的亚麻餐巾。在数道菜中，最先端上来的将是俄国鱼子酱、法国餐前小吃和意大利葡萄酒。这家的长子已从北美的大学回来，另两名子女也离开了法国和瑞士的住宿学校而在家中度假。他们的父亲是曾在美国留学的杰出外科医生，他的许多顾客是国内外的达官显贵和富商。除了本身的职业之外，他在农村还拥有相当大的一块土地。对住高层公寓的这户幸运人家来说，每年去国外度假、进口的豪华汽车、最精良的食品和衣物，都是既平常而又令人愉快的事。

那么，住在山坡污垢棚屋的那家穷人的情况又如何呢？他们

也能眺望大海，但由于某种缘故，这里的景色似乎既不优美，也并不能使人轻松。露天污水沟的恶臭表明，上述的享受还相当遥远。室内没有餐桌可安放，事实上连顿象样的饭菜也没有，只有一点不新鲜的碎面包片。七个不识字的孩子多数把时间花在上街乞讨、给人擦皮鞋上，偶尔甚至企图偷在街上散步、不警觉的行人的钱包。几年前，他们的父亲从穷乡僻壤迁居到这座城市，家庭其他成员最近也跟了来。他成年做一些零活，而没有固定的工作。全家人的年收入不到150美元。孩子们上学、退学已好几次了，因为他们必须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家里挣钱。18、9岁的大女儿与镇对面的朋友们住在一起，偶尔似乎也有一些零用钱——但无人过问钱从哪来，是如何挣的。

这两种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极易使人心绪不宁。然而，考察一下亚、非、拉的任何大城市，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种贫富悬殊（虽然不平等的程度可能没有这样显著）。

作为对世界各地生活状况短暂观察的最后一个方，我们设想来到了非洲东部。那里，在干枯贫瘠的土地上一小群、一小群的棚屋茅舍星罗棋布。每一小群都是一组延续型的家庭，人人都参与和分担劳作。这里没有货币收入，因为所有食品、衣物、畜棚和世俗财产都是人们自己生产并消费的——这是一种仅能维持自己生存的经济。这里没有道路、学校、医院、电力或自来水，生活似乎在许多方面和几千年前一样。它在许多方面像大洋对面拉丁美洲贫民窟（Favela）中人们生活一样的贫困而又艰辛。然而，人们心理上或许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因为那里没有豪华的海滨高层公寓来突出赤贫者一无所有的状况。这里的生活似乎是永恒不变的——但实际上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一百公里以外正在修建一条要从这个村庄附近通过的公路。无疑，这将给人们带来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使寿命延长。但与现代文明的新发明一道，它也将无情地带来有关外部世界的信

息。获得“较好”生活的可能性在增大，实现这种生活的良机将成为现实。人们会产生种种憧憬，但是种种挫折也会随之而来。简言之，“发展”过程将会开始。

不久以后，可用于出口的热带水果和蔬菜可能将生长在这个目前还很少被开垦的地区。它们甚至最终会出现在居住海滨公寓的那个富裕的南美家庭的餐桌上。同时，东南亚制造的、播放着北欧录制的音乐的晶体管收音机，将成为这个非洲村庄所珍视的财产。遍及全球的这种仅能维持生存的偏僻村庄，正在逐渐地然而又是不可抗拒地同现代文明联结起来。这个过程目前在稳步进行着，今后会变得更为急剧。

初步掠过地球上各个部分的生活就能够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十分富裕与极端贫困并存的情况不仅横跨各大洲，而且存在于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城市之内呢？怎样才能将传统的、低生产率的、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高生产率、高收入的国家？富裕国家的经济活动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促进或阻碍贫穷国家的发展意愿呢？尼日利亚、巴西或菲律宾穷乡僻壤的自给农民要通过哪些步骤，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发展成为成功的商业性农民呢？这些问题和许多其它关系到国际与国内各方面生活水平，包括健康与营养、教育、就业、人口增长和平均寿命等悬殊问题，都可以根据对世界各地生活的非常粗略的考察而提出来。

本书计划帮助学生通过着重探索处于贫困和低生活水平现实中的世界 3/4 人口的境况，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和前景。然而，正如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如果不同时考虑经济发达国家在直接、间接地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无法现实地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或许，对发达国家的学生来说，下述事实甚至更为重要，即我们在导论中曾指出的：随着现代交通运输的扩展使世界相对缩小，这小小星球上所有人的前途愈来

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东南亚、非洲、中东或拉丁美洲贫穷的农村家庭和许多其它家庭在卫生与经济福利方面发生的变化，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相应影响欧洲、北美洲家庭的健康与经济福利，反过来也是一样。经济上日益增长的这种相互依赖的方式及原因，将在其余各章中展开论述。但是我们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全人类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开始了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 2 经济学与发展研究

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是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一宽广的学科领域中最新、最令人振奋、最富有挑战性的分支之一。虽然有人可以声称亚当·斯密是第一位“发展经济学家”，他的写于1776年的《国富论》是第一部阐述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但是，对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与过程的系统研究，只是在过去30年间才出现的。然而，有些人仍然宣称，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不象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或财政学和货币学那样是一个真正确定的经济学分支。相反他们断言，它只是所有这些传统经济学科的混合，不过专门集中研究亚、非、拉等国的具体经济问题而已。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发展经济学会以传统的或改进了的形式，从经济学的其它分支中吸收一定的原理和概念，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论结构的研究领域。197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授予两位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阿瑟·刘易斯爵士和芝加哥大学的西奥多·舒尔茨教授。这一事实鲜明地确认了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学科内一个独立的领域的地位。因此，我们以现代发展经济学同“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对比为开端，然后，用第1章的大部分篇幅分析那些国内外经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分析一切发



展问题及前景的基本内容。

## 2.1 发展经济学的性质

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涉及稀缺生产资源耗费最少的有效配置，以及这些资源在一定时期的最优增长，从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劳务（所谓“传统经济学”，我们仅仅是指美、英教科书所讲授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后面将进一步详述）。政治经济学超越了传统经济学，除了其它诸种事物外还研究社会与制度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某些经济和政治集团为了独自实现其自身利益，或者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再加上更多人的利益，影响着这些稀缺性生产资源现在乃至将来的配置。因此，政治经济学关心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强调政权对做出经济决策方面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的视野甚至更加广阔。除了现存稀缺的（或闲置的）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整个期间的持续增长之外，它还必须涉及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机制，涉及公有的和私有的部门，这对于使亚、非、拉穷困不堪、营养不良、未受教育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迅速地（至少是以历史的标准来衡量），大规模地得到改善是必要的。这样，发展经济学就比传统经济学甚至政治经济学，在更大程度上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迅速变革所必不可少的经济与政治过程，而这些变革将最有效地给其人口的最大多数带来经济进步的果实。因此，政府的作用、某种程度的协调的经济计划及有广泛依据的国内外经济政策等，通常被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构成部分而加以考察。

## 2.2 为什么学习发展经济学？一些关键性问题

发展经济学的导言部分，应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有关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若干关键性问题。下列17个问题说明了几乎所有发

展中国家、甚至每一个发展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1. “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一定的经济学原理和理论怎样才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发展过程？

2. 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从这种增长中受益最多的是谁？为什么？为什么一些国家和集团越来越富，而其余的人则依然赤贫？

3. 70年代国际石油价格的急速上涨、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对非石油输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什么？

4. 第三世界国家是怎样陷入如此严重的外债问题的？这些债务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何影响？

5. 迅速的人口增长是否在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在普遍贫困、收入无保障的环境里，大家庭有无经济上的意义？

6. 第三世界的失业，尤其是城市失业人口为何如此之多？为什么人们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少，却仍不断地从农村地区迁往城市？

7. 有关发展计划的全部内容是什么？究竟为什么要计划？

8. 是否应鼓励外国私人多国公司在贫穷国家的经济中投资？如应鼓励，应以什么为条件？

9. 来自富国的外援的效果如何？发展中国家是否应继续寻求这种援助，以什么为条件，目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是否应继续提供援助，以什么为条件，目的是什么？

10. 是否应该促进诸如农产品一类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或者，所有欠发达国家是否都应通过尽可能快地发展自己的重型制造业来实现工业化？

11. 第三世界政府应在何时、何种条件下采取外汇管制、提高关税的政策，或对一定“非必需”商品的进口实行配额制，以便改善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12. 从贫穷国家的发展观点来看，是否需要开展国际贸易？

真正从贸易中得利的是谁，好处如何在各国间分配？

13. 既然许多欠发达国家70%或80%的人口仍居住在农村，怎样才能最好地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

14. 富裕国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蔓延如何影响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国际经济力量的角逐中穷国有无可以依赖的东西，或者，他们是否注定要做被动、脆弱的旁观者？

15. 整个世界食物是否将长期短缺？如果是这样，将对哪些国家产生最不利的影响？将来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避免这种短缺呢？

16. 第三世界的教育体制是否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它们是否仅仅是使某些特殊集团或阶级能够保持其财富、势力和影响的一种机构？

17. 当前第三世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起因和根据是什么？建立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它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以及许多类似的问题将在以下各章中加以分析和考察，其答案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应该记住，一切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的课程，其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系统地思考有关的经济问题与争论，在分析中肯的原理和可靠的统计资料基础上做出判断和结论。既然在现代世界中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而且应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因此，对那些可能出现的常规的经济问题，我们也经常需要使用非常规的方法。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原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发展问题，但不应让它们遮蔽我们了解这些国家实际情况的视野。在传统的经济成长和发展理论能适当阐明经济学上尚无前例的复杂的发展问题之前，无论在假设还是程序上都经常需要加以修正。本章后面还将更多地谈到传统经济理论的作用和局限性。

## 价值准则在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涉及人类及其借以组织自己的活动，以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如食品、住所、衣物）和非物质要求（如教育、知识、精神满足）的社会系统。由于经济学家是社会科学家，他们面临着这样一种有些不寻常的情况：他们的研究对象——普通经济生活中的人——和他们自己的活动都植根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既不能要求得到科学规律也不能自称找到普遍真理。在经济学中只存在着各种“趋势”，甚至这些趋势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也往往有很大的变化。许多所谓一般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关人的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内含的假定之上的，这些假定同发展着的经济现实之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也许更多地是一种想象而非现实。不能脱离这些国家的制度、社会和政治环境，断章取义、简单从事，做出经济研究和分析。在必须解决折磨着世界上2/3以上人口的饥饿、贫穷和健康不良等人类困难问题时尤其如此。

为此，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什么是合乎理想的，什么是不合理理想的这样一些伦理或规范的价值前提，通常是经济学科，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在以后几章中将要讨论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概念，由于取得了圣雄甘地一度称之为“人的潜能的实现”的东西，就或明或暗地反映了各种理想目标的价值前提。经济与社会平等、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民族独立、制度现代化、政治和经济的参与、基层民主、自力更生、人格完善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或目标都是从关于好与坏、合乎理想与否等主观的价值判断得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相反的价值准则可以得出不同的概念或目标，例如，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个人有权无限地积累财富，维护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严格的不平等的等级

结构、以及想象出来的人统治人的“自然权利”。

当我们在第二和第三篇论及诸如贫困、平等、失业、人口增长、农村停滞及国际性依附等主要的发展问题时，把这些看作是问题，只是表明了以下的价值判断，即，使它们得以改善或予以根除是合乎理想的，因而是好的。认为这些是值得向往的目标的看法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政治家、学究式人物和普通市民——中是普遍一致的。这不会改变如下事实：这些目标不仅是从什么是理想目标的客观经验或实证分析中产生的，而且最终是从理想目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观的或规范的价值判断中产生的。

因此，价值观念不管怎样小心翼翼地加以掩饰，却必定是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经济学不可能象物理学或化学一样，不受价值观念的约束。从而，经济分析的确实性和经济方案的正确性，始终应该根据基本的假定的性质，即根据其价值前提来评价。一旦一个国家，特别是那些负责国家决策的人，对这些主观的价值准则取得一致看法，那么，建立在“客观”理论和定量分析基础上的具体发展目标（如收入更加平等）和相应的政府政策（如，对较高收入按较高的税率征税），就能得以执行。然而，在决策制定者中存在严重价值观念的争论和分歧的地方，在理想的目标或适当的政策上取得一致的可能性，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始终是搞清他们的价值观念前提，在发展经济学这个领域里尤其如此。②

#### 2.4 西方经济理论的性质

分析一系列关键性的发展问题，需要对一般的经济概念和原理有一些基本的理解。不幸的是，传统经济学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既不中肯又不适用，因为它们是从先进工业国家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结构的特点中得出来的并与之相联系。

因此，让我们快速地考察一下经济理论，并简略地说明为什么许多所谓西方经济模式和理论不适用于研究第三世界的发展。这样做，便于我们较好地认识现代发展经济学独特的性质。

经济理论体现了这样一种方法，即：经济学家用概念将经济生活中相互依赖的部分，包括生产、消费、收入、价格、就业、进出口、储蓄及投资等组织起来。既然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涉及稀缺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最有效地用于生产社会产品的方式，那么，经济理论就由被普遍接受的有关经济行为的概念和原理的主体所构成，这些原理和概念如果经过适当的阐述和正确的编排，便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解释经济系统的运行。经济理论的方法或“思维过程”在性质上主要是演绎的，即：在已知的或假定的有关经济基本特征的一系列论据基础之上，提出假设，建立模式。模式或简单或复杂，但所有模式本质上都是现实的简化。从模式的特性或从模式范围内的实验出发，就能够依逻辑推导出一种经济或经济系统运行的有关结论。然而值得花费时间的是，各种模式需要通过统计学和统计方法的运用，不断地经受客观实际的检验。

任何经济理论或模式，最重要的是要能够解释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况。理论或原理必然是以简化了的假定和抽象为基础的，但它们应该是什么不能凭空而定。所确定的假定和抽象必须符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必须与观察和体验所标明的经济生活特有的面貌相适应。而且，对于一种在一定地点或时间的经济是正确的和适用的理论和原理，对于同时代的或不同时代的其它社会来说则未必正确。这就使我们得到一个有关经济学和发展问题的要点，它是本书结构和设计的主要理论基础。

### § 3 传统理论有限的适用性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那种传统的或西方新古典和新凯

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就其本身而言，对于理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经济过程的特有面貌的关系不大。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讲的最好，他反对不加批判地在贫穷国家使用传统的经济概念和理论。他说：

经济理论家比其它任何社会科学家更加长时期地倾向于得出一般的命题，然后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命题对于一切时代、地方和文化都正确。当代经济理论存在着遵循这条道路走向极端的趋向……理论和概念是适合于西方世界的特殊情况而提出的，因此包含了使之适应于有关社会现实的各种暗含的假定。但这些理论和概念不适合大发达国家的情况，把它们用于研究大发达国家的问题，其后果是严重的。<sup>③</sup>

波士顿大学教授保罗·斯特里顿的表述甚至更为简洁，他指出，“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工具似乎突然变得过时了”<sup>④</sup>。

虽然在此我们不打算深入涉及把西方经济模式作为理解和改善不发达状况的指南进行广泛批评的具体细节，但稍加概括性的评论还是必要的。

发达国家所讲授并通过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在发展中国家讲授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传统上一向被分做三大门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个别的经济单位，即基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与活动。而宏观经济学则把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研究的是象消费、储蓄、投资、货币供给、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与总价格水平等总合的或“宏观的”经济变量。国际经济学则考察既作为出口生产者、又作为进口消费者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货币关系，从而表现为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原理的结合。

把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广泛领域联系起来的概念结构和行为假定是：消费者自主权、完全竞争和利润最大化这三重

“观念”。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均衡与稳定的经济学，需根据非均衡、非稳定的发展中世界的情况加以修正。是它边际选择的、“多一点或少一点”的经济学，往往不适用于发展中世界，而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做出的重要基本选择是在最短的期间获得“更多”。

在微观经济理论中，假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一基本问题由全体消费者的总合偏好所决定，而这个总和偏好是由各种商品和劳务的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曲线表示出来的。它是假定生产者只对“有主权的”消费者偏好作出反映，假定他们受最大利润动机的驱使，在购买资源和出售其产品的平等条件下彼此竞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完全竞争”概念，是这个全部过程的中心。它假定所有的价格、工资、利率等都是由供求力量的自由作用所决定的，假定无数消费者和成千上万生产者中的每一个同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是如此之小，以致不可能达到单独影响所购销的商品、劳务和资源的市场价格和数量的程度。这种理论或经济活动模式的基本原理，就是亚当·斯密有关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的观念。如果每一个单个的消费者、生产者或资源供给者都追求个人利益，那么，他或她“仿佛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

不幸的是，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却使得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对于分析和制定政策来说都起不了多大作用。<sup>⑤</sup>竞争性的市场并不存在，而且，如果考虑到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制度、文化和历史的环境，即使从长期的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也并不一定合乎需要。作为总体的消费者对任何事都很少能自主，更不用说关于应该生产什么商品和劳务、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了。生产者不论是私人还是政府，在决定市场价格和销售数量方面都有着极大权力。竞争的观念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与现实很少有联系的观念。<sup>⑥</sup>最后，所谓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往往促进不了一般福利，并且提高那些本来已经很富裕了的人的福利同



时却降低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尽管从微观理论中可以学到许多关于“正确”的价格对高效率的生产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见第8—10章），但许多第三世界经济中制度与政治的结构——更不用说它们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了——往往使得这样合适的价格的实现非常困难，要尽极大的努力。

宏观经济理论的局限性更显而易见。简要地说，宏观经济理论（无论是采取“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形式的），也是透过竞争均衡、供给和需求的眼镜来观察经济及其制度的。不过在这里，人们论述的是国民产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决定。在经济中总需求水平越高，就业均衡和价格均衡水平也就越高。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政策方案，实质上依据这一理论。例如，在凯恩斯模式中，失业是由于对一国“潜在”产出（即作为整体的国家以最大能力所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的不足。因此，通过增加总需求（如扩大政府支出或减少税收），政府就能加速经济活动，理所当然地导致更高水平的就业。相反，当总需求超过了该经济的生产能力（总供给）并造成通货膨胀时，政府的作用就是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便减少消费者需求，制止价格的普遍上涨。

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理论应用到发展中世界的现实经济生活中甚至比微观经济学更加不行。<sup>①</sup>在生产、资源和金融市场高度分割的经济中，这一点尤其正确。上述典型的市场分割，是由工农业中现代和传统两种经营方式并存所致。它是不充分的、机能失调的信用体系和不发达国家普遍易受强有力的国外经济影响的脆弱性合成的。

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基本上不适用于第三世界的发展，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其一般理论是作为本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的特殊经济与制度状况的反映，而系统提出的。凯恩斯的许多宏观理论甚至被认为同今日发达国家也不相干，70年代

那里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失业或通货膨胀，而是“滞胀”（即，需求膨胀及结构性膨胀所伴随的失业，见第8章）。政府通过一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操纵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方法，看来已大大失灵了。结果，凯恩斯经济学日益受到批评，这些批评甚至来自发达国家中它以前的狂热支持者。⑥

既然在工业国家宏观理论同经济现实之间尚存在如此差距，那么，对于无论过去或现在制度和经济系统都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这种理论该是多么不适用呵！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看到的，为减少工业中失业者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政策——通过扩大政府诱导的总量需求来创造更多的城市职位——在贫穷国家一定的现实环境里，实际上却会提高城市的失业水平，这是由于这种政策所引起的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结果。同时，它还可能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也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篇所看到的，这并非是孤立的一个例子。不加鉴别地把标准的西方理论用于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时，可能产生许多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而一旦依据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来考虑传统理论时，那些原来看来似乎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自相矛盾的许多其它现象，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最后，我们将在第12章发现，事实上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相同的假定基础上的许多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于理解本世纪80年代富国和穷国之间国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结构的指导作用是有限的。谁从贸易中获利最大，利润如何分配，国际商品价格如何确定等，往往与传统的贸易和增长模式的判断很少有共同之处。

#### § 4 作为社会系统的经济：超出 单纯经济学的范围

为论述第三世界发展的复杂而又多方面的问题，前面对传统

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介绍性评论，大体上被限制在其性质、眼界和局限性的范围内。但经济学和经济系统，尤其是第三世界的，需要以广阔得多的视野，即在一个国家总的社会系统的环境内进行考察。“社会系统”，是指所谓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之间各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非经济因素包括：生活态度，工作与职权，公开的和隐蔽的官僚政治与行政的结构，亲属关系和宗教的类型，文化传统，土地占有制度，政府机构的权力及其是否完善，大众参与发展决策和活动的程度，经济与社会等级是否森严。

纵观全书我们将发现，解决发展问题、取得发展成就是一项比某些人试图使我们所相信的要远为复杂的任务。增加国民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和促进广泛就业既是对诸如储蓄、投资和汇率这些战略经济变量进行控制的直接结果，又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准则、鼓励办法，观念与信仰，社会制度与权力安排作用的结果。正如某些经济学家偶尔把他们的科学与普遍真理混淆起来一样，他们有时也由于这些非经济变量“不能用数量表示”，因而未必很重要，就错误地不加考虑。

但是，正如我们将在第二、三、四篇所看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发展政策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在分析中有意无意地把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如传统的财产权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或宗教信仰对有关现代化的观念和计划生育的影响）排除在外。尽管本书重点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性质及其对理解贫穷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问题的作用，我们同样将继续看到价值准则、观念和制度在总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式。

## § 5 作为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系统组成 部分的第三世界社会系统

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以上分析。正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活

不可避免地同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生活结为一体一样，这些国家的国内社会系统也同国际社会系统——世界经济的组织和行为准则，相互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控制和依附现象（见第3章）。这种控制和依附关系实际上渗透到各个方面。它们在国际经济事务，包括外援、国外私人投资、债务问题和技术转移中到处可见。而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团经常受到富裕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全球势力的支配。控制和依附关系也存在于政治、知识和文化领域。在这里，富国的许多价值准则、思想、宗教信条、法律、观念及制度等，渗入、影响并塑造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系统。

相反，发达国家正开始意识到它们自己最终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后者既是它们的制成品的市场，又是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例如，美国的出口中大约41%是运往发展中国家的。美国最大的20个贸易伙伴中，有11个是第三世界国家。事实上，在美国制造业部门中每六个职位中就有一个是由于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货物而存在的。在进口方面，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石油产品的依赖是众所周知的。美国燃料进口的80%仍然要依靠发展中国家，而欧洲和日本对能源的依赖要更大些。

石油并非是以前的依附经济能够开始对富裕的工业国家施加影响的唯一资源。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大量的世界性原材料资源，即使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仍主要受强大的多国公司所控制和管理。例如，赞比亚、智利、秘鲁及少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铜占世界80%；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提供的天然橡胶占世界50%以上；玻利维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占世界锡贸易的85%；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牙买加、苏里南和圭亚那几乎提供了发达国家铝土矿进口的90%。第三世界国家是主要供应者的其它关键矿物还包括：锰矿（加蓬、巴西和扎伊尔），铁矿（委内瑞拉和印度）和铅（秘鲁、墨西哥及其它国家）。

在商品出口方面，几乎全世界的咖啡供给是由巴西、哥伦比亚、肯尼亚、象牙海岸、乌干达和萨尔瓦多生产的；世界可可产量大部分是巴西和加纳生产的；世界大部分的茶叶来自于印度、斯里兰卡、东非和中国；世界2/3以上的黄麻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和尼泊尔。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几乎独自控制了世界闻名的石油资源的60%，虽然它们的人口还不及世界的1%。

这些统计资料突出了现已被普遍认识到的这样一种事实：今日的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这种相互依赖性在未来甚至可能更突出。不过，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占优势的富裕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政策，过去一直有并且总的说来现在仍然有着大得多的依赖性。即使承认如下事实，即许多发展中国家正试图单独或共同地实行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他们迫切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见第17章），然而，如不涉及上述的依附现象，要谈论第三世界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在7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争端已从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政治退出，并开始更多地集中于对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的不断竞争（许多自然资源位于第三世界国家），南——北（即穷国——富国）经济对抗的可能性显得加倍重要。在80年代，对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的这种国际竞争，已经显示出更加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和有关的争论，我们在第四篇进一步讨论。

因此，研究发展经济学，如不承认和不谈欠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和制度上对富国的持续依赖，以及富国对第三世界的出口市场和资源政策的日益依赖这双重现象，就会忽略各种发展努力之所以长期成功或失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在随后各章、特别是第二和第三篇中，对诸如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等关键性的发展问题的讨论，将不仅在单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系统这一广阔背景下讨论，而且在发展中国家是日益相互依赖但仍高度不平等的全球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这种国际背景里来进行阐述。我们将

发现，许多常见的力量在这个系统中运行着，而当不发达的各种问题既在国内又在全球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时，许多表面上不合情理的经济论点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 § 6 提要与结论

发展经济学是传统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延伸。尽管发展经济学必然也关心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总产出稳定的持续增长，但它主要集中研究那些能使第三世界国家贫苦大众的生活水平迅速和大规模改善所必要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的机制。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系统地阐述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影响整个社会主要经济、制度和社会的变革而制定的适当的公共政策。否则，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逐年扩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部门在发展经济学中起着比在传统（西方）的经济分析中更广泛、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涉及人以及如何最充分地为人提供物质手段，以帮助他们完全实现人类的潜能。但幸福生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因此，经济学必然会涉及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而我们对促进发展的关心，就体现了一种隐含的有关好（发展）和坏（欠发展）的价值判断。但“发展”对许多不同的人，会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因此，需要仔细地讲清发展的性质与特征以及我们所赋予它的含义。这将是第3章及全书其它地方的任务。

一切社会中心的经济问题，包括了诸如应该生产什么商品和劳务、在何处生产、怎样生产、生产多少以及为谁生产等传统的问题。但是，它们也应包含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在全国范围，谁或者哪一个集团实际地制定或影响经济决策，这些决策首先是为什么人的利益而制定的。最后，在国际范围有必要考虑这样的

问题：哪些国家和哪些强有力的国家集团，在有关使用全球有限的食物和矿产资源的供给问题上施加着最大的影响。此外，他们为谁行使这一权力？

对发展问题的任何现实分析，都要求用同样有关的非经济因素来补充，诸如收入、投资和储蓄等严格的经济变量。它们包括：土地使用安排的性质，社会和各阶层的影响，信用结构，教育与卫生体系，政府的官僚组织和动力，政府行政机构，大众对工作、闲暇和上进心的看法的种类，及政治和经济集团的价值准则、作用和观念。寻求提高农业产出、创造就业机会和根除贫困的经济发展战略过去之所以经常失败，是因为经济学家和其他政策建议人未将经济看成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和非经济的力量以此时自我增强而彼时相互矛盾的方式持续地相互作用着。

在所有国家（富国和穷国）的国际社会系统这一较广阔的环境里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社会系统是很重要的。这里，经常强调了这样的现象：一些小的权力集团（大多来自富裕国家），影响着全球的战略及第三世界国家相应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是由对东、西方工业国家的支配和依赖关系引起的。类似的脆弱性和支配——依赖关系，也常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人数相对较少但有势力的显贵之间。

然而，70年代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匮乏、80年代的外债问题与出口市场的继续缩小，作为前所未有的事件，大大增加了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依赖，并因此而大大发展了国际社会系统中所有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加拉加斯、开罗和加尔各答在生活方面发生的变化，将以种种方式显示出它们与纽约、伦敦和莫斯科的生活具有重要联系。曾有人说过，“美国打声喷嚏，世界就会染上肺炎”。而80年代更为恰当的表述或许是，“世界就象一个人的躯体，一处疼痛别处也有感觉，如果许多部位受伤，全

身都会难受”。

第三世界国家正是构成了全球有机体的“许多部位”。因此，它们未来发展的性质和特征对一切国家都将是利害攸关的，而不论其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倾向性如何。在20世纪的最后年代和21世纪，不再可能有两个前途——少数富国一个前途，其它大多数穷国一个前途。用一位诗人的话说，“前途只有一个，否则就根本没有前途。”

## 注 释

① 丹尼斯·古雷特的著作和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状况提供了两个极好的描述。它们作为阅读材料之1和阅读材料之2，刊印于我为补充本教科书而编的阅读书籍中，见M.P.托达罗（编），《为经济发展而斗争：有关问题和政策的阅读材料》，朗曼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对价值准则在发展经济学中作用的最优分析，见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纽约·帕森出版社1970年版，第1章；对经济学所有价值自由观点的更全面的批判，见罗伯特·海尔布伦纳：《作为一门“价值自由”科学的经济学》，《社会研究》1973年春季号第129—143页。

③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性事件，各国贫困的调查》，纽约帕森出版社1968年版，第16—17页。

④ 保罗·斯特里顿：《世界发展》1974年第4和第5号第83页。

⑤ 关于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是否正确，甚至对西方发达经济的批评，见E.费尔普斯-布朗：《经济学的不发达》；G.D.N.沃斯基克：《经济科学的进步是可能的吗？》；N.卡尔多：《均衡经济学的不当》，均载《经济学杂志》第82卷1972年3月第325号。

⑥ 虽然资源购买和产品售卖的垄断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传统的垄断理论很少说明这些公益事业和私人公司的日常活动。决策的规则能够广泛地随社会结构变化，因此，利润最大化同创造就



业或用当地人员替换外国移居来的管理者相比，可能是次要的目标（见第16章）。

⑦ 对凯恩斯经济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最早、最有力的批判之一，可见于达德利·西尔斯的有创见的论文，《特殊情况的局限性》，《牛津经济学和统计学学院公报》1965年5月号。

⑧ 例如，见加尔布雷斯，《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美国经济评论》1973年3月第1号1至11；里昂惕夫，《理论的假定和未观察的事实》，《美国经济评论》1971年3月号。然而，有关对凯恩斯经济学和发达国家的凯恩斯政策的坚定捍卫，见W.赫勒，《对经济学来说什么是正确的？》，《美国经济评论》1975年3月号。

## 概念复习

传统（西方）经济学

（Traditional (Western) economics）

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经济理论

（Economic theory）

经济模式

（Economic model）

消费者主权

（consumer sovereignty）

西方经济理论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第一世界

（First World）

“规律”与“趋势”

（“Laws”versus“tendencies”）

价值准则和价值前提

（Values and value permises）

社会系统

（Social system）

非经济变量

（Noneconomic Variables）

相互依赖性

（Interdependence）

经济和社会制度

（Economic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经济系统（国内和国际的）

第二世界  
(Second World)

第三世界  
(Third World)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Economic system,  
domestic and interna-  
tional)

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  
(Subsistence economy)

支配—依赖关系  
(Dominance—dependen-  
ce relationships)

## 问题讨论

1. 为什么你认为经济学对于理解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是如此重要?
2. 你认为第三世界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吗? 为什么?
3. 为什么应该怀疑那种认为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普遍适用的主张? 请解释。
4. 虽然经济理论的各种假定或命题在不同社会可能不同, 但经济学的“思维过程”应是相似的。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什么? 你能举出几个共同的思维过程的例子吗?
5. 你认为我们环绕世界的短暂旅行所发现的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 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是否也能够找到? 我们所说的不同“生活水平”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6. 你希望从这本发展经济学教程中获得什么(除了要取得及格成绩外)?
7. 价值准则和价值前提在经济学中为何如此重要?
8. 把经济作为社会系统来考察, 超出单纯的经济因素来分析发展问题, 为什么是重要的?
9. 你认为“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系统”这一表述的含义是什么? 当我们临近20世纪末时各国经济正以什么方式变得更为相互依存了呢?

## 第2章 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 结构和共同特点

当然，发展中国家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但是〕坚持它们之间不存在共同点必然会认为超越单个国家的范围讨论发展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牛津大学 朱利安·韦斯特

第三世界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的普遍贫困。

德里经济学院与哈佛大学 帕德玛·德赛

### § 1 多样性中的相似性

如果要从 143 个构成第三世界的联合国会员国中概括出很多共同点是很困难的。几乎所有国家都缺乏资金，但它们在文化和经济条件，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又是多种多样的。举例说，低收入国家既包括拥有 17 个邦和 7.4 亿人口的印度，又包括比美国大多数大城镇人口还少的、不到 10 万人的伯利兹。国家大带来了复杂的国家行政管理和全国团结问题，同时又带来了相对较大的市场，多种资源，自给自足和经济上可能多样化的好处。与此对照，许多小国则出现另一些相反的问题，包括市场有限，缺乏技

术，缺乏自然资源，讨价还价能力弱，几乎没有实行有效的自力更生的前景等等问题。

在对国家进行分类时，有些分析家利用联合国分类系统倾向于将第三世界分为三个组，被联合国称为“最不发达”的42个最穷的国家<sup>①</sup>，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88个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sup>②</sup>，和在70年代国民收入显著增加的13个盛产石油的输出国组织国家。其它分析家按照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建立的分类系统把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没有加入联合国的国家和地区）分为62个低收入国家（LICs，即那些1980年人均收入不足600美元的国家，包括29个最不发达国家），73个中等收入国家（MICs），11个新近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NICs），和13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表2.1提供了包括在经合组织分类体系中的159个国家的完整名单。

最后，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即更为人们所知的世界银行有它自己的分类体系。它把所有的国家分为六类：低收入国，中等收入国，中上等收入国，高收入的石油输出国，工业市场经济国，东欧非市场经济国。前四类包括了第三世界的143个国家，而后两类代表了29个所谓的第一和第二世界国家。本章后的表2.2大致按世界银行的分类体系以及每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料提供了这172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完整名单。

尽管国家和分类体系多种多样，但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一系列共同的明确目标。这些包括改善贫困状况和不平等状况及减少失业人数；向每一个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教育、卫生、住房和食物；扩大经济和就业机会；造就一个团结的民族国家。与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目标相联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共同的难题：广泛长期的绝对贫困；不断增长的严重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不断扩大的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低下、停滞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大的、而且还在扩大的城乡生活水

平和经济机会的不均衡；过时的、不适用的教育卫生系统；严重的国际收支和国际债务问题；对通常是不适用的外国技术、制度、价值体系的严重并还在增长的依赖。因而谈论紧迫的发展问题的相似之处，并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分析这些问题不但可能，而且有益。这将是我们在第二、三两篇中的任务。

目前我们试图找出发展中国家中的某些最重要的结构上的差异，然后提出相应的资料描述它们的某些最普遍的特征。尽管具有物质、人口、历史、文化和结构上的明显差异，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难题，正是这些决定了它们都属于不发达国家。

表2.1 按收入组列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类体系

62个低收入国家 (LICs)		
1. *阿富汗	13. *科摩罗	25. 印度
2. 安哥拉	14. 吉布提	26. 柬埔寨
3. *孟加拉国	15. 埃及	27. 肯尼亚
4. *贝宁	16. 萨尔瓦多	28. *老挝
5. *不丹	17. 赤道几内亚	29. *莱索托
6. 玻利维亚	18. *埃塞俄比亚	30. 利比亚
7. 缅甸	19. *冈比亚	31. 马达加斯加
8. *布隆迪	20. 加纳	32. 马拉维
9. *佛得角	21. *几内亚	33. 马尔代夫
10. *中非共和国	22. *几内亚比绍	34. *马里
11. 中国	23. *海地	35. 毛里塔尼亚
12. *乍得	24. 洪都拉斯	36. Mayotte

(续前表)

37. 莫桑比克	46. 索罗门群岛	55. *乌干达
38. *尼泊尔	47. *索马里	56. *上沃尔特
39. *尼日尔	48. 斯里兰卡	57. 瓦努阿图
40. 巴基斯坦	49. *苏丹	58. 越南
41. *卢旺达	50. *坦桑尼亚	59. *北也门
42. 圣赫勒拿	51. 多哥	60. *南也门
43.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52. 托克劳群岛(英属)	61. 扎伊尔
44. 塞内加尔	53. 汤加	62. 赞比亚
45. 塞拉利昂	54. 图瓦卢	

63 个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 (MICs)

1. 巴哈马	11. 刚果	21. 危地马拉
2. 巴林	12. 库克群岛	22. 法属圭亚那
3. 巴巴多斯	13. 哥斯达黎加	23. 圭亚那
4. 伯利兹	14. 古巴	24. 以色列
5. 百慕大	15. 塞浦路斯	25. 象牙海岸
6. 博茨瓦纳	16. 多米尼加共和国	26. 牙买加
7. 文莱	17. 福克兰群岛	27. 约旦
8. 喀麦隆	18. 斐济	28. 基里巴斯
9. 智利	19. 直布罗陀	29. 黎巴嫩
10. 哥伦比亚	20. 瓜得罗普	30. 澳门

(续表前)

31. 马来西亚	43. 巴拿马	54. 叙利亚
32. 马耳他	44. 巴布亚新几内亚	55. 泰国
33. 马提尼克	45. 巴拉圭	5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4. 毛里求斯	46. 秘鲁	57. 突尼斯
35. 摩洛哥	47. 菲律宾	58. 土耳其
36. 瑙鲁	48. 法属波里尼西亚	59. 乌拉圭
37. 荷属安的列斯	49. 留尼汪	60. 瓦利斯群岛和富 库纳群岛
38. 新喀里多尼亚	50. 圣皮埃尔岛 和密克隆岛	61. 西萨摩亚
39. 尼加拉瓜	51. 塞舌尔	62. 西印度群岛
40. 纽埃岛	52. 苏里南	63. 津巴布韦
41. 阿曼	53. 斯威士兰	
42. 太平洋群岛(美)		

11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或地区 (NICs)

1. 阿根廷	5. 南朝鲜	9. 西班牙
2. 巴西	6. 墨西哥	10. 台湾
3. 希腊	7. 葡萄牙	11. 南斯拉夫
4. 香港	8. 新加坡	

### 13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OPEC)

1. 阿尔及利亚	6. 伊拉克	11. 沙特阿拉伯
2. 厄瓜多尔	7. 科威特	12.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 加蓬	8. 利比亚	13. 委内瑞拉
4. 印度尼西亚	9. 尼日利亚	
5. 伊朗	10. 卡塔尔	

• 29个最不发达国家(LLDC)

## § 2 第三世界多样化经济结构概况

关于发展中国家结构的多样化,我们能够列出七个要点,包括:

- (1) 国家的大小(国土,人口和收入);
- (2) 历史的演变;
- (3) 物质和人力资源状况;
- (4) 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比重;
- (5) 工业结构的种类;
- (6) 对外国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依赖程度;
- (7) 国内权力的分配和政治与制度的结构。

以下我们从亚、非、拉国家的相似点和不同点的具体材料,简要地考察上述各个要点。

### 2.1 国家的大小与收入水平

很明显,一个国家的自然规模、人口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是这个国家经济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区分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主要因素。作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143个发展中国家中的104个国家,人口不足1500万,75个国家的人口不足500万。人口稠



密的大国像巴西、印度、埃及和尼日利亚与像巴拉圭、尼泊尔、约旦和乍得这样的小国并存。国家大通常带来资源多样、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较少依赖外国材料和产品的好处。但它也引出了行政控制、民族团结和地区不均衡等问题。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中所看到的，一个国家的大小与它的国民收入水平以及这收入的分配是否平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除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富裕的产油国家，甚至像印度这样的有7.4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年人均收入水平还不足265美元，而邻近的不足260万人口的新加坡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超过了5900美元。

## 2.2 历史背景

大多数非洲和亚洲国家过去都曾曾是西欧国家的殖民地，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但也有些是比利时、荷兰、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它们的经济结构、教育与社会制度都一直按照它们以前的殖民统治者的模式建立的。因而，那些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关心的不是单纯地迅速发展经济，而是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政治组织。因此它们的政策（例如前殖民国家居民担任的文官职务的迅速非洲化）反映了它们对这些刻不容缓的政治问题更为关心。

在拉丁美洲，较长的政治独立的历史加上较普遍的殖民传统（即西班牙的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意味着尽管在地理上和人口上是形形色色的，但这些国家都具有相类似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亚洲，不同的殖民传统和当地民族的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使各国形成了不同的制度与社会模式；例如印度（英国的），菲律宾（西班牙和美国的），越南（法国的），印度尼西亚（荷兰的）。

### 2.3 物质与人力资源天赋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受它的物质资源情况（它的国土、矿藏和其它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情况（包括人口数量和他们的技术水平）影响。有幸得到天赋物质资源好处的极端例子自然是波斯湾各产油国了。另一个极端是乍得、也门、海地和孟加拉等国，在这些国家中原材料、矿藏和肥沃的土地相对说是最少的。

在天赋人力资源方面，不仅人口的绝对数目及其技术水平是重要的，他们的文化素养、对工作的态度、上进心也都重要。而且行政管理水平往往决定国营部门改变生产结构的能力和能够改变这种结构的时间。这里涉及文化、传统、宗教、种族、部落的分裂或团结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因此，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性质和特点是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见第11章），而且不同地区之间显然有差别。

### 2.4 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比重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是混合经济系统，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既有国营的又有私营的部分。两者的划分以及它们的比重主要是历史和政治形势作用的结果。因而，一般说来拉丁美洲国家比亚洲，特别是非洲国家存在更多的私营成分。私营成分中外国资本的比重是区别欠发达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变量。外国占有的大私营部门既会经常带来外国投资不多的那些国家所没有的问题，也会创造出一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机会。像非洲国家那样有技术的人力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总认为通过协调而不是分割管理活动和企业的活动，可以最充分地利用其有限的技术力量。以这种假设作为根据，它们通常倾向于把重点进一步放到国营部门的活动中。然而，加纳、塞内加尔、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家的许多国

营企业普遍经济破产、财务拮据，使人们对这种假设是否有根据产生许多疑问。

例如，促进更多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在国营成分多的国家和私营成分相当大的国家中自然不同。在国营成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中，会优先考虑政府直接投资项目和农村工程计划，而在私营为主的经济中，政府的政策很可能会优先采取通过减免税收的办法刺激私人企业家多雇佣工人而不会直接增加国营部门的就业。因而，虽然问题可能是相似的（广泛的失业），但在国营经济成分和私营经济成分比重不同的国家中，解决的办法就会不一样。

## 2.5 产业结构

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国。如果不是从国民总产值所占的比重看，而是从整个劳动力中的职业分布情况看，农业，不管是自给农业还是商品化农业，都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正如我们在第10章中将要看到的，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农业不仅是个职业，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过在拉丁美洲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农业系统的结构和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都很不相同，而亚洲的农业系统在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上与拉丁美洲似乎更为接近。然而，文化上的更大差异冲淡了拉丁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这种相似之处。

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变化最大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有较长的独立历史，一般说来比非洲和亚洲国家国民收入水平高，拥有较先进的工业部门。但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像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大加速了制造业产品的增长速度，正迅速成为工业化国家。如果单纯从规模讲，印度拥有第三世界国家最大的制造业部门，然而与印度巨大的农业人口比它又很小。表2.2提供了美国和英国以及17个发展中国家农业与制造业间的劳动力分配和国内生产

总值 (GDP) 的百分比资料。这些国家产业结构之间,特别是农业所占比重的悬殊差别是惊人的。

因此,尽管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会由于每个国家的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商业、金融、运输和服务业)的性质、结构和相互依赖程度而异。

表2.2 17个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和英国1982年的产业结构

劳动力的百分比		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农 业	制 造 业	农 业	制 造 业
非洲:			
坦 桑 尼 亚	83	6	52
肯 尼 亚	78	10	32
尼 日 利 亚	54	19	23
乌 干 达	83	6	75
扎 伊 尔	75	13	32
亚洲:			
孟 加 拉 国	74	11	54
印 度	69	13	37
印 度 尼 西 亚	55	15	24
菲 律 宾	46	17	23
斯 里 兰 卡	54	14	28
南 朝 鲜	34	29	17

(续前表)

劳动力的百分比			占国内总产值的百分比	
农 业		制 造 业	农 业	制 造 业
拉丁美洲：				
墨 西 哥	36	26	8	22
危 地 马 拉	55	21	—	—
哥 伦 比 亚	26	21	27	21
巴 西	30	24	13	27
秘 鲁	39	18	9	25
委 内 瑞 拉	21	18	27	15
美 国	2	32	3	23
英 国	2	42	2	20

资料来源：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附件表3和21（这个来源以后的参考资料将由适当年份的《世界发展报告》提供）。

## 2.6 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对外依赖

一个国家对外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势力的依赖程度主要与这个国家的大小、自然资源状况和政治历史相联系。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这种依赖是大量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依赖几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部分的小国极度依赖与发达世界的对外贸易（见第12章）。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进口外国通常是不适用的生产技术具有依赖性（第8章）。这一事实本身就会对这些具有依赖性国家的成长过程的性质，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在以国际物资和技术转移等严格的经济形式而出现的

依赖性之外，还存在制度（最明显的是教育和卫生体制），价值观念，消费模式和对生活、工作和对自我的态度的国际传播。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要说明这种传播现象对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极大潜力、更多依靠自己的国家既有好处又有坏处。一个国家掌握自己经济和社会命运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对这些和其它的外来势力的依赖程度。

## 2.7 政治结构、权力和利益集团

最后，往往并非仅由经济政策本身是否正确来决定国家对关键性发展问题处理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权贵统治阶层（例如大土地所有者、城市的实业家、银行家，外国的工厂主，工会领导者）的既得利益和是否忠诚会根本上决定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主要障碍在什么地方。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不同部分中的权力和利益集团本身就是这些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产物，而且看起来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在拉丁美洲的大地主中权力的特殊分配是什么样的，也不管非洲的政客和高级公务人员是些什么人；也不论中东石油国的酋长和金融巨头是哪些，或者也不管亚洲的地主、放债者和富裕的实业家怎么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那些发达国家相比，在更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由少数有势力的上层人物统治着。

因此，有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或者要求通过说服或强迫取得上层人物的支持，或者这些人被更为强有力的力量推到旁边。不管怎么说，本书从头至尾要时时重复这一点，没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例如土地占有制度、教育结构、劳动力市场关系、物质和货币资产的分配与控制、税法和继承法、信用的提供等等的变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可能的。

### § 3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前边几节已经说明为什么要从亚、非、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国家中过多地引出一一般性的结论来有时是不保险的。然而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特征却使得我们可以从广义的类似结构中去观察它们。在本节中，我们试图确认这些相似性，而且提供一些解释性资料以说明这些相似点的存在。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些共同特点归结为六条：

- (1) 生活水平低；
- (2) 劳动生产率低；
- (3) 人口增长率高和扶养负担重；
- (4) 高度的、并还在提高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水平；
- (5) 对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的严重依赖；
- (6) 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

#### 3.1 生活水平低

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往往很低。不仅与富裕国家大部分人比是这样，就是和他们本国少数上层人物集团比也往往是如此。这种低生活水平以低收入(贫穷)、住房不足、卫生条件差、受教育有限或根本没有受过教育、婴儿死亡率极高、预期寿命和预期工作年限低、在许多情况下存在普遍的不安和失望等等形式，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显示出来。我们可以看一看不发达国家与经济上较为先进的国家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最近进行比较得出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虽然是按国别统计的，统计上往往有重大错误，而且在某些具体情况下由于换算率的变化也并不是严格可比的，但它至少能说明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生活水平的大致情况。

**人均国民收入** 人们通常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说明不同国家人民相对福利状况的概要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本

身是衡量经济活动综合水平最常用的标准。例如，到1984年，世界所有国家生产总值超过125 000亿美元，其中97 500亿美元是在经济发达国家生产的，同时，只有不到27 500亿美元是在欠发达国家生产的。当考虑到世界人口的分布时，这意味着世界总收入大约78%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不到世界人口1/4的人生产的。因此，其余3/4以上的世界人口只生产世界总产品的22%。更重要的是在收入方面：第三世界占世界人口几乎76%，但只靠27%的世界收入生活。不发达国家总体的人均收入平均不到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1/12。

图 2.1 说明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注意，瑞士 1982 年的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穷国家之一、孟加拉国的 100 多倍，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印度的 60 多倍。表 2.2 提供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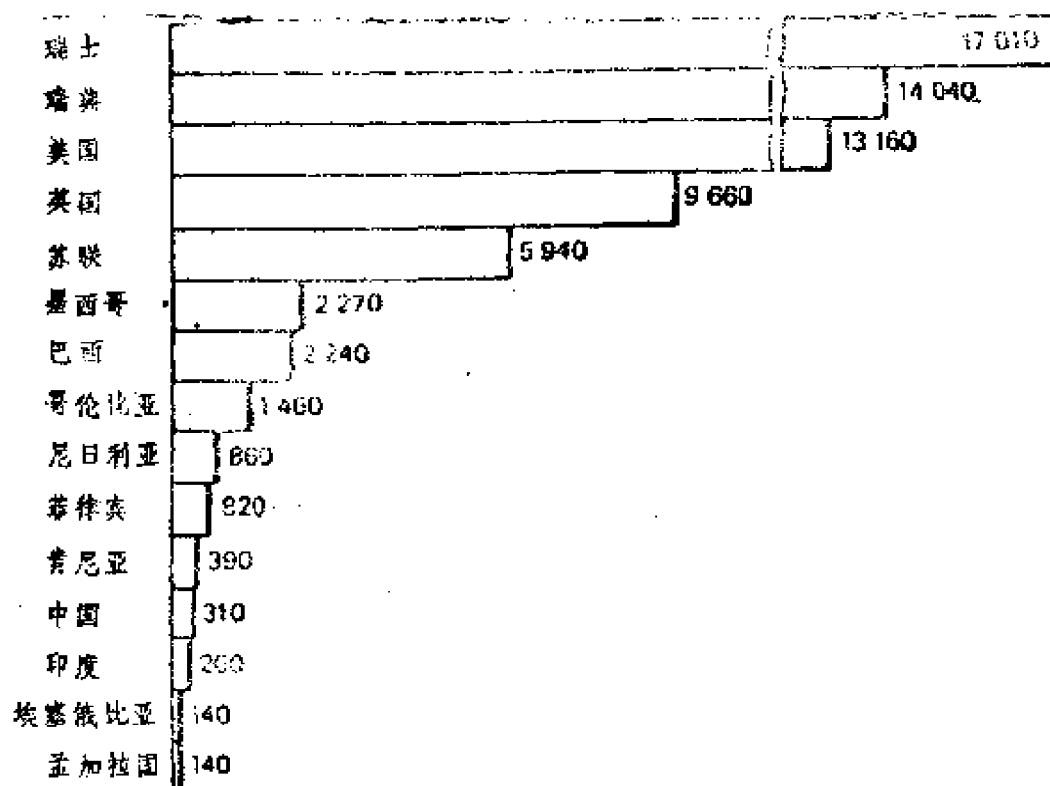


图 2.1 一些国家 1982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4 年世界发展报告》，附件表 1。



所有国家人均收入数字和其它有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sup>④</sup>

**国民收入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除了人均收入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以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速度也比发达国家慢。例如，被联合国分类体系称为“欠发达”的最穷国家（不包括印度和中国）在1960年到1982年期间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只达到1.1%。同一时期由联合国归入“发展中”国家的会员国的平均增长率大约是3.2%。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第三世界非产油国每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3.1%。

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4%。这意味着富裕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每年2.3%的比率扩大了。虽然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比工业化国家增长得快一些（3.8%比3.4%），但是由于前者是在低得多的基础上起步的，所以所有的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继续在扩大。而且，当我们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2.1%，而发达国家只是0.5%时（见表A 2.2），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鸿沟则以1.9%的年率扩大了。<sup>⑤</sup>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60年代和70年代——头两个“发展的10年”中——在第三世界最穷困的国家中（即人口增长率几乎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同的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几乎没有什么提高。无怪乎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富人财富越来越多，穷人孩子越来越多！”

表2.3提供了与表2.2相同的17个发展中国家从1960年到198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和趋势的比较资料。

**国民收入的分配** 富国与穷国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不是它们在经济上不平等不断扩大的唯一表现。为了能够正确评价第三世界贫困情况的广度和深度，有必要看一看单个不发达国家内穷人与富人的鸿沟不断扩大的情况。我们在第5章将更详细讨论

收入分配和平等问题，但在这儿做一些评论也是适宜的。

表2.3 1960年到198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每年平均增长的百分比)

非洲，	
坦桑尼亚	1.9
肯尼亚	2.8
尼日利亚	3.3
乌干达	1.1
扎伊尔	-0.3
亚洲，	
孟加拉国	0.3
印度	1.3
印度尼西亚	4.2
菲律宾	2.8
斯里兰卡	2.6
南朝鲜	6.6
拉丁美洲，	
墨西哥	3.7
危地马拉	2.4
哥伦比亚	3.1
巴西	4.8
秘鲁	1.0
委内瑞拉	1.9

资料来源：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附件表1。

首先，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我们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可以找到穷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然而，一般说来穷富之间的鸿沟在欠发达国家比在发达国家要大。例如，如果将各国最穷的40%人口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与最富的20%人口所占份额作为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指标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象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委内瑞拉、肯尼亚、塞拉利昂、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这类国家在收入上存在很大的不平等现象。其它的象印度、坦桑尼亚、智利、法国、丹麦和联邦德国存在着中度的不平等现象，而台湾、利比亚、以色列、南斯拉夫、加拿大、日本、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总的来说较小。此外，在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或伴随关系。菲律宾与台湾的人均收入虽处在相同的低水平上，但是菲律宾人口中上层的20%和底层的40%之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要大得多。与此类似，委内瑞拉与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一样高，但分配给底层40%人口的收入所占百分比却低得多。<sup>①</sup>这个现象使这个重要论点更加突出，即，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总收入或人均收入的水平和增长率去衡量，我们还必须考虑这些收入是如何在人口中分配的——这就是说还要问，什么人从发展中得到好处。

**贫困的范围** 任何国家贫穷的范围和程度都取决于两个因素：（1）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2）国民收入分配中不平等的程度。很明显，在任何人均国民收入的既定水平上，分配越是不平等，贫穷的就越多。与此类似，对任何既定的分配来说，平均收入水平越低，贫困的范围就越大。但是，人们怎样才能从一些有意义的数量中去衡量贫困呢？

在70年代，由于对贫穷问题的重视增强了，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尝试建立一般贫困线，在衡量国家内和国家间贫困的程度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现在已广泛使用的“绝对贫

困”的概念。它意味着去描述为保证“继续生存”而取得吃、穿、住等基本物质需要所必须的生活收入特定的最低水平。但是，当人们承认最低生存水平在不同国家与地区是变化的时候，就出现了难题。这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心理要求不同。然而经济学家为了避免把问题不切实际地夸大，倾向于对世界的贫穷问题做保守的估计。一个通常的方法是，比如说以75个不变价值美元（如以1970年美元价值为基准）为标准建立一条“国际贫困线”，然后再去估算相当于这个数目的美元的“同等购买力”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额。

表2.4介绍了绝对贫困的范围（一个国家实际收入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和绝对贫困的人数多少（可以被划为“绝对贫困”的人的实际数字）的一些估计数字。这35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资料来自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阿鲁瓦利亚、卡特和钱纳里所作的著名研究报告。该报告用的是1983年的人口数字和1975年对贫困的估计。作者应用保守的估计数字得出结论，第三世界人口中几乎40%的人正在绝对贫困水平上挣扎。在许多人口密集的低收入国家中，这个百分比还要高得多。这些国家包括象孟加拉国(60%)，印度(46%)，印度尼西亚(62%)等国。从表2.4可以看到，在我们所举的这个实例中，从总人数说，104 600万以上的亚洲人、7 400万拉丁美洲人和17 100万非洲人仅仅得到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如果我们再拿1983年发展中国家的总人口（35亿）乘上代表总人口中低于贫困线的平均百分比（35%）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在80年代初，有12亿人可以归入受到绝对贫困煎熬的范围。如果我们接受中国所说的它已经消灭了贫困的说法（见第10章），实际数字倒很可能在87 300万人左右。这也是世界银行最近的和最为可靠的估计数字。但即使如此，世界银行仍然指出，1983年，世界人口的27%挣扎在贫困线上！

表2.4 1983年35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低于贫困线的人口

国 家	1981年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 (\$)	1983年 人 口 (百万)	贫困人口 的百分比*	贫困人口 数 量 (百万)
拉丁美洲 (所有国家)	2063	390.0	19	74.1
阿根廷	2560	29.1	3	0.9
巴 西	2220	131.3	8	10.6
智 利	2770	11.5	9	1.0
哥伦比亚	1380	27.7	14	3.8
危地马拉	1140	7.9	10	0.8
墨西哥	2260	75.7	10	7.6
秘 鲁	1170	19.2	15	2.9
委内瑞拉	4220	18.0	5	.9
亚洲 (不包括日本)	968	2616.0	40	1046.4
孟加拉国	140	96.5	60	57.8
緬 甸	190	37.9	56	21.2
印 度	260	730.0	46	335.8
印度尼西亚	530	155.6	62	96.4
伊 朗	N/A	42.5	8	3.4
马来西亚	1840	15.0	8	1.2
巴基斯坦	350	95.7	34	32.5
菲律宾	790	52.8	29	15.3
南朝鲜	1700	41.3	6	2.5
斯里兰卡	300	15.6	10	1.6
台 湾	2360	18.9	4	0.8
泰 国	770	50.8	23	11.7
土 耳 其	1540	49.2	11	5.4

续前表

国 家	1981年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 ( \$ )	1983年 人 口 ( 百 万 )	穷 困 人 口 的 百 分 比 *	穷 困 人 口 数 量 ( 百 万 )
非洲				
(所有国家)	783	613.0	33	171.0
埃 及	650	45.9	14	6.4
埃 塞 俄 比 亚	140	31.3	62	19.4
加 纳	400	13.9	19	2.6
象 牙 海 岸	1 200	8.9	14	1.2
肯 尼 亚	420	18.6	48	8.9
摩 洛 哥	860	22.9	16	3.7
尼 日 利 亚	870	84.2	29	22.7
塞 内 加 尔	430	6.1	29	1.8
苏 丹	380	20.6	47	9.7
坦 桑 尼 亚	280	20.5	46	9.4
突 尼 斯	1 420	6.8	9	0.6
乌 干 达	220	13.8	45	6.2
扎 伊 尔	210	31.3	49	15.3
赞 比 亚	600	6.2	7	0.4
所有发展中国家	728	3 519.0	35	1 232.0

\* 第三栏中穷困人口的百分比是阿鲁瓦利亚等人估计的1975年的数字。他们后来用1983人口数计算了1983年，即第四栏的穷困人口估计数。

资料来源：第一栏和第二栏：人口调查局，《1983年世界人口资料表》，华盛顿特区1983年版；第三栏：M.S.阿鲁瓦利亚、N.卡特和H.钱纳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贫困》，《发展经济学杂志》1979年9月第6期表1和表2。

最后，从表2.4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注意到，人均收入高并不一定会消除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存在。由于分配给不同阶层人口组的国民收入的实际份额在不同国家中很不一样，所以国际贫困

问题在人均收入水平具有很大差异的国家中可能同样严重。例如，我们如果把表 2.4 中的墨西哥和南朝鲜比较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墨西哥在 1981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墨西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百分比仍然比南朝鲜的大得多（10% 比 6%）。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收入水平大致相同，但其低于贫困线人口的比例却是斯里兰卡的 3 倍以上（34% 比 10%）。即使对统计误差进行调整之后，这些结果也仍然是惊人的。

**卫生状况** 除了与低收入进行斗争外，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人还经常与营养不良、疾病和恶劣的卫生状况进行斗争。世界最不发达国家 1984 年的预计寿命平均大约是 49 岁，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是 57 岁，而发达国家是 72 岁。婴儿死亡率（即 1 000 个分娩成活的婴儿中不满一年的死亡数）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平均约为 124，而其它欠发达国家是 86，发达国家是 18。图 2.2 显示了一些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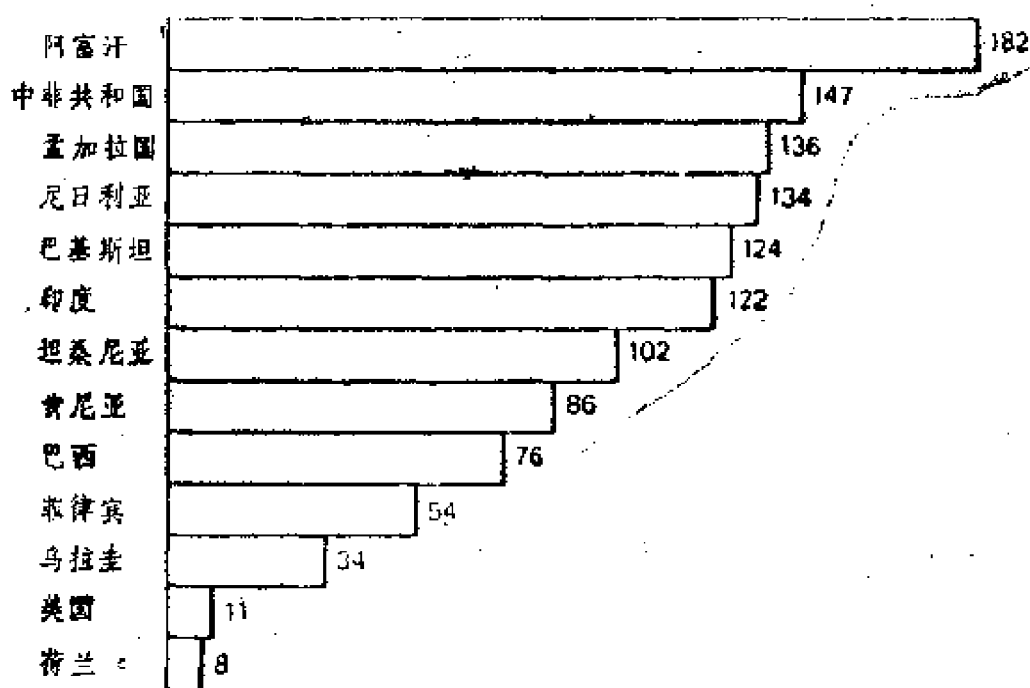


图 2.2 一些国家 1984 年的婴儿死亡率 (每一千个分娩成活婴儿中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人口调查局：《1984 年世界人口资料表》。

的具体例子。

表2.5甚至揭示出更多的问题。1975年10亿以上的人，也就是发展中世界一半的人口（不包括中国）吃不饱肚子，缺乏必要的能产生热量的食物。他们之中1/3是不到两岁的儿童。这些人集中在最穷的国家里，而且集中在这些国家中收入最低的那些阶层里。无论在亚洲或非洲，60%以上的人口只能获得维持适当健康所必须的最低的热量要求。此外，据估计亏缺的热量合计不到70年代世界谷物产量的2%。这就与许多人持有的营养不良是世界人口与世界食品供应之间不平衡的必然结果的观点相矛盾。世界收入分配的巨大的不平衡状况似乎是更为可信的解释。因而，营养不良和卫生状况恶劣与食品生产问题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的，也是同样重要的有关贫穷的问题，虽然这二者是间接关系。

表2.5 1975年消费食物的热量低于需要的人口

地 区	人数(百万)	人口百分比
拉 丁 美 洲	112	36
亚 洲	707	63
中 东	81	33
非 洲	193	61
总 计	1 073	55

资料来源：S. 鲁特林格、M. 塞鲁斯基，《营养不良与贫困：数量与政策选择》，巴尔第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出版）。

经常使用的另一种测定营养不良的方法是人均每日蛋白质消费量。它可以从高的如美国的每天97克到巴西的63克，印度的48克和加纳的43克。在世界谷物消费方面，发达国家70年代平均每人每年大约消费650公斤，对比之下欠发达国家是180公斤。



最后，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地方，医疗工作是一种格外稀缺的社会服务。最近的资料显示，在80年代初期，最不发达国家中每10万人平均只有9.7个医生。与之相对照，发达国家平均有158个医生。医院病床与人口的比率在这两类国家之间也同样悬殊。此外，如果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医务人员集中于仅居住着25%人口的城市地区时，那么提供给穷苦大众的卫生服务工作不足得可悲也就一清二楚了。例如在印度，80%的医生在只居住着20%人口的城市地区行医。在玻利维亚，住在城市里的人只有1/3，但90%的医护人员都在城里。最后，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人口与医生的比例是672比1，而在87%人口居住的乡间这个比例是20 000比1。

**教育** 要说明充斥第三世界国家的异常低的生活水平，最后我们需要考虑教育机会的普及问题。试图提供小学教育机会或许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的最有意义的努力。大多数国家教育开支占政府预算的最大部分。然而，尽管在入学人数方面有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比较，文化水平仍是惊人地低。例如，在最不发达国家中，识字率平均只有人口的37%（见表A2.2）。第三世界其它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识字率大约分别是63%和97%。此外，正如我们在第11章中指出的，很多提供给学龄儿童的教育不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而且往往与国家发展的需要无关。

总结到现在为止的讨论，我们可以列出发展中国家下列共同特点：

（1）国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国民收入增长率在许多国家中比较缓慢。

（2）人均收入水平低，其中许多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率处于停滞状态。

（3）人口中收入高的20%的人的收入所得，往往是底层40%的人的收入所得的5至10倍的高度畸形的分配模式。

(4) 作为以上1—3条的结果，第三世界大部分人口受到绝对贫困之苦，各地共有8.5亿到12亿人靠每年不到100美元的仅能生存的收入过活。

(5) 人口中的很大部分人受到卫生状况恶劣、营养不良和使人衰弱的疾病之苦，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10倍。

(6) 教育方面的文化水平低，中学退学率高，教育课程和教学设施不足并且往往不切实际。

最重要的是以上所有这些特点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势必使影响第三世界大众寿命的普遍“贫穷、愚昧和疾病”问题进一步恶化和永久化。

### 3.2 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除了生活水平低以外，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是发展中国家的又一特点。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系统显示产出与投入各要素不同组合之间关系的生产函数概念，通常被用来说明社会所从事的满足物质需要的方式。但是生产函数技术上的概念还需要由包括管理能力、工人的能动性、制度上的灵活性等“其它”更广泛的投入加以补充。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较，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人的产出）都极低。许多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例如，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原理表明，如果可变因素（劳动）的数量不断加到一定数量的其它因素（例如资本、土地、设备）上，那么在超过某一数量之后，可变因素的额外产量或边际产量就会下降。所以，劳动生产率低可以由没有或严重缺乏诸如实物资本或有经验的管理等“补充”投入要素来解释。

根据这种观点，为了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动员国内的储蓄和国外资金在实物资本货物上的投资，并且通过教育与训练的投资建立起人力资本（例如管理技术）贮备，为了使这种实物和人

力投资的潜力达到最大，体制上的变革也是必要的。这种变革可以包括土地使用权、公司税法、信贷和银行体制的改革，包括建立和加强一个独立的、忠诚的和有效率的行政机构，调整教育和训练计划等各种措施，使它们更适合发展中社会的需要。要想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战略目标获得成功的话，就必须将这些和其它输入“社会”生产函数的非经济投入考虑进去。有一个古老的谚语说：“你可以把马引到河边，但不能强迫它喝水。”在欠发达国家，下边这句话也同样正确，即：“为了自我改进，你可以创造经济机会，但是没有适当的体制上和结构上的准备，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我们还必须重视由工人和管理人员对自我改进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必须考虑他们的机敏程度、适应性、事业心以及他们对革新和实验的积极程度；必须考虑他们对体力劳动、纪律、权威和被使用时的可能的态度。把这些加在一起就会是令人满意地做工作的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

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最清楚地显示了发展中国家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与低收入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大家都知道儿童时代的营养不良会严重限制一个人体力和智力的成长。<sup>④</sup>饮食习惯不良，食物欠缺和个人卫生条件差在后来又会引起工人健康的进一步恶化，而且会因此不幸地影响他对工作和他周围人的态度。劳动生产率低不一定都由于营养不够，也可能是因为身体上感觉懒散、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对承受竞争性工作的日常压力感到无能为力。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低生活水平和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自我强化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且它本身又是不发达的基本表现形式和造成不发达的因素。缪尔达尔著名的不发达国家循环和累积因果论就是基于低生活水平和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sup>⑤</sup>

### 3.3 高人口增长率和抚养重担

1985年，全世界大约48亿人口中，3/4以上的人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里，不到1/4的人生活在较为发达的国度中。两类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显著不同。在欠发达国家中，出生率一般都很高，都在35%至40%人的相似水平上，而发达国家的出生率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确实，正如表2.6所显示的，人口出生率（每1000人每年成活分娩的数目）或许是区别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很少有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低于30%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高于30%。

死亡率（每1000人每年死亡数）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比在发达国家高，但是因为卫生条件改善并且控制住了重要的传染病，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死亡率上的区别比出生率上的区别要小得多。因而第三世界国家每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现在大约是2.1%（不包括中国是2.4%），与此对照，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率每年是0.6%。

欠发达国家高出生率造成的主要影响是，15岁以下的儿童几乎占这些国家全部人口的一半，而在发达国家中则约占全部人口的1/4。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业劳动力必须抚养的儿童的比例几乎是富裕些国家的一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的比例则大得多。儿童和老人是社会中的非生产性人员，因而必须由国家的劳动力（通常定义为15岁到64岁之间的那些人）抚养，在这个意义上，通常把他们称为经济上的“抚养重担”。综合抚养重担（即老人和儿童都包括在内）在发达国家只占人口大约1/3，而在欠发达国家中则占人口的一半。此外，在下列的国家中，90%以上的被抚养人是儿童，而在较富裕的国家中儿童仅占66%。

因此，结论是，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是以人口增长率较高为特

表2.6 世界人口出生率

千分率	国 家
50	埃塞俄比亚、马里、肯尼亚、多哥、利比里亚、赞比亚、象牙海岸、也门、尼日利亚、孟加拉国
45	扎伊尔、塞拉利昂、乌干达、摩洛哥、苏丹、刚果、玻利维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40	莱索托、缅甸、伊朗、厄瓜多尔、秘鲁、南非、柬埔寨、埃及
35	印度、委内瑞拉、巴拉圭
30	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土耳其、牙买加、巴拿马、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巴西、北朝鲜
25	以色列、南朝鲜
20	波兰、苏联、中国、爱尔兰、乌拉圭
15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希腊、古巴、西班牙
10	瑞士、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日本

资料来源：人口调查局，1984年人口资料表。

征，而且他们还必须与比富裕国家更大的扶养重担作斗争。使得人口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的环境和条件是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们将在第7章中仔细考察的问题。

### 3.4 高水平的、不断增长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低的一个基本表现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利用不充分或效率低下，这也是造成生活水平低的一个因素。劳动力利用不充分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表现为不充

分就业——不管在乡村或城市都有一些人工作得比他们所能够做的工作（每天，每周或每个季节）为少。不充分就业还包括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全天工作但是效率低下，以至于他们少工作一些时数对整个产出的影响也无足轻重。第二种形式是公开失业——指那些能够工作、通常也渴望去工作，但是没有适合于他们做的工作的人。

当前在第三世界城市劳动力中公开失业率平均从10%到15%。但是这只说明一部分情况。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龄从15岁到24岁的很多青年中失业率往往高达平均数的一倍。表2.7选择了8个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地区不同年龄的人的失业情况的粗略估计数字。

表2.7 欠发达国家部分城市地区以年龄划分的失业率

城市地区	15—24岁	15岁和15岁以上的全部
加纳大都会	21.9	11.6
哥伦比亚波哥大	23.1	13.6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6.3	4.2
智利城市地区	12	6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37.7	18.8
泰国曼谷	7.7	3.4
菲律宾城市地区	20.6	11.6
新加坡	15.7	9.2

资料来源：爱德加·O.艾德华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纽约福特基金会1973年版，表2。

表2.7显示的资料只不过说明了欠发达国家劳动力利用不充分的一个侧面。当把不充分就业与公开失业加在一起时，第三世界国家则几乎有30%的城乡劳动力没有被利用（见第8章，表8.1）。

仅从最近和当前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来说，这些国家的劳动生将来某个时期也将会加速生成。这意味着仅仅为了跟上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就必须以相同比率创造就业机会。此外，在多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的一些国家里），当城市地区正由于人口的迁入使得劳动力以每年5%到7%的速度激增时，为有效对付水平不断提高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情况，为了安抚不断增加、有选举权、受过教育，但因失业而焦虑不安和灰丧气的青年人的前景本身至少可以说是令人生畏的。我们将在3章和第9章中进一步讨论失业与迁徙问题的影响及其各个方

### 5 严重依赖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出口

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人生活、工作在农村地区。几乎80%的生活在农村，而经济发达国家生活在农村的人不到35%。从这些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比率来说，欠发达地区是66%，而发达国家仅为21%。此外，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前者大是32%，而后者仅仅是8%。

**小规模农业** 表2.7列出了对发达世界和欠发达世界地区的人口、劳动力和农业生产情况的分析。请特别注意非洲和南亚农业人口的比例（68—63%）与北美农业人口的比例（5%）的显著差别。从具体数字看，1984年亚洲和非洲年生产产出价值1.89亿美元，使用的农业劳动力几乎达6.85亿人。<sup>⑩</sup>另一方面，在北美，不到上述亚洲、非洲农业劳动力总数1%的农业工人（450万）生产出相当于南亚、非洲年产值1/4以上的产品（5500万美元）。这意味着用美元表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北美几乎比亚洲和非洲高35倍。虽然这些国际间比较数字的准确性和计量方法往往颇为含糊，然而这些数字仍为我们提供了大概的数量比较。比如说，即使对低估了第三世界非市场性农业产值进行了调整，农业

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仍然非常大。

表2.8 发达国家与大发达国家地区1984年的人口、劳动力和生产

国家或地区	人口 (百万)	城市 (%)	农村 (%)	农业劳动力 (%)	农业在GNP中的百分比
世界	4 763	40	60	45	—
欠发达国家	3 598	32	68	60	26
发达国家	1 166	71	29	7	4
非洲	531	29	71	68	28
南亚	1 539	27	73	63	37
东亚	1 243	29	71	51	23
拉丁美洲	397	65	35	32	14
欧洲	491	72	28	22	8
苏联	274	64	36	32	22
北美	262	74	26	5	3
日本	120	76	24	21	7

资料来源：人口发展局：1984年人口资料表；《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附件表3和表19。

发展中国的人口和生产活动，都集中在农业和其它初级生产部门中的基本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低收入水平上，任何人首先优先考虑的是吃、穿、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不仅因为大量的人都种地，而且因为欠发达国家的农业通常是以技术原始，组织得不好和人力与物力资本投入有限为特征的。因而，工艺落后是因为第三世界农业是非商品性的小农农业占优势的农业。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小农农业还是以自耕农经常租种而不是拥有他们耕种的小块土地的土地占有制度为特征。正像我们将在第10章中将要看到的，这种土地



占有制度夺去了增加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大量的经济动力刺激物。但是，即使土地肥沃的地方，由于原始的技术，使用手工耕地、耙地，使用役畜（牛、水牛、毛驴），或利用生手，一个典型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也一定不能多于5至8公顷（12至20英亩）。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里，一个农户平均使用的土地可以低到1至3公顷。这块土地所要供养的人，既包括直接供养的人（由农庄消费掉）又包括间接供养的人（通过为城市的和非农业的农村食品需要生产的产品），通常每公顷高达10至15人。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增加每公顷稻麦、玉米、大豆、小米的平均产量，都被当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出口的依赖** 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是面向于生产与“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相对的初级产品的。这些初级产品构成了它们向其它国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例如，图2.3显示了这些初级产品（食品、原材料、燃料和贱金属）在1980年几乎占有所有第三世界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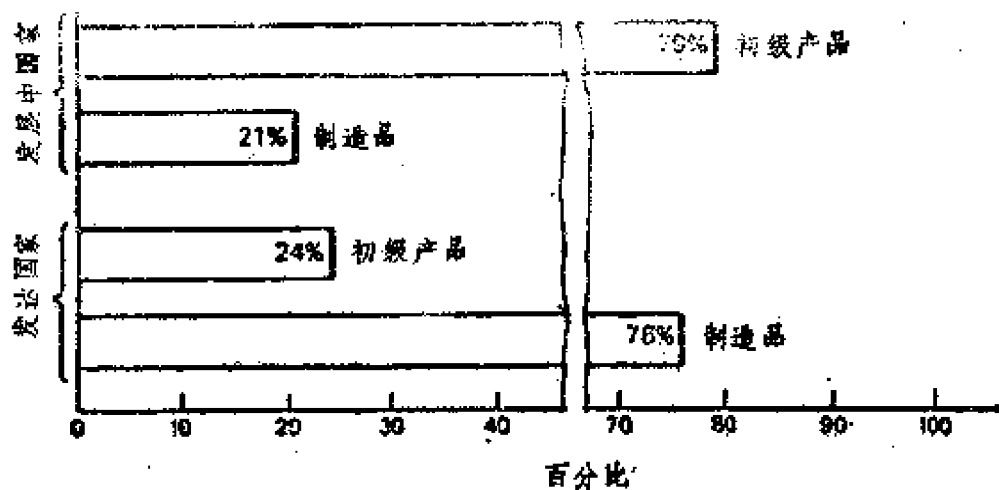


图2.3 1980年世界出口构成(初级产品和制造品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海外发展理事会：《美国外交政策与第三世界，1983年记事册》，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83年版，表E-5。

出口总产品的80%。但是除了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贵重矿产资源的少数幸运国家外，仅粮食和原材料就基本上占去了欠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大部分。

正如我们在第14章中将要看到的，为了给重点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大多数贫穷国家除了国内储蓄外还需要取得外汇。虽然流入的私人外国投资加上外国援助是这种外汇的重要来源，但是初级产品出口所赚外汇一般仍占每年流入发展中世界全部外汇收入的60%至75%。

虽然出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显得这么重要，但是在过去20年里出口的增长（除了石油出口外）并没有跟上发达国家。结果，即使在这些国家的最好年代里，发展中国家非石油输出国占全世界对较发达国家贸易中的份额也一直是下降的。例如，1950年它们的份额几乎达33%，从那时起，这个数字几乎每年都下降，到1980年已经差不多降到了21%。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60%增加到了72%（大部分是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此外，整个第三世界相互之间的出口从1960年的28%降到了1979年的25%。因此，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总份额一直下降，另一方面为了给它们的产品找到出路，欠发达国家甚至变得更依赖发达国家了。⑩

欠发达国家为了外汇的流入对富裕国家经济的依赖不断增长，这引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后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在世界经济中依赖富裕国家，有时受富裕国家支配。

### 3.6 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

富国与穷国之间经济和政治权力分配的极其不平等是使许多欠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持续低下、失业不断增加和收入分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因素。正像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这种不平等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富国控制国际贸易类型的支配权力，而且也表现在富

国通常有能力支配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给予外援和进行私人投资的条款。

但是，国际转移过程的其它同样重要的方面也能够阻止穷困国家的发展。对持续不发达起作用的、难以捉摸然而又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把第一和第二世界的价值观念、看法、制度以及行为准则搬到第三世界。这样的例子通常包括把不适宜的教育结构、课程和学校制度搬过来；把西方式的工会结构搬过来；卫生健康服务的组织方法和重点也仿效西方的模式；以及最后把很不相宜的政府官僚政治体系和行政体系的运行办法和结构搬过来。富裕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级别、上流人物的豪华生活和对私人财富积累的一般态度的影响，甚至具有更大的潜在的意义。这种态度通常能够产生腐化现象和一小撮特权人物在经济上的掠夺。最后，富裕国家的看法，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渗透也会对得到广泛承认的、被称为“国际人才流失”的问题起作用。所谓“国际人才流失”，就是花了很大代价，在发展中国家受过教育、有专业和技术的人才，却到发达国家生活和工作的移民。这样的例子包括医生、护士、工程师和经济学家。

所有这些因素作用的最后结果，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脆弱”地位。在这种地位中，它们控制不了力量强大，能够对它们整个经济和社会福利起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影响。很多国家——大多数当然是那42个最不发达的国家——是小国，经济上有依赖性，自力更生的前景很小。它们要退出世界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将要看到的，它们可以从联合经济力量，促进某种集体形式的自力更生中找到希望。这种合作还可以加强这些小国讨价还价的能力，能使它们更仔细检查和挑选外国投资和外国技术援助。

对拥有更多资产和相对来说有较大讨价还价能力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控制和支配更多地表现在富国通常以牺牲穷国为代价

而变得更富的总趋势上。但是,如上指出的,这并不单纯是富裕国家比穷困国家增长的速度快的问题,它也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内部富裕的和起支配作用的部门和集团(如现代工业或农业部门中,地主、工会领导人、实业家、政客、官僚和有权势的文职官员)往往以牺牲人数大得多,但在政治、经济方面不那么强大的劳苦大众的利益为代价而变得越来越富的问题。这种富国与穷国差距越来越大,穷国内部贫富日益悬殊的双重变化过程决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我们下章讨论二元结构和二元社会的概念时,将会看到这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当普遍的特征。

## § 4 结 论

观察不发达的现象需要从国内和国际范围出发。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经济和社会力量都对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不平等、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共同特点负有责任。成功地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需要第三世界制订适当的发展战略,而且也需要改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它更注重贫困国家的发展需要。但是为了制订这样的国内战略,提出改变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方案,有必要搞清楚我们使用的“发达”和“欠发达”这两个词意味着什么,以便从一个相当清晰的概念开始我们的探讨。这将是第3章的目的。

### 注 释

① 这些国家有时甚至被称作第四世界以突出它们是第三世界“穷国中最穷的”国家的地位,它们还特别需要国际援助。说明和分析见H.C.洛和J.W.豪,《集中注意力于第四世界》,《美国和世界发展,1975年的行动记录》,纽约普雷格1975年版(为海外发展理事会出版),第35页—54

页。

② 是不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于发展的定义（见第3章）。但是为叙述的方便和避免语义上的混乱，当我们从整体上称呼第三世界国家时，在全书中将使用发展中的、欠发达的、经济发展不充分的这些可以替换的形容词。如果不这样的话，会使讨论复杂化。

③ 著名的勃兰特委员会的报告（见本书阅读材料2，《为经济发展而斗争》）也采用了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似的分类体系。它把第三世界分为三类：低收入国家，新近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NICs）和石油输出国（新近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也包括像巴西、阿根廷、南朝鲜、台湾、墨西哥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制造业和产业发展的能力迅速发展）。

④ 1974—1975年末，石油价格猛涨，像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大大超过美国。虽然根据1984年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在人均收入方面瑞士（17 010美元）、挪威（14 280美元）、瑞典（14 040美元）都超过了美国（13 160美元），但从总“财富”（即积累起来的物质财产和资金财产）方面看，美国仍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

⑤ 回想一下，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只不过是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差额进行衡量。

⑥ 自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内还有一些在经济工作方面比一般水平好得多和坏得多的国家的实例（见表A2.2）。

⑦ 每一个国家的具体资料，可见霍利斯·钱纳里等人，《有增长的再分配》，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8—9页。

⑧ 例如可见艾伦·伯格等，《营养、全国发展与计划》，剑桥马萨诸塞MIT出版社1973年版，第1篇和第2篇。

⑨ 例如，可见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性变化》，纽约帕森出版社1968年版，附录2。

⑩ 由于在欠发达国家中很多食物直接由农民家庭消费，因此这部分产品往往在生产总数中没有被估计进去，从而实际农产品总价值可能比这个数字高。

⑪ 从1973年以来，这个份额略有增加，但这仅仅是由于石油输出国

组织国家出口收入惊人增长。对第三世界的其余国家来说，它们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继续下降（见第12章）。

### 概念复习

人均收入 (Per capita income)	劳动生产率 (Labor productivity)
收入差距 (Income gap)	自然出生率 (Crude birthrate)
收入不平等 (Income inequality)	死亡率 (Death rate)
绝对贫困 (Absolute poverty)	扶养重担 (Dependency burden)
生活水平 (Levels of living)	公开失业 (Open unemployment)
婴儿死亡率 (Infant mortality)	就业不足 (Underemployment)
营养不良 (Malnutrition)	出口商品 (Exports)
识字 (Literacy)	外汇 (Foreign exchange)

### 问题讨论

1. 在许多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可能不同，请予以说明。它们是由一系列共同具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共同问题是什么？你认为哪一个问题最重要？为什么？

2. 说明生活水平低和人均收入低的区别。在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同时能不能存在生活水平低的情况？请说明和举出一些例子。

3. 欠发达国家的某些共同特点是什么？你能想到课文中没有提到的其它特点吗？

4. 使用像国际贫困线这样的概念的优缺点是什么？你认为150美元的实际年收入在墨西哥和在尼日利亚或泰国具有同样的意义吗？请解释一下你的答案。

5. 你是否认为在健康、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请给予说明。

6.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关系受“劣势地位、依附性和脆弱性”的影响的说法意味着什么？你能举出一些例子吗？

## 附录2.1

### 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名次

表A2.1 14个第三世界国家1982—1984年  
各种发展指标的名次

I. 人均收入水平 (从最高到最低)	
1. 墨西哥	8. 泰国
2. 巴西	9. 赞比亚
3. 南朝鲜	10. 肯尼亚
4. 哥伦比亚	11. 加纳
5. 秘鲁	12. 巴基斯坦
6. 尼日利亚	13. 印度
7. 菲律宾	14. 孟加拉国
II. 人均增长率 (从最高到最低)	
1. 南朝鲜	8. 巴基斯坦、菲律宾
2. 巴西	9. 印度
3. 泰国	10. 秘鲁
4. 墨西哥	11. 孟加拉国
5. 尼日利亚	12. 赞比亚
6. 哥伦比亚	13. 加纳
7. 肯尼亚	14. —
III. 底层40%人口与上层20%人口的收入分配比率(从最高到最低)	
1. 孟加拉国	7. 肯尼亚
2. 南朝鲜	8. 秘鲁

续前表

3. 印 度	9. 巴 西
4. 泰 国	10. 不详, 巴基斯坦、赞比亚、 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加纳
5. 菲 律 宾	
6. 墨 西 哥	

IV. 识字率(占人口的百分比, 从最高到最低)

1. 南 朝 鲜	8. 肯 尼 亚
2. 泰 国	9. 赞 比 亚
3. 墨 西 哥	10. 印 度
4. 哥 伦 比 亚	11. 尼 日 利 亚
5. 秘 鲁	12. 孟 加 拉 国
6. 巴 西	13. 巴 基 斯 坦
7. 菲 律 宾	14. 不 详, 加 纳

V. 人口增长率(从最高到最低)

1. 肯 尼 亚	8. 巴 西
2. 尼 日 利 亚	9. 印 度
3. 赞 比 亚、加 纳	10. 哥 伦 比 亚
4. 孟 加 拉 国	11. 泰 国
5. 巴 基 斯 坦	12. 南 朝 鲜
6. 菲 律 宾	13. ———
7. 秘 鲁	14. ———

VI. 婴儿死亡率(从最低到最高)

1. 南 朝 鲜	8. 加 纳
2. 泰 国、菲 律 宾	9. 赞 比 亚
3. 墨 西 哥	10. 巴 基 斯 坦
4. 哥 伦 比 亚	11. 印 度
5. 巴 西	12. 尼 日 利 亚



续前表

6. 肯尼亚	13. 孟加拉国
7. 秘 鲁	14. ———

资料来源：I、II和IV的名次从《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附件表1.28中得到；  
I、V和VI中的名次是从人口调查局《1984年世界人口资料表》中得到。

表A2.2 1981—1984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

	1984年 中期人口	1982年 人均 GNP	1970—1981年 人均(实际) GNP增长率(PQLI)△	物质生活 质量指数	每千人 出生率	每千人 死亡率
低收入国家(40) (人均GNP < 400)	2 353.7	285.2	2.5	56	31	12
(不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	1 319.6	252	1.2	42	39	16
非洲(26个)	213.7	260	-0.7	37	47	20
*贝 宁	3.9	310	1.3	33	49	19
*布 隆 迪	4.7	280	1.6	30	47	21
*佛 得 角	0.3	350	3.8	57	35	8
*中非共和国	2.6	310	-0.4	34	46	20
*乍 得	5.0	80	-5.0	24	44	23
*科 摩 隆	0.5	340	-3.3	50	46	17
*赤道几内亚	0.3	175	2.8	38	42	18
*埃塞俄比亚	32.0	140	0.7	24	47	23
*冈 比 亚	0.7	350	1.6	20	49	28
*几 内 亚	5.6	310	0.1	28	47	19
*几内亚比绍	0.8	170	0.3	29	42	22
马达加斯加	9.8	320	-1.9	49	46	18
*马 拉 维	6.9	210	2.3	31	51	19
*马 里	7.6	180	2.0	23	46	22
莫桑比克	13.4	240	-6.2	38	45	17
*尼 日 尔	6.3	310	0.2	23	51	22
*卢 旺 达	5.8	260	1.8	46	49	18
圣多美与普林西比	0.1	370	0.3	不详	39	10
塞拉利昂	3.9	390	-1.0	24	39	19
*索 马 里	5.7	290	1.0	23	47	21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45	129	34	10	21	8 490	11 953
47	153	25	14	5	36	886
42	121	23	5	6	71	165
81	81	37	不详	n/a	4	75
43	147	39	12	6	136	89
46	147	15	3	9	141	137
47	92	58	不详	n/a	20	33
48	142	38	不详	24	26	58
40	146	15	3	12	431	842
41	197	15	15	0	25	164
45	164	20	12	0	428	351
42	147	28	不详	n/a	11	52
47	70	50	17	10	335	494
47	170	25	5	8	380	360
43	153	9	8	6	154	370
47	114	28	3	10	457	773
43	144	5	12	2	297	449
47	106	50	5	59	147	191
n/a	70	不详	不详	n/a	13	26
47	206	15	11	11	277	238
43	146	5	7	2	133	405

1984年 1982年 1970—1981年 物质生活 每千人 每千人  
 人均 人均(实际)质量指数 出生率死亡率  
 中期人口 GNP GNP增长率 (PQLI)△  
 (百万) (美元) (%)

* 苏丹	21.1	400	0.5	34	47	17
* 坦桑尼亚	21.2	280	1.6	58	46	14
多哥	2.9	340	-0.6	34	47	18
* 乌干达	14.3	230	-4.3	52	46	15
* 上沃尔特	6.7	210	1.8	18	48	22
扎伊尔	32.2	190	-3.1	48	46	17
亚洲(13)	2 137.0	287	2.8	58	30	11
* 阿富汗	14.4	170	1.3	17	48	23
* 孟加拉国	99.6	140	1.5	35	49	18
* 不丹	不详	120	-0.1	23	41	18
* 缅甸	38.9	190	2.3	59	38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034.5	310	4.1	75	21	8
* 印度	746.4	260	1.6	42	34	14
柬埔寨	6.1	110	0.3	21	38	19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3.7	110	-2.0	39	42	18
* 马尔代夫	0.2	400	0.2	不详	43	13
* 尼泊尔	18.6	170	0.0	28	43	18
巴基斯坦	97.3	380	2.0	40	43	15
斯里兰卡	161	320	3.1	82	28	6
越南	58.3	190	-0.5	65	34	10
拉丁美洲(1)	5.5	300	1.5	41	36	14
* 海地	5.5	300	1.6	41	36	14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48	123	20	18	81	820	1 942
52	102	74	14	18	533	1 136
47	108	16	24	15	344	597
54	96	48	9	58	317	395
43	210	9	5	13	133	323
47	111	58	13	5	2 817	1 403
57	85	52	11	19	33 480	46 912
40	182	12	4	4	283	484
47	148	26	2	1	791	2 542
44	149	4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54	99	70	2	6	515	791
65	35	66	16	32	19 889	19 388
50	125	36	6	6	7 844	1 5169
43	201	36	不详	不详	43	103
45	128	41	不详	10	9	85
48	120	82	不详	不详	9	36
44	149	19	2	1	63	195
51	124	24	5	12	2 881	5 410
66	37	85	5	2	1 020	1 938
66	100	87	6	17	153	791
52	113	23	4	3	333	587
52	113	23	4	3	333	587

(续2)

	1984年	1982年	1970—1984年	物质生活	每千人	每千人
	人均	人均	人均(实际)	质量指数	出生率	死亡率
中期人口	GNP	GNP	GNP增长率	(PQLI)		
	(百万)	(美元)	(%)			
中低收入国家 (38) (人均GNP400美元—999美元)	544.6	716	3.1	55	39	14
非洲(16)	235.5	732	2.0	44	48	16
安哥拉	7.8	790	-2.4	21	47	22
*博茨瓦纳	1.0	900	8.5	44	50	16
*喀麦隆	9.4	890	3.6	43	44	18
吉布提	0.3	476	-4.4	n/a	47	21
埃及	47.0	890	5.5	53	38	11
加纳	14.3	380	-4.5	41	48	16
肯尼亚	19.4	390	3.1	55	53	13
*莱索托	1.5	510	7.8	49	41	12
利比亚	2.2	490	-0.4	40	45	15
毛里塔尼亚	1.8	470	-0.5	27	50	22
*摩洛哥	23.6	870	2.4	47	41	12
*尼日利亚	88.1	860	2.3	38	49	12
塞内加尔	6.5	498	0.2	24	48	18
斯威士兰	0.6	940	3.5	45	48	16
赞比亚	6.6	640	-2.5	46	48	6
津巴布韦	8.3	850	-1.5	63	47	13
亚洲(8)	273.2	676	4.4	62	33	13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52	95	54	21	23	79 971	90 714
50	117	37	28	29	34 353	43 573
42	153	5	17	0	1 744	1 640
50	82	33	58	35	460	600
47	108	41	19	10	1 862	1 760
不详	不详	5	不详	不详	32	293
56	80	44	19	46	3 233	8 782
50	102	30	12	5	878	1 184
55	86	50	23	18	1 216	2 121
52	120	52	8	0	45	320
54	153	25	29	7	1 141	1 942
43	142	17	17	47	325	571
57	106	28	49	44	2 150	4 487
49	134	29	34	27	18 727	18 776
43	146	10	18	4	416	1 035
47	134	55	39	11	230	466
50	105	44	26	4	1 170	915
53	73	71	22	52	714	590
53	80	68	10	16	35 016	35 091

(续3)

	1984年 中期人口	1982年 人均 GNP (百万)	1970—1981年 (人均实际) GNP增长率(PQLI)△ (%)	物质生活 质量指数	每千人 出生率	每千人 死亡率
*印度尼西亚	161.6	580	4.6	55	34	13
蒙古	1.9	780	3.1	81	36	8
菲律宾	54.5	820	3.6	73	32	7
泰国	51.7	790	4.3	76	26	6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5.9	500	5.5	21	48	21
*也门民主人民 共和国	2.1	470	9.6	37	48	19
拉丁美洲(10)	29.7	640	-0.3	74	32	10
玻利维亚	6.0	570	1.4	51	42	16
古巴	9.9	不详	-1.2	94	16	6
多米尼加	不详	710	-2.6	80	22	5
圣萨尔瓦多	4.8	700	0.0	70	34	8
格林纳达	0.1	760	-0.1	92	24	7
圭亚纳	0.8	670	0.7	87	28	8
洪都拉斯	4.2	660	0.4	61	44	10
尼加拉瓜	2.9	920	-3.0	69	47	11
圣卢西亚	0.1	720	2.0	83	33	7
圣文森特	0.1	620	-0.6	87	25	6
大洋洲(5)	4.0	785	-0.1	48	43	15
太平洋岛托管地	0.1	920	-2.5	不详	32	5
巴布亚新几内亚	3.4	820	-0.4	44	43	14
所罗门群岛	0.3	660	2.6	59	47	11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均人公 共教育 开支 (%)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49	92	62	6	12	2 2101	13 520
64	64	95	50	80	36	28
61	54	75	12	13	5 756	8 864
61	54	84	18	24	6 784	10 330
43	160	8	18	68	39	1 699
45	144	40	21	58	300	652
62	64	77	58	38	9 371	10 471
50	130	63	20	18	881	1 212
74	17	93	122	79	5 800	6 000
65	12	94	不详	不详	29	29
64	44	62	24	10	794	962
70	13	98	不详	不详	27	49
70	43	92	58	19	422	416
58	87	60	20	15	846	986
56	89	90	19	23	529	731
70	23	82	不详	不详	26	20
65	60	96	不详	不详	14	12
51	95	39	34	10	956	1 409
不详	31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52	103	32	34	10	860	1 224
65	70	60	不详	不详	68	87

(续) 4

	1984年	1982年	1970—1981年	物质生活	每千人	每千人
	中期人口	人均	人均(实际)	质量指数	出生率	死亡率
	GNP	GNP	GNP增长率(PQLI)△			
	(百万)	(美元)	(%)			
汤 加	0.1	480	0.9	85	13	2
西萨摩亚	0.2	850	3.1	86	38	8
欧 洲 (1)	2.9	840	4.2	80	28	7
阿尔巴尼亚	2.9	840	4.2	80	28	7
中高收入国家(40)						
(人均GNP1 000—3 499美元)	692.0	2171.2	3.7	72	32	6
非 洲 (8)	73.4	2 046.4	2.1	55	41	13
阿尔及利亚	21.4	2 350	3.0	49	44	11
刚 果	1.7	1 180	1.3	44	44	18
象牙海岸	9.2	1 050	1.4	41	46	17
毛里求斯	1.0	1 240	4.8	81	23	7
纳米比亚	1.1	410	0.3	45	43	14
塞 舌 尔	0.1	1 797	4.4	73	24	8
南 非	31.7	2 670	1.0	62	35	10
突 尼 斯	7.0	1 390	5.2	62	33	7
亚洲 (10)	171.3	2 088	4.5	72	33	9
☆伊 朗	43.8	1 940	-0.1	57	44	12
☆伊 拉 克	15.0	3 020	6.4	48	47	13
约 旦	3.5	1 623	4.9	69	47	10
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19.2	1 130	3.8	81	32	8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61	21	100	不详	不详	11	34
63	40	98	不详	不详	17	64
70	47	72	34	68	275	224
70	47	72	34	68	275	224
63	69	73	70	52	210 718	278 490
56	107	49	96	25	32 854	37 622
57	116	35	131	33	14 056	11 505
47	128	50	56	34	1 040	791
47	126	41	97	13	2 586	2 434
65	30	85	68	2	283	543
52	95	38	n/a	n/a	24	103
65	19	58	n/a	n/a	6	69
61	95	57	81	27	12 650	18 254
59	98	62	67	9	2 209	3 923
63	57	69	73	114	78 798	103 052
55	106	50	111	119	10 169	12 634
58	77	24	84	211	9 372	18 907
60	69	70	53	102	682	3 907
64	34	90	34	70	593	659

(续) 5

	1984年 中期人口	1982年 人均 GNP (百万)	1970—1981年 人均(实际) GNP增长率(PQLI)△ (%)	物质生活 质量指数	每千人 出生率	每千人 死亡率
南朝鲜	42.0	1 910	6.9	85	23	5
黎巴嫩	2.6	1 890	6.0	76	30	8
澳门	0.3	2 500	12.9	不详	26	8
马来西亚	15.3	1 860	5.2	72	31	7
叙利亚	10.1	1 680	5.4	69	46	8
台湾	19.2	2 503	7.0	87	23	5
拉丁美洲(17)	337.4	2 199.2	3.4	76	31	8
阿根廷	29.1	2 520	0.3	87	24	9
伯利兹	0.2	1 080	3.5	不详	32	8
巴西	134.4	2 240	5.2	72	31	8
智利	11.9	2 210	0.1	84	24	6
哥伦比亚	28.2	1 460	3.4	76	28	7
哥斯达黎加	2.5	1 280	2.4	89	31	4
多米尼加共和国	6.3	1 330	3.1	58	35	9
☆厄瓜多尔	9.1	1 350	4.6	72	41	9
危地马拉	8.0	1 130	2.5	59	42	7
牙买加	2.4	1 330	-3.0	89	26	6
墨西哥	77.7	2 270	3.1	79	32	6
巴拿马	2.1	2 120	1.1	84	26	5
巴拉圭	3.6	1 610	5.4	79	35	8
秘 鲁	19.2	1 310	0.2	68	37	12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64	34	93	52	86	20224	25 092
66	41	68	不详	77	1 106	3 946
不详	18	79	不详	不详	638	523
64	31	60	82	57	11 193	11 581
66	61	58	69	238	2 205	4 603
72	91	82	66	120	22 611	21 200
63	64	80	60	20	68 741	91 183
70	38	93	75	55	7 905	10 017
70	27	91	不详	不详	79	161
63	26	76	64	14	19 732	22 995
68	23	89	70	88	3 911	6 246
63	56	81	20	9	3 103	4 813
72	18	90	92	0	968	1 198
61	67	67	24	18	1 174	1 601
61	81	81	43	24	2 562	2 332
59	66	46	19	12	1 393	1 690
71	28	90	72	9	945	1 372
66	55	81	80	10	21 233	29 132
70	25	78	74	8	317	2 880
65	46	84	14	13	296	600
58	101	80	20	25	3 649	4 200

(续6)

	1984年	1982年	1970—1981年物质生活		每千人	每千人	
	中期人口 (百万)	GNP (美元)	GNP增长率(PQLI)△ (%)	人均	人均(实际)质量指数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质量指数	出生率	死亡率
波多黎各	3.3	3 010	-0.5	92	22	6	
苏里南	0.4	2 950	6.4	77	28	8	
乌拉圭	3.0	2 650	3.3	89	18	9	
大洋洲(1)	0.7	1 950	2.7	85	29	6	
斐 济	0.7	1 950	2.7	85	29	6	
欧 洲 (4)	103.4	2308.4	4.4	75	25	10	
葡 萄 牙	10.1	2 450	1.8	82	16	10	
罗马尼亚	22.7	2 560	9.2	91	18	9	
土 耳 其	50.2	1 370	2.5	61	31	10	
南斯拉夫	23.0	2 800	4.7	85	16	9	
高收入国家 (人均GNP> 3,499美元)	1 170.6	9 372	3.1	93	16	9	
非 洲 (3)	4.6	7 123	-1.1	53	42	14	
*加 蓬	1.0	4 000	1.7	30	35	20	
*利比亚	3.7	8 510	-1.9	55	46	13	
留尼汪(岛)	0.5	4 010	0.2	76	23	6	
亚 洲 (11)	151.8	11 301	4.2	92	18	7	
巴 林	0.4	9 280	3.6	66	32	6	
文 莱	0.2	17 790	5.7	77	30	4	
香 港	5.4	5 340	7.1	95	16	5	
以 色 列	4.2	5 810	1.2	92	24	7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73	19	88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68	36	65	不详	不详	517	526
70	34	94	48	59	957	1420
62	29	79	86	16	313	551
62	29	79	86	16	313	551
65	74	75	80	69	30 012	46 082
71	26	70	75	70	4 145	9 762
71	29	98	108	64	10 235	11 542
62	121	60	48	57	4 703	8 961
70	30	85	122	97	10 929	15 817
72	20	97	422	356	1632 160	1619 895
54	94	45	321	160	18 702	17 120
45	116	12	151	108	2 196	956
57	99	50	358	171	16 391	15 414
65	14	63	不详	不详	115	750
74	18	90	497	298	355 999	266 452
69	53	40	186	381	3 541	4 386
66	13	64	230	208	3 56	703
73	10	90	n/a	n/a	21 820	24 772
73	14	88	389	1 464	5 381	9 501

(续7)

	1984年	1982年	1970—1981年物质生活		每千人	每千人
	中期人口	人均人均 (实际)		质量指数	出生率	死亡率
		GNP	GNP	增长率(PQLI)△		
	(百万)	(美元)	(%)			
*日本	119.9	10 080	3.8	98	13	6
*科威特	1.6	19 870	2.8	77	35	3
阿曼	1.0	6 090	3.3	35	48	17
*卡塔尔	0.3	21 880	0.0	56	31	9
*沙特阿拉伯	10.8	16 000	8.1	40	42	12
新加坡	2.5	5 910	6.9	86	17	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5	23 770	1.7	68	30	7
拉丁美洲 (7)	21.8	4 377	1.9	82	33	5
巴哈马	0.2	3 830	-2.4	87	25	5
巴巴多斯	0.3	3 500	3.1	92	17	8
瓜德罗普	0.3	4 200	4.6	85	19	6
马提尼克	0.3	4 680	4.3	87	18	7
荷属安的列斯群岛	0.2	5 150	0.9	83	27	6
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1.2	6 840	4.2	89	25	6
*委内瑞拉	18.6	4 140	1.7	81	33	5
大洋洲 (5)	19.1	10 973	1.2	95	16	7
*澳大利亚	15.5	11 140	1.4	96	16	8
法属波利尼西亚	0.2	7 980	1.5	79	32	6
关岛	0.1	7 010	5.2	n/a	29	4
新喀里多尼亚	0.1	7 000	-3.5	83	26	7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76	7	99	508	83	151 500	142 868
70	23	60	541	705	16 581	8 042
50	127	20	94	902	4 416	2 221
59	53	34	2 667	4 762	3 978	1 571
55	112	16	521	1 837	113 328	35 268
71	11	75	108	194	20 970	27 571
64	53	56	226	1 321	20 939	9 549
66	40	83	136	40	29 893	32 594
69	22	90	不详	不详	1 769	5 307
71	23	99	154	7	200	515
70	26	83	不详	不详	110	546
70	16	88	不详	不详	125	622
62	25	93	不详	不详	4 485	9 977
70	26	95	155	13	3 570	2 869
67	42	82	135	42	19 634	12 758
73	12	100	476	196	27 798	32 798
75	10	100	505	213	21 796	26 186
62	41	95	不详	不详	28	268
不详	16	不详	不详	不详	18	135
64	30	91	不详	不详	349	450

(续) 8

	1984年 中期人口	1982年 GNP (百万)	1970—1981年 GNP增长率(PQLI) $\Delta$ (%)	1984年 人均人均(实际)质量指数 95	1982年 出生率 16	1970—1981年 物质生活 每千人 死亡率 8
新西兰	3.2	7 920	0.5	95	16	8
*欧洲(26)	704.7	7765	3.3	93	15	10
*奥地利	7.6	9 880	3.4	94	12	9
*比利时	9.9	10 760	2.5	96	12	11
*保加利亚	9.0	4 150	5.6	91	14	11
*山诺群岛 (Channel Islands)	0.1	6 780	1.1	不详	11	12
*塞浦路斯	0.7	3 840	5.5	86	22	8
*捷克斯洛伐克	15.5	5 820	4.1	93	15	12
*丹麦	5.1	12 470	1.7	97	10	9
*芬兰	4.9	10 870	2.4	96	14	9
*法国	54.8	11 680	2.8	96	15	10
*德意志民主 人民共和国	16.7	7 180	4.7	95	14	14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61.4	12 460	2.6	94	10	12
*希腊	10.0	4 290	3.3	90	14	9
*匈牙利	10.7	4 180	4.8	92	12	14
*冰岛	0.2	12 150	2.5	98	18	7
*爱尔兰	3.6	5 150	1.9	95	20	9
*意大利	57.0	8 840	2.3	95	11	10
*卢森堡	0.4	14 340	2.9	93	12	12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72	12	99	336	111	5 607	5 739
71	22	98	321	327	883403	927785
73	13	99	311	111	15 841	21 034
72	12	99	668	368	55 615	62 067
72	18	91	134	106	10 372	9 650
不详	11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74	17	76	97	56	562	1 166
70	17	99	161	148	14 891	15 148
74	8	99	789	297	16 027	17 565
74	6	100	487	126	14 011	14 174
74	10	99	560	424	106 425	120 951
72	12	99	249	235	17 312	19 082
73	10	99	566	404	176 086	163 911
73	14	84	103	257	4 257	8 592
71	23	98	167	95	8 726	9 159
77	7	99	380	0	895	1 024
73	10	98	300	61	7 789	10 596
73	13	98	259	136	75 284	91 102
72	7	98	827	117	不详	不详

(续) 9

	1984年 1982年 1970—1981年物质生活		每千人 每千人			
	人均人均 (实际) 质量指数		出生率	死亡率		
	中期人口	GNP	GNP增长率(PQLI)△			
	(百万)	(美元)	(%)			
马耳他	0.4	3 800	10.9	89	14	8
• 荷兰	14.4	10 930	1.7	97	12	8
• 挪威	4.1	14 280	3.5	97	12	10
• 波兰	36.9	3 900	5.2	93	19	9
• 西班牙	38.4	5 430	2.4	93	13	7
• 瑞典	8.3	14 040	1.3	98	11	11
• 瑞士	6.5	17 010	0.4	97	12	9
• 苏联	274.0	5 940	4.1	90	20	10
• 英国	56.5	9 660	1.5	95	13	12
北美洲 (2)	261.4	12 906	2.0	96	16	9
• 加拿大	25.1	11 320	2.5	96	15	7
• 美国	236.3	13 160	1.0	96	16	9
发展中国家 (143个)	3 596	750	2.8	59	33	12
发达国家 (29个)	1 166	9 190	3.0	94	15	10
世界 (172个国家)	4 762	2 800	2.9	68	29	11

注: △见附录3.2关于PQLI数的说明。

• 属于联合国认为的最不发达的31个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

• 由于人均GNP超过3 500美元, PQLI指数超过90, 因而被海外发展署列为发达国家。

GNP, 国民生产总值。

FOB, 离岸价格。

CIF, 到岸价格。

出长时的 预期寿命 (岁)	每千人活 产婴儿 死亡率	识 字 率 (%)	人均公 共教育 开支 (美元)	人均军 费开支 (美元)	1981年 出口总额 (FOB) (百万美元)	1981年 进口总额 (CIF) (百万美元)
71	14	87	86	32	444	873
76	8	99	850	359	68 746	67 298
76	8	99	857	357	17 988	15 637
71	20	98	112	111	16 998	19 089
73	9	90	110	95	20 335	32 153
76	7	99	1 164	408	28 566	28 842
75	8	99	789	324	27 037	30 688
69	32	100	210	433	76 481	68 523
73	11	99	360	342	102 715	99 461
74	12	99	680	508	306 365	343 146
74	10	99	715	174	72 627	69 795
74	11	99	676	543	233 738	273 351
57	86	55	27	34	592 106	595 365
72	18	99	428	345	1 373 046	1 453 186
60	69	66	123	109	1 965 152	2 048 551

资料来源：海外发展署：《美国外交政策与第三世界国家，1983年大事记》，纽约普拉格1983年版，第210—221页；人口调查局：《1984年世界人口资料表》，华盛顿特区1984年版。

## 第3章 各种发展理论与发展的含义

我们如果不掌握发展的内在含义，不管有多少关于发展的资料用处也不大。

丹尼斯·古雷特：《严酷的选择》

发展应该被重新解释为对今天世界上的主要祸害：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的进攻。从总增长率来衡量，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从就业、正义和消灭贫穷方面看，它是个失败，或者只不过获得部分成功。

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保罗·P·斯特里顿

把发展作为努力奋斗、向美好的新世界挺进的社会工程的早期幼稚幻想已经消失。多项目标已代替了最初的单一目标。现在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过程中国内外因素间存在着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注重作为发展努力的基础、手段和最终目标的人类及其潜力。

东京联合国大学校长 苏加莫柯

### § 1 人人想发展，但它的含义是什么？

每一个国家都在为发展奋斗。虽然经济进步是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并非发展的唯一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发展的范围

不能只限于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和金钱方面。所以它应当被理解<sup>解</sup>为包括重新改组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调整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方向的多方面的过程。典型的发展，除了增加收入和产量外，还包括制度、社会和行政结构的迅速改变，特别是社会观念的迅速改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要改变风俗习惯和信仰。最后，发展虽然通常是就一国的范围而言的，但是它的全面实现还必须有国际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

本章集中探讨发展的含义——它的各方面的性质，既包括经济方面，又包括非经济方面。我们的考察从可供选择的三种发展理论开始，继而复习重要的二元理论和二元社会的概念。在考察几种传统的对发展的经济衡量方法之后，我们试图得出一个既关心人们物质需要又关心人们非物质需要的关于发展的实用的定义。

## § 2 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三种研究途径

过去的30年里，经济发展著作一直由三种主要的、有时是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支配：（a）线性阶段经济增长理论；（b）新古典结构变动理论；（c）国际依赖模型。<sup>①</sup>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的思想主要集中到“经济成长阶段”的概念上。它把发展过程看作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的一系列连续阶段。它基本上认为是认为正常数量和比例的储蓄、投资和外援都是使第三世界国家能沿着较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发展所必要的。因而发展与整个经济的迅速增长成了同义语。

这种线性阶段研究方法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两种与之抗衡的经济（实际上还有意识形态上的）思想流派所代替。第一种叫新古典结构变动模型。它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试图勾画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成功地产生和保持

迅速的经济增长所必须经过的结构变化的内在过程。第二种称之为国际依赖模型，它是一种较为激进、偏重政治的理论。它从国际、国内力量关系，制度和结构在经济上的僵化以及在世界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的扩散这些方面来看待不发达。依附理论倾向于强调外在的与内部的制度和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重点放在为彻底根除贫困、提供较为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所必需的新的政策上。这些和其它的平均主义目标要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取得，但是线性阶段理论和结构变动理论并没有提高经济增长本身的地位到与之相符的高度。下面，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每一种发展理论。

## 2.1 线性阶段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世界上的穷国开始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进行实际斗争时，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学家没有任何准备。他们没有现成的理论工具去分析那些实际上不具备现代经济结构特征的，主要是由小农组成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确实有执行马歇尔计划、在几年内运用大量美国财政和技术援助重建被战争搞得支离破碎的欧洲国家、使之经济现代化的新鲜经验。此外他们认为，难道所有的现代工业国家不也都曾经是从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吗？它们的经济从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巨人的经验不是确能使亚、非、拉各落后国家得到重要的教益吗？这两种思想的逻辑性和简明性——需要注入大量资本和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模式——对那些富国的学者、政客和政府官员来说，是无可辩驳的。他们对第三世界人民和生活方式的了解，不比联合国或人类学书籍中散乱章节的统计资料更现实。

**罗斯托的增长阶段** 出于这种多少有些贫乏的知识环境和被



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政治所刺激，伴随着为争取新独立国家的效忠而产生的竞争，出现了经济增长阶段的学说。这个学说的最有影响和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是美国的经济历史学家W.W.罗斯托。根据罗斯托的学说，从不发达到发达过渡可以用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的一系列步骤或阶段来说明。正如罗斯托在他的《经济增长阶段》一书的开篇一章所写的：

这本书显现了一个经济史学家总结现代历史推进过程的方法……在经济方面，它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这些社会都处于五个类型其中的一个阶段类型上：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再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这些阶段不只是说明性的，它们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连续性……它们最终既构成经济增长的理论，如果更为偏颇的话，又构成整个现代历史的更全面的理论。②

它证明，在历史上，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经过“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阶段，而欠发达国家或者是仍然处于传统社会阶段，或者处于“准备”阶段，它们必须遵循发展的一套特定的规律，依次起飞进入自我经济持续增长阶段。

任何起飞都必须具备的发展的基本诀窍之一就是，为产生足够的促使经济增长的投资，必须动员国内和国际的储蓄。更多的投资导致更快的增长的经济机制可以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来说明。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为了替换陈旧的或者磨损了的资本物（建筑、设备、材料），每一种经济都必须节省下一定比例的国民收入。但是，为了求得增长，必须有代表资本净增长额的新投资。假定在总资本K和国民生产总值Y的大小之间存在某种直接的经济关系——例如，如果生产1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总是需要3美元的资本的话——那么以新投资的形式出现的资本的任何净增加额必然带来国民总产品（GNP）“流量”的相应增长。

这种关系在经济学中叫作资本—产出比率，假定大约是3比1。如果我们定资本/产出率为  $k$ ，并进一步假定国民储蓄率  $s$ ，是国民总产品的固定比率（例如6%），新的总投资取决于总储蓄水平，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起下面的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

1. 储蓄 ( $S$ ) 相当某种比率  $s$  的国民收入 ( $Y$ )，这样我们得到简单方程

$$S = sY \quad (1)$$

2. 定投资 ( $I$ ) 为资本存量  $K$  的增加额，用  $\Delta K$  表示，则

$$I = \Delta K \quad (2)$$

但是由于总资本存货  $K$  与整个国民收入或总产品  $Y$  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由资本/产出比率  $k$  表示，那么就得出

$$\frac{K}{Y} = k \quad \text{或者} \quad \frac{\Delta K}{\Delta Y} = k \quad \text{或者最终}$$

$$\Delta K = k\Delta Y \quad (2a)$$

3. 最后，由于国民总储蓄  $S$  必须与总投资  $I$  相等，我们可以把这个等式写作

$$S = I$$

但是从上面的方程 (1) 中我们知道  $S = sY$ ，从方程 (2) 与 (2a) 中我们知道  $I = \Delta K = k\Delta Y$ 。所以这样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恒等式”可由方程 (3) 表示为

$$S = sY = k\Delta Y = \Delta K = I \quad (3a)$$

或者简单地表示为

$$sY = k\Delta Y \quad (3b)$$

现在再把方程 (3b) 两边先除以  $Y$ ，然后除以  $k$ ，我们则得到下列的表达式

$$\frac{\Delta Y}{Y} = \frac{s}{k} \quad (4)$$

注意，方程式的左边  $\Delta Y/Y$  代表变化率或GNP的增长率（即GNP变化的百分比）。

方程 (4) 是经济增长理论里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方程<sup>③</sup>，

它简明扼要地表述了GNP的增长率( $\Delta Y/Y$ )是由国民储蓄率 $S$ 和国民资本/产出率 $k$ 共同决定的。更为特殊的是,它道出了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储蓄率是正比或“正向”的关系(即在一个经济中,人们从一定的GNP中储蓄—和投资—越多,GNP的增长就越大),而与经济中的资本/产出比率呈反比或“反向”的关系(即 $k$ 越高,GNP的增长率就越低)。

方程(4)的推理很简单。为了寻求增长,一个社会的经济中必须从国民总产值中拿出一定比例,进行储蓄和投资。因此,他们越能储蓄就越能投资,增长也就越快。但是在每一水平上的储蓄和投资所能增长的实际速度取决于这些投资的生产能力。投资的生产率——每多增加一份投资能得到多少增加的产品——可以用资本—产出率 $k$ 的倒数来衡量,因为这个倒数 $1/k$ 就是产出/资本率或产出/投资率。于是以资本生产率 $1/k$ 乘上新投资率 $s = I/Y$ ,就能得到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障碍与约束** 现在我们回到增长阶段理论。利用简单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方程(4),我们知道取得经济增长的最基本的“诀窍”无非是增加用来储蓄(即没有消费掉的)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如果我们能增加方程(4)中的 $S$ ,那么我们就可以增加 $\Delta Y/Y$ ,即GNP的增长率。例如我们假定某个欠发达国家的国民资本产出率是3,而总储蓄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则根据方程(4)可知,这个国家的产值可以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即

$$\Delta Y/Y = s/k = \frac{6\%}{3} = 2\%$$

那么,如果国民储蓄率从6%增加到比如说15%——通过增加税收、外国援助或者减少总消费——GNP增长率就可以从2%增加到5%。这就是

$$\Delta Y/Y = s/k = \frac{15\%}{3} = 5\%$$

实际上，罗斯托以及其他人正是这样明确地解释起飞阶段的。那些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储蓄15%到20%的国家比起那些储蓄少的国家可以增长（“发展”）得更快些。除此而外，这种增长以后就可以成为自我持续的了。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达的诀窍不过是增加国民储蓄和投资的问题。

根据这一理论，在大多数穷国中，发展的主要障碍或约束条件是形成新资本的水平较低。但是一个国家要想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但如果储蓄和投资（假定 $k$ 即最终的总资本产出比率是3）占不到国民收入的21%，只能占15%时，要填平这6%的“储蓄沟”，就必须借助于外国援助或外国私人投资。

这样，增长和发展的“资本约束”阶段研究方法就成为发达国家为大量向欠发达国家进行资本和技术援助进行辩护的理论工具和（用冷战政治的词说）机会主义工具。它整个是又一个马歇尔计划，不过这次对象是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

**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对阶段模型的批评** 不幸的是，包含在增长阶段理论里的发展策略往往并不奏效，其基本原因并非由于更多的储蓄和投资不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是肯定的——而是由于这些不是经济加速增长的充分条件。我们又一次看到第1章所讨论的问题的一个例证：西方经济理论暗含的许多假设前提不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条件。马歇尔计划对欧洲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具有把新资本有效地转换成高水平产品的必要结构、制度和思想上的条件（例如高度统一的商品和货币市场，高度发达的运输工具，受过良好训练和教育的劳动力，成功的动力，高效率的政府机构）。罗斯托—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不发达国家都同样具备这些条件。但在很多场合不发达国家是缺少诸如管理能力、有技术的劳动力、计划和执行各色各样的发展规划的能力等一些补充因素的。

甚至从更基本的层次看，阶段论也失于没有将下列决定性的

事实考虑进去，即第三世界国家是高度统一的和复杂的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这个体系中，即使是最完善和最明智的发展战略有时也会由于受到无法控制的外力影响而失效（70年代初期阿连德(Allende)当政时智利的事实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人们完全不能象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那样简单地说，发展只不过是一个“搬掉障碍”和提供各种象资本、外汇、技术和管理等“缺少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理论上说，发达国家能够起主要作用——的问题。正因为多次失败和对这种严谨的经济发展理论越来越不抱幻想（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种更新的研究方法。它把经济和制度因素合在一起加进国际发达与不发达的社会系统模式中。这就是我们不久就要考察的国际依附模型。但是我们首先还是来考察当前西方发展理论主流即新古典结构变动模型中的两个重要例子。

## 2.2 新古典结构变动模型

结构变动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不发达经济利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使国内经济结构从以仅能维持生存的传统农业为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化、多样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这种理论以新古典价格、资源分配理论和现代计量经济学为工具，描述这种转变如何进行。结构变动研究方法的两个著名的有代表性的例子是，W.阿瑟·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理论模型和霍利斯·钱纳里的各种“发展模式”的经验分析。

### 刘易斯发展理论

**基本模型** 早期最著名的集中研究原来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的结构转变的发展理论模型，最初是由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瑟·刘易斯于50年代中期系统提出的。以后，费景翰和古斯塔夫·拉尼斯对这个理论加以修改、公式化和进一步扩充<sup>④</sup>。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两部门模型被公认为解释第三世界劳

动力剩余国家发展过程的“普遍”理论。这种理论在今天，特别是在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中仍然有许多拥护者。

在刘易斯的模型中，不发达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a) 传统的、人口过剩的、仅能维持生存的农村部门，以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为特点。正因为如此，刘易斯是在将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抽出而不会减产的意义上称这些劳动力是“过剩的”。(b) 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从仅能维持生存的部门退出的劳动力可以逐渐转入这个部门。这个模型的注意力基本上是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和现代部门产量和就业的增长这两个方面。劳动力转移和现代部门就业的增长都是由这个部门产量的增加所带来的。而产量增长的速度是由现代部门工业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的。假定“资本家”把所得利润都重新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就由现代部门利润超过工资的部分决定。最后，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被假定为不变，而且它的量是由传统农业部门中仅能维持生存的平均固定工资再加上一个一定的量所决定（刘易斯假定城市工资最少必须比农村平均收入高30%才能吸引劳动者从他们的家乡迁移出来）。在城市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曲线被认为非常富于弹性。

我们可以利用图 3.1 说明刘易斯两部门经济中现代部门增长的模型。纵轴的数字是实际工资和劳动边际产品， $MPL$ （假定它与完全竞争的现代部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相等），横轴是劳动力数量。

$OA$  代表传统的（即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定价都是非竞争性的）农业部门中仅能维持生存的平均实际收入水平。 $OW$  则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在这种工资水平下，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被假定为“无限的”或非常富于弹性，由劳动力供给水平线  $WS$  表示。换句话说，刘易斯假定，在比农村平均收入  $OA$  高的  $OW$  城市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的雇主需要雇多少农村剩余工人就能够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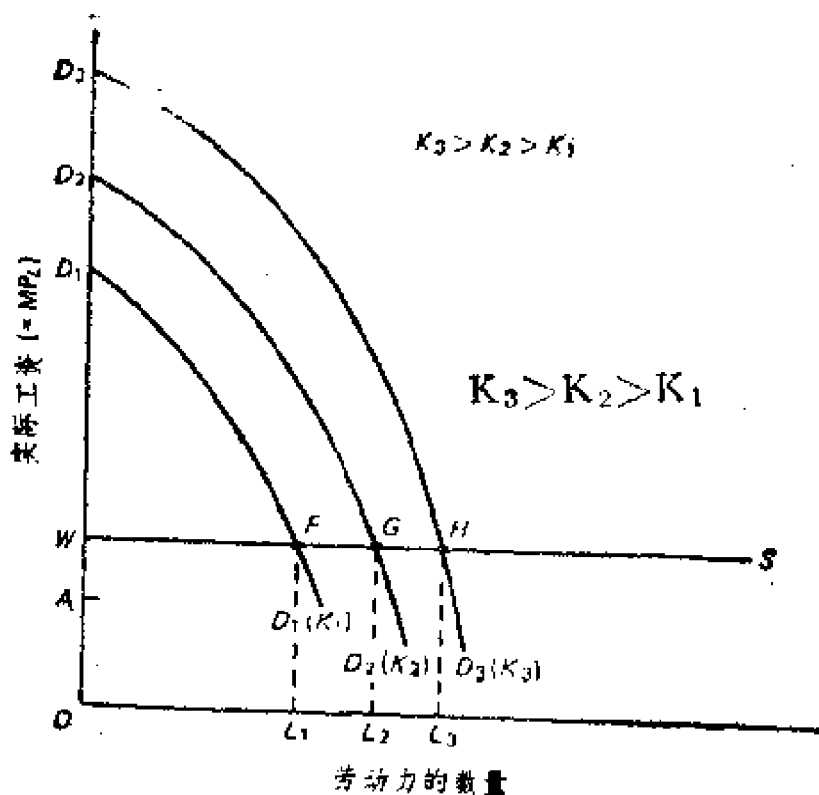


图3.1 二元剩余劳动经济中的劳动就业  
与经济增长刘易斯模型

多少，而不必害怕工资水平会提高。假定现代部门增长的最初阶段确定的资本供给量是 $K_1$ ， $D_1(K_1)$ 表示由递减的劳动边际产品所决定的劳动需求曲线。由于假定追求利润最大化现代部门的雇主雇佣工人直到劳动力的边际物质产品与实际工资相等那一点为止（即劳动需求和供给曲线的交点 $F$ ），因此整个现代部门的就业量将与 $OL_1$ 相等。整个现代部门的产量将由点 $OD_1FL_1$ 画出的面积表示。整个产量中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部分将会与矩形 $OWFL_1$ 的面积相等。剩下的 $WD_1F$ 部分则是资本家得到的利润总额。由于刘易斯假定这些利润都用来再投资，因而现代部门所用的资本总额将从 $K_1$ 增加到 $K_2$ 。投入的资本增加使得现代部门总产量曲线上移，它同样也使劳动边际产品需求曲线上移。在图中，劳动需求曲线的外移由 $D_2(K_2)$ 表示。现在现代部门雇佣 $OL_2$

的工人，从而现代部门将在点G处建立起一个新的均衡就业水平。在工资总额和利润总额分别增加到 $OWGL_2$ 和 $WD_2G$ 的同时，总产出也增长到 $OD_2GL_2$ 。这部分更多的利润( $WD_2G$ )再一次重新投资，投入的资本增加到 $K_3$ ，劳动需求曲线移到 $D_3$  ( $K_3$ )，现代部门的就业水平也提高到 $OL_3$ 。

以上现代部门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扩大过程被假定一直继续到新的工业部门把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吸收为止。在这点之后，只有付出比造成的食品生产损失更高的代价才能从农业部门得到新增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对土地的比率不断下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已不再为零。这样，当现代部门的工资和就业继续增加，劳动供给曲线变为向上倾斜。随着经济活动不断从传统农村农业向现代城市工业转移，就发生了经济结构的转变。

**对刘易斯模型的批评** 虽然刘易斯的两部门发展模型既简单又与西方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经验大体一致，但是这种理论的三个关键的假设条件并不适合当代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与经济现实。

首先，模型暗含假定现代部门的劳动转移率和就业创造率与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率成比例。资本积累率越高，现代部门增长率也越高，同时新工作的创造率也越高。但是如果资本家的利润重新投入到更加尖端的节约劳动的资本设备上，而不是象刘易斯模型暗含假定的只是和现存资本一样投在同样的设备上，那又会怎么样呢（当然，这里我们接受那个有争议的假定，即资本家的利润事实上重新投入当地经济中，而不是以“资本外逃”的形式送到国外，增加西方银行的存款！）？图3.2再次描画出基本模型，只是这一次劳动需求曲线不是象往常那样向外移动，而是在事实上相交。需求曲线 $D_2$  ( $K_2$ )比 $D_1$  ( $K_1$ )更向下倾斜，这反映了所投入的资本的增加额中包含了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的事实——这就是， $K_2$ 的技术每单位的产量比 $K_1$ 的技术要求的劳动较



少（见附录5.1关于节约劳动的技术变化的较为正式的分析）。

我们看到，虽然总产量大量增长（即 $OD_2EL_1$ 比 $OD_1EL_1$ 大得多），但工资总额（ $OWEL_1$ ）和就业总量（ $OL_1$ ）并没有改变。所有额外产量都以超额利润形式给资本家带来好处。因而图3.2提供了一个某些人可能称之为“反发展的”经济增长例证——即所有的额外收入和增加的产量都分给了极少数的资本所有者，而工人大众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却基本没变。虽然国民生产总值会增加，但是从更多的人在收入和就业方面所分得的好处来衡量，社会总福利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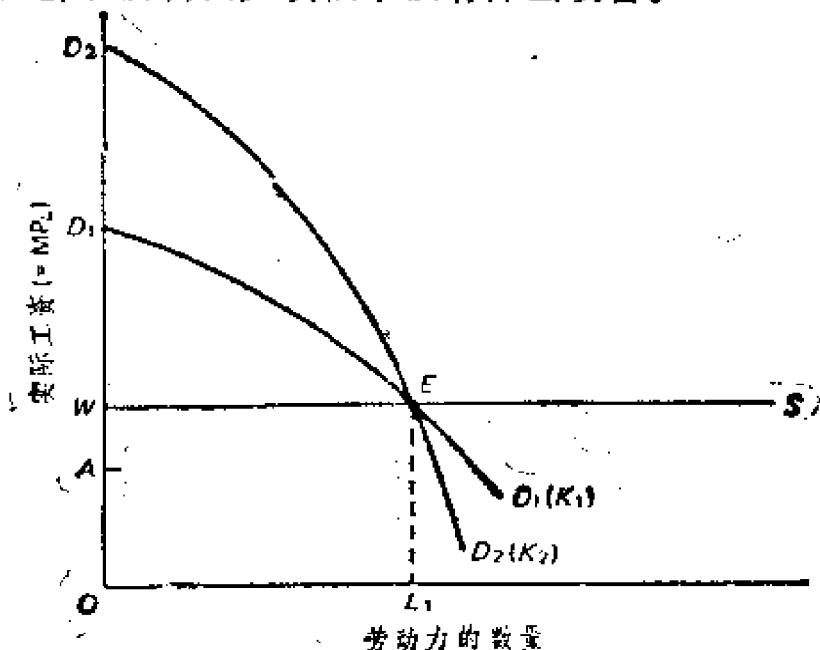


图3.2 节约劳动的资本积累使刘易斯模型的  
就业观点出现一些变化

模型的第二个不可靠的假定是认为，在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而城市里则是充分就业状况。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和第9章中看到的，当代大多数研究报告都显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相反的情况似乎才是事实（即在城市里存在大量失业，但在农村完全是剩余劳动力的人很少）。确实，农村有季节性和地区性的失业现象，与这个规律不相符合（例如亚洲次大陆的一些地区和拉丁美

洲的孤立地区的土地所有制非常不平等)，但是总的来说，今天的发展经济学家似乎都同意，城市存在剩余劳动的假定比刘易斯认为农村存在完全的剩余劳动的相反假定从经验上说更有根据。

第三个不真实的假定是刘易斯认为，现代部门存在一个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它保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以前城市实际工资总是不变。第9章将要指出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决定中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即使是在现代部门公开失业水平不断上升，农村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或者为零的时期内，无论就绝对量还是相对于农村平均收入而言，城市工资都一直有大量增加的倾向。工会组织讨价还价的能力，文官工资级别制度，跨国公司雇佣人员的惯例等这些制度上的因素都很容易使第三世界国家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不管什么样的竞争力量都起不了什么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当我们考虑到大多数现代技术的转换中节约劳动的倾向，当考虑到大量资本外逃的现象，考虑到农村地区普遍不存在剩余劳动以及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公开失业现象现代部门工资还倾向于迅速上升的情况，那么，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虽然作为对发展过程中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变动的早期理论上的说明来说极有价值，但是，为了适合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还要对模型的假定条件和分析方法做重大的修改。

### **结构变动与发展模式**

象早些的刘易斯模型一样，“发展模式”结构变动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在新产业取代传统农业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一段时期内，不发达经济、产业和制度方面的结构转变完成的连续过程。然而，与刘易斯模型和发展的初始“阶段”的观点相对照，“发展模式”分析者认为增加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了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本积累以外，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要有一些相互联系的变化，以便完成从传统经济体系

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变。这些经济结构变动实际上包含所有经济函数的改变，包括生产的转变和消费者需求构成的变化，国际贸易，资源利用以及象城市化和国家人口的增长及分布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经验结构主义者强调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对发展的制约因素。国内的制约因素既包括象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天赋及其物力和人力大小这些经济制约因素，又包括政府政策和目标等制度制约因素。对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包括得到外国资本、技术和进行国际贸易的机会。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大体上可以归结于国内和国际的这些制约因素。然而，正是国际制约因素使得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转变过程与现在工业发达国家不一样。由于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由工业国提供的把工业国作为资金与技术和进口工业品的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能够比工业国家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早期更快的速度完成这种转变。因此，与早些的阶段模型不同，结构主义模型承认，发展中国家是高度一体化的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它们的发展。

结构主义模型主要建立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的经验分析成果的基础上。钱纳里曾考察过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1950—1973年间的发展模式。<sup>⑥</sup>他对不同人均收入水平国家的经验分析既是横剖面的（即在一些国家的某个特定时间上的），又是按时间序列的（即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分析确定了发展过程的几个特点。

**钱纳里的经验分析研究结果** 钱纳里及其同事从他们所研究的国家中所确定的最广泛流行的特点之一是生产结构的转变。他们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转移。这个最初的结构变化由图3.3表示，它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时，工业产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而农业（初级产品）的产

量所占比重下降。例如，钱纳里发现1976年人均收入200美元的国家初级产品生产的价值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工业生产约占15%（见图3.3中的点A和点B）。然而，当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初级产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跌落到20%，而工业生产则上升到28%（点C和点D）。注意，农业产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农业生产的绝对水平下降。相反，农业生产有可能是相对下降。

生产的结构变化可以根据发展过程中工农业生产的比重大致持平的中点把这种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图3.3中，这点出现在以1976年美元衡量人均收入水平（Y）600美元处。低于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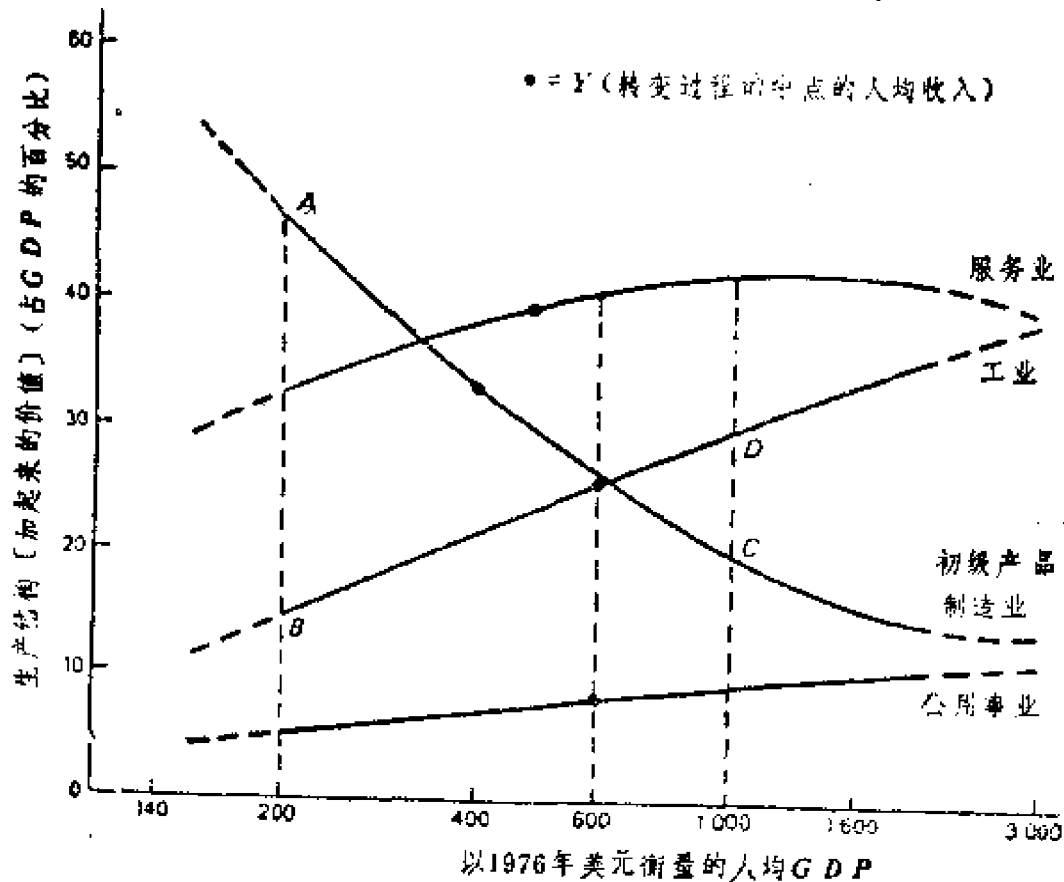


图3.3 生产的转变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和摩西·西尔比：《1950—1970年的发展模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图5。

水平的国家一般被钱纳里和其他人视为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或“不发达”阶段，而人均收入高于600美元但低于工业化国家3000美元收入的国家被视为处于发展的后期或“转变”阶段。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以依赖（虽然逐渐减少）农业生产作为收入和增长的来源为特点的，而发展的后期阶段则包含对工业生产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模式模型与刘易斯提出的模型是相似的。

与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增长相联系的是物力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图3.4表明了储蓄、投资和政府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学校入学人数指数。图表显示在发展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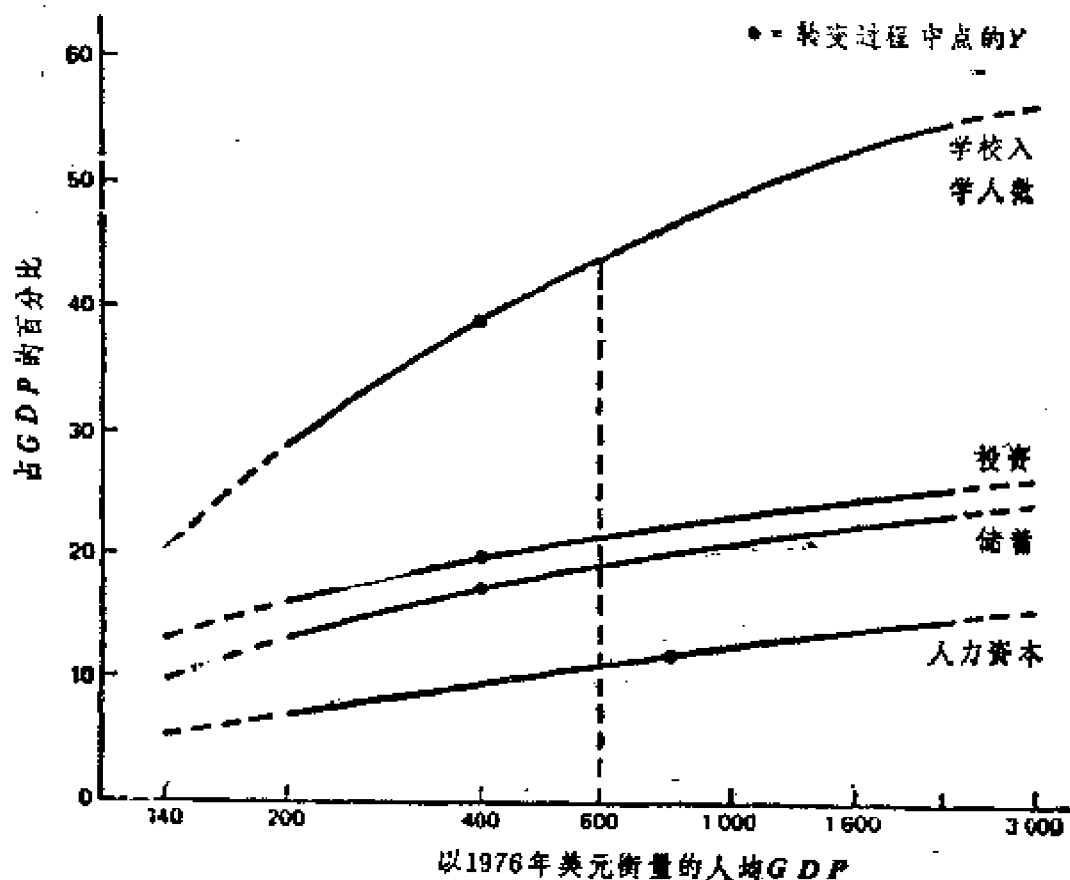


图3.4 资本积累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和泽西·西尔尼：《1950—1970年的发展模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图1.2.3。

变过程的早期阶段，投资和入学人数（代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量增加。

与生产结构变化和物力、人力资本积累相应，国内需求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图3.5表示了这个变化。这些国家最一致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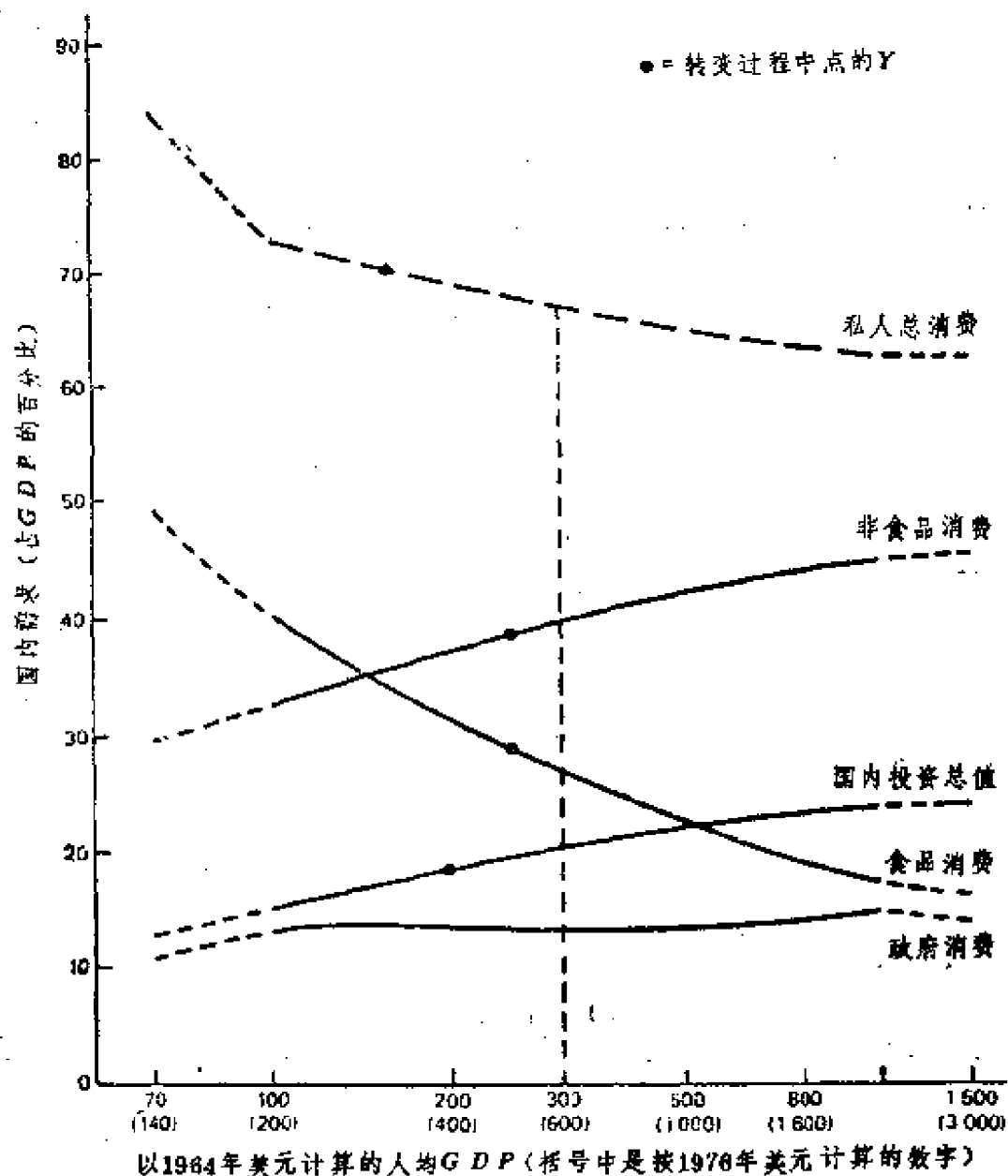


图3.5 需求的变化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和摩西·西尔昆：《1950—1970年的发展模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图4。

是，食品消费从占国内总需求的40%以上下降到仅占17%。这使得需求的其他组成部分——非食品消费、政府消费和投资——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增加。

虽然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是这些国家最容易变动的因素，但总的说来，钱纳里还是发现，在这些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总进口和总出口都有所增长，在总出口中工业产品的比重相对上升，而在总进口的份额中，工业产品的比重相对下降。图3.6说明了这些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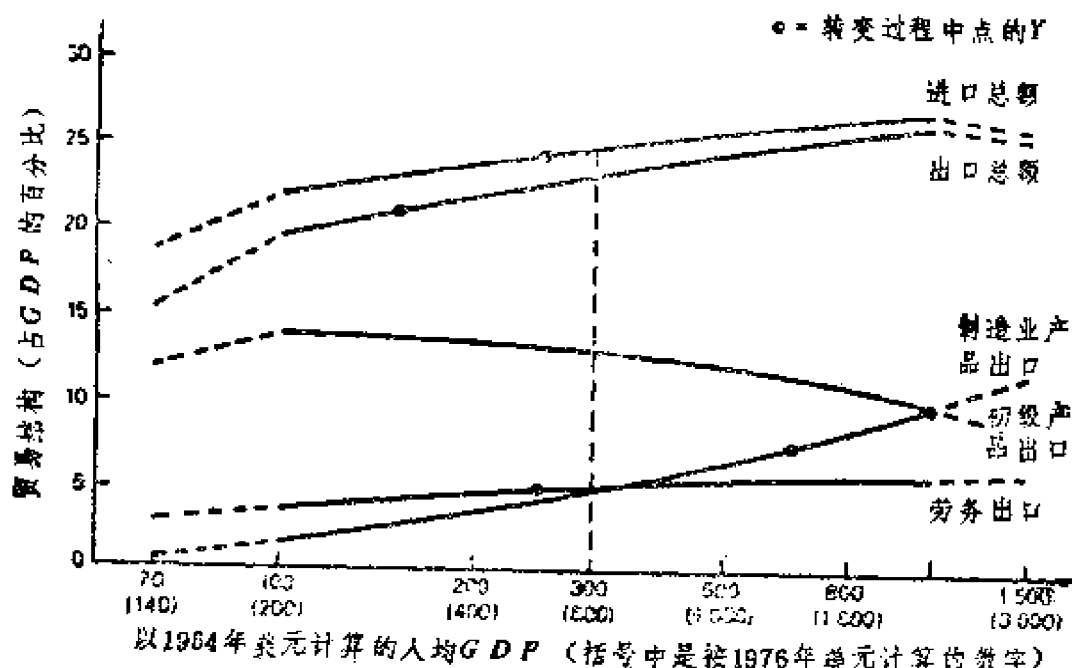


图3.6 贸易的变化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和摩西·古尔格，《1950年—1970年的发展模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图6。

关于生产要素使用上的变化，存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退出，进入工业和服务业的变动，虽然这种变动滞后于生产结构的变动（见图3.7）。由于这种滞后的缘故，农业部门无论在发展的前期阶段还是后期阶段在产生就业方面都起很大作用；而工业部门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1600美元或发展进入最后期时最终会与农业

部门的就业相适应。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发展的前期增长缓慢，只是在转变过程完成时才能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平（见图3.8）。然而，经济中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是上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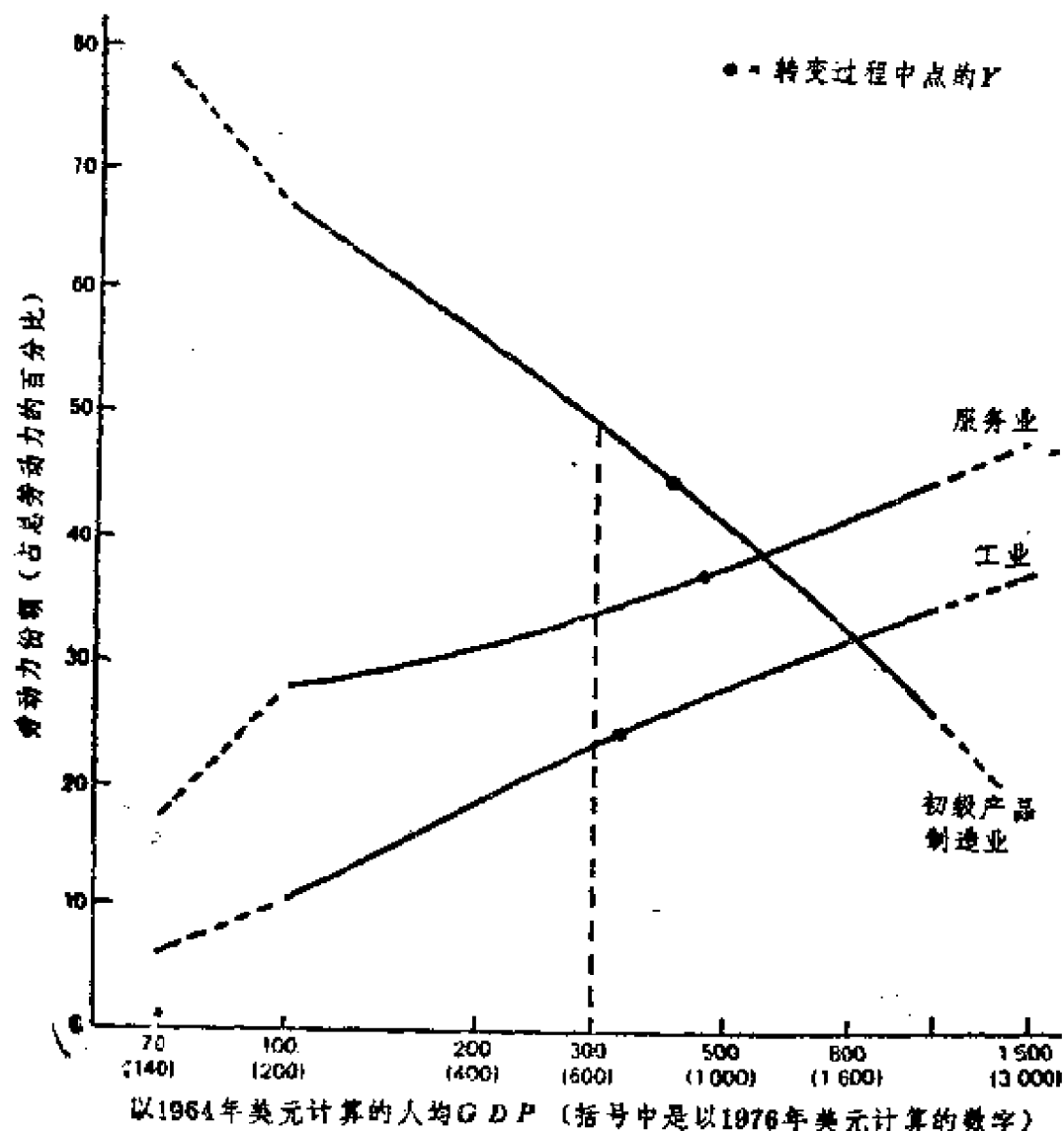


图3.7 就业的变化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和摩西·西尔昆：《1950—1970年的发展模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图8。

在转变的过程中还存在社会经济过程的变化。在这些国家中发现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由工业生产增长和从农村到城市的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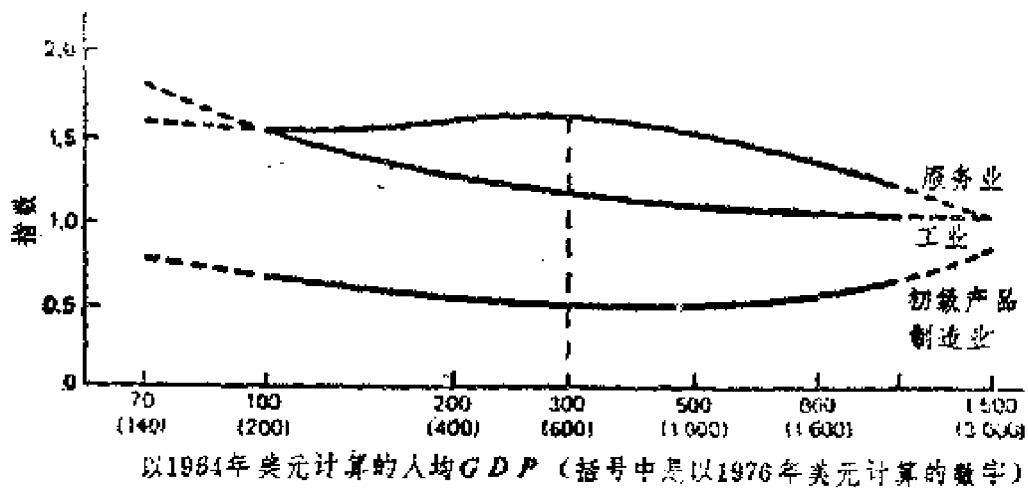


图3.8 劳动部门的生产率

资料来源：霍利斯·钱纳里和摩西·西尔昆：《1950—1970年的发展模式》，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图9。

速移民引起的日益城市化的现象。钱纳里发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超过1000美元时，城市人口一般都超过农村人口。但是人们也看到，在城市现代部门的收入集中大量增加时，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对收入分配情况的不断恶化起了作用。不过，某些其它的结构变化，比如教育机会的分散、人口增长率降低和经济二元结构情况的减少（见下文），都与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相联系。这使得某些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南朝鲜和台湾）能够奉行把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更公平地分配的政策。钱纳里所确定的转变过程的最后一方面的特点是，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死亡率和生育率都有所降低，虽然正如钱纳里已经注意到的，作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点的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下降之间并不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滞。

**结论及含意** 以上一直在描述的这一系列结构变化是钱纳里和他的同事们按时间序列和以横剖面对这些国家进行分析所观察到的“一般”发展模式。结构主义模型的主要假定是，发展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增长和变化过程，在所有国家中发展的特点都是相似

的。然而正如早些时候提到的，这种模型确实承认，随这些国家一系列特殊环境而定，它们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具体方式可以产生差别。影响发展过程的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天赋和大小，政府的政策和目标，可利用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及国际贸易环境。

一般来说，大国（例如印度、中国、巴西）有较为多样化的资源作为发展的基础，国内需求也较大。这种需求较大是由于这些国家人口较多，这使得这些国家可以早些工业化，并可以利用规模经济而无需向出口市场渗透。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台湾、南朝鲜和新加坡）通常国内需求较小，因而必须依赖于国外需求和外国市场以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总增长。那些促进初级产品出口的有利自然资源也缺乏的较小国家易于较早进行工业化，而资源丰富的较小国家易于推迟进行工业化的时间，在人均收入进入较高水平时仍依赖于初级产品生产。

然而各个国家的变化很大。例如人们发现马来西亚和委内瑞拉因为有特别有利的初级产品出口条件（或有利的国际贸易气氛）甚至比资源丰富的较小国家推迟工业化的正常时间还要长。另一方面，人们发现巴西和以色列推行工业化的时间甚至比一个大国或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的正常标准还要早些。这种偏离正常情况的解释是，巴西和以色列都能吸引可能得到的外国资金和技术。而且专门生产初级产品的部门发展迅速，国家的人均工业产量可以很容易地比专门进行现代工业生产、发展较慢的国家增长得多得多——比如，比较一下马来西亚（锡和橡胶）、印度或委内瑞拉（石油）和阿根廷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简单来说，结构变化过程的经验分析研究导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的速度和模式能够由于国内国际因素而有所变化，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是各个国家控制不了的。然而，虽然存在这种变化，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学家仍认为，人们能够在发展进程中确

认在几乎所有国家出现的某种模式。他们认为，这些模式既可以受到国际贸易和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又会受到欠发达国家政府选择的发展政策的影响。因而结构主义者对“正确的”经济政策结合可以产生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有利模式这一点基本上是乐观的。与此相对照，国际依附学派则悲观得多，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悲观主义的。他们争辩说，结构主义经济学家从各类穷国和富国计算出来的统计平均数对确定特定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只有有限的实践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使第三世界的贫困保持不变并使之永久化的世界经济中的实际因素。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依附理论是怎么一回事。

### 2.3 国际依附模型

近些年来，由于对线性阶段理论和结构变动理论的幻想逐步破灭，国际依附模型在许多人中间、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国际依附模型基本上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现在被国际、国内制度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各种僵化的状况所困扰，在穷国与富国的关系中，它们处于一种依附和受支配的地位。在这种总的看法下，存在两种主流思想。

#### 新殖民主义依附模型

第一种主流思想，我们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依附模型”，它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派生的。它基本上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存在和继续归结为存在富国——穷国之间高度不平等关系的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历史演进的结果。不管是富国有意识的剥削还是无意识的疏忽，富国和穷国在中心地区（发达国家）和边缘地区（欠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所控制的国际体系中共存，使得穷国在争取发展时要想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很难，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⑥ 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收入多、社会地位高、政治权力大

的集团（例如地主、企业家、军人统治者、商人、拿薪水的文职官员和工会领导人）组成了统治阶级少数上层人物。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基本利益是与不平等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为这种一致，他们才得到赏赐。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受支配于）包括跨国公司、国家双边援助机构和主要由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资助和支持的多边援助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特殊利益权利集团，同时从这些集团得到赏赐，依赖于这些集团。他们的活动和观点往往抑制了任何有利于大多数人口的真正为改革而做的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甚至可能导致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和不发达的永久化。总而言之，在不发达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观点把第三世界国家持续和不断恶化的贫困状况大都归咎于北半球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及其政策和它们在不发达国家内利用少数强有力的上层人物或寡头集团所进行的扩张。<sup>①</sup>因此，为使处于依附地位的第三世界从第一世界和国内压迫者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控制中解放出来，需要进行革命斗争，或者至少要求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重大的结构变革。

西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叙述是对国际依附学派的思想所作的最有力的说明之一：

不发达完全不是资本主义以前的落后状况所造成的，相反，它是附属于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结果和一种特殊形式……从属是一种制约性处境，在这种处境下，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其它国家经济发展与扩张的制约。当一些国家能够由于自我推动力量而获得扩张，而另一些国家由于处于从属地位，它们的发展只能是处于支配地位国家扩张的反映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经济之间或者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对这些国家的立即发展可能既有积极

作用又有消耗作用。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基本的依附处境使这些国家既要受剥削又要蒙受落后之苦。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在技术、商业、资本上以及社会政治上要比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占优势——这种优势的形式随着每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变化——因而可以剥削它们，榨取当地生产的部分剩余产品。因此依附是以在某些国家中允许工业发展，而在增长附属于并受到世界权力中心制约的另一些国家中限制工业发展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sup>③</sup>

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的各种论点在本书的第二篇和第三篇讨论穷困、收入分配、失业、国际贸易与外国援助问题时将更详细地加以探讨。但是我们仍将在本章的附录3.1中试图为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的读者简要说明新马克思主义不发达理论的中心论点。

**虚假示范模型** 第二种并且是不那么激进的国际依附模型发展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虚假示范”模型。它把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归咎于从发达国家援助机构和多国援赠组织来的好心的、但往往是不学无术的国际“专家”顾问所提出的错误的和不适宜的意见。这些专家提出有关发展的成熟概念、完美的理论结构和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往往导致不适当的或者完全错误的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是以主流学派的刘易斯式的剩余劳动理论或钱纳里式的结构变动模型为基础。由于土地所有制和其它所有权高度不平等、国内上层集团对国内国际金融资产控制不均衡、以及取得信贷机会极为不平等等等诸如此类制度因素的存在，这些政策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只服务于现存权力集团的既得利益。

此外，根据这种论点，主要大学的知识分子，工会领导人，未来的政府高级经济学家和其它文职官员都是在发达国家的学校接受训练的。他们在那里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大量的恶劣的洋概念以及完美的但却不适用的理论模型。由于很少或没有使他们有

效地掌握实际发展问题的真正有用的知识，这些人往往易于变成当权者现存政策和制度结构的不自觉的或胁从的辩护士。例如，在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中一般往往教授错误的、至少是纠缠于枝节问题的西方概念和模型，而在讨论政府政策时却把重点过多地放在资本—产出率、储蓄—投资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上。结果，我们在前边提到的许多需要解决的制度和结构改革问题却被忽视了，或者仅仅是一笔带过。

**结论及其它** 不管他们的思想体系如何不同，新殖民主义依附模型和虚假示范模型都拒绝把重点全部放在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标志的传统西方经济模型上。考虑到刘易斯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两部门模型的假设不真实和第三世界国家最近的历史事实，他们对两部门模型表示怀疑。他们进一步认为也不存在钱纳里等人声称的、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大多数穷国应当遵循的、脉络清晰的经验发展模式。相反，持依附理论观点和虚假示范理论的理论家们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国际力量的不平衡以及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基本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必要改革上。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号召立即剥夺私人财产，以期公共财产所有制和公共控制会更有效地帮助根除绝对贫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总生活水平（包括改善健康、教育和文化状况）。虽然一些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竟然说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无关紧要，但是多数有思想的观察家都承认，处理这些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伴随有审慎和明智的公私经济活动的国际和国内改革，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最终的目标是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改变增长的性质，这样，第三世界各个部分的人都会参加增长过程并从中受益。在第5章中，我们将探讨达到这双重目标的途径，这就是，既能在经济上获得较迅速的增长，又能在分配上较为平等。

### § 3 二元结构和二元社会的概念

不管是结构变动理论还是国际依附理论都含有世界是一个二元社会的见解，即认为整个世界分为富国和穷国；在发展中国家，小块富裕地区被广大贫困地区包围。在结构变动理论中隐含了这一见解，而在国际依附理论中则明显地包含这个内容。发展经济学充分讨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它描述了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在各个层次上存在并顽固保持着不断向对立方面发展的趋向。详细说，二元结构的概念包括下列四个主要内容<sup>①</sup>：

1. **不同条件**，有的条件“优越”，其它的条件“恶劣”，在既定领域中并存。二元结构的这一内容的例子包括刘易斯理论中城市现代生产方法和农村传统生产方法的并存；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物与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的并存；也包括依附理论中富强的工业化国家与孱弱的、陷于贫困的农民社会在国际经济中的并存。

2. **这种并存是长期的**，不仅仅是一种过渡。它并不是一种暂时现象，优越成分和恶劣成分的差距不会一下子消失。换句话说，穷国和富国在国际上共存并不仅仅是一种很快就会被纠正过来的历史现象。虽然增长阶段理论和结构变化理论都暗含这种假定，但是国际上的不平等日益扩大的事实似乎将驳倒这一假定。

3. 这种优劣的程度不仅确实没有任何缩小的迹象，而且甚至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例如，发达国家工人和欠发达国家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看来是在年复一年地扩大。

4. 优劣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是，**现存优势成分并没有或很少对改善劣势成分起什么作用**。事实上，它可能起着把劣势成分往下推的作用——去“发展不发达”。

### 3.1 国际上的二元结构

这四个二元结构的基本要点恰当描述了现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形势。首先,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见到的,在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大陆和气候区中现有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第二,这些差异很明显不是短期的现象,而是长期的现象。比如拿英国和法国为一方,以印度和非洲的下撒哈拉地区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持续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个世纪了。第三,这些差异显示出不断扩大的迹象,而不是不断缩小。我们看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特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的20年当中是怎样向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扩大。第四,也是最后一点,至少发展经济学家经济依附学派中多数人的判断是,国际经济中富国和穷国相互关系中许多因素使富国迅速增长,而对穷国的发展作用有限,有时则绝对有害。这些阻碍第三世界国家持续发展的所谓国际回流影响作用还包括以下国际的控制和依附力量:

1. 强国以对它们有利的方式控制和操纵世界资源和商品市场的势力;
2. 国际资本主义通过私人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控制欠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扩展;
3. 富裕国家对稀缺原材料的特权;
4. 由带有剥削性质的专利和许可证制度保护的不适用的和脱离实际需要的科学技术的出口;
5. 工业化国家在第三世界为防止跨国公司垄断经营的进口替代关税壁垒后面,把它们的产品“强加”于脆弱的第三世界市场的能力;
6. 向一个把教育视为发展过程的关键的社会传输过时的、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



7. 富裕国家在其控制的市场上用“倾销”廉价产品的办法瓦解穷国争取工业化的努力的能力；

8. 把第三世界国家限制在使国际收入日益减少的初级产品出口的有害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9. 注重规模宏大的现代部门的“橱窗”工程项目，而往往仅仅对国内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恶化起作用的有害的援助政策；

10. 创造并支持那些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效忠于外部世界（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上层特权集团；

11. 传输不适当的大学教育方法和不现实的、往往是脱离实际的职业标准（比如外国实行的对医生、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济学家的学位要求）；

12. 富裕国家用有吸引力的报酬引诱有技术专长的人材脱离欠发达国家的力量（国际人材流失）；

13. 使人精神沮丧的国内外豪富们骄奢淫逸生活带来的“示范效应”，这些通过进口的外国电影和杂志广告等获得传播。

正如我们在前边指出的，要想把不发达的灾难统统归咎于国际上的各富裕国家是不现实的。很明显，富裕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可以帮助穷国获得从历史上看较高的出口增长率。但另一方面，认为许多严重的不发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来自国外也同样幼稚。驳倒辛格教授的观点是困难的：

由较富裕国家的迅速发展所推动的那股发展动力——详细说就是那些更尖端、更昂贵和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人口死亡率的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对疾病控制能力的增强——就是在较穷国家产生人口爆炸、使失业率增长、不能发展自己的技术能力的那股力量。这事实上可能将使它们肯定无法获得继续保持当前的增长速度（更谈不上加速增长了）、带来令人满意的发展水平所需要的时机。<sup>⑩</sup>

### 3.2 国内的二元结构

我们对二元结构四层含义的说法也同样可以描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的经济结构。首先，在人口上层的20%和底层的40%之间生活水平差别很大。相当有代表性的比率高达6到12比1（见第5章）。收入很高的那少部分人大多居住在城市，而大批穷人一般则住在农村。然而，即使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地区也往往可以看到非常富裕的小块地区与不断扩大的贫民窟并存的现象。

但是二元结构的这第一个因素——“优”“劣”现象并存——并不仅限于财产、收入和权力的分配。它也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工业生产的技术性质上。这里既有使用进口的现代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制造大量高级尖端产品的小块飞地式的现代工业（大部分是加工制造业），又有为数众多的传统的、为迎合当地有限需要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工业。

第二，小块现代飞地与传统社会并存，一小撮“进步的”有钱的上层人物集团与劳苦大众并存，这种并存并没有显示出消失的迹象。在今天，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似乎还象过去一样，比如说10至15年以前一样，“发展”还没有沾他们的边儿。

第三，穷富的鸿沟以及现代与传统生产方法的鸿沟不仅在各个欠发达国家中，而且在各个欠发达国家集团中，都呈现了增长、甚至扩大的迹象。现在，象巴西、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新加坡、台湾、泰国、朝鲜、塞浦路斯、塞拉利昂和肯尼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多年来人均收入已取得相当高的增长；而孟加拉国、海地、马里、苏丹、加纳、印度、秘鲁以及许多其它国家在过去10年中人均产值增长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增长。然而，在许多国家内，穷富之间的鸿沟在许多情况下还正在扩大。这在那些具有明显的二元工业结构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菲律

宾、委内瑞拉、秘鲁、肯尼亚、赞比亚和印度等国家中尤其是这样。

最后，在现代飞地式经济中不断增加的财富与传统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之间的“扩散影响”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都不明显。事实上，好像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扩散影响。许多观察家不无理由地声称，正是二元社会中较强或优越部分的增长使得较弱或恶劣部分变得越来越恶劣。至少，它们是以牺牲“恶劣”部分的代价来求得自己的加强和优越的。在第二篇和第三篇讨论贫困、收入分配、失业、农村发展、教育、贸易、援助和技术引进等问题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是怎样被延长和强化的。

## § 4 “发展”的含义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把本章前几个部分的许多线索，当然还有前几章的线索，都放到一起，来解释一下我们讲的“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 4.1 传统的经济衡量方法

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说，“发展”一直是意味着一个原来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到7%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能力。衡量一个国家能够以比人口增长率更快的速度扩大它的产出的能力时，大家也一直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作为通用的经济发展指标。从广义上说，以“实际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和增长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货币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全面经济福利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说，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有多少实际的物资和劳务可供消费和投资。

经济发展在过去也可以用生产和就业的有计划变化，即在生产和就业中农业部门比重减少，而加工制造业和服务行业比重增加表示。当然，这在本质上实际是结构变动理论。因此，发展战略过去总是集中于往往以牺牲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代价的城市迅速工业化上。最后，这些关于发展的基本衡量办法往往要临时参考非经济的社会指标加以补充：例如识字人数、在校学生人数、卫生健康状况与服务状况、住房条件等的改进等。本章末将在附录3.2中为那些有兴趣的学生介绍补充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各种发展的“社会指标”的情况。

但是，总的来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几乎总是被视为一种经济现象。即迅速取得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者会以就业或其它经济机会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流到”人民大众身上，或者为经济和社会福利更广泛的分配创造必要条件。与“完成增长的任务”相比，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都是次要的。

## 4.2 经济发展的新观点

不幸的是，虽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确实达到了联合国的全面增长目标，但是，大部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却依然如故。这种情况暴露出发展的狭义定义中有些是十分错误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起来呼吁“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并要求直接加强对广泛存在的绝对贫困、日益增大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日益上升的失业的幽灵的进攻。总而言之，在70年代，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范围内从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被重新加以解释。“从增长中进行重新分配”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口号。达德利·西尔斯教授在他的主张中简洁地提出了有关发展含义的基本问题：

因此，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

经济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失业发生了什么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这三方面都从原来的高水平向下降，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特别是如果三个方面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作“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sup>①</sup>

以上的推断并非毫无根据，或者它是对某种假想状态的描述。比如，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取得了相当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但同时，增长对这些国家底层的40%人口来说，在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改进，甚至在实际上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水平还有所下降。从早期的“增长”定义来说，这些国家是“处于发展之中”。但以最近的贫困、平等和就业标准来衡量，它们并没有发展。当80年代初，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率时，不少国家的政府被迫砍掉原来就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项目，形势就进一步恶化了。

但是发展现象或长期不发达状况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或者对收入、就业和不平等的简单衡量问题。不发达是世界上20亿以上人民实际生活中的严酷事实——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国民贫困状态。正如丹尼斯·古雷特所生动描绘的：

不发达是骇人听闻的：它是肮脏、疾病、不必要的死亡和绝望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不发达对一个人来说只是反映低收入、住房破旧、夭折或不充分就业的统计数字的话，他是不会懂得它的。最富于感情的观察家也只有在亲自经受或设身处地地经受“不发达的震动”之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问题。当一个人被带入“贫困的文化”普遍流行的情绪中时，他就会受到这种独特的文化的震动。而那些生活在匮乏生活中的人，当他自己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既是非人的，又不是不可避免时，他们感受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震动。……不

发达情况下的普遍情绪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软弱无能感，是当一个人摸索着认识变革时的慌乱感和无知感，是对控制事态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屈辱感，是在饥饿和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的绝望感。长期贫困是一种地狱一样残酷的东西；人们只把它当作一件客观事物看待时，不能理解这个地狱是多么残酷。<sup>⑫</sup>

因而，不发达的处境整个说来是束手无策的。这种被剥夺状况在越来越多的人得到其它社会的发展信息，知道消灭贫困、痛苦和疾病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措施确实存在的时候变得尤其不堪忍受。

因此，发展必须既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公众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方面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通过这种变化，整个社会系统应面向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使大家普遍觉得原来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已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向更好一些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转变。

#### 4.3 发展的三个核心含义

当我们把发展视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系统持续向着“更美好”或“更人道”的生活前进时，我们能否把我们认为的发展含义解释清楚或使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大？问题是：美好的生活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是一个与哲学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环境重新加以评价和回答的永恒的长期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20世纪最近的20年的适当答案并不一定要象以前几十年那样。但我们和古雷特教授和其他一些人都相信，要理解发展的“内在”含义，起码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价值作为思想基础和实际指导方针。这些核心价值是，最

低生活需要，自尊和自由，它们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sup>⑭</sup>它们与所有时代的几乎所有社会与文化中的基本人类需要相联系。因而，下面我们依次对它们进行讨论。

**最低生活需要：提供基本需求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某些基本的需求，没有它们就活不下去。这些“维持生命”的基本人类需求无可置疑地包括食物、栖身之所、健康和保护<sup>⑮</sup>。当没有其中任何一种或严重供应不足时，我们就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存在“绝对不发达”状况。因而，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作用是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克服由于缺乏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引起的绝望和痛苦的手段。在这种范围内，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提高“发达的”“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在社会水平和单个个人水平上的持续不断的经济进步，人力资源的潜力就不能发挥出来。很清楚，一个人必须“有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sup>⑯</sup>因此，增加人均收入，消灭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上的不平等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sup>⑰</sup>

**自尊：要被当做一个“人”来看待** 美好生活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自尊——一种觉得自己有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被作为工具来使用。所有的民族和社会都在寻求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虽然这些形式也许被称为权威、个性尊严、荣誉或社会承认。这种自尊的性质和形式可能随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而变化。但是，随着发达国家“现代价值观”的扩散，由于国家的繁荣已经几乎成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上和技术上与先进社会接触时，这些原来有着自己的深刻价值观念的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在文化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由于在发达国家中与物质价值相联系的自尊具有极重要地位，因此，有价值 and 值得尊重现在越来越只赋予那些拥有经济财富和技术力量的那些国家——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这里我们再一次引证古雷特教授的话：

中肯的观点是，欠发达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命运。只要一个人的价值和能否得到别人的尊敬根据的是物质财富以外的标准，那么就有可能使人们安于贫困而不觉得受蔑视。相反，一旦社会流行的风气把优裕生活，包括物质福利当作尊严和尊敬的基本因素时，物质上“欠发达”的人们要感到受到尊敬和有尊严就变得困难了。……为了获得生活在欠发达状况中的社会所不能获得的尊严，而今第三世界正在寻求发展。……正因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或许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获得尊严的途径，所以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目标。⑩

**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能进行选择**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应包含在发展的含义中的标准是自由的概念。这里自由不是从政治或思想意识的意义上去理解（例如，自由世界），而是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中获得自由或解放出来这种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去理解的自由，以及男人和女人从自然、无知、其他男人和女人、悲惨的处境、各种惯例和教条主义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获得自由。自由含有社会及其成员具有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在追求我们称之为发展的社会目标时外部限制最小化的意义。W.阿瑟·刘易斯强调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时断定：“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增长，而在于它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⑪ 财富可以使人们获得他在贫困时不能得到的对自然界和周围物质环境的更大的控制能力（如通过与衣、食、住产品有关的生产）。财富还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多的闲暇的自由，得到更多的物质产品和劳务的自由，或者使人们摆脱物质需要的负担，生活在平静的精神世界的自由。

#### 4.4 发展的三个目标

我们可以断定“发展”既是物质的现实，又是精神上的一种状态；在发展中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方面的综合过程，社



会获得了过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

1. 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卫生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对生活必需品的分配；

2. 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要增加物质上的福利，还要能给每个人和国家带来更大程度的自尊；

3. 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是对其它人和国家的依附，而且是与无知和人类的悲惨处境有关的奴役和依附。

因此，我们可以把西尔斯教授对于发展含义所提的问题再一次系统表述和扩展如下：

1. 在一个国家中，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能使绝对贫困状况（即得不到生活必需品）、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业水平、教育、卫生和其它社会和文化服务的性质和质量得到改善？

2. 经济进步是不是既从内部人与人之间、又从外部国家和地区之间两个方面提高了个人和集体的尊严？

3. 最后，经济进步是不是扩大了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人们从国内外其他人和制度上的奴役和依附状况下解放出来？或者是不是它只是把一种形式的依附，比如说经济上的依附换成了另一种，比如思想文化上的依附？

如果某一国家对以上三个问题的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经历了真正的发展。如果只有第一个问题（它相当于西尔斯教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其它的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样的国家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仍然是欠发达的国家，它只能被称为“经济上较发展的”国家。

从这种意义上说，从彻底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分析角度出发，对世界上的富国是不是真正发达持保留态度，而称它们为经济上发达的国家是更为适宜的。根据西尔斯的思想，假如对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即如果人们的自尊和尊严感到少了，或者如果他们选择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使出现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把它们称之为发展也是一种误解。

## § 5 不发达与发展的多重因素：图解概要

图3.9试描述和概括我们认为不发达在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的某些主要内容。在图表中我们把不发达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用带有表示因果关系箭头的三个矩形表示，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低生活水平（仅够维持生命）、缺乏自尊和自由受到限制。决定生活水平要素的上半部分图表描述出不发达问题的经济方面。表的下半部分的两个方块——自尊和选择的自由——描述了我们称之为发展的典型的非经济方面。

实际上，经济力量对这三个方块都造成强烈的冲击，而像工作态度和制度等重要的非经济因素也是生活水平决定因素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处理现实世界的发展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分开。但是为了能够充分理解图表所描述的概念和过程，我们简单地分别观察一下这三个组成部分。

首先，我们看到低生活水平（生活必需品不足和教育、卫生及其它社会服务不够或根本没有）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低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低收入都是由整个社会劳动力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低引起的，而不仅是由在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引起。劳动生产率低可由各种因素引起。在供给方面的因素包括健康状况和营养状况差；工作态度不好；人口增长率高；高失业率和就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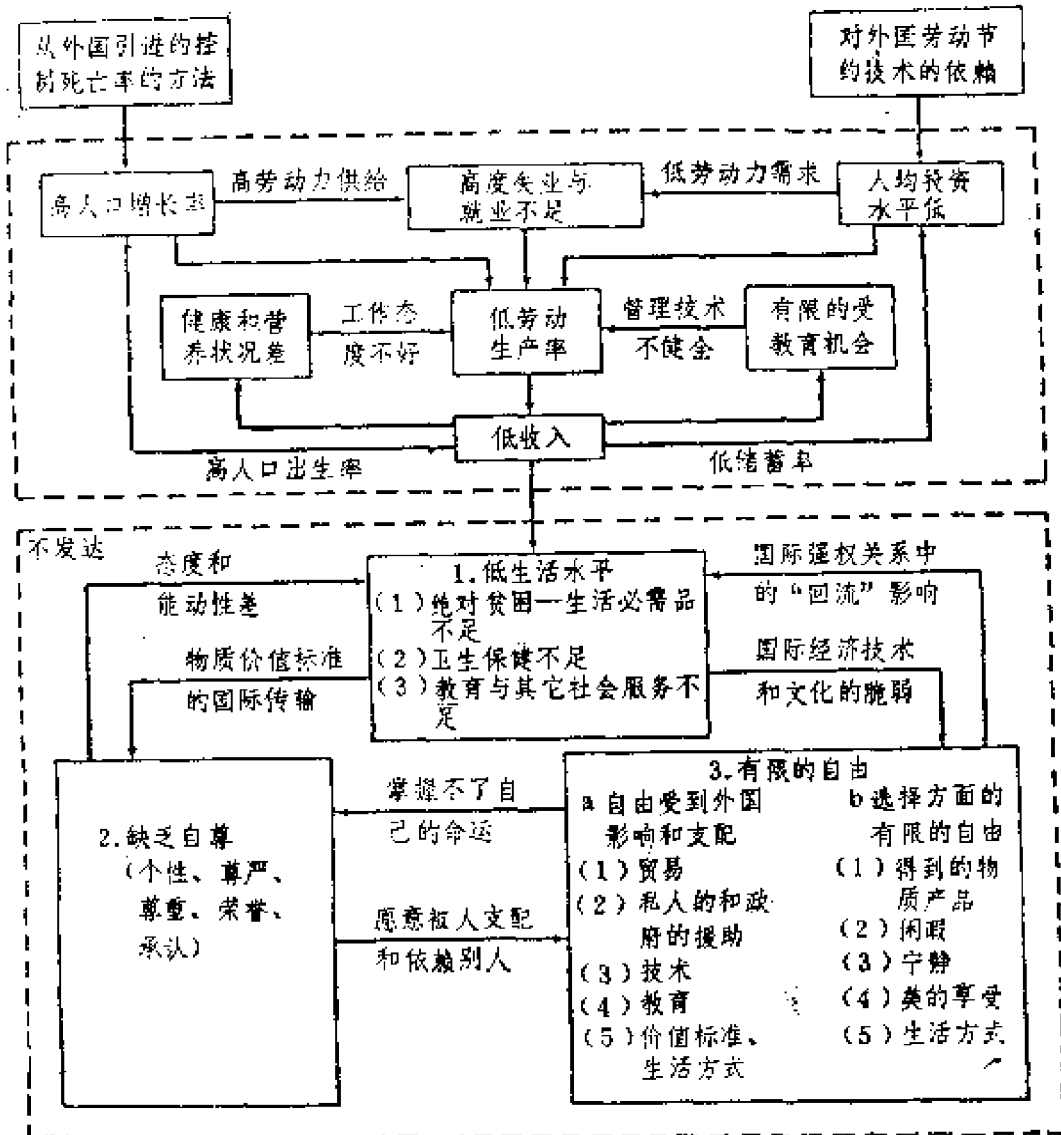


图3.9不发达：从多方面进行的图解

足。在需求方面的因素有技术不熟练，管理人员水平低下，工人总教育水平低会随着进口发达国家节约劳动的生产技术导致在国内生产中用资本代替劳动力。劳动力需求不足而劳动力供给奇高这二者一齐导致劳动力利用不充分。而且，收入低会导致储蓄和投资少。这二者又限制了整个社会的就业机会。最后，正像我们将在第6章中看到的，由于在旧时代对特别贫困的家庭来说，儿童是经济和社会安全感的几个有限来源之一，因此，低收入也被

认为与家庭人口多和高生育率有关。

请注意图 3.9 上半部分的箭头，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关系形成一系列连续的“链”，表明了一种“循环因果关系”或恶性循环过程。例如，在右方外部的链中，我们看到低收入导致低储蓄，它意味着低投资，有限劳动力需求，高度就业不足，低劳动生产率，从而只能得到低收入。在右方内部的链条中，低收入导致有限的教育机会（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以及管理人才和高水平劳动力的训练计划不足。结果是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被迫在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中生产，这进一步又使收入水平低的状况永久化。左方内部的链条表示，由于食物缺乏、环境卫生条件恶劣等导致工人健康状况不佳，营养不良，这些也都同样是决定工人的工作表现、工作是否拖拉、是不是遵守纪律、有没有上进心的基本要素。最后，左方外边的链条表明了低收入与高生育率、高人口增长率、供过于求的高劳动力供给、高度就业不足、低人均劳动生产率，以及最终，低收入永久化的关系。

从所有这些链和箭头中要记住的重要之点在于，低劳动生产率，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是彼此促进，互相影响的。它们构成了缪尔达尔所称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低收入导致低生活水平（低收入加上健康状况差，受教育水平低），低生活水平又导致劳动生产率低，而劳动生产率低进一步又使低收入永久化，等等，等等。<sup>⑩</sup>

但是，广义的低生活水平本身并非就是不发达。它们只是发达与不发达内在含义的表现之一。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发达与不发达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图 3.9 的方程（2）和方框（3）——缺乏自尊和有限的选择自由——包括了不发达的三个因素中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都受低生活水平的强烈影响，也都对低生活水平起作用。例如，低收入并不一定使特别穷的人感到卑贱或缺乏尊严，除非在其他人的眼里他们的身份和价值大部分

是由他们的物质上的幸福所决定。因而，富裕国家重物质的价值观念通过电影、电视、报纸、杂志、教育制度、外国“专家”、社区开发者等等在国际间的传输能够，也确实改变了决定自尊的因素。所以生活水平低使人们觉得自己的真实价值降低了。反过来，自尊心降低又会由于对生活、工作、清洁、一丝不苟和上进心的消极态度加速生活水平降低。这些现象由指向方框（1）和方框（2）的两个箭头表示。

低生活水平既造成有限的自由，也被这种有限的自由所影响（方框（3）和方框（1）与（3）之间的箭头）。它们使得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们在那些物质更富足的人面前挺不起胸，依赖这些人，受他们的控制。这极大地限制了这些国家和人民对不同的各种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选择的范围。反过来，有限的自由又大大削弱了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力量，迫使他们接受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中，富国的发展可能带来使穷国低生活水平永久化的长期的“回流”效应。

最后，请注意方框（2）和方框（3）还被显示原因与结果的箭头连接着。有限的选择自由意味着这些国家和人民很少或根本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更低一点儿，而且在其他人的眼睛里好像又丧失一些尊严。反过来，自尊心低的国家和人民通常没有经济心理和物质力量对他人的控制和丧失选择自由的情况进行抵抗。

总而言之，图3.9的三个方框简要地表示出不发达的本质及其内在含义。由于低生活水平、缺乏自尊和有限的自由都在使不发达永久化的累积因果过程起作用，那么很清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实际上就不存在发展的前景。由此必然得出，要从长期的不发达状况中摆脱出来求得发展，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起中心作用。然而在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关键因素的同

时，如果第三世界的政治家和计划工作者没有对国家和个人的尊严以及努力扩大选择的自由的重要性也给予重点考虑，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就会削弱，甚至化为乌有。

## 注 释

① 除本节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论述外，学生最好再查阅我编辑的《为经济发展而斗争》一书中由派帕尼克、亨利奥特和利斯克所写的阅读材料3、4、5。见该书17—54页。

② W·W·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3、4、12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罗斯托的阶段理论进行广泛而详尽的批评性评论见保罗·巴兰和E·霍布斯包姆：《经济增长的阶段》，见《凯克洛斯》杂志1961年第14期，第234—242页。

③ 这个模型是以两个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他们一个是英国的罗伊·哈罗德爵士，一个是美国的伊夫塞·多马教授，他们同时却分别在50年代初系统提出了这个模型的不同公式。

④ W·A·刘易斯：《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发展》，曼彻斯特学院1954年版；以及费景汉和G·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伊利诺伊斯州霍姆伍德城爱尔温出版社，1964年版。

⑤ 例如可见霍利斯·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巴尔第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工业化与发展》，《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工作文件第539号（1982年）》；霍利斯·钱纳里与摩西·西尔昆：《经济发展模式：1950年—1970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⑥ 最全面介绍新马克思主义关于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上的国际观点的老作之一，见保罗·巴兰：《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学》，伦敦海恩曼1975年版。

⑦ 把这种观点用于分析肯尼亚的例子提供了丰富材料，很令人感兴趣。见科林·赖斯：《肯尼亚的不发达状况：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学》，伦敦海恩曼1975年版。

⑧ 西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发展理论的危机与拉丁美洲的依

赖问题》，《西格罗》杂志1969年第21期；还可见本杰明·J.科恩：《帝国主义问题：控制与依附的政治经济学》，纽约贝西克书店1973年版。

⑨ 汉斯·辛格：《二元论的再思考：发展中国家二元社会问题的新探讨》，《发展研究》杂志1970年第1号第60—61页。

⑩ 同上，第62页。

⑪ 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国际发展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新德里1969年版，第3页。

⑫ 丹尼斯·古雷特：《痛苦的抉择：发展理论的新思想》，纽约埃西尼姆出版社1971年版，第23页。

⑬ 同上书，第87—94页。

⑭ 对“基本需求”方法的说明见弗兰克林·李斯克：《传统发展战略与基本需求的满足》，作为阅读材料5再印于《为经济发展而斗争》以及P·K.戈什编辑的《第三世界发展：基本需要研究方法》，康涅狄格州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84年。

⑮ 同⑫，第124页。

⑯ 最近的试图详细说明基本需要的概念并从数量上对它做出规定的文件，请见世界劳工组织：《就业、增长与基本需要》，日内瓦世界劳工组织1976年版。集中注意“权利”概念的类似观点可见阿玛蒂亚·森：《发展：现在走那条路？》，《经济杂志》93 1983年12月第754—757页。

⑰ 丹尼斯·古雷特：《痛苦的抉择》，第89、90页。从拉丁美洲发展的角度对个人自尊和尊严含义的讨论甚至更令人愤慨，见波拉·弗雷拉：《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伦敦企鹅出版社1972年版。

⑱ 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是合乎需要的吗？》，见《经济增长的理论》，伦敦艾伦与阿尔温出版社1963年版，第420页。

⑲ 见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性变化》，纽约众神出版社1968年版，附录4。

## 概念复习

发展 (Development)

不发达 (Underdevelopment)

扩散效应 (Spread effects)

控制 (Dominance)

依赖 (Dependence)

脆弱性 (Vulnerability)

增长阶段发展理论 (Stages of growth theory of development)

资本/产出比率 (Capital/output ratio)

资本货 (Capital stock)

储蓄率 (Savings ratio)

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 (Center and periphery)

哈罗德—多马方程 (Harrod—Domar equation)

必要与充分条件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结构变动模型 (Structural change models)

刘易斯两部门模型 (Lewis two—sector model)

剩余劳动力 (Surplus labor)

劳动力节约型资本积累 (Labor—sav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发展分析模式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analysis)

制度工资 (Institutional Wage)

新殖民主义依附模型 (Neocolonial dependence model)

买办集团 (Comprador groups)

虚假范例模型 (False paradigm model)

二元结构论 (Dualism)

生活富足、自尊、自由 (Lifesustenance, self—esteem, freedom)

恶性循环 (Vicious circle)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



## 问题讨论

1. 说明不发达阶段增长理论、刘易斯和钱纳里的结构变动模型与新马克思主义和虚假范例概念的国际依附理论的基本区别。你认为哪一种模型完满说明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处的地位？请说明为什么。

2. 说明二元结构和二元社会的含义。你认为二元结构的概念是否准确描述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情况？为什么？

3. 有的人认为国际上的二元结构和国内的二元结构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现。你认为他们这么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正确的概念吗？请说明。

4. 简要叙述在课文中遇到的“发展”含义的各种定义。每一种定义的优缺点是什么？你是否认为发展尚有其它方面而课文中没有提到？如果有，请叙述它们？如果没有，请说明为什么你相信课义对发展含义的叙述是充分的？

5. 为什么严格经济上的发展定义是不完全的？你理解“经济上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你能不能举出一种假设情况或真实事例说明一个国家经济上可能是发展的，但仍是不发达的？

6. 为什么理解发展的含义对第三世界国家制订政策是很关键的？你认为一个国家能不能草草得出一种发展定义并为取得这些目标相应调整它的发展战略？在实现这些发展目标时会出现什么经济与非经济的障碍和制约因素？

## 附录3.1

###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评论<sup>①</sup>

在本附录中，我们将简要地介绍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两个理论的基础之上：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虽然帝国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推出的，但前者并不能完全决定后者。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作为“中心地区”的富国统治“边缘地

区”穷国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完全事先认定。以下两个因素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1）在国际关系中，政治优于经济。而对政治决策进行预测较为困难；（2）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不都是完全一样的，因而有各种形式的依赖和支配关系。因此，新马克思主义模型只想说明这种关系的一般特点，而为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留有充分的余地。

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穷国和富国关系上的基本论点是，中心地区的存在对边缘地区国家的发展是有害的，而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古典作家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得到的两个主要出发点之一。这个观点可以用他们另外一个重要出发点，很概括地加以说明。即垄断资本主义需要一系列的外界需求来源和有利可图的对外投资场所。由于马克思“剩余价值不断增长”规律的作用，垄断资本主义比它的前身竞争资本主义更富于扩张性和对外侵略性，因而它的这种需求更大。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中心地区国家结构需要的本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关系必定是一种剥削关系。剩余价值或利润通过各种渠道从边缘地区流入中心地区。这进一步使中心地区榨取剩余价值更加困难，导致它们进一步向外扩张。这样，欠发达国家就被卷入中心地区榨取剩余价值的爆发性恶性循环中；同时，由于中心地区国家从它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以及其它因素（下边将说明），使它们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的事。

在这个观点上，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巴兰、斯威齐和麦格道夫认为，这种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活动是不发达国家经济不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充分条件，而阿明和托玛斯（见附录末特殊参考文献目录）在强调导致欠发达国家发展一种不适宜经济结构的“其它”因素的同时，对这种“不可能论点”的绝对可靠性产生疑问。因此，

根据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必须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可能性”与“不适宜模式”二者有所区别。

这个差别十分重要。由于早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榨取剩余价值的作用（他们认为这种作用逐步削弱），因而他们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制造特别穷的边缘地区和繁荣的中心地区必然的两极分化制度。因此，贫困和富裕是一块硬币的两面。这种暗含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从它很象一方赢多少必然引起另一方输多少的赌博的角度说是不真实的、教条主义的，很容易破坏对问题的探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当武断地假定：

(1) 相当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中心地区榨取了；(2) 没有被中心地区榨取走的剩余价值也不能用在有助于当地发展的方面。因而，即使被榨取走的和未被榨取走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很低，他们也认为谈不上增长。

阿明和托玛斯在这两个观点上比较现实。他们试图用欠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必然不适应性取代教条主义的“不可能论点”。阿明用马克思的术语把榨取剩余价值称作中心地区国家的“持续原始积累”，但是他认为总还会有些剩余价值留在不发达国家的当地集团手中，而且仍存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合理利用这些剩余的可能性。这样，新马克思主义模型适应实际的能力大大加强。欠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不适宜性也由于欠发达国家被包含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而被视为是一种必然结果。

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主要早期发展文献中的“恶性循环”论点。他们认为，这些理论为较穷国家的依赖性、宿命论和屈从气氛提供了思想武器，从而促成了它们贫困的永久化，助长了它们在发展中寻求外界帮助的习惯。巴兰批判恶性循环理论的话经常被人引用：——“我们似乎面临一种恶性循环，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而没有农业产量的增长和剩余产品的增长就没有工业化。但是，在社会经济关系领域，正如马克思指出

的，只有在纯粹抽象、纯‘理论’的意义上，这些因素的连锁关系才显得这么严格，这种命运的循环才是这样令人非相信不可。这是很常见的。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大量的因素加进过程中，使得在‘灰色理论’中显得毫无出路的地方取得突破”②。

言外之意，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恶性循环理论是拒绝承认具体历史环境特性的思想方式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中总可以找到刺激增长的因素。巴兰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这种必要的外界刺激是由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特别是在殖民地进行的掠夺所提供的。在苏联，斯大林独裁统治强加给人们头上的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以斩钉截铁的手段解决了不发达的棘手问题，由此创造出的经济剩余几乎同时被用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过程中。

对巴兰来说，欠发达国家的真正难题不在于出现大家公认存在的恶性循环现象，而是缺乏被榨取剩余产品所恶化了的对发展的有效刺激。于是，这里又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些类似一方得分就等于另一方失分的记分方法。这种观点认为，中心地区国家不断地进行“原始积累”，这就意味着边缘地区国家的负原始积累。于是，剩余产品的转移造成了欠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并使之永久化。弗兰克（Frank）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不发达的发展”。

阿明也接受了弗兰克的这一观点，然而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对阿明来说，这意味着一种“依赖性发展”，即通过发展中国家与中心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严格地说：即通过把这些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强加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一种不适宜的增长模式。这种观点考虑到了总收入增长的可能性，这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中是看得到事实。

最紧要的问题是，这些欠发达国家能够到手的剩余是怎样利用的。这使得新马克思主义者去考察各个国家的上层人物集团。

虽然像巴兰和斯威齐这样的作家有时变得极为傲慢，但他们的傲慢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不是一种道德判断：它力求清楚地说明，指望这些上层人物是不会有发展的。相反，这些上层人物天生是助长欠发达的因素。这种分析是基于这些上层人物所处的“客观条件”。他们大摆阔气的挥霍浪费，投资于不动产当中并极其害怕担风险，为了保险起见把积蓄运出去存在外国银行，他们避免在工业中投资——所有这些经济行为都是从他们的私人利益出发，基本上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合理反应。他们害怕外国的竞争（如果他们投资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中的话）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大多数上层人物集团成员都缺乏建立能与外国寡头竞争的企业所需要的资本。他们也缺乏有利于增长的创业者的技术、工作态度和创新精神。

阿明提出，当地的上层人物集团事实上并不受中心地区上层人物的“剥削”，只不过他们独立活动的余地和积极性受到这些上层人物集团的严格限制而已。不管怎么说，很多欠发达国家的上层人物也从外国在他们本国的活动中得到好处。阿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接受了埃曼纽尔（Emmanuel）的不等价交换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工资水平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欠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较低，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不但要承担本国资本家阶级剥削的重担，而且还要受中心地区国家资本家阶级的剥削。他们既要承受本国资本家的“一般”剥削，又要负担中心地区国家资本家阶级的“原始积累”的重负、中心地区国家劳动阶级所享受到的较高的工资本身只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它并不承担持续原始积累的任务。

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第三世界国家缺乏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人才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但是，他们指责把这种情况当作解释不发达问题的中心的人的折衷主义和专横武断。他们认为，企业管理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一俟使得利用这些人才成为可能和

必要的“客观条件”出现，就马上会被发现和创造出来。而这些客观条件在依附于人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第二位的；它只不过是中心地区国家有计划地打击和破坏（或者如阿明和托玛斯所说，向错误方向引导）当地发展努力这一根本问题的结果。

从边缘地区国家上层人物在经济上软弱无力的观点出发，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中，只有国家才能在有利于发展的形式上利用这些剩余产品。它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利用这些剩余产品。首先，国家本身可以成为资本家，由国营企业为工业化投资。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国家的这种作用必定是有限的。第二，国家可以用长期贷款的形式，给本地上层人物中有能力的人以足够的资金。这种常见的做法支持了国家成了制造阶级的工具的观点。一旦国家认为本地勤勉的资本家是增长的先决条件时，国家就试图从现有的、完全是以获利为目的的、官僚、有地产的上层人物中创造出这样的阶级。但不久，国家就会陷入一种矛盾状态：勤勉的产业资本家阶级发现自己处于与强大得多的外国竞争者相抗衡的地位（国家一般也迎合他们的需要），也处于和当地的商业资本家、官僚政治和地产阶级势力相抗衡的地位。这些人也象国家一样在外国势力面前奴颜婢膝。于是，国家通常不投资于与外国势力相竞争的部门，而投资于基础设施部门和旅游业。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是在运输和通讯方面投资较多，是欠发达国家的特点。这种特点或者是由于在和外国资本的竞争中沒有其它的选择，而作为欠发达国家政府实行“新政”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果而出现，或者是买办政权利用本地资源剥削本国劳动人民“自然”要实行的一种政策。有人断言，修建道路并不是为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服务的，而是为外国公司的需要服务的。这种论点的论据是所修道路都是贸易中心，港

口和跨国公司所在地的通路。

当地投资较多的第二个领域是旅游业。对此新马克思主义者极为蔑视。他们认为，旅游业是依赖性的直接结果，是解决欠发达国家长期问题的不费力气的办法。旅游业带来外汇，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建筑业的活力——建筑业是通常不为外国人包揽的少数工业部门之一。但是，由此带来的危害要大于好处。与外国的习俗接触（往往是富裕阶级的习俗），破坏了本地的文化，会产生可能恶化国家的收支平衡和储蓄能力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兴趣。“示范影响”的作用变得意味深长：外国消费模式成为地位显赫的象征。

正如几个大的寡头公司控制了中心地区国家的国内市场一样，这些公司的分公司也是中心地区国家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工具。跨国公司（MNCs）被新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现代帝国主义的权力机构，而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则不过起一种辅助或支持作用而已。

因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东道国活动的效果完全是单向性质的。他们只看到跨国公司活动消极影响的一面，或者最多承认它有积极影响，但是这种积极影响会被其消极影响所抵消，或者根本不值一谈（第14章将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第三世界中的跨国公司进行不偏不倚的讨论）。

在新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看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利润动机仍然是核心和支配性动机，因此，跨国公司的基本作用就是把剩余（利润）从边缘地区国家输往中心地区国家。跨国公司的存在目的及其基本作用就决定了它们对第三世界东道国的发展是有害的。由于跨国公司是利润动机的工具，所以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它们从本质上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是有害的。马克思原来就认为，不存在任何利润合理化问题：利润代表完完全全的盗窃。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对跨国公司的论点是他们强调利

利润动机思想方法的产物，是他们把跨国公司视为利润动机的工具这种观点的结果。不幸的是，这使他们贬低了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显著的好处。

一般说来，新马克思主义者固有的对跨国公司的激进观点还反映在他们对外国投资、外国援助、对外贸易和国际关系的观点中。无论外国政府的投资还是私人的投资，都被他们视为中心地区国家向边缘地区渗透的重要手段。由于所要进行的工程项目是由外国投资者选择的，所以这些工程的作用是使边缘地区国家的经济成为中心地区国家的附庸。即使决策权不完全掌握在外国投资者的手里（有些特殊工程项目），但反映中心地区国家偏好和稀缺程度的国际价格结构和以中心地区价格为基础的新古典派的项目评估计划方法（由国际组织、国际援助机构等推荐给欠发达国家——见第16章）的结果也差不多。因此，他们指责中心地区国家把根本不适合当地需求的增长模式强加给边缘地区国家经济。而且由于开始时流入的外国资本在以后几年会以还本付息、返回利润和资本外逃（本地的上层人物为安全起见把积蓄送到国外）的形式，导致多得多的资金外流，因而会在很大程度上暗中破坏这种增长的可能性和增长的速度。

因此，根据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向外国投资，是中心地区国家千方百计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的结果。任何这样的投资都可能被中心地区国家用于剥削。但是问题的实际一面也是重要的。对早期马克思主义来说，外国优先投资的领域是榨取原材料的领域（特别是与能源有关的原材料）。这反映了战后中心地区国家面临重要原材料的短缺以及它们要把对边缘地区国家这些稀缺原材料供应的依赖性变为边缘地区国家对中心地区国家的依赖的企图。但是人们对此可以争辩说，问题是在外国投资和利润返回这一期间实际出现了什么情况。这样提出问题可能更合适。例如，因循守旧的人会说，如果没有外国投资也许还建不起来这些工



厂，当地也不会有这些生产技术。因而他们认为，被剥削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好处的。这样，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就代表接受投资的国家为这些外来的好处所付的代价。但这种观点与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把利润视为“剥削”和盗窃的观点完全是格格不入的。

**援助**被新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外国投资的补充。或是直接——当发展中国家把援助用于基础设施——或是间接——当援助款项被用于赠与国规定的方面——援助都对外国投资打开了这些国家的大门，并使将剩余送往国外的机制更加灵活。由于援助主要由政府使用，因而新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是私人投资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通过政府花费的部分。

**策略**考虑使援助成为外国宝贵的政策工具。很多援助都是为了避免对中心地区国家不利的政治危机而提出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目的。例如，这些援助项目的一个方面是为美国军事基地所付的租金。援助的结果是把本地当局的决策权力转移到了赠与国的政府。因此，援助是服务于控制和利润动机的工具。这样的体系结构中不存在人道主义援助的特殊、持久、必然地位，因而，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忽略不计。新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即使小额的人道主义援助像政府间援助那样，由于援助是通过同样渠道来的，它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对多边援助**，新马克思主义者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这种援助的“多边性”只不过是减少风险的一种策略。这样能使第三世界国家被剥削的穷人找不到一个发泄愤怒的具体目标。在慈善精神支配下管理这些援助的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被视为中心地区国家剥削的帮凶。

最后，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流行的二元发展理论是骗人的，因为这些理论忽视了他们所说的把剩余从传统部门输送到现代部门，从边缘地区输送到中心地区这种国际输送的基本事实。对他

们来说，没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改变当代国际事务的状况，也不可能带来自力更生的发展。

以上结束了我们对新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在经济发展的批判所作的总结。它的核心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要求经济发展的激进目标以及通过令人难以忍受的手段实现这些目标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据说是产生于依附的道德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弊病，甚至是产生于“依附性发展”的弊病。是因为现存国际体系加重了这些弊病，才产生了这种必然性。

但其他的不那么激进的观察家虽然在许多方面与新马克思主义一致（在基本的看法上有争议），但他们认为，变革可以在现行体系内部或外部先行产生，并不需要相应的革命。他们指出，新马克思主义者除了革命什么药方也开不出。而且他们注意到，革命运动有用一种剥削（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代替另一种剥削（经济上的）的倾向。

但是，不管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与其它形式的结构主义和传统主义者的旧理论的争论中谁优谁劣，人们可以确信，随着南一北对抗的加剧，这种争论在今后一些年中会愈演愈烈。

## 注 释

① 我很感谢我的学生乔治·亚那考基欧高斯在准备这篇附录中对我的帮助。

② P·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8年版，第227页。

## 附录3.2

### 多种衡量发展的社会指标

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衡量发展的标准所带来的问题，大家都很清楚。反对这种衡量方法的主要意见是，这种方法没有把维持生活的非市场的（因而也是非价格的）生产，包括妇女的许多家务劳动包括在内，也没有把国民生产总值与收入、福利的分配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于是，~~许多人~~许多人一直在设法补救这种方法的缺陷和创造其它综合指标补充或代替这种传统的衡量标准。<sup>①</sup> 这些指标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要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标准的”或“最理想的”方式来衡量发展，另一类则用生活质量衡量发展。

第一类综合指标的主要代表之一是由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1970年所进行的研究。<sup>②</sup> 这项研究的内容涉及选择最适宜的发展指标和对不同发展水平上的这些指标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的结果是建立了社会发展综合指标。起初考察了73项指标，然而最后只选择了16项主要指标（9项社会指标和7项经济指标，见表A3.1）。指标的选择是根据它们对形成一个发展指数是否有密切关系，以关系密切程度得出权数。人们发现，这种发展指数与各种单独的社会和经济指标的关系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这些指标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国家按发展指数排列的次序与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列的次序不同。人们还发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展指数的关系要比发展中国家密切得多。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在人均产值达到500美元（按1960年价格）时，社会发展速度要比经济发展速度快。

另一项根据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方式衡量发展的研究是由阿德尔曼和莫利斯进行的。这项研究根据41个变量对74个国家进行了分组，列在表A3.2中。<sup>③</sup> 他们用因素分析法

考察社会和政治变量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发现了某些关键性变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许多相关关系。

对这些研究的主要批评是，他们是根据结构变化而不是根据人民福利去衡量发展过程。他们的方法同样包含发展中国家必须沿着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假定。这些研究人员使用诸如人均动物蛋白消费指标和人均能源消费指标就表明了这一点。

而且这类研究总是强调对产出的衡量，比如用每千人所拥有的医生或病床数以及就学人数比率等投入项目去衡量卫生和教育状况，虽然只有象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等产出项目才是真正的发展目标。为了回答这些责难，有好几种研究项目都试图根据满足人口大多数的基本需要或根据“生活的质量”来建立衡量发展程度的综合发展指标。

莫利斯建立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PQLI) 的研究是这方面的著名的尝试之一。<sup>④</sup> 他用人们在一岁时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三项指标组成一套简便的综合指数 (PQLI)。每一种指标都用1—100的数字代表对每个国家工作成绩的评价，1表示“最坏”的成绩，100表示“最好”的成绩。预期寿命的上限100定为77岁（瑞典在1973年取得的成绩），下限1定为28岁（几内亚比绍1950年的预期寿命）。各国预期寿命的数字都在上下限之间，在从1到100评分。例如估计寿命上限77岁和下限28岁的中点是52岁，就把52岁定为50分。与此类似，婴儿死亡率的上限定为9%（瑞典1973年的成绩），下限定为299%（加蓬，1950年）。识字率用从1到100的百分比衡量，就直接用百分制划分等级。一旦一个国家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的成绩按1到100的等级定出分来，按同样的权数平均，这个国家的综合指数 (PQLI) 就计算出来了。

虽然通过研究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的国家PQLI值也偏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PQLI值也偏高，但二者之间

表A3.1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表

---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人口中在20000人以上的地点居住的人口的百分比
人均每天动物蛋白消费
中小学入学人数总和
职业教育入学人数
每千人中报纸发行份数
每一居室平均住人数
职业人口中有电、水、煤气的人的百分比
每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农业产量
人均电力消费 (KW)
人均钢材消费 (KG)
能源消费 (折合为人均消费煤 (KG))
制造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百分比
人均外贸额 (以1960年美元计算)
工薪收入者在整个从事经济活动人口的百分比

---

资料来源：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和衡量标准》，日内瓦1970年版，第63页。

的相互关系并不十分紧密。某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但PQLI值却很低，甚至低于最穷各国的平均值。另一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但PQLI值却比中上收入水平各国的平均值还高。表A3.3列出了本世纪80年代初分别按人均收入和PQLI值排列的第三世界国家名次的一个实例。资料似乎表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量增长之前基本生活的质量就能获得重大改善。或者反过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较高并不能保证生活质量较高。请特别注意人均收入水平相近但PQLI值差别很大的那些国家（或地区），例如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中国和印度，坦桑尼

表 A3.2 阿德曼和莫利斯列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量

---

传统农业部门的大小
二元结构的程度
城市化的程度
基本社会组织的性质
本地中产阶级的地位
社会流动性的大小
识字率
大众传播媒介的水平
文化与种族的同质程度
社会紧张程度
自然人口生育率
观念现代化程度
国家一体化的程度和民族团结意识
政治权力集中程度
民主制度的实力
政治上的反对党和出版的自由程度
政党的竞争程度
政党制度的主要基础
工人运动的实力
传统上层集团的政治力量
武装部队的政治力量
政府机关的效率
领导层对经济发展的支持
政治稳定程度
196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50/51—1963/64年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自然资源蕴藏量大小
总投资率
工业现代化水平

1950年以来工业化的变化程度  
农业组织的性质  
农业技术现代化的水平  
1950年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程度  
有形的经常资本充足程度  
1950年以来有形的经常资本的改善程度  
税收制度的有效性  
1950年以来税收制度的改善程度  
财政制度的有效性  
人力资源的改善程度  
对外贸易的结构

---

资料来源：艾尔玛·阿德曼和塔夫特·莫利斯：《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  
巴尔第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亚和冈比亚，台湾和伊拉克，哥斯达黎加和巴西。沙特阿拉伯和斯里兰卡之间对比起来特别突出。

表面上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没有以GNP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标准时所带来的那些主要问题。它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用生活质量衡量发展结果的办法把人们生活福利状况的问题考虑进去。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还通过利用反映这些领域分配情况的指标，把分配问题结合进来加以考虑。因为，除非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从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方面的改进中得到好处，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以上这些领域中取得较高的平均值。而且，大家一般都同意，这些领域中的进步，是发展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像GNP一样，PQLI值也可以用来进行国际间的比较。与其它讨论过的指标相比，它还具有所需资料容易找到、衡量简便的重要优点。

但是，对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它只是一种有限的衡量标准。它没有结合“生活质量”这个概念使人联想到的许多其它社会和心理上的特点——如安全感、正义、人权等等

表A3.3 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1981年人均GNP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PQLI) 的对比

国 家	人均GNP (美元)	PQLI
冈比亚	348	20
安哥拉	790	21
苏丹	380	34
巴基斯坦	349	40
沙特阿拉伯	12 720	40
印度	253	42
伊拉克	3020	48
卡塔尔	2 7790	56
坦桑尼亚	299	58
津巴布韦	815	63
巴西	2 214	72
中国	304	75
斯里兰卡	302	82
新加坡	5 220	86
台湾	2 503	87
哥斯达黎加	1 476	89

资料来源：约翰·P·刘易斯和V·科拉布编：《美国外交政策与第三世界1983年大事纪》，纽约普拉格出版社1983年版，表C-3。

——在标准中加以考虑，更为重要的意见是，它对构成指数的每一指标都给予同样的权数，同时收进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这两个反映类似现象的衡量标准，而且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样做的道理何在。

然而，尽管物质生活质量指数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它弥补了GNP衡量标准的某些不足之处，似乎仍是衡量发展的一种有用的指标。因此，它可以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有益补充。



## 注 释

① 本附录吸收的两个优秀的社会指标研究结果是，在南希·巴斯特编辑的：《衡量发展：发展指标的作用及适当问题程度》，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72年版，书中“发展指标：导言”一节；诺尔曼·希克斯和保罗·斯特里顿，《发展指标：探索基本需求的尺度》，见《世界发展》1979年版，第7卷第6号第567页—580页。

②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及衡量标准》，日内瓦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1970年版。

③ 艾尔玛·阿德曼和赛西亚·塔夫特、莫利斯：《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巴尔弟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7版。

④ D. 莫利斯：《衡量世界穷国的状况：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1979年版。

## 第4章 历史上的增长与当代的发展：教训和争论

今日大发达国家的增长状况，同发达国家进入其现代经济增长的前夕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差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西蒙·库兹涅茨

### § 1 增长竞赛

在过去20年里，世界经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促进国民收入实际增长速度的方式上。一切国家，富国和穷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混合型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迷信经济增长率。每年年底，世界各国都编制统计资料，以表明其GNP（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增长率。“增大增长速度”已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在全球的记分卡上，经济增长成绩的优、劣能够决定各国政府地位的升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三世界的各种发展计划常常是以其国民产品和收入的增长程度来评价的。事实上，许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发展同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等同起来。

鉴于增长概念对于在世界范围内评价国民经济的相对成就起着关键的作用，了解经济增长的性质及其原因是很重要的。因此，这一章开始考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使用简单的生产可能性结构来描述国民产值的水平、构成和增长。在简要地

考察当代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记录之后，我们将分析经济、结构和制度方面6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似乎显示了一切增长经济的特性。我们通过提出如下问题来作结论：当代发达国家的历史增长经验，对于今日第三世界国家的计划和战略是否适用？

## § 2 增长经济学：资本、劳动和技术

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或组成部分是：

1. 资本积累，包括国土上所有新投资、物质设备和人力资源。
2. 人口增长以及因人口增长而造成的劳动力增长。
3. 技术进步。⑦

以下简要考察各个要素。

### 2.1 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为了增加未来的产品和收入将现有收入的若干份额储蓄起来并用于投资的结果。新的工厂、机器、设备和材料增加了一个国家的实物“资本存量”（即所有物质生产资本货物的总的“净”实际价值），使扩大产出水平成为可能。这些直接的生产投资，是由通常被称为社会经济“基础设施”——道路、电力、水源和卫生设备等方面的投资来补充的，后者促进各种经济活动并使它们溶为一体。例如，农场主购买一台新拖拉机的投资，可以增加他所能生产的蔬菜的总产量。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运输设施使这些增加的产品到达本地市场，其投资就不会增大全国的食品生产总值。

还有其它用不太直接的方式投入一国的资源。水力灌溉设施能够改良一个国家的农业用地，提高每公顷土地的生产率。如果100公顷可灌溉土地能够生产出和其它投入相同的200公顷非灌溉土地的产量，那末，该水利设施的作用就相当于增加了一倍非灌

溉土地的数量。使用化学肥料和以农药控制害虫，在提高现有农田的生产率方面，会有同样的效果。所有这些投资形式，都是改善现有土地资源质量的手段。就实用而言，它们在提高生产土地总“存量”上的效果，同迄今尚未使用但可以使用的空白地是很难区分的。

与此类似，人力资源的投资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产生和增加劳动力的数量相同、甚至更大的生产效果。正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成人及其它类型的“非正规”教育，作为在房屋、仪器、设备上的直接投资（例如，书籍、电影放映机、个人电脑、科学仪器、业务器械和诸如机床、磨床一类的机械）的结果，都能在增加人的技能和人力资源方面起更大的作用。对教师的进一步的适当培训，同样，好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可使一定劳动力的质量、领导能力和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人力资源的投资概念同通过大规模投资提高现有土地质量从而提高生产率的投资概念是相似的。

以上所有现象和许多其它现象，都是导致“资本积累”的投资形式。资本积累能增加新的资源（如尚未使用的空白地），或者提高现有资源的质量（如水利、化肥和农药），而其基本特点是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做一笔交易——现在先做出点牺牲以便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 2.2 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

人口增长以及与之相关、尽管延缓的劳动力的增加，在传统上一直被看成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较多的劳动力意味着较多的生产性劳动力，而较多的总人口使国内市场的潜在规模增大。然而，对于在“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人力供给的迅速增加，对经济进步究竟产生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是有争论的（见第6章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究竟起好作用还是坏作

用的讨论)。显然，这将取决于该经济系统吸收和雇佣这些追加的生产劳动者的能力——主要是指同资本积累的速度及种类，以及诸如经营管理技能等有关因素的水平。

在暂时忽略技术因素而对经济增长的前两个基本构成部分有了一个初步了解之后，让我们通过生产可能性曲线来看一看它们是怎样相互作用，以扩大一切商品的社会潜在总产量的。回想一下，对一定技术和一定数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来说，生产可能性曲线描述了当所有资源被充分、有效地使用时，任何两种商品比方说稻米和收音机可达到的最大产量的组合。

假定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提高现有资源质量的投资，或在新的资源——土地、资本、以及就较大家庭来说还包括劳动力方面进行了投资，就会使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数量增加一倍。图4.1表示，倍增的总资源将引起整个生产可能性曲线由 $P—P$ 均匀地外移至 $P'—P'$ 。现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收音机和更多的稻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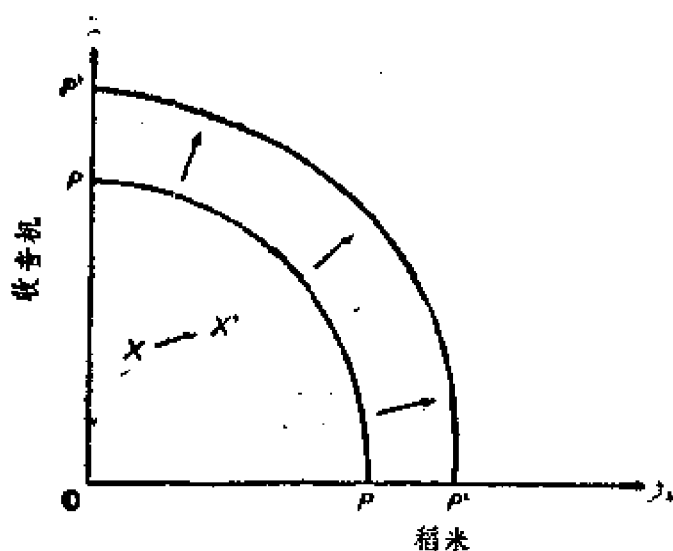


图4.1 增加物质和人力资源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影响

既然假定该经济仅仅生产两种商品，因此，国民生产总值（即生产的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总价值）将比过去提高。换句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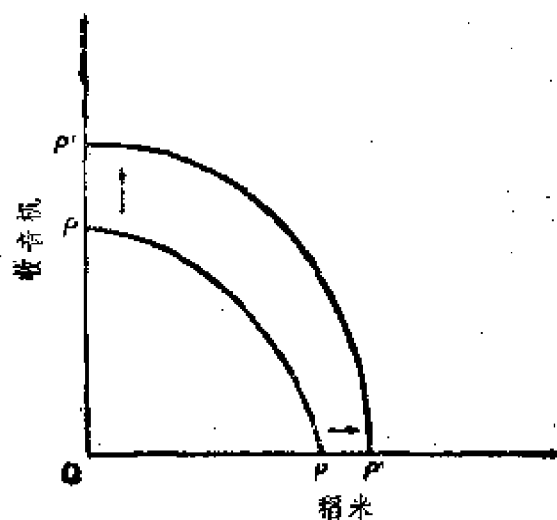
经济增长过程正在进行。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谈论的这个国家是在物质和人力资源未充分利用，如图4.1的点X的情况下运行的，但生产资源的增长仍能够使组合总产量，如点X'更高。即使存在着普遍失业及利用不足或闲置的资本和土地也是如此。但也要注意，资源增长并非必然导致较高的产量增长。这并非一条经济规律，正象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可怜的增长记录能证实的那样。资源增长甚至也不是短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较好地利用闲置的现有资源能够大幅度地提高产出水平，如图4.1所描述的由点X移向X'的运动。然而从长期看，改善和提高现有资源的质量，增加现有资源数量的新投资，确实是促进国民产值增长的主要手段。

现在，假定并不是所有生产要素都成比例增长，而只是资本或土地的质量和数量增长了。图4.2(a)和(b)表明，如果制造收音机使用相对多的资本设备，而稻米生产是一个土地相对密集的过程，那么，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移动在资本迅速增长时，对收音机来说将更为明显(图4.2a)，当土地的数量增长或质量提高时则对稻米更为显著(图4.2b)。然而，由于在正常条件下两种产品都将把这两种要素作为生产投入(尽管是以不同的组合)使用，在只有资本增加时生产可能性曲线仍会沿图4.2a的稻米轴向外稍微移动，而当只有土地资源的数量或种类扩大时生产可能性曲线仍会沿图4.2b的收音机轴向外稍微移动。

### 2.3 技术进步

现在是考虑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根源，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根源——技术进步的时候了。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技术进步是用新的和改良的方式，完成诸如种植玉米、缝制服装或建筑房屋等传统工作所引起的结果。技术进步有三个基本类



(a) 资本的增长

图4.2 资本存量 and 土地的增长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影响  
型：中间型 (neutral)、劳动节约型 (labor-saving) 和资本节约型 (capital-saving)。

“中间型”技术进步，是指使用相同数量和组合的要素投入而达到较高的产出水平。象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简单创新，能够导致较高的总产出水平和所有人的较高的消费。根据生产可能性分析，中间型技术变革比如，它使总产量倍增，与所有生产投入量的加倍在概念上是相同的。因此，图4.1向外移动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图式，也适用于中间型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可以是劳动节约型或者资本节约型的（即，以相同数量的劳动或资本投入量能够达到较高的产出水平）。使用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纺织机、高速电动钻床、拖拉机和机械犁及许多其它种类的现代机器和设备，可归入为劳动节约型。正如我们将在第8章看到的，20世纪的技术进步史大体上是从制造钢材到制造自行车，到制造桥梁的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迅速发展史。

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是一种罕见得多的现象。但这主要是因为几乎世界所有的科学和技术研究都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那里的要求是节约劳动而非节约资本。可在劳动充裕（资本不足）的

第三世界国家，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却是最为需要的。这种技术进步导致了更有效的（即成本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法——例如，用于小规模农业的手动或轮转除草机和打谷机，脚控风笛式抽水机、手工操作的背携式喷雾器等。<sup>②</sup>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表明的，欠发达国家固有的低成本、有效率和劳动密集型（资本节约型）生产技术的发展，是任何面向就业的长期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技术进步也可以是劳动或资本扩展型的。劳动扩展型技术进步是在劳动力的质量或技能提高时产生的一——例如，通过使用用于课堂教学的录像磁带、电视和其它电子通讯手段使之提高。同样，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导致了对现有资本货物的更富于生产性的使用，如在农业生产中用铁犁替代木犁。

我们能够使用稻米和收音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检验与发展中国家产量增长相联系的技术进步的两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60年代，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培育了一种以IR—8或“神奇水稻”著称的新的、高产杂交稻种。这些新稻种与后来经过进一步科学改良的品种一道，能够使东南亚一些地方的稻农在大约几年的时间里把每公顷的产量提高一、两倍。实际上，这一技术进步被“包含”在新稻种中了（人们也可以说这是“土地的扩展”），它使得用基本相同的补充投入量（虽然更多的肥料和农药是受欢迎的）来达到较高的产出水平成为可能。从生产可能性分析方面来说，杂交水稻较高产量的变化可以用图4.3来描述，也就是在收音机轴上的截距基本保持不变（即，新稻种不能直接用于增加收音机的生产）的情况下，该曲线沿稻米轴向外移动。

在收音机生产的技术方面，发明晶体管很可能对通讯系统产生类似蒸气机的发现在运输方面所产生的那种意义深远的影响。甚至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最偏僻的地区，晶体管收音机也已成为一种珍品。采用晶体管排斥了对复杂、笨重和易碎的电子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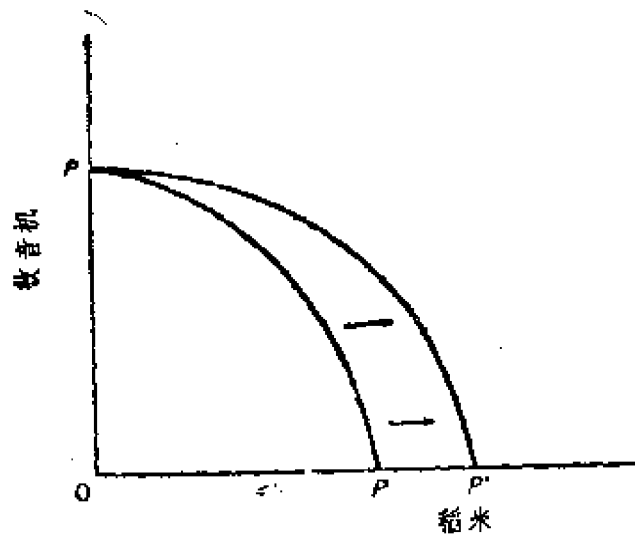


图4.3 农业部门的技术变化对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影响

的需要，导致了收音机生产的大量增长。生产过程变得不太复杂了，工人能够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总生产能力。图4.4表明，象比较高产的稻种的情况一样，可以说晶体管技术已引起了生产可能性曲线沿纵轴向外转动。而在很大程度上，稻米轴的截距仍旧不变（虽然稻田工人在劳动时用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听音乐，多半会使他们提高劳动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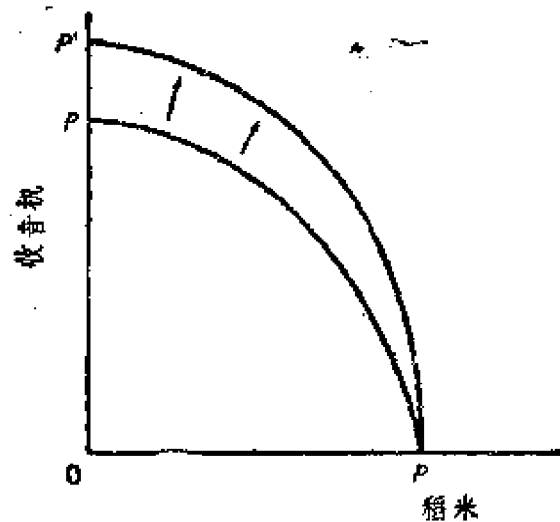


图4.4 工业部门的技术变化对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影响

## 2.4 结论

我们可以概括一下以上讨论。经济进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各要素的变化。而全面地看，改善现有物质和人力资源的质量，增加这些生产资源的数量，及通过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全部或特定资源的生产率，所有这些方面的投资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任何社会中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生产可能性曲线图使我们得以方便地对一个经济的生产抉择进行分析，理解闲置或未充分利用资源的产出量和“机会成本”的含义，并描述增加的资源供给和改善了的生产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

在对简单的增长经济学作了以上介绍之后，现在我们能够更仔细地考察当代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以便详细地分析长期增长的重要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因素。然后我们将看到，这一切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有何联系。

## § 3 历史记录：库兹涅茨提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 6 个特征

西蒙·库兹涅茨教授由于在衡量和分析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历史增长方面所从事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了197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他给一国经济增长下的定义是，“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所需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基础之上，向本国人口提供日益多样化的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sup>③</sup>。这一定义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都极为重要。

(1) 国民产出量的持续上升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形式，而提供极其丰富的商品的能力是经济成熟的标志。

(2) 不断提高的技术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基础或先决条件——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

(3) 为了实现新技术所固有的增长潜力，必须进行制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没有社会创新伴随的技术创新就象没有电的电灯泡一样——尽管存在着潜力，但如无补充的投入，什么也不会发生。

库兹涅茨教授在其透彻的分析中，提出了几乎在所有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6个特征。它们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两个总合的经济变量：

1. 人均产量和人口的高增长率，
2. 总要素生产力、特别是劳动生产力的高增长率，

两个结构变动的变量：

3. 经济结构的迅速变革，
4. 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迅速变革，

影响增长向国际扩散的两个因素：

5. 经济发达国家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材料而向世界其余部分扩展的倾向，

6. 这一经济增长向只占世界人口1/3的有限扩散。

现在分别简要地考察以上各个特征。

### 3.1 高人均产量增长率和高人口增长率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大体上从1770年至今），所有当代发达国家，原有的增长率都增加了好多倍。非共产主义的发达国家，过去200多年的年人均产量增长速度平均差不多达2%，人口增长速度达1%，因而，总产量（即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达3%。这些增长率意味着，人均产量大约35年、人口约70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约24年翻一番，远远快于18世纪末叶工业革命开始以前的整个时期。例如，最近两个世纪间的人均产量估计差不多为现代社会以前阶段的10倍；人口比以前增长了4或5倍；因此，

总产量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估计是19世纪前的40或50倍！

### 3.2 生产力的高增长率

现代增长的第二个总合经济特征是总要素的生产力（即，全部投入的单位产出量）的较高增长。就生产力的主要要素（劳动）来说，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也是以前的许多倍。例如，据估计生产力的增长率可说明任何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均产量增长50%到75%。换句话说，所测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历史上增长的大部分原因，可由包括改善现有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技术进步来说明。我们将简要讨论技术发展在导致和维持经济增长上的关键性作用。

### 3.3 经济结构的迅速变革

当代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增长记录展示了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增长过程中固有的结构和部门的高速变革。这一结构变革的某些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农业活动逐渐向非农业活动转移，然后工业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生产单位在大小或平均规模方面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即，由小的家庭和个体企业转变为全国性的或多国公司形式的巨大的非个体组织）；最后，劳动力在空间位置和职业状况方面，相应地由农村、农业及其有关的非农业活动面向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行业转移。例如，美国总劳动力中从事农业活动者所占的比重在1870年是53.5%。到1960年，这一数字降为不足7%。同样，在象比利时这样的欧洲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由1846年的51%降为1947年的12.5%和1970年的不足7%。在19世纪前，农业劳动力降到总劳动力供给的大约50%用了好几个世纪。而美国、日本、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国家在过去100年里使这个数字下降了40%至50%，从以上事实看，显然这个阶段结构的变革是十分迅速的。

### 3.4 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迅速变革

对任何社会所发生的经济结构的有益变化来说，在观点、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之相伴随的变革也常常是必要的。有关这些社会变革的明显实例包括普遍的城市化过程，包括采纳那些已经颇为人们所知的“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制度。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论述亚洲欠发展问题的创新论文中，提出了一长串有关这些现代化观念的条目。<sup>④</sup>其中包括：

(1) 理性。用现代思维、行动、生产、分配和消费方法来代替陈旧的和传统的做法。按照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尼赫鲁的意见，不发达国家需要的是“一个科学的和有技术的社会。不论是在农庄、工厂或是运输方面，都要使用新的技术。现代技术并非就只是取得一种工具并使用它的问题。现代化技术要有现代化头脑，用旧式的头脑去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它是不会运转的。”<sup>⑤</sup>理性的追求包含这样的意思，即有关经济战略和政策方面的各种意见，在逻辑上应该是尽可能深地扎根于对有关事实的认识的正确推理。

(2) 计划。寻求一个合理协调的、能够导致并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政策调节系统（见第15章）。

(3) 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化。促使在地位、机会、财务、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的更加平等。

(4) 进步的制度和观念。这样一些变革被设想为是必要的，提高劳动效率和努力程度；促进有效的竞争、社会和经济的能动性及个人的进取心；允许更大的机会均等；创造潜在的更高的合理的生产率；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发展。过了时的土地占有制度、社会和经济垄断、教育和宗教结构、管理和计划体制等，都包括在需要变革的社会制度中。在有关观念的范围内，“现代人”的概念体现了如下的思想，如讲求效率、勤奋努力、遵守纪律、

严守时间、勤俭节约、诚实正直、具有理性、勇于变革、自力更生、同心协力和目光远大。

在第二篇中，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上述的某些现代化特征，因为它们关系到当代第三世界国家考虑以什么方式、如何适应发展的经济战略问题。

### 3.5 国际上的经济扩张

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后两个特征，涉及到发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问题。第一个是讲富裕国家为了获得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廉价的劳动力及出售其制成品的有利市场，而向世界其它地方扩张这一历史的和持续着的倾向。发达的现代技术，尤其是运输和通讯使这种扩张活动得以进行。它们以在19世纪之前还不可能存在的方式，对世界的统一施加着影响。而且，它们还扩大了强大的北方邻邦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贫穷国家的可能性。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各殖民地的建立和诸如撒哈拉非洲和亚洲、拉丁美洲的部分难以进入地区的开发或瓜分，为北半球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其增长着的制造业所需要的出口市场。

### 3.6 经济增长在国际间的有限扩散

尽管过去两个多世纪来世界产出有了极大的增加，但现代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的局限在不到1/3世界人口的范围内。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少数人口几乎享有全球收入的75%。此外，我们在该章稍后部分还看到，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权力关系，具有一种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加深的趋向，而前者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常常是靠牺牲后者的增长来取得的。⑩

## 结论：增长特征之间的相互联系

这里所考察的现代增长的6个特征，联系紧密并相互促进。人均产量的高增长率产生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而高的人均收入反过来又导致了高水平的人均消费，从而刺激了生产结构的改变（因为当收入提高时，对工业制成品和劳务的需求也比对农产品的需求要快得多的速度提高了）。为达到这些产量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结构的变动，引起生产规模及企业单位在组织和配置两方面的特性都发生变化。反过来这又使劳动力的配置和结构，使各职业集团的地位关系也必须迅速改变（例如，地主和农民的收入份额下降，而制造商和实业家的收入份额趋向上升）。这也意味着社会的其它方面，包括家庭规模、城市化以及决定自尊和尊严的物质因素的改变。最后，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同运输和交通方面的技术革命相结合，使那些最早发展的国家在国际上的扩展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受这一国际扩展影响的各贫穷国家会由于制度、意识形态或政治方面的原因，从这一过程中不是无法得到好处，就是仅仅成为富裕国家经济剥削政策的弱小受害者。

如果这些相互联系的增长特征中的共同因素和纽带，正如库兹涅茨教授所提出的，是“对技术创新的大规模应用”的话，那么，可能产生经济盈余以便为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的迅速经济增长，就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成长的趋势。换句话说，经济的迅速增长使得基础科学研究成为可能，而基础科学研究又反过来导致了技术的发明与创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则推动了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增长。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为什么增长过程似乎更有益于已经富裕了的国家，而很少和贫穷国家有关：几乎所有科学研究的98%是在富国进行的，并且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问题。这种

研究及其所引起的技术进步，对于那些在资源和制度环境方面都与发达国家不相同的贫穷国家很少有直接的好处。富国能担负得起基础科学研究的费用，而穷国则不行。因此，发达国家能够为自我保持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提供持续的手段，而这种进步却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和技术的能力。这就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似乎逐年扩大的一个真正潜在的经济原因。

### 3.8 几点教训

从我们有关现代经济增长6个特征的讨论中得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较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为什么没有更迅速地传播到欠发达国家？有两点概括性的解释。第一点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原来的条件有关，另一点则涉及到当代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性质。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经济增长不仅是资源质和量的提高和技术改进的结果，而且，也来源于有助于这种变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增长要求一个稳定而灵活的社会政治的机构，这种机构能够适应，甚至促进结构的迅速变革。增长还需要能够解决伴随着这种结构变革的利益集团和部门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社会环境。试想，从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社会，转变成高度技术、面向城市的工业和劳务经济的例子。随着从大土地所有者到新的城市实业家的相对势力与影响的转移，利益冲突就会发生。

简单地说，除非地方的观念和制度状况适应结构的变革，不抑制社会中那些促进增长的组织，并且为多数人提供分享经济进步果实的机会，否则，试图通过严密设想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增长的努力多半要失败。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篇的许多章中看到的，尽管某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力和物质资源方面大量投资并引进尖端技术，他们想使经济更快增长的努力显然还是失败了，这主要应归



结为其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僵化及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有限扩散影响不无联系的第二点解释，是由发达国家本身同发展中国家形成对比的政治、经济政策派生出来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已了解到的，富国共同影响和控制着同穷国的国际贸易关系的条件，并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改变它们的技术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价值准则和制度。这种支配权力可能已大大阻碍了穷国的经济进步。为什么一直会是这样，可作三点说明。首先，这些全面变化往往造成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支配与依附的关系并使之永久化，而穷国在这种关系中多半仍不能控制它们的经济命运，不能发扬原有的自力更生精神。其次，这些转变本身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夙愿来说，也许基本上是不适宜的并阻碍生产的。最后，让现在占世界人口1/4，却控制着世界3/4产量的那些人与其余3/4的人们共享丰裕，也许根本就不符合他们的长期私人经济与政治利益。一个资源和商品都日益稀缺的世界，是不会同一种较为公平的全球经济扩展和谐共存的，尤其当相对的权力分配如此不平等时。

显而易见，一方面，僵化的、起反作用的国内社会结构和阻碍国民经济增长的那些权贵集团，同另一方面，一小簇强国的同样僵化和起反作用的政策是相类似的。正如单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要求灵活的、能解决争端和促进结构变革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有关世界发展的任何现实打算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国际范围内相似的灵活性（即，发达国家方面作出真诚援助、至少不妨碍贫穷社会的经济进步的承诺），全球的经济进步也就绝不可能出现。如果没有灵活的全球性制度（例如，灵活的世界贸易和援助关系）和世界领袖们的国际（而非省际的）眼光，那么，预见少数繁荣国家和许多贫穷国家之间不断出现争端，甚至发生世界性暴乱，就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了。面对僵硬的社会、政治结构，发达国家经常爆发内战，以解决经济争端，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就

是一个例子。近来，少数上层人物集团与通常由另一个上层人物集团代表的广大穷苦群众之间的剧烈冲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泰国、智利、海地、埃塞俄比亚、越南、柬埔寨、老挝、苏丹、莫桑比克及最新近的伊朗、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日益频繁地发生了。同样，在国内和国际的活动场所之间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在世界经济增长的果实缺乏更公平的分配和更为灵活的国际制度时，第三世界国家对现存的国际体系可能变得很不耐烦，并开始作为一个集团运用自己的潜在力量。其后果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是，这种暴力的潜在条件似乎是与日俱增（第17章我们将考察在第三世界要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势下国际合作与冲突的前景问题）。

#### § 4 历史增长经验的有限价值：不同的初始条件

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陷是未能认识和注意到，西方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对于指导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其价值是很有限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阶段及其有关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各种模式，对今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最初条件强调得太少。事实是，这些国家今日的增长状况同当代发达国家着手现代化经济增长的时代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差别。例如，我们至少可指出8个在初始条件方面的重要差异——它们要求大大改进对增长前景和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分析。

1. 天赋资源状况，包括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源状况；
2. 与世界其余部分有关的人均收入和国民总产值（GNP）水平；
3. 气候；

4. 人口的多少、分布与增长；
5. 国际迁徙的历史作用；
6. 国际贸易的好处；
7. 基础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能力；
8. 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为了系统地提出更现实的、能导致并保持80年代及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一套要求和重点，下面逐一讨论这些条件。

#### 4.1 天赋资源（物质的和人力的）

从总体上看，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同发达国家开始其现代增长时相比，一般缺乏丰富的自然资源（注意：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许多富裕国家当前自然资源非常匮乏的现状，而是指他们在发展前夕所占有的自然资源）。除了少数在世界性需求日增情况下有幸得到丰富的石油，其它矿产和原材料供给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几乎占世界2/3人口的亚洲国家，是十分缺乏自然资源的。此外，在拉美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非洲地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需要大量的投资来开采。如果不牺牲许多主权并接受发达国家强有力的多国公司的控制，不易获得这样大的财力而目前多国公司独自就可以进行大规模、有效率的资源开采。

熟练的人力资源拥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更为明显。一个国家有效开采自然资源的能力，除其它方面而外，取决于其人民的管理和技术的技能。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总的说来比起西方早期经济增长时期的那些国家（或就此而言，苏联和日本在其较近代的成长过程开始的时候），更缺少教育，缺乏经验和技能。

#### 4.2 人均收入和GNP的相对水平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3/4，平均说来，他们所拥

有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比19世纪的俄国和日本要低得多。正如我们在第2章已看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大超过70%的人口，正以仅能糊口的最低收入水平维持生存。很明显，19世纪初叶英格兰的平均生活标准是没有什么可令人羡慕的，但它也没有象今天第三世界大多数人、特别是4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那些人在经济上那样每况愈下和朝不保夕。

其次，在今日发达国家开始其现代化增长的时代，他们已在经济上优于世界其它国家。因此，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强有力的金融条件来扩大它们自己同其它不幸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今日欠发达国家是在国际人均收入规模低的一端开始其增长过程的。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相对虚弱的状况，就象一位年轻运动员和一个老头之间的1500米赛跑，而给予前者1000米的起跑点。如此的落后状况不仅在经济上难以克服，甚至改进，而且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挫折感和不惜任何代价“增长”的愿望。事实上，这种做法会抑制国民生活水平的长期改善。

### 4.3 气候差异

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这样一种分歧不能简单归之于巧合，它必然与不同的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

一个明显的直接影响生产状况的气候因素是，大多数贫穷国家一般极高的温度和湿度导致土地质量衰退和许多天然货物迅速贬值。它们还导致某些庄稼低产，削弱了森林的更新生长，并使牲畜的健康恶化。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极高的温度和湿度不仅使劳动者们感到不适，而且还有损于他们的健康状况，使他们不愿参加紧张的体力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效率普遍降低。

#### 4.4 人口的规模、分布与增长

第6章将详细考察与人口迅速增长有关的某些发展问题和争论。这里指出如下一点就足够了：第三世界人口的规模、密度与增长，构成了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又一个重要差别。在西方国家早先的增长之前和增长期间，延续几个世纪人口的增长非常缓慢。在工业化开始时，由于死亡率的降低和出生率的缓慢提高，人口增长率从根本上说是加快了。然而，在欧洲和北美洲各国现代增长时期，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未超过2%。

相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以高于2.5%的年增长率增加，而且有的国家今天甚至增长得还要快。再者，这些大量增长着的人口在少数地区的集中，意味着今日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是以比欧洲国家在其早期增长年代还要高得多的人口/土地率的情况下起步的。最后，就相应的绝对规模而论，除苏联以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在经济开始增长的长时期里接近现今印度、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或巴西的人口规模。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它们的任何自然增长率也不象现今的墨西哥、肯尼亚、菲律宾、孟加拉国、扎伊尔或危地马拉那样。事实上，许多评论家甚至怀疑，如果当代发达国家的人口一直也象这样迅速膨胀的话，其工业革命和长期的高增长率是否能够实现，或者能否以如此小的挫折和动乱进行得这样迅速，尤其是很穷的国家更是如此。

#### 4.5 国际迁徙的历史作用

以下事实或许与不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具有同等的历史重要性：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农业过剩人口的主要出路在于国际迁徙。

正如表4.1所显示的，国际迁徙分布广泛而且规模巨大。

表4.1 1846—1939年间欧洲年平均向海外移民

年代	欧洲海外 移民 总 计	小 计	不列颠 (爱尔兰) 群 岛	德国	挪威 瑞典 丹麦
1846—50	256.6	254.3	199.1 (118.8)	35.5	4.3
1851—55	342.3	331.3	231.7 (139.0)	74.9	6.9
1856—60	197.1	184.7	123.5 (43.7)	49.4	4.5
1861—65	219.3	202.9	143.6 (39.1)	43.5	9.7
1866—70	354.9	308.4	170.8 (47.8)	83.4	39.3
1871—75	370.7	310.1	193.9 (59.9)	79.0	22.1
1876—80	258.0	192.8	114.9 (28.4)	46.2	23.2
1881—85	651.3	480.7	228.0 (67.1)	171.5	58.4
1886—90	737.7	407.2	214.8 (62.0)	97.0	60.8
1891—95	674.8	273.9	128.4 (45.5)	80.5	48.1
1896— 1900	543.3	137.5	81.0 (30.2)	24.9	22.1
1901—5	1038.9	253.0	156.0 (36.8)	28.4	53.9
1906—10	1436.7	322.2	234.6 (31.0)	26.4	43.7
1911—15	1365.3	325.6	265.7 (38.4)	15.8	28.6
1916—20	405.5	123.9	101.1 —	2.4	11.2
1921—25	629.5	295.2	197.7 —	58.9	26.2
1926—30	555.6	253.5	163.3 —	54.0	23.9
1931—35	130.8	50.0	30.4 —	12.7	3.1
1936—39	147.4	60.4	30.3 —	17.3	4.2

资料来源：达德利·柯克，《两次战争之间各年欧洲的人口》，  
普林斯顿国际联盟1946年版，第279页。

向海外移民数 (万人)

瑞士、法国、 低地国家 (荷兰、比利时、 卢森堡的总称)	小计	意大利	奥地利、 匈牙利、 捷克斯洛 伐克	俄国、波 兰、立陶 宛、芬兰	西班牙 葡萄牙	巴尔干 半岛 各国
14.4	2.3	0.2	1.6	0.1	0.4	
17.8	11.0	0.7	4.0	0.2	6.1	
7.3	12.5	4.2	2.2	0.2	5.9	
6.1	16.4	8.2	2.2	0.3	5.9	
14.9	37.4	18.7	5.7	0.6	12.4	
15.1	60.6	23.3	10.5	5.0	21.8	
8.5	65.2	28.9	11.8	7.2	17.3	
22.8	180.6	64.0	34.6	17.1	64.5	0.4
34.6	330.5	134.2	52.5	45.5	96.7	1.6
16.9	400.9	150.2	67.6	72.2	108.9	2.0
9.5	405.7	165.7	77.2	55.8	102.4	4.6
14.7	785.9	320.6	203.0	143.4	97.4	21.3
17.6	1114.3	402.4	265.4	211.6	185.4	49.5
15.5	1039.5	312.2	243.6	216.8	220.2	46.7
9.2	281.8	126.6	11.5	7.8	121.3	14.6
12.2	334.4	130.9	23.8	56.8	96.3	26.5
13.3	302.2	89.4	23.0	75.5	74.7	39.6
3.8	81.0	28.2	5.1	20.9	19.6	7.2
5.6	87.2	23.6	6.3	20.8	27.4	9.1

有关爱尔兰的数字见布林利·托马斯：《迁徙与经济增长》，  
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84页。

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爱尔兰，严重的饥荒或土地紧张时期常常同城市工业有限的经济机会相结合，“迫使”无技术的农业工人转向劳动力不足的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从而，正如布林利·托马斯在谈到19世纪的迁徙和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所论证的，“欧洲劳动力对美国经济的三个突出贡献——1847至1855年间118.7万爱尔兰人和91.9万德国人，1880至1885年间41.8万斯堪的那维亚人和104.5万德国人，及1898至1907年间175.4万意大利人——带有疏散的特点。”<sup>①</sup>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移民的主流在性质上都是远距离和长期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迁徙则在欧洲内部复活，它基本上是短距离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多半带有临时的性质。但导致这种迁移的经济力量却是基本相同的，即，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间，来自南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的剩余农工成群地涌入劳动力短缺地区，最著名的是联邦德国和瑞士。表4.2举出了1960年至1964年间意大利移民的数量和方向。

当代从欧洲南部和东南部劳动力剩余地区的迁移既是持久性的，又是非持久性的，这一事实为迁出非技术工人的相对贫穷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双重利益。本国政府减少了供养可能仍在失业者的花费，而且，由于工人将其工资的大部分寄回了祖国，其政府获得了一个有价值的、并非无足轻重的外汇来源。<sup>②</sup>

根据以上详述，人们有理由问：为什么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量贫困的人不效法欧洲东南部的工人，到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去寻找临时的长期的工作呢？在历史上，至少就非洲来说，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劳动力迁移是相当普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地区的不景气。即使在今天也有相当的好处，大量潜在的问题由于下述事实而避免了：成千上万上沃尔特的非技术工人能够在邻近的象牙海岸找到临时工作。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在欧洲的突尼斯人、摩洛哥人和阿尔



表4.2 1960—1964年的意大利移民

地 区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欧洲经济 共同体	17980	175266	158900	107578	113200
全欧洲	309876	329597	313400	235134	236600
北美洲	34219	29754	27876	26492	26466
中南美洲	18823	10252	8568	3837	3322
澳大利亚	19629	16379	14411	11539	10890
非 洲	1283	1022	706	589	1128
亚 洲	78	119	255	20	178
总 计	383908	387123	363216	277611	278584

资料来源：《意大利移民：1964年迁徙的一些情况》，《国际迁徙》1966年2月号第4期第122页。

及利亚人；在委内瑞拉的哥伦比亚人和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属于这种情况。然而除了这些可能的例外，事实仍然是：今日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大规模移民来减轻人口过剩压力的余地十分狭小。其原因，不仅同缺乏其它国家的有关知识有很大关系，而且也与地理（从而经济）距离的综合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现代发达国家的移民法非常苛刻。再者，对今日国际迁移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不仅是剩余人口的这一历史出路事实上已经被堵死，而且，由穷国迁移到较富国家的人中很大部分恰恰是欠发达国家不应流失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并有技术的人。既然移民的绝大多数是长期搬迁的，那么，这种反常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就不仅体现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方面的损失，而且能够证明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未来经济进步的一个严重制约。例如，本世纪60和70年代期间，仅由发展中国家移居美国、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等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力资源，就相当于40多万熟练工人（见表11.5）。总之，类似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那样规模的非技术工人

合法的国际迁移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不再能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当代剩余人口提供有效的“安全阀”（我们将在第9章详细讨论第三世界国际迁徙的近来趋势，讨论日益增长的非法迁徙和世界难民问题）。

#### 4.6 国际贸易对增长的刺激

国际贸易常被誉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推动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的“增长发动机”。迅速膨胀的出口市场，为增长着的本地需求提供了一种附加的刺激，引起制造业的大规模建立。连同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和灵活的社会制度，所增加的这些出口收益使19世纪的发展中国家能以很低的利率在国际资本市场借到现款。这一资本积累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使增加进口成为可能，并导致更加多样化的产业结构。19世纪，欧洲和北美洲国家之所以有可能分享国际交换的这种有力的增长，大都是由于相对的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非技术剩余劳力无拘束的国际迁移。

今天，形势完全不同了。除了几个非常成功的东亚和拉美国家之外，非石油输出的（甚至某些输出石油的）发展中国家试图以世界贸易为基础来发动经济的迅速增长时，面临着种种难以应付的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一种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它们的出口扩大了，但通常没有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得那样快。它们的贸易条件（即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例）已经不断降低。因此仅仅为赚得与前几年相同数量的外汇，出口量就必须增加得更快。而且，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远远胜过欠发达国家，它们能担负得起各种费用，以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持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发展各种更新的产品（常常是欠发达国家传统上出口的初级农矿产品的人造代用品），并以更优越的条件得到国际资金供应。最后，当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成为那些

成本比发达国家低的竞争性产品的生产者时（例如纺织品、服装、鞋类和某些轻工业制品），发达国家就对贸易采取实行进口配额、卫生要求和特别许可证协定等各种形式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第12至14章将详细讨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学，目前只需指出一点：在19世纪曾轰鸣北半球的所谓增长的国际发动机，对20世纪参加增长竞赛的大多数后来者来说，由于缺乏充足的燃料和需要修整，已在很大程度上运转不灵了。

#### 4.7 基础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能力

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在当代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贯穿本章的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国家的高增长率一直是由以下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来保持的：一方面，许多新的技术创新的大规模应用是以科学知识积累的迅速扩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增长着的剩余财富又使这种知识积累的进一步增加成为可能。甚至在今天，所有阶段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过程——从基础研究到生产发展——是大量集中在富国的。我们先前曾看到，全世界几乎98%的研究和发展开支来源于这些国家。而且我们还看到，研究经费是根据富国自己的经济重点和天赋资源来使用，以解决与这些国家有关的种种经济、技术问题的。在劳动力和原材料供给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富国为节约起见，主要对发展尖端产品、大型市场及使用大量资本投入和高技术、高管理水平的先进生产方法感兴趣。而穷国则与此相反，它们更加注意那些简单产品和简单设计，更加注意节约资本、使用充裕的劳动力和为较小的市场生产。目前要着手于最符合其长期经济利益的研究和发展，它们既缺乏财力又缺乏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它们对各种“不适用”的外国技术的依赖，造成了我们在第3章曾讨论的国内经济的二元结构，并使之永久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在科学技术研究这一重要领域中，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极端不利的竞争地位。相反，当发达国家开始其早期的增长过程时，它们在科学技术上大大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因而，它们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即根据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所确定的进度发展新技术以保持领先地位。

#### 4.8 政治、社会制度的稳定与灵活性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形势之间的最后一个差异，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现在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是：在发达国家进行产业革命之前，它们大体上是巩固的民族自治国家，能够根据大众对“现代化”的主张和看法这种一般的舆论来实施国家的政策。正如缪尔达尔教授正确指出的：

它们（现在的发达国家）构成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文明的小型世界，其内部人员的流动和观念的传播都相当自由……现代科学思想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远在它们的产业革命之前），而现代化技术也很早就开始推广到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农业和工业之中。<sup>⑩</sup>

这些就是工业化以前文化同质、物质适应、政治统一并且注重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思想的社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只是新近获得了政治独立，它们还必须具有制订并实行国家发展战略的实际能力才能成为巩固的民族国家。再者，现代化观念具体体现在理性主义、科学思想、个人主义、社会与经济的灵活性、职业道德，以及对于民族的物质与文化价值的献身等概念之中，这同当代许多第三世界社会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或许这些国家中受过教育、居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除外。在稳定的和灵活的政治制度能够巩固并得到广大公众支持之前，

发展中国家现存的社会和文化的支离破碎，对其加速民族经济进步的愿望很可能起抑制作用。

#### 4.9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最初的条件很不一样，西方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适用性是十分有限的。然而，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可汲取的最有意义、最适用的教训之一是：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关键是要在技术、社会和制度方面相应进行互为补充的变革。这些转变不仅在单个发展中国家中一定要产生，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国际经济中也一定要出现。换句话说，世界经济除非在结构、观念和制度上有某种较大范围的改革，适应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雄心壮志并对发展中国家的显著成就给予鼓励，否则，单有第三世界内部的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还是不够的。这一认识为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理论基础。我们将在第三篇中、最后在第17章中再次研究这个重要问题。

#### 注 释

① 在数字上，这些成分可以写成标准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形式，即 $Y=f(L, K, t)$ 。这里Y代表国民产出，L为劳动力，K为资本，t表示技术进步。

② 关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中间型、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创新的较规范的区分，见附录4.1。

③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1971年12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的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演讲，并发表在《美国经济评

论》第63卷，1973年第3号上。这一段的大部分资料和分析均依据库兹涅茨的开拓性著作。库兹涅茨该文全文作为阅读材料之6，重印于我的《为经济发展而斗争》一书中。

④ G. 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性变化》，纽约帕森出版社1971年版，第57—69页。

⑤ 贾瓦哈拉·尼赫鲁：《第三个计划的战略》，见《第三计划问题评论集》，印度政府新闻广播部1961年版，第46页。

⑥ 有关第三世界对于国际扩展在助长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方面的影响的观点，见西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依附的结构》，《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7。

⑦ 布林利·托马斯：《迁徙与经济增长》，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viii页。

⑧ 关于地中海地区向西欧国际移民的经济影响的说明和分析，见W5 R. 伯农：《对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移民的一些思考》，《国际劳动评论》1971年第14期。

⑨ G. 缪尔达尔：《世界贫穷的挑战》，纽约帕森出版社1970年版，第30—31页。

## 概念复习

资本积累

(Capital accumulation)

技术进步

(Technological progress)

中间型、劳动节约型和

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Neutral, labor-saving, and

Capital-Sav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劳动扩展型和资本扩展型技术进步

理性

(Rationality)

天赋资源

(Resource endowment)

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作为“增长发动机的贸易”

(Trade as an “engine of  
growth”)

灵活的与僵硬的政治、社会制度

(Labor augmenting and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发明与创新

(Inventions versus innovations)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社会和制度的创新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经济结构的变革

(Economic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现代化观念

(Modernization ideals)

(Flexible versus rigid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基础科学”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Relation between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研究和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 问题讨论

1. 怎样运用生产可能性分析方法说明经济增长过程？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使用P—P边界图对它们进行说明？

2. 历史的记录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揭示了什么？

3. 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记录同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有什么联系？“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有何重要性？列举你所熟悉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与大多数当代发达国家开始其现代经济增长经历时不同的初始条件方面的一些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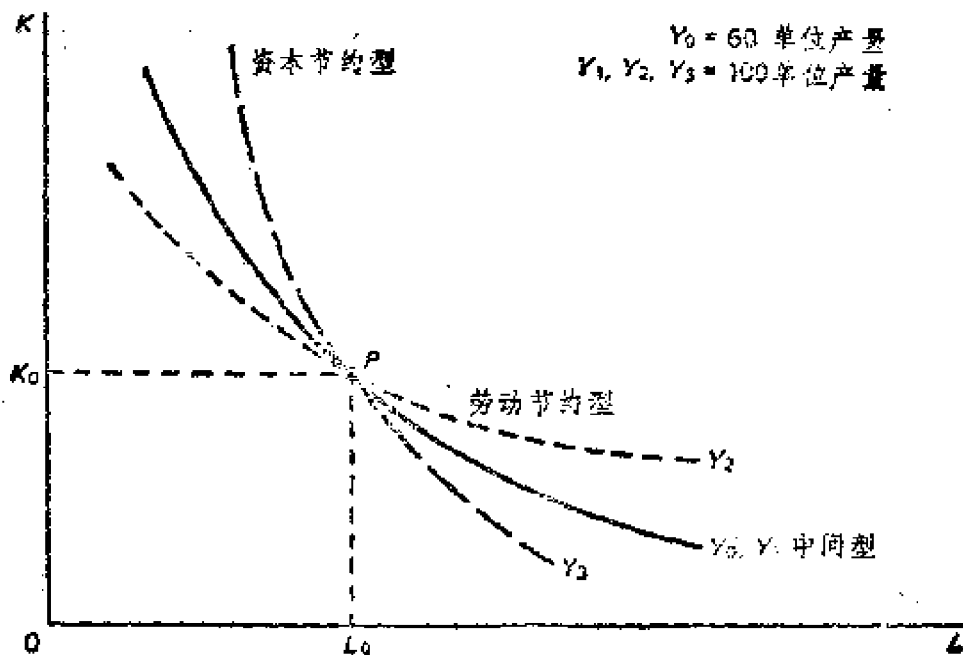
4. “社会和制度的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来说象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一样重要”这一段话的含义何在？解释你的答案。

5. 为什么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经济增长在现在的发达国家中迅速展开，而当代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未能以同等程度扩展，你认为主要原因何在？

## 附录 4.1

### 创新的分类

发明和创新按照劳动节约型、资本节约型或者中间型分类，可以用基本的等产量曲线分析来说明。对于不熟悉这个概念的人来说，“等产量曲线”或者“等量生产线”是各种资本（K）和劳动（L）组合的轨迹，对于确定的技术结构，形成相同的实物产量水平。看图A4.1。



图A4.1 技术进步：中间型、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

我们从一条给定的等产量曲线出发， $Y_0$ 代表一个产量水平，比如说60单位。假定当时的生产要素价格是最低费用点在P点，使用资本 $K_0$ 、劳动 $L_0$ 。那么，技术进步可以用通过P点的新的等产量曲线表示，现在表示100单位产量水平。在图4.5中，画出了三条这种新的100单位等产量曲线：虚线 $Y_2$ 、 $Y_3$ 以及和原来的 $Y_0$ 重合的实线 $Y_1$ 。技术进步按照在P点的新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分类



(例如, 新的边际实物生产率)。

(1) 斜率不变:  $\frac{MP_L}{MP_K}(Y_1) = \frac{MP_L}{MP_K}(Y_0)$  表示中间型进步

(2) 斜率变低:  $\frac{MP_L}{MP_K}(Y_2) < \frac{MP_L}{MP_K}(Y_0)$  表示劳动节约型进步

(3) 斜率变高:  $\frac{MP_L}{MP_K}(Y_3) > \frac{MP_L}{MP_K}(Y_0)$  表示资本节约型进步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假设图A4.1中存在常规的、连续的、凸型的新古典学派的等产量曲线。这意味着在从高度劳动密集型(低K/L比例)到高度资本密集型(高K/L比例)范围内有无限多种技术选择。在现实中,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非常有限的技术选择范围, 这些技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可能得到的外国技术和跨国公司影响的支配(见第8章)。



## 第二篇 问题与政策

### 国内部分



## 第二、三篇提要

在此，我们就第二篇和第三篇的逻辑结构和分析步骤，为学生们做一些说明。

本书第一篇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特征，重温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并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性质和含义。第二篇和第三篇将研究一系列重要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被列为优先考虑的对象。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描述这些问题的性质，而且要表明经济分析如何有助于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如果仅仅理解了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而不会运用它们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那么这种学习是毫无价值的。

因此在第二篇和第三篇，各章针对所侧重的问题，一般都按五个步骤的逻辑程序进行阐述。我们认为，不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其它领域，这种方法都为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便利的途径。现将五个步骤列举如下：

1. 提出问题与主要争论之处；
2. 指出该问题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重要性；
3. 找出可能的目标和任务；
4. 经济学的作用；
5. 政策的选择和后果。

下面分别说明这五个步骤。

### 第一步：问题的陈述

我们的每次讨论，都将从分析什么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开始，比如人口增长、失业或者贫穷。对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从以下

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1. 问题是什么？
2. 问题为什么存在？
3. 问题的重要性如何？
4. 问题的关键何在？

进行这一步研究的目的，在于澄清问题的性质和重要性，以使学生们懂得为什么在新闻报道、发展计划、政治演讲和国际舆论中，人们对发展问题给予了那么多的关注。

## 第二步：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性

我们使用大多数尽可能新的资料，编出简要的统计概览，以便表明各种具体发展问题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相对重要程度。这些发展问题在不同国家之间如何不同？这些问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之间，质和量上有何不同。例如，很清楚虽然失业和未按专长就业人数的增加在各发展中国家是共同现象，但其性质、范围和重要程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与拉美或南亚国家却有着极大的区别。我们并不想使学生因为比较第三世界的统计资料而负担过重，而是要使学生们认识到某些发展问题尽管各国都有，但其重要性和主要表现却可能不同。结果，人们为处理这些问题所设计的政策，在范围和内容上往往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 第三步：可能的目标和任务

这一步是找出与相应问题有关的可能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此，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价值判断和主观偏好。例如，假设以争取较大的平等为国家政策的总目标，那么诸如收入分配、普及教

育和发展劳动密集型项目，就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相反，如果是以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目标，而不管分配的状况如何，那么上述要求的份量就相对较轻。这里的关键在于确定什么是理想的目标，如何在众多不同的理想目标中排列选择的先后顺序。只有具备明确的经济和社会的价值标准，才能够处理现实世界的发展问题。事实上，就连本书第二篇和第三篇所选择加以讨论和分析的各种问题，例如贫穷、不平等、失业、人口增长、教育、农村发展、贸易、援助和技术等等，也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纵然这种价值观看来似乎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尤其是与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意见一致。

#### 第四步：经济学的作用和经济学原理

在找出相应于某一特定发展问题的可能的目标系列之后，我们将询问经济学家以下有关问题：

1. 什么是这一发展问题中的经济因素？
2. 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如何能够使我们理解和解决该问题？
3. 在这一发展问题中，经济因素是否占主导地位？假如是（或不是），这些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又怎样？

#### 第五步：政策选择和后果

最后这一步，是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给出可供抉择的经济政策手段，以及预测运用这些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作者在每章末尾对政策选择的阐释，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的小组讨论和独立思考。应该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的结论和自由发表与作者不同的看法。政府所选择的政策的性质，取决于整个问题的经济方面。人们根

据对各种发展目标的偏好，评价每一种政策选择。我们必须看到达到每个目标可能付出的代价。例如，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的目标，或许会与消除失业和铲除农村贫穷的目标不一致。与此相似，鼓励外国私人投资，或许会与争取更多自力更生的愿望相矛盾。当这类不一致和矛盾变得明显时，人们就必须根据其偏好和社会经济的后果，在选择某种目标的同时，放弃或削减对另一种目标的要求。我们必须估计到，用以解决某一特定发展问题的政策，有可能会导导致另一类问题的加剧。上述这些方面，就是我们分析的最后一个步骤所做的工作，这正是发展经济学最能用武之地。

依靠上述五个步骤的分析方法，不仅能够保证学生对重要的发展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他们独立分析当前和将来的发展问题的能力。我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依靠这种较为严谨的分析程序，比那种较为松散的单纯讨论，会有好得多的效果。



## 第5章 增长、贫穷和收入分配

使大多数人迄今还过着贫穷和悲惨生活的社会，不能被认为是繁荣和幸福的。

亚当·斯密1776年

一个缺乏和不去争取正义的社会，是将其未来置于危险境地之中。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80年

### § 1 关于增长的争论

70年代，人们对经济活动的根本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富国还是穷国，都日益放弃把不顾一切地追求增长作为社会首要经济目标的做法。在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为主要标志，着重点看来已从强调增长转向关心“生活的质量”。人们强烈抗议工业迅猛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大气和水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天然风景的破坏。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具有重大影响。该书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发生，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将不能维持经济持续的高增长率。这种观点早在19世纪就首先由李嘉图、尤其是马尔萨斯所阐释。《增长的极限》尽管具有逻辑上的缺陷和许多不牢靠的假设，仍然得到了广泛流行和赞许，这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情

绪。

穷国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许多在60年代曾有过较高经济增长率的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意识到这种高速增长带给穷人的利益微乎其微。对于亚、非、拉数以亿计的人民来说，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在一些国家甚至还有所降低。城乡的失业率在上升，贫富之间的鸿沟似乎逐年扩大。人们普遍感到，高速的经济增长率并不能消除、甚至不会减少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存在的绝对贫穷。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要求废黜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活动首要目标的呼声到处可闻。人们呼吁把解决贫穷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作为下一个发展时期的主题。巴基斯坦的马哈布·乌尔哈克的话看来表达了许多人的共同看法，他言简意赅地说：“我们历来所接受的教条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将会解决贫穷问题；现在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解决贫穷问题来增进国民生产总值”。<sup>①</sup>

消除普遍的贫穷和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所有发展问题的核心，并且事实上也是许多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本书第二篇将围绕着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和不平等问题的性质开始论述。虽然我们讨论的是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但是学生们应该明白，这些经济的不平等只是发展中国家广泛的不平等问题中的一小部分。与此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还有一系列不平等问题，包括权力、声誉、地位、社会承认、职业满足、工作条件、参与程度和选择自由等方面及其分枝。这些问题与我们以后关于发展、自尊和自由选择的意义的讨论有较大关系。就大多数社会现象而言，人们决不能脱离非经济的不平等因素，孤立地考察经济上的不平等。每个问题都会加剧其它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往往会影响一系列问题组成的因果链。

我们考察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前面的第二、三篇提要中已作了介绍。首先，我们将阐述贫穷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性质，考察它

们在第三世界各个国家中的重要程度；然后，我们将提出可取的目标和任务，研究经济分析通过什么方式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探讨可能的政策抉择，这些政策将直接用于消除贫穷和减少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充分理解不发达国家这两大基本经济问题，将为以后各章所讨论的较为特殊的各种发展问题，包括人口增长、失业、农业发展、教育、国际贸易和外国援助，奠定分析的基础。

## §2 什么人，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

一种解释贫穷和收入分配这对孪生问题的简便方法，是再次运用生产可能性图式。为便于说明我们的观点，权且把我们所假设的发展中经济的产品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活必需品，诸如日常食品、一般衣服和必备的家俱，这些是维持生存的基本物品；第二类是奢侈品，大致包括豪华的汽车、上乘的马匹、耐用消费品、时装和高级食品。假定现在生产已经达到了可能性边界，即所有的资源都已被充分和有效地利用，那么，问题就在于：社会将按什么样的比例生产这两类产品？这种比例由谁决定和如何决定？

图5.1 说明了这个问题。这幅图的纵轴表示所有奢侈品的数量，横轴则表示全部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图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表明在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充分有效地使用资源的情况下，社会所能够生产出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全部数量的组合。不过这一曲线本身不会告诉我们在众多的组合中实际应该选择哪一种。例如同一个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图上可能处于A点、也可能处于B点。当处于A点时，表示社会生产的奢侈品较多而必需品较少；处于B点时，奢侈品较少而必需品较多。一般认为，国民收入低的国家，产量组合通常在B点附近。除了在“指令性经济”中是例外，那里的生产和分配取决于中央的计划。在市场经济或混合经

济中，产量的组合则基本上取决于由所有消费者的抉择形成的有效需求水平。这是因为，对不同产品的社会总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水平，特别是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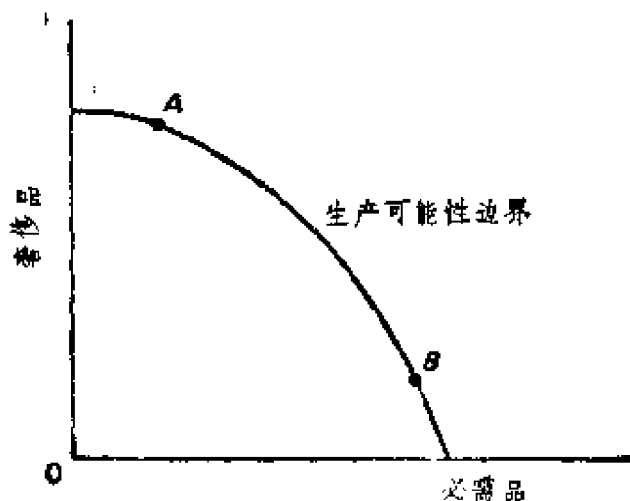


图5.1 选择生产什么：奢侈品  
与必需品

在此举个例子。为简便起见，假设某种经济中只有两个消费者和两种物品——奢侈品和必需品。从历史资料和各国消费统计的研究中可知，收入较低的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很大部分，是用于购买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要物品；另一方面，对较富裕者来说，必需品占收入支出的比重较小，奢侈品所占的比重则较大。假设有个穷人每年只有5个单位或更少的收入，他可能会把其中的90%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即他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倾向是0.9，将这一数字乘以他的收入就是其生活必需品的总消费额。剩下10%的收入用于购买奢侈品，即奢侈品消费倾向为0.1。再假设一个年收入多于5个单位的富人，将其收入的20%用于购买必需品，80%用于奢侈品，即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消费倾向分别是0.2和0.8。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人所有收入都用在这两种物品上了。

现在假设国民生产总值为8单位，上述两人均分得4单位，以Y代表他们的个人收入水平。从表5.1可见，如果两人的必需品消

费倾向都是0.9，那么他们在其各自4单位的收入中将用3.6单位（ $0.9 \times 4 = 3.6$ ）购买必需品，从而对必需品的总需求是7.2单位。同样，如果两人的奢侈品消费倾向都是0.1，也即各自只花0.4单位购买奢侈品，那么总共将只有0.8单位的收入用于购买奢侈品。一旦这种需求转换为生产，产量的组合将在图5.1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B点附近。

表5.1 假设只存在两个人和两种货物并且收入分配平等的经济中，消费和生产的情形

	第一人	第二人
个人收入 (Y)	$Y=4$	$Y=4$
消费和支出倾向:		
1. 必需品 ( $0.9 \times Y$ 如果 $Y \leq 5$ ) 或 ( $0.2 \times Y$ 如果 $Y > 5$ )	3.6 ( $=0.9 \times 4$ )	3.6
2. 奢侈品 ( $0.1 \times Y$ 如果 $Y \leq 5$ ) 或 ( $0.8 \times Y$ 如果 $Y > 5$ )	0.4 ( $=0.1 \times 4$ )	0.4
总需求结构:		
1. 必需品 = 7.2 ( $=3.6 + 3.6$ )		
2. 奢侈品 = 0.8 ( $=0.4 + 0.4$ )		
总支出 = 8.0 (人均收 = 4.0) (=国民生产总值)		

再假设国民收入仍然是8单位，但由于分配极不平等，第一个人得到了7单位，第二个人却只有1单位。表5.2显示了在这种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对必需品的总需求只有2.3单位（即富人的1.4单位和穷人的0.9单位），而对奢侈品的总需求则有5.7单位（富人的5.6单位和穷人的0.1单位）。产量组合在图5.1即A点附近。

表5.2 假设只存在两个人和两种货物并且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经济中，消费和生产的情形

	第一人	第二人
个人收入 (Y)	$Y=7$	$Y=1$
消费和支出倾向:		
1. 必需品 ( $0.9 \times Y$ 如果 $Y \leq 5$ ) 或 ( $0.2 \times Y$ 如果 $Y > 5$ )	1.4 ( $=0.2 \times 7$ )	0.9 ( $=0.9 \times 1$ )
2. 奢侈品 ( $0.1 \times Y$ 如果 $Y \leq 5$ ) 或 ( $0.8 \times Y$ 如果 $Y > 5$ )	5.6 ( $=0.8 \times 7$ )	0.1 ( $=0.1 \times 1$ )
总需求结构:		
1. 必需品 = 2.3 ( $=1.4 + 0.9$ )		
2. 奢侈品 = 5.7 ( $=5.6 + 0.1$ )		
总支出 = 8.0 (人均收入 = 4.0) (= 国民生产总值)		

可见，尽管一个国家从总体上来说相对贫穷，但分配的极不平等意味着富人可以决定生产什么，因为富人的需求偏好对消费品市场的影响超过穷人。上述两个例子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分别是8单位和4单位，即完全一样，但由于极不相同的分配状况，导致了生产和消费的格局具有重大差别。

表5.1和5.2说明了收入分配对需求结构的影响。具有相同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两个国家，由于其分配平等与否的差别，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格局，这表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处于不同的坐标点。对于一定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人均国民收入，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富人的消费偏好对总需求和生产的影响作用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占总人口比例很小的富人，能够控制极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他们对社会购买力的支配，会使

生产和进口都偏重奢侈品，尽管此时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尚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状态。这种极为明确的事例证明，传统的以市场需求曲线为依据的消费者主权理论，实际上表明的是极少数能够支配市场和决定生产什么产品的富人的主权，而不是所有消费者都具有这一主权。

由于收入分配的极不平等，导致许多国民收入低的第三世界国家，将相当大一部分的财力、技术和管理用于高级消费品的生产，同时大量进口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电子设备等，以迎合人数虽少但经济权力极大的那些大多居住在都市区的人们。如果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话，需求的结构将会转向多生产一些基本食品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这有助于消除农村的贫穷和提高总人口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此外，正如第8章将会论及的，为满足对奢侈品的需求，通常要求采用相对较高程度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而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则对应于相对较多地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其结果是，就业越少，利润越大（包括当地外国公司的利润），收入分配的鸿沟越深。

本章随后各节，将依次考察关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穷之间相互关系的下列五个关键问题：

1.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相对不平等的程度究竟如何？绝对贫困的范围有多大？

2. 谁是穷人？他们的经济特征是什么？

3. 什么决定经济增长的“性质”？即究竟哪些人从增长中得益？

4. 对于国民收入较低的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增长与改善分配的不平等，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促进的还是相互冲突的？换句话说，只有以扩大分配的不平等为代价才能换取经济的迅速增长，还是有可能以减少收入差距来取得经济的高增长率？

5. 采用什么政策可以减少绝对贫困的范围和程度？

### § 3 几个基本概念、收入的规模分配和功能分配

把来自不同渠道的最近的一些资料放在一起考察，我们可以对前一节最后所列问题的头两个，即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与贫穷的范围和特征，得出一些看法。本节将确定收入分配和贫穷问题所研讨的范围，并找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和贫穷问题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我们首先应弄清，如何衡量收入分配的状况。

为了便于分析和定量，经济学家通常喜欢区分两种主要的收入分配指标：（1）“个人的”或“规模的”收入分配；（2）“生产要素的”或“功能的”收入分配。

#### 3.1 规模分配

个人的或规模的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最常使用的指标。它只表示个人或家庭与其总收入的关系，而不考虑取得收入的方式。它只看每个人或家庭所得的多少，而不顾这些收入是来自工资，还是来自利息、利润、租金、馈赠或遗产。此外，也忽略收入来源的地区性（城市或农村）差别和职业性（如农业、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差别。只要X先生和Y先生年个人收入一样，他们就分在同一类，而不管X先生可能是靠每天在他的农场工作15个小时谋生，Y先生则是完全不工作仅靠他所继承的遗产生息过活。

因此，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喜欢依据个人收入的高低，将全部人口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即“规模”。一种常用方法，是依次根据收入水平的高低将人口5等分或10等分，即分为5个或10个人数相等的收入组，然后算出每个组的收入在总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例）。例如，表5.3描绘了一个虽属假设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很典型的收入分配模式。这张表上的20个人（更常是以家庭



为单位) 代表这个国家的总人口, 按照他们每人年收入的高低进行了分组, 次序是从收入最低 (0.8单位) 的个人到收入最高 (15单位) 的个人。所有个人收入的总和或国民收入是 100 单位, 这也是第2栏数字的总计。在第3栏总人口被按4人一组五等分, 第1组代表了收入最低的20%人口, 他们的总收入 (5单位) 只占国民收入的5%。第2组 (第5人至第8人) 得到了国民收入的9%。换句话说, 占总人口40%的最底层只获得国民收入的14%, 而占人口20%的最高层 (第5组) 却分得了国民收入的51%。

表5.3 一个假设但却是典型的不发达国家个人  
收入规模分配的模式;  
将人口5等分或10等分时, 各阶  
层的收入份额

个 人	个人收入 (货币单位)	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5等分制	10等分制
1	0.8		
2	1.0		1.8
3	1.4		
4	1.8	5	3.2
5	1.9		
6	2.0		3.9
7	2.4		
8	2.7	9	5.1
9	2.8		
10	3.0		5.8
11	3.4		
12	3.8	13	7.2

(续前表)

个 人	个人收入 (货币单位)	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	
		5 等分制	10等分制
13	4.2		
14	4.8		9.0
15	5.9		
18	7.1	22	13.0
17	10.5		
19	12.0		22.5
19	13.5		
20	15.0	51	28.5
总计 20	(国民收入) 100.0	100	100

$$\text{不平等程度} = \frac{\text{最底层40\%人口的收入}}{\text{最上层20\%人口的收入}} = \frac{14}{51} = 0.28$$

第3栏的数据是占人口40%的最底层与占人口20%的最高层的收入的比率，这一比率通常用以衡量一个国家贫富两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上例中，这一不平等比率是14单位除以51单位，即约等于0.28。

表5.3的第4栏是对规模收入分配的更细致分析，它将人口等分为10个组。由表可见，占人口10%的最底层（两个最穷者）只得到国民收入的1.8%，而同样占人口10%的最高层（两个最富者）却获得了国民收入的28.5%。如果我们还想知道占人口5%的最高层的收入，则可以将总人口20等分（在上例中即每人为一组），然后计算出最高层所得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从表5.3我们可知，占人口5%的最高层（即第20人）获得了国民收入的15%，比占人口40%的最底层的收入之总和还多。

### 3.2 洛伦茨曲线

通常还可用另一种方法分析个人收入的统计资料，这就是建立所谓著名的洛伦茨曲线<sup>②</sup>。图5.2即其形状。横轴表示收入领取者的数目，但这是累积的百分数而不是绝对数。例如，刻度20指占人口20%的最穷者，刻度60表示占人口60%的广大下层，最后刻度为100时包括了所有的人口。纵轴表示每个百分比的人口所得到的收入份额，它也是累积到100%以便与横轴相对应。两轴恰好围起一个正方形，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画一条对角线，该线上每一点对应的收入百分比和人口百分比都相等。例如，对角线的中点正好对应收入的50%和人口的50%，在对角线的3/4处，对应的是收入的75%和人口的75%。换句话说，图5.2的对角线表示规模收入分配的“完全均等”<sup>③</sup>，每个百分比的人口得到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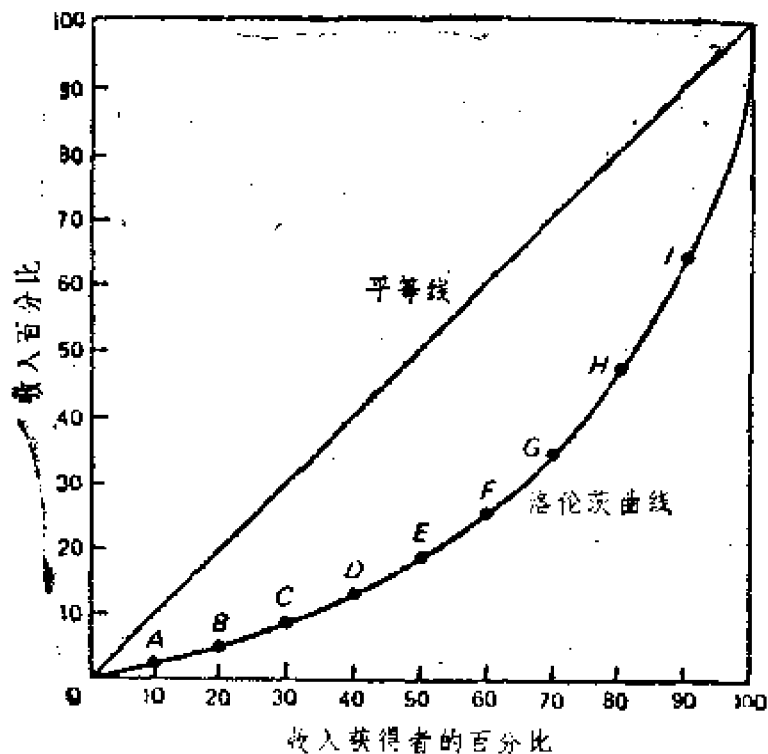


图5.2 洛伦茨曲线

等百分比的国民收入。就像40%的人口最下层得到了40%的国民收入，5%的人口最高层也只得到5%的国民收入。

洛伦茨曲线显示了在既定年份，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与其所得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之间的实际数量关系。图5.2所描绘的洛伦茨曲线使用了表5.3提供的10进位制的资料，也即把横轴和纵轴都按10等分，每个刻度都是10%。A点显示10%最底层的人口仅得到国民收入的1.8%，B点表明20%最底层的人口得到的国民收入是5%，此后各点类推，在中点E可见，50%的下层人口只占有国民收入的19.8%。

洛伦茨曲线与对角线（表示完全均等）相距越远，表示不平等的程度越大。曲线与下方横轴和右方纵轴的共同交点，表示完全不平等这么一种极端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人拥有全部的国民收入而其他人却毫无所得。由于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可能出现完全平等或完全不平等，所以不同国家的洛伦茨曲线总是处于对角线右下方的某一位置（如图5.2）。不平等的程度越大，曲线越加弯曲并越趋近于下方横轴。图5.3显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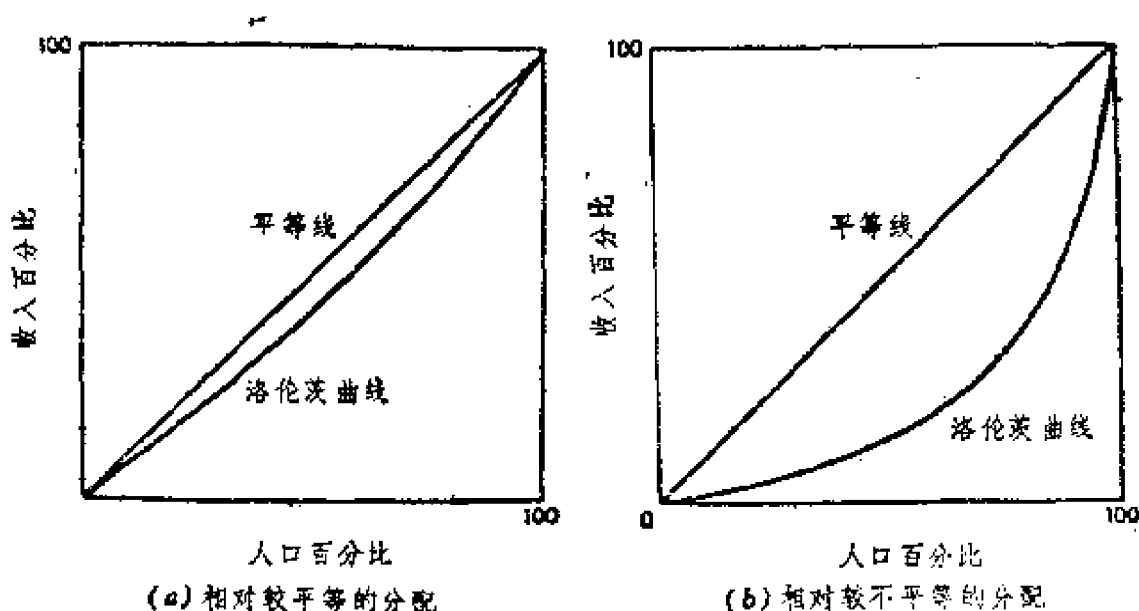


图5.3 洛伦茨曲线的曲率越大，不平等的相对程度越大

两种有代表性的分配情况，相对较为平等的分配（图5.3a）和较不平等的分配（图5.3b）。洛伦茨曲线为什么不会出现在对角线的左上方？这请学生们自己解释。

### 3.3 基尼系数与不平等的总量指标

对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相对不平等程度的衡量，可以通过计算洛伦茨曲线示意图中的对角线和曲线所夹面积，与正方形中曲线所在右半方的面积之比率而得到，这是一种至今最简便的衡量方法。在图5.4中，即阴影部分的面积A与三角形BCD之比率。由于意大利的统计学家C.基尼在1912年首次列出此公式，所以这一比率被称为“基尼稠密度系数”，或简称基尼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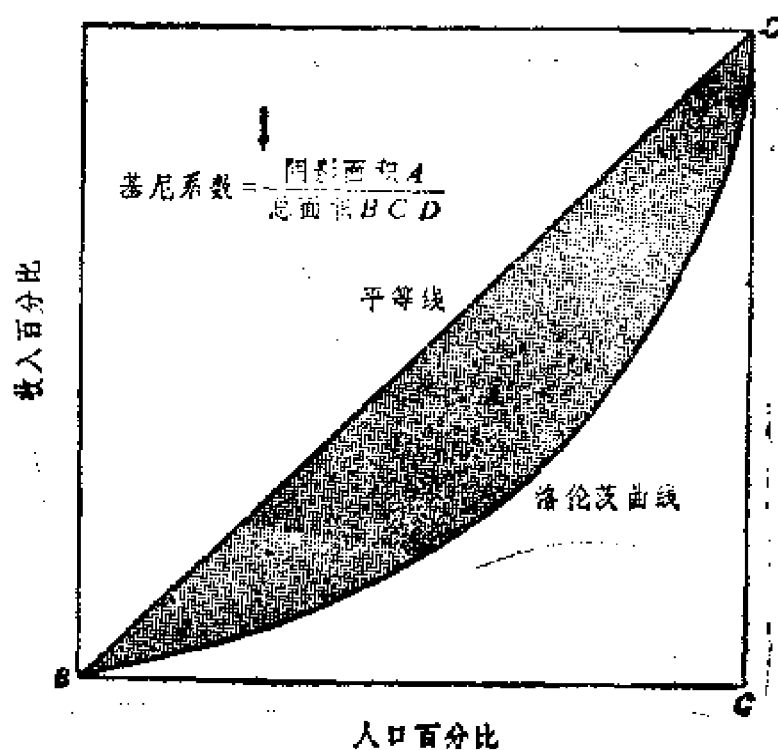


图5.4 基尼系数的估算

基尼系数是不平等的总标志，其变化区间是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实际上，正如我们随后将要看到的，

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的基尼系数，通常是在0.50到0.70之间；收入分配相对较为平等的国家则在0.20到0.35之间。表5.3和图5.2我们所假设的分配状况，其基尼系数大约是0.61，属于相对不平等的分配。

### 3.4 功能分配

经济学家衡量收入分配的第2种常用方法，即功能的或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用以表明各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得的份额。这种方法不是把个人看成独立的实体，而是将“劳动的”所得当作一个总体，与租金、利息和利润（即分别是对土地、信贷和资本的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相比较。尽管有的人的收入可能来自于上述所有生产要素，但这无碍于功能分配的分析。

许多阐述功能收入分配概念的理论著作认为，每个生产要素的收入来自其对生产的贡献，供求关系决定了每种生产要素的单位价格。以某种生产要素的单价，乘以一定效率下（即最小成本）所使用的该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便可得到对该种生产要素的总报酬。例如，假定对劳动的供求决定了劳动的市场工资，将此乘以就业者总数，便可知总工资支付量，有时也称作总货币工资。

图5.5是传统的功能收入分配理论的简明图解。这里假设只有两个生产要素：一个是资本，它是给定的不变量；另一个是劳动，它是唯一的变量。假定是在竞争市场，劳动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即就业者人数的增加将持续到他们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他们的实际工资为止。但是，根据边际产量递减的原理，劳动需求将是就业数量的递减函数。所以图5.5用DL曲线表示斜率为负的劳动需求曲线，以向上倾斜的SL曲线表示传统的新古典学派的劳动供给曲线，从两曲线的交点可得“均衡”工资OW和均衡就业水平OL。国民总产量（=国民总收入）以OREL的面积表示。<sup>④</sup>这一国民收入将分为两部分，OWEL部分以工资的

形式分配给工人们，余下的WRE部分作为资本的利润分配给资本的所有者。因此，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该生产要素的供求曲线，各种生产要素报酬的总和等于国民总产品。收入的分配是根据各生产要素的“功能”进行的：劳动者得到工资，土地所有者接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这一理论看上去很美妙和富有逻辑性，因为各种生产要素都根据其对国民总产品的贡献得到了报酬，而且不多也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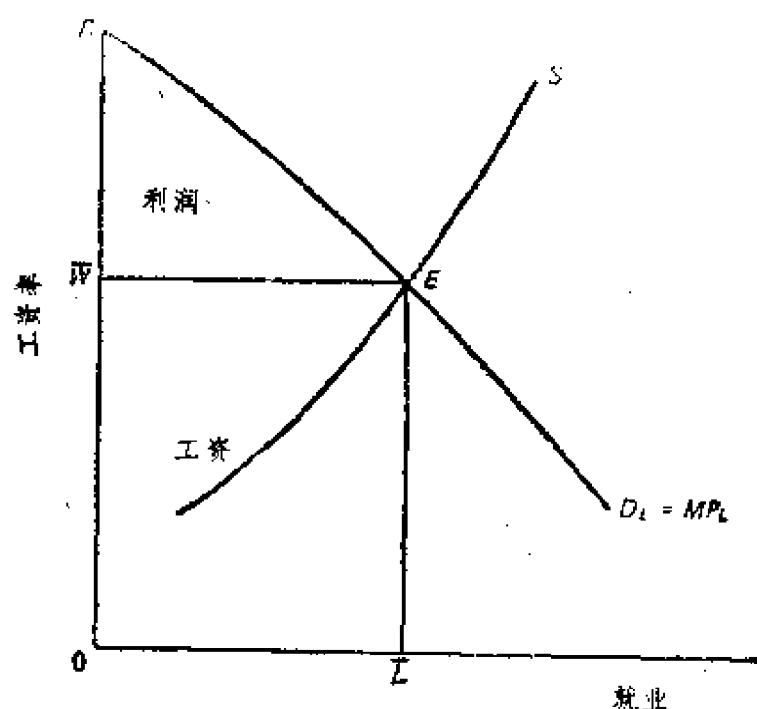


图5.5 市场经济中功能收入分配的图解

不幸的是，由于未考虑非市场因素对生产要素价格决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功能分配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雇主和工会两个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会对“现代部门”工资率的确定产生影响；垄断者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操纵资本、土地和

产品的价格使之有利于他们自己。本章后面还将更多地谈到分析收入分配的两种方法（规模的和功能的）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先考察一些经验资料，以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和贫穷的程度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

## § 4 实例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等和绝对贫困

### 4.1 不平等：各国的差异

为了确定第三世界国家收入分配和贫穷问题的重要性，第一步我们先看看最近收集的15个国家的资料，即表5.4所列各国不同组别人口的所得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的统计。尽管这些资料搜集的方法、覆盖面以及各国对个人收入的具体解释有所不同，该表还是大致反映了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例如，我们从表中最下一行所列平均后的15个国家不同组别的人口占收入的份额可见，占总人口20%的最穷者只得到5.8%的国民收入，而占总人口10%或20%的最富人口组却分别获得了36.9%和51.4%的国民收入。

接着，让我们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大量抽样调查中，来看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表5.5把这些国家交替分为三组：横栏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的程度，把各国划分为高度不平等、中度不平等和低度不平等三类；纵栏以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各国收入水平，也将各国分为高、中、低三组。此外，表中还列出了分别占各国总人口40%的最下层和20%的最上层的收入的比率，以显示在规模分配不同的国家收入集中的程度。



仔细审视表5.5，我们可以得出许多特别的和有趣的结论：

1.所有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混合经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在于可促使我们认真考虑究竟什么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分配制度，也就是应该探寻建立一种使各国会为之奋斗的合理的规范和目标，而不是去追求那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并且也许是不受人欢迎的完全平等。

2.社会主义国家——捷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具有较高程度的收入分配平等，即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最低。

3.总的来说，发达国家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对较为平等的分配。这是因为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能够创造一种有效的机制，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例如，较高的收入累进税率，以及公共开支、社会保险、失业补偿、食物赈济和对赤贫者的其它公开的福利政策，都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的悬殊，这种悬殊通常是私人经济活动的自发后果。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上述收入转移的机制至今仍然较为缺乏，或者是执行起来难以奏效。

4.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不平等程度，在第三世界各国差异很大。

5.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看来人均收入水平与收入集中程度没有明显的联系。即使在国民收入非常低（人均收入低于300美元）的一组国家中，占人口40%的下层群众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从6.5%（巴西）到20%（台湾）多不等。

#### 4.2 绝对贫困：范围和程度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从不同组别的人口所获得的收入份额，转向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的范围和程度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第2章曾谈到，“绝对贫困”的范围可依据生活在一定最

表5.4 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的估算

国 家	最底层20%人口	次底层20%人口	中层20%人口
阿根廷	4.4	9.7	14.1
巴 西	2.0	5.0	9.4
斯里兰卡	7.5	11.7	15.7
智 利	4.4	9.0	13.8
哥斯达黎加	3.3	8.7	13.3
埃 及	4.2	9.8	15.5
香 港	5.4	10.8	15.2
印 度	7.0	9.2	13.9
肯尼亚	2.6	6.3	11.5
南朝鲜	5.7	11.2	15.1
墨西哥	2.9	7.0	12.0
秘 鲁	1.9	5.1	11.0
菲律宾	5.2	9.0	12.8
坦桑尼亚	5.8	10.2	13.9
委内瑞拉	3.0	7.3	12.9
平均数	5.8	8.7	13.4

续前表

较高层20%人口	最高层20%人口	最高层10%人口	年 份
21.5	50.3	35.2	1970
17.0	66.6	50.6	1972
21.7	43.4	28.2	1970
21.4	51.4	34.8	1968
19.9	54.8	39.5	1971
23.5	47.0	不详	
21.6	41.6	31.3	1980
20.5	49.8	33.6	1975
19.2	60.4	n.a.	1976
22.4	45.3	n.a.	1976
20.4	57.7	40.6	1977
21.0	61.0	42.9	1972
19.0	54.0	38.5	1971
19.7	50.4	35.6	1969
22.8	54.0	35.7	1970
20.7	51.4	36.9	

资料来源：《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28；“海外发展委员会编：  
《美国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1983年备忘录》表C-10。

表 5.5 按照收入水平和不平等程度分类的各国

	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数>5.0					中度不平等	
	国名*	年份	人均收入	比率★	基尼系数	国名*	年份
低收入 (少于 300美 元)	巴西△	1970	231	6.5/66.7	0.61	达荷美	1959
	哥伦比亚△	1970	251	9.4/59.5	0.54	萨尔瓦多	1969
	厄瓜多尔△	1970	202	6.4/73.5	0.66	圭亚那	1955~56
	加蓬△	1960	261	6.0/71.0	0.65	印度	1961~64
	洪都拉斯	1967~68	224	7.3/67.5	0.61	菲律宾	1965
	伊拉克△	1956	172	6.8/68.0	0.61	苏丹	1963
	马达加斯加	1960	93	13.5/61.0	0.52	坦桑尼亚	1967
	秘鲁	1970~71	297	6.5/60.0	0.57	泰国	1962
	罗得西亚△	1968	214	8.2/69.0	0.62	突尼斯△	1961
	美内加尔多	1960	171	10.0/64.0	0.56	赞比亚	1959
中等收 入(30 0—750 美元)	牙买加	1953	338	8.2/61.5	0.56	阿根廷	1961
	黎巴嫩	1955~60	454	13.0/61.0	0.52	智利	1963
	墨西哥	1968	464	10.2/65.3	0.58	哥斯达黎加	1971
	巴拿马	1969	560	9.4/59.3	0.54	乌拉圭	1967
	南非△	1935	530	6.2/58.0	0.56		
	委内瑞拉	1962	750	9.7/58.0	0.52		
高收入 (大于 750美 元)						丹麦	1968
						芬兰	1962
						法国	1962
						联邦德国△	1964
						荷兰△	1967
						波多黎各	1963

资料来源：蒙特卡·阿鲁瓦利亚：《问题的范围》，载钱纳里等编：《增长的再分配：一种政策手段》，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1973年版。

\* 没有标号的国家的资料是根据其家庭的规模收入分配。

· 人均收入是按1964年的美元计算到最近两年。

★ 比率是指最低层40%人口的收入与最上层20%人口的收入之比。

△ 这些国的资料是根据现役工人的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0.40~0.50			低度不平等基尼系数<0.40				
人均收入	比率★	基尼系数	国名*	年份	人均收入	比率★	基尼系数
65	15.5/50.0	0.44	波兰	1969~70	135	17.0/46.0	0.37
248	12.7/52.0	0.45	台湾	1964	207	20.4/49.1	0.32
272	14.0/45.7	0.40	乍得	1958	63	16.0/43.0	0.35
84	14.0/54.0	0.46	象牙海岸	1959	139	17.5/55.0	0.43
150	11.6/55.4	0.50	南朝鲜	1970	150	18.0/45.0	0.36
91	14.2/50.3	0.43	利比亚	1962	220	23.5/37.0	0.26
70	14.0/57.0	0.48	马来西亚	1957~58	208	17.7/43.9	0.36
	12.9/57.7	0.50	尼日尔	1960	73	18.0/42.0	0.36
2156	10.5/55.0	0.50	巴基斯坦	1963~64	83	17.5/45.0	0.37
9150	14.6/57.0	0.40	乌干达	1969~70	119	17.1/47.1	0.38
681	17.3/52.0	0.42	保加利亚	1962	407	26.8/33.2	0.21
427	13.0/56.8	0.49	希腊	1957	341	21.0/49.5	0.37
423	14.7/50.6	0.43	以色列	1957	686	20.2/39.4	0.30
460	14.3/47.4	0.42	波兰	1964	649	23.4/36.0	0.25
			西班牙	1964~65	572	17.0/45.2	0.31
			苏里南	1962	311	21.7/42.6	0.31
			南斯拉夫	1968	451	18.6/41.5	0.33
1838	13.6/47.6	0.42	加拿大	1965	2057	20.0/40.2	0.32
1193	11.1/49.3	0.45	捷克斯洛伐克	1964	880	27.6/31.0	0.18
373	9.5/53.7	0.50	匈牙利	1969	870	24.0/33.5	0.24
11614	15.4/52.9	0.45	日本	1963	780	20.7/40.0	0.31
1437	13.6/48.5	0.43	新西兰	1968~69	1 800	15.5/42.0	0.37
688	13.7/50.6	0.44	挪威	1963	1 609	16.6/40.5	0.35
			瑞典*	1963	2 220	14.0/44.0	0.39
			英国	1968	1 599	18.8/39.0	0.32
			美国	1970	3 693	19.7/38.8	0.31

低收入水平下的人数来确定，这一收入水平即某种想象的“国际贫困线”。这条线适用于任何国家，不依该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转移。绝对贫困的现象在纽约，就如同在加尔各答、开罗、拉各斯或波哥达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只不过在纽约绝对贫困的范围，即它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绝对数和相对数，可能比后面的各城市低得多而已。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阿鲁瓦利亚、卡特和钱纳里，在最近一份关于第三世界贫困的规模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几乎40%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营养。穷人大多分布在下列最穷的国家：南亚各国，印度尼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却有超过3/4的人口处于贫困中。在那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最低的国家，贫困范围达到人口的60%或更多。<sup>⑤</sup>”

在表5.6中，上述作者估算了36个第三世界国家到2000年的绝对贫困水平，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将其划分为较低（按1970年美元计算，人均收入在150美元以下）、中等（人均收入150—325美元）和较高（325—1300美元）三类。他们预测到本世纪末绝对贫困将大量减少，尽管尚未彻底消除。但这一预测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实际经济增长和收益分配趋势的乐观估计基础上的。因此，对2000年情况的预测，有赖于上述乐观估计将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尤其要看80年代经济形势的严重程度。

最后值得再强调的是，正如前述第5个结论所表明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人均收入高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大量的绝对贫困者。由于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各国之间很不一样，因此，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人口在人均国民收入较高的国家中可能比在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中比重更大。例如表5.6所示，台湾和危地马拉197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大致相同，但后者处于国际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重是前者的3倍以上。

与此相似，南朝鲜的人均收入是秘鲁的60%，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重却只有秘鲁的30%。这些完全表明，与其说贫困和高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不如说它们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取决于决定所增加的国民收入如何在人口中分配的政策和制度。

## § 5 贫困人口的经济特征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绘了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与贫困问题的大致图景。<sup>⑥</sup>我们已经说明，较低的人均收入及其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共同决定着绝对贫困的程度。显然，如果收入分配的比例是既定的，则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绝对贫困的人数就越少。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见，人均国民收入较高并不能够确保贫困水平较低。由此可以理解，收入规模分配的性质是分析低收入国家贫困问题的核心。

但是，只大致描绘第三世界贫困的图景是不够的。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和计划以根治贫困，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知识：究竟谁属于贫穷阶层？他们的经济特征是什么？正如本章随后将谈到的，当人们选择与贫穷斗争的政策时，单纯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或者，期望国民收入的增长将使“利益扩散”从而改善穷人的生活，这是很不够的。相反，采用直接对付贫穷问题的政策手段，则无论从短期还是较长的时间来看，都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如果不具备关于贫困的地区、范围和特征的详细知识，就不可能直接对症下药。

也许，穷人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大都不均匀地分布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及其附属活动。从第三世界国家广泛抽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我们发现，大约 2/3 极贫穷的人是作为小农或报酬很低的农场工人勉强维持生计。其余 1/3

表5.6 1975—2000年(预测) 36个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和贫困状况

国 家	1975年 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1960—1975	1975—2000
<b>A组(150美元以下)</b>			
(1) 孟加拉国	72	2.4	4.6
(2) 埃塞俄比亚	81	4.3	4.1
(3) 缅甸	88	3.2	2.5
(4) 印度尼西亚	90	5.2	5.5
(5) 乌干达	115	4.0	3.2
(6) 扎伊尔	105	4.3	4.8
(7) 苏丹	112	3.0	6.0
(8) 坦桑尼亚	118	6.8	5.4
(9) 巴基斯坦	121	5.6	5.2
(10) 印度	108	3.6	4.5
小 计	99	3.8	4.7
<b>B组(150—325美元)</b>			
(11) 肯尼亚	168	7.0	5.9
(12) 尼日利亚	176	7.1	5.2
(13) 菲律宾	182	5.6	7.3
(14) 斯里兰卡	185	4.2	3.8
(15) 塞内加尔	227	1.5	4.0
(16) 埃 及	238	4.2	6.1
(17) 泰 国	237	7.5	6.7
(18) 加 纳	255	2.7	2.1
(19) 摩洛哥	266	4.4	6.2
(20) 象牙海岸	325	7.7	5.8
小 计	209	5.5	5.8



40%最底层人口的收入份数		1975年最穷人口	穷人的数量 (百万)	
1975估算	2000预测	所占的百分比	1975估算	2000预测
20.1	17.4	60	52	56
16.8	15.0	62	19	25
15.7	15.2	56	20	29
16.1	12.7	62	76	30
14.4	14.0	45	6	12
14.6	12.7	49	11	13
14.5	12.0	47	10	8
14.3	12.3	46	8	9
16.5	14.5	34	32	26
17.0	14.6	46	277	167
16.7	13.9	49	510	375
8.9	7.7	48	7	11
13.0	11.8	27	27	30
11.6	10.3	29	14	6
19.3	18.2	10	2	2
9.6	8.9	29	1	2
13.9	13.5	14	7	5
11.5	10.9	23	13	4
11.2	11.9	19	2	6
13.3	10.9	16	4	2
10.4	10.4	14	1	1
12.0	10.1	24	81	70

(续前表)

国 家	1975年 人 均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1960—1975	1975—2000
C组(325—1300美元)			
(21) 南朝鲜	325	9.3	8.1
(22) 智 利	386	2.3	6.0
(23) 赞比亚	363	3.4	4.9
(24) 哥伦比亚	352	5.6	7.4
(25) 土耳其	379	6.4	6.3
(26) 突尼斯	425	6.1	7.5
(27) 马来西亚	471	6.7	6.7
(28) 台 湾	499	9.1	6.2
(29) 危地马拉	497	6.1	6.0
(30) 巴 西	505	7.2	7.0
(31) 秘 鲁	503	5.7	6.3
(32) 伊 朗	572	9.5	7.2
(33) 墨西哥	758	6.8	6.8
(34) 南斯拉夫	828	5.8	6.1
(35) 阿根廷	1097	4.0	4.5
(36) 委内瑞拉	1288	5.8	6.8
小 计	577	6.4	6.9
总 计	237	5.4	6.2

资料来源：M. S. 阿鲁瓦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贫困》，见《发展经济学》杂志第6卷表1和表2，1979年9月。

(续前表)

40%最底层人口的收入份额		1975年最穷人口	穷人的数量(百万)	
1975估算	2000预测	所占的百分比	1975估算	2000预测
16.9	19.1	6	3	1
13.1	14.3	9	1	1
13.0	12.9	7	0	1
9.9	11.5	14	5	2
9.3	10.4	11	6	4
11.1	13.3	9	1	0
11.1	13.3	8	1	1
22.3	24.4	4	1	0
11.3	12.4	9	1	1
9.1	11.9	8	16	7
7.3	8.8	15	3	2
8.2	11.0	8	5	2
8.2	10.8	10	8	6
18.8	23.9	4	1	0
15.1	18.5	3	1	1
8.5	12.9	5	1	1
9.9	10.0	8	54	30
9.8	6.5	35	644	475

的穷人，一部分在农村从事零星劳务，另一部分在都市中心区的边缘从事各种自雇形式的劳务，如摆街摊、跑买卖和干零星活等等。平均来说，在亚洲和非洲大约有75%至80%各种类型的贫穷人口居住在农村，在拉丁美洲这一比例约为70%。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20年来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最大部分，都是直接用于城市，尤其是城市中较为富裕的工商区。无论是在直接的生产性投资方面，还是在教育、卫生、住房和其它社会服务方面，政府支出对城市现代化地区的偏袒，是我们随后各章所要讨论的许多发展问题的焦点。这里我们只须指出，由于贫穷人口极不平衡地集中于农村，因此任何真正想缓解贫困的政策，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针对农村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部门（见第9章）。

## 5.1 妇女与贫困

贫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妇女的影响更大。实际上在每一个国家，妇女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人数都比男子多。而且，以妇女为家长的家庭的贫困仍在不断增加。在全世界的总家庭数中，估计约有17—28%的家庭是以妇女为家长。在一些地区，例如加勒比地区和南非，这一比例超过40%。总的说来，以妇女为家长的家庭处于社会的最贫穷阶层。

由于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贫困使她们承受的负担特别沉重。在家里，她们通常要负责家务、煮饭和照顾孩子。对于穷人家的妇女来说，她们的家务通常还包括下列重活：砍柴挑水，在家庭的农田除草、播种和收割庄稼，碾磨谷物，以及饲养牲畜等等。穷人家的妇女倾向于多生孩子，这也增加了她们的负担。在家庭之外，这些妇女只能在农村或非正式的城里工厂干活，这些劳动不仅艰苦和时间长，而且报酬又低。在实际上没有资本设备的低技术劳动竞争场所，许多妇女所得到的仅够糊

口的工资是她们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也有些妇女还要添上她们男人的救济金来弥补家庭所需。

对穷人家的妇女来说，时间是主要的资源。由于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她们的工作既累时间又长，这使她们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实际上，由于报酬低迫使她们外出赚取更多的收入，这牺牲的是她们自己的闲暇时间，而并没有减少她们做家务的时间。如果把她们的这些劳动时间都计入社会产值和家庭的现金收入，那么妇女和孩子们所做的贡献将比穷男人更多。

事实表明，以妇女为家长的家庭的贫困和一般的妇女的贫困，是直接与她们的地位有关的。妇女通常受教育不多，就业机会较少，并且比男人所得的报酬低。此外，她们占有的土地、资本和技术也较少，而这一点大大降低了她们在家庭内外的生产效率。

显然，如果以消灭绝对贫困为目标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努力改善妇女的地位。这种努力包括为妇女提供较多的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并增加她们占有的生产要素。事实上，这将会是提高最贫穷家庭收入的最直接的手段，而在这些家庭中妇女的收入是维持家庭生计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来源。

偏重于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政策已经导致了妇女与男子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政策通常是更多地为男子提供就业和训练机会。与城市化有关的若干趋势同样扩大了两性的收入差距，因为妇女在城里工厂赚取收入的机会较少。流向城里的男性工人如果不往家里汇款的话，农村家庭的收入将会减少。农业的衰落也将导致妇女就业机会的减少，因为她们习惯于从事农活取得收入（参见第10章关于妇女在农业经济中作用的进一步讨论）。

## § 6 经济增长与贫困的范围

前面我们说过，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自然力量来减少发展

中国的绝对贫困，是远远不够的。认识到这一点是进一步研究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前提。一个基本疑问是：如果沿着传统的以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路线追求经济增长，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和贫困程度会趋向于改善还是恶化，或者无济于事？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至今尚未确切了解影响各国过去收入分配变化的具体因素。对现代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模式研究有素的库兹涅茨教授认为，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趋向于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后期阶段则趋向于改善收入分配。尽管西方国家的长期历史资料似乎的确支持了这种论点，但对照一下最近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资料，却发现这种观点并不使人信服，如图5.6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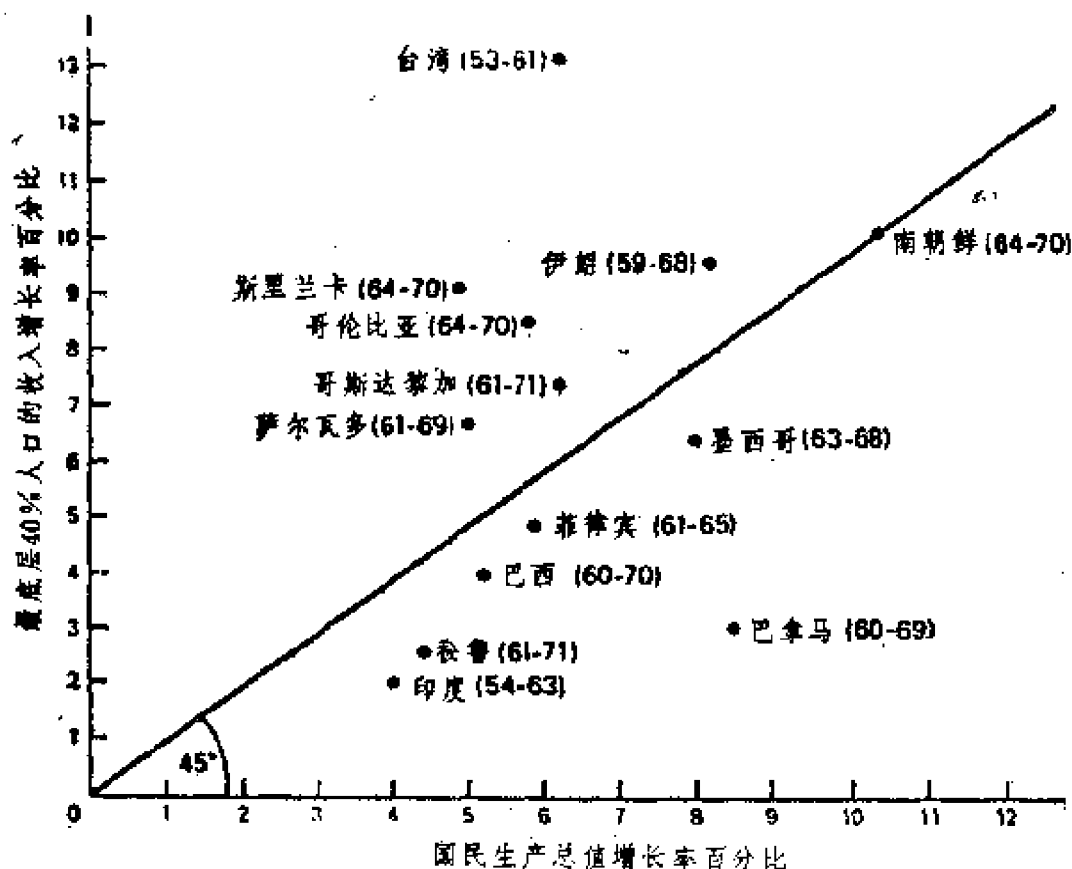


图5.6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最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率的比较

在图5.6中，横轴显示了大约13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纵轴表示这些国家中占人口40%的最下层收入的增长率。所取资料的时间起止年份写在每个国家之后的括号内。资料在分布上直意识地企图显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改善穷人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因此每个国家的资料都以一定点表示，该点同时反映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40%最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45°线以上的国家的收入分配在所考察时期得到了改善，表现为40%最穷人口的收入的增长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45°线以下的国家，收入的增长慢于国民生产总值，表明在所考察时期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了。

从图5.6上分布的各点来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并没有很明显或密切的关系。正如某些人所预言的，高增长率并不一定恶化收入的分配。的确，在一些地区，诸如台湾、伊朗和南朝鲜，在有着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改善或至少保持了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不过，也有一些国家，象墨西哥和巴拿马，在有着差不多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却发生了倒退。另一方面，从图5.6也看不出低增长率与收入分配的改善有必然联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象印度、秘鲁和菲律宾，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却伴随着占人口40%的最下层在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的减少。而斯里兰卡、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在有着相近的经济低增长率的同时，却努力增加了低收入人口的相对经济福利。

上述资料尽管不够充分并仅限于一个较短的时期，但还是再次表明经济增长能否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即增长是如何取得的、参与者的构成、生产要素的排列顺序和政策的侧重点等等。利益分配的性质显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的迅速增长。

上述关于“经济增长的性质”的观点在下面的探讨中得到了

进一步论证。通过对43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更为广泛和细致的研究，对这些国家中约占人口60%的最下层的收入份额和国家总经济实际之间关系进行的分析<sup>⑧</sup>，人们发现，一般说来，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主要影响，在于减少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并不存在所谓经济增长会自动向穷人“扩散”利益的证据。相反，这43个欠发达国家经历的增长过程表明，典型的是利益向少数人的中等阶层、特别是向最富的上层“扩散”。因此我们认为，“经济结构，而不是经济水平或增长率，才是收入分配状况的根本决定因素。”<sup>⑨</sup>

## § 7 发展目标的重新确定：收入分配改善的增长

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已普遍认识到重新确定发展的优先顺序的必要性，从孤立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最大化，转向更为广泛的一系列社会目标，诸如根除贫困和减少过度的收入悬殊，但是，从认识到问题转化为采取行动，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如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对于严重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问题不加以考虑，而仅仅单纯地把注意力转向更多地关心穷人，那么经济学本身关于发展中的经济如何成长以及投资如何分配最有效方面的研究就毫无作用，甚至经济学家关于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发展战略以及针对贫穷问题应该制定什么样政策的讨论也毫无意义。这不仅因为贫困和收入分配本来也是政治和制度的问题，而且也由于现存许多经济理论对于收入分配如何决定的解释发达国家很少理解，还不如听由不发达国家自行其事。

但是，经济学的发展史表明，理论和认识的进步，来自于对现实世界具体经济问题的反映，而不只是纯理论自身演绎的逻辑发展。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日益贫困化理论，



新古典学派关于个人行为指向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理论，凯恩斯的就业和收入决定论，以及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论，都是对其时代的主要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反映。因此，从人们当前对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视，可以合理预料到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将日益从单纯关心经济增长问题转移开，会有新的更好的理论和政策产生，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而能够解决亿万人民日常遭受的苦难。

由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任何现实的发展计划都必须自觉地增加这一基本任务。此外，迅速的经济增长和较公平的收入分配作为发展的目标，不一定是相容的。我们并非是在要更多的增长还是更多的平等之间进行选择，所要选择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追求何种增长类型——是使利益更多地集中于富人之手还是更广泛地扩散。下一节我们将论述增长和平等并不矛盾的根据。在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战略不仅要求注重加速经济的增长，而且要求直接关注提高第三世界人口中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后者在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因此，发展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促成收入普遍增长的理想格局，尤其是着重促进贫穷阶层的收入增长。这样一种目标需要一个同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大化而不考虑分配后果的目标完全不同的战略。

## § 8 经济分析的作用：从增长中实行再分配

### 8.1 增长与收入分配

**关于生产要素报酬、储蓄与经济增长的传统看法** 尽管许多经济分析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冷淡地保持沉默，但却有一大部分理论在实质上认为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

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sup>⑩</sup>事实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大都或明或暗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倾向于不重视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按照这种理论，高度不平等是最大增长的必要条件，在长期的最大增长过程中，通过竞争和混合的经济制度会实现自然的“利益扩散”，从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企图直接减少贫困的努力则会弄巧成拙。无庸讳言，这种观点不论是否正确，都为权贵阶层的财富积累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尽管这也许不是有意识的。

为高度收入分配不平等辩护的基本经济论据，在于认为较高的个人和公司收入是储蓄的必要条件，储蓄通过一定的机制，如第3章所述哈罗德-多马模型，使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可能。假如富人将他们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储蓄和投资而穷人则将其全部收入用于消费，假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的确直接与国民收入中的储蓄比例有关，那么显然高度不平等比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助于经济的增长。最终，这将能使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提高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使相当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可通过税收和补贴项目来进行再分配。而在此之前，任何较大程度再分配国民收入的企图，都只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延缓解决不平等的时间。因为只有使国民收入这个蛋糕变大，才能使分割给每个人口组的蛋糕更多些。<sup>⑪</sup>

**反对传统观点的理由<sup>⑫</sup>**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现在认为，上述传统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争取较大的平等才是发展中国家自主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有如下4条理由：

首先，人们共同感到近来丰富的经验资料证明了一个事实：与现存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富人，并不打算为了节俭或理想而储蓄和投资，把他们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发展地方经济。相反，地主、实业家、政治家和其它富豪们以挥霍他们的财富而著称，将他们的收入大都用于进口奢侈品、

盖豪华的住宅、出国旅游、购买黄金珠宝和吃外国银行的户头。这类“储蓄”和“投资”丝毫不可能增加本国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消耗，他们挥霍的是从普通未受过教育的非熟练劳动者身上榨取的血汗。从短期看，富人不见得比穷人将更大的收入比例用于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性的”国内储蓄和投资。<sup>③</sup>所以，以较大的和增长着的收入不平等为基础的发展战略，事实上比机会主义的鬼话好不了多少，其结果只会永久保持第三世界国家中经济和政治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并以牺牲占总人口大多数的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战略应该叫做“反发展战略”。<sup>④</sup>

其次，穷人的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诸如卫生、营养和教育条件的低劣，可能会降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并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如果采取提高40%最下层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战略，将不仅是增加了这些人的福利，而且也增进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收入。

第三，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将刺激对国内生产的食物和衣服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全面提高，这将增加国内的生产、就业和投资，为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更多人分享增长的成果创造条件。富人则倾向于把增加的收入更多地用于进口奢侈品。<sup>⑤</sup>

最后，通过减少大多数人的贫困来取得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能够从物质和精神上强有力地激励公众广泛参加和支持发展过程，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反之，收入悬殊和较严重的绝对贫困，则从物质和精神上压抑经济的进步，最终将可能遭到受压迫的群众和政治上敏感的人、尤其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的强烈反对。

## 8.2 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国发展和福利指数的片面性

前面我们已经批评了把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当作发展和经济福利的主要标志的观点。每人平均拥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并不能说明国民收入实际上是如何分配的以及哪些人从经济

增长中获得了较多的利益。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可能掩盖着贫困依旧没有好转的事实。

许多人，其中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往往没有认识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40%最上层人口的收入的增长率，因为他们获得了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不相称的大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不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当作社会福利改善的指数。这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某个经济社会只有10个人，其中前9人没有一点收入而最后一人却接受了100单位的收入，这个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0，人均收入是10。现再假设每个人的收入增加了20%，国民生产总值达120，人均收入变为12；过去没有收入的9人现仍毫无收入，因此这种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会使他们高兴，仍然是那唯一的富人占有了全部的收入。所以，在此与其说国民生产总值是整个社会福利的指数，还不如说它只是某个人的福利的指数更为确切。

上述例子同样可用来说明较为现实的情况。现实虽不象上例那么极端，但收入的分配的确是很不平等的。在表5.3中，我们曾将人口等分为5组并显示出20%的最下层人口只得到国民收入的5%，而其余4组（每组均占总人口的20%）分别得到国民收入的5%、9%、13%、22%和51%。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发现，如果把每个社会阶层的收入份额列在一起，可以反映出他们各自所得的相对经济福利；每个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则可反映出这个阶层经济福利的增长。把每个阶层的收入增长化为简单权数，我们可以估算出整个社会总福利的增长。这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的总福利中，掺进了根据每个阶层所占收入份额计算出的各阶层的权数。在把人口划分为5个阶层的特定情况下，适用于等式(1)⑥：

$$G = w_1 g_1 + w_2 g_2 + w_3 g_3 + w_4 g_4 + w_5 g_5 \quad (1)$$

其中：G = 加权的福利增长指数

$g_i$  = 第  $i$  组人口的收入增长率 (在上例中  $i$  依次为 1, 2, 3, 4, 5)

$w_i$  = 第  $i$  组的“福利权数” (在上例中  $w_1 = 0.05$ ,  $w_2 = 0.09$ ,  $w_3 = 0.13$ ,  $w_4 = 0.22$ ,  $w_5 = 0.51$ )

只要权数加在一起不是负数, 社会福利增长的总标志即  $G$ , 必然处于各组收入的最高增长率和最低增长率之间。在极端的情况下, 某个人或者最上层的 1/5 人口占有了全部收入, 此时“福利权数”即收入份额, 与计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在此等式 (1) 将变成等式 (2) :

$$G = 0g_1 + 0g_2 + 0g_3 + 0g_4 + 1.0g_5 = 1.0g_5 \quad (2)$$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福利的增长只是最上层 1/5 人口的收入的增长。

在表 5.3 的例子中, 以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收入份额表示的加权社会福利指数为:

$$G = 0.05g_1 + 0.09g_2 + 0.13g_3 + 0.22g_4 + 0.51g_5 \quad (3)$$

现假设最底层 60% 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为零 (即  $g_1 = g_2 = g_3 = 0$ ), 最上层 40% 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是 10%, 等式 (3) 将变成:

$$G = 0.05 (0) + 0.09 (0) + 0.13 (0) + 0.22 (0.10) + 0.51 (0.10) = 0.073$$

即社会福利指数将提高 7% 以上, 这也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就是说表 5.3 中第 4 和第 5 组人口的收入如增加 10%, 国民生产总值将从 100 提高到 107.3)。由此意味着, 即使 60% 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 社会福利却已增加了 7.3%。这 60% 的人口依然只分别拥有 5、13 和 22 单位的收入。显然, 收入分配更加恶化了, 因为 60% 人口的收入的相对份额下降了。

等式 (3) 的例子通俗明白地解释了我们的观点。使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社会福利的指数和比较不同国家发展状况的标志, 可能是非常不妥当的, 尤其是在国民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

家。在这些国家中，不同收入人口组的收入增长率所乘的“福利权数”极不均等，最上层1/5人口的收入增长最为显著。比如在等式(3)的例子中，同样各组收入都是增长1%，但由于在权数上最上层1/5人口是最下层1/5人口的10倍多（即0.51:0.05），因此前者收入的绝对增量也是后者的10倍多。换句话说，如果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绝对量作为社会福利改善的标志，以每个人口组的收入份额表示的“福利价值”作为发展的标志，那么这意味着对于社会来说，20%最富人口的收入增长1%比20%最穷人口的收入增长1%重要10倍多。由此必然得出如下结论：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好途径，就是不顾穷人而使富人的收入增长率最大化，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证明不能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发展看作一回事。

### 8.3 设置社会福利的贫困加权指数

一种可替代简单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分配份额”指数）作为社会福利指数的办法，是设置“均等权数”甚或“贫困加权”的指数。后两种指数对于那些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的国家尤其有用。顾名思义，均等权数的指数权衡每个阶层的收入增长，不是按照该阶层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而是根据该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被平等对待。在把人口按收入划分为5个组的经济中，使用均等权数指数意味着给每个人口组的收入增长以0.2的权数。因此当最下层20%人口的收入增长了10%的时候，最上层20%人口以及中间各层人口的收入也将同样增加10%，尽管从收入增长的绝对量来看最下层人口所得比其上各层人口少得多。

用均等权数的指数来说明我们的例子，当最上层两组人口（占总人口的2/5）的收入增长10%的时候，假定其他三组人口的收入保持不变，则有：

$$G = 0.20g_1 + 0.20g_2 + 0.20g_3 + 0.20g_4 + 0.20g_5 \quad (4)$$

乘进各组的收入增长率后为：

$$G = 0.20 (0) + 0.20 (0) + 0.20 (0) \\ + 0.20 (0.10) + 0.20 (0.10) = 0.04$$

社会福利只增加4%，而在使用分配份额或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指数时，同样情况下社会福利增加了7.3%。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在此仍然是增长了7.3%，但经过调整的福利发展指数只上升了4%。

最后，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完全真诚地希望改善40%最穷人口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必要设置一种贫穷加权的发展指数，以便让40%最穷人口享受发展的主要好处。这就是说，可以人为地设  $w_1$  的福利权数为0.60， $w_2$  为0.40，同时使  $w_3$ 、 $w_4$  和  $w_5$  的福利权数为零。运用同一例子，此时社会福利的增长指数为：

$$G = 0.60g_1 + 0.40g_2 + 0g_3 + 0g_4 + 0g_5 \quad (5)$$

当  $g_1 = g_2 = g_3 = 0$  和  $g_4 = g_5 = 0.10$  时，等式变为：

$$G = 0.60 (0) + 0.40 (0) + 0 (0) \\ + 0 (0.10) + 0 (0.10) = 0$$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3%，贫穷加权的指数则表明社会福利毫无改善（即没有发展）。

虽然对任何发展指数的福利权数的选择纯粹是人为的，但这确实反映了对社会目标和方向的价值判断所具有的重要性。假如可能的话，了解一下第三世界各国的不同发展战略所真正包含的福利权数，想必一定是有趣的。在此我们主要想说明的是，只要或明或暗地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衡量发展的成绩，这就意味着实际使用的是“财富加权”的指数。

为了使上述讨论结合具体现实来说明不同的加权增长指数在评价各国经济实绩中的作用，让我们分析一下表5.7所列科利尼和阿鲁瓦利亚搜集的资料。该表先后列出了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等权”指数和“贫穷加权”指数所衡量的14个国家的收

表5.7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国 家	时 期	I. 收入增长	
		最上层20%	中层40%
1 南朝鲜	1964—70	12.4	9.5
2 巴拿马	1960—69	8.8	9.2
3 墨西哥	1963—68	8.8	5.8
4 台 湾	1953—61	4.5	9.1
5 哥斯达黎加	1961—71	4.5	9.3
6 加拿大	1961—65	7.0	5.3
7 哥伦比亚	1964—70	5.2	7.9
8 萨尔瓦多	1961—69	3.5	9.5
9 菲律宾	1961—65	5.0	6.7
10 巴 西	1960—70	6.7	3.1
11 美 国	1960—66	5.6	5.2
12 芬 兰	1952—62	6.0	5.0
13 斯里兰卡	1963—70	3.1	6.3
14 南斯拉夫	1963—68	5.0	5.0
15 法 国	1956—62	5.6	4.5
16 秘 鲁	1961—71	3.9	6.7
17 印 度	1954—63	5.3	3.5

资料来源：阿鲁瓦利亚和钱纳里：《经济分析的概念结构》，见钱纳里等编：



最底层40%	11. 年福利增加		
	(A) 国民生产总值权数	(B) 均等权数	(C) 贫困加权
11.0	11.0	10.7	10.5
3.2	8.2	6.7	5.2
6.0	7.8	6.5	5.9
12.1	6.8	9.4	11.1
7.0	6.3	7.4	7.8
6.5	6.2	6.1	6.1
7.8	6.2	7.3	7.8
6.4	5.7	7.1	7.4
4.4	5.5	5.4	5.2
3.7	5.2	4.1	3.5
4.1	5.2	4.8	4.5
2.1	5.1	4.0	3.1
8.3	5.0	6.5	7.6
4.3	4.9	4.7	4.5
1.4	4.8	3.5	2.4
2.4	4.6	4.4	3.8
2.0	4.2	3.3	2.5

《增长的再分配：一种政策分析》，1973年版。

入增长率。表中所用贫穷加权指数的实际权数是按照下述比例分配的：最下层40%人口的权数为0.6，其次中层的40%人口为0.4，最上层20%的人口为0。从对表5.7的最末三栏的观察可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1.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对较高的一些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巴拿马，以“等权”和贫穷加权指数衡量的经济实绩则显然较差。因为这类国家在该时期都经历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财富集中的加剧。

2.在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和台湾，加权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显示了更好的发展实绩。毫无疑问，在这些地方该时期低收入阶层的相对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高收入阶层。

3.在南朝鲜、秘鲁、菲律宾和南斯拉夫，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很少变化，因此用各种指数测量的社会福利增长率差别不大。

由上可见，衡量经济增长对哪些人有利的一项简便方法，就是观察加权（包括“等权”和“贫穷加权”）福利指数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

最后，上述分析还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与其在迅速发展经济和争取更平等的分配中二者择一，不如在各个阶层的收入增长率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采用加权福利指数衡量经济的发展，那么使较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较高的经济发展相联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更为理想，至少根据社会平等观的价值判断来说是如此。

#### 8.4 将增长经济学同分配结合起来

以上对各种发展指数的反复比较和说明，大概已使我们理解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至少明确了一点，即，第三世界国家与其设法消除增长和分配之间的矛盾或改变整个收入分配

的模式，还不如采取措施直接改善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而不理解是什么决定了不同阶层的收入差别和收入增长的相对变化，是毫无用处的。不幸的是，经济理论对此很少有所帮助，因为经济学注重的是决定功能收入分配（即各生产要素所得的国民收入）的因素，而不重视研究决定收入的规模分配（谁得到了什么）的因素。传统的功能收入分配决定论关于收入如何按照各生产要素的功能进行分配的知识，并不能使我们理解收入为何和如何趋向于集中在某一阶层之手。为此我们必须了解各种能获得报酬的生产要素在不同阶层中是如何配置的。个人收入不仅来自其提供的劳动，而且也来自其对各种可赚钱的资产如土地和资本（在物质形态上和价值形态上）的控制。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主要来自后一方面。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存在收入高度不平等分配的真正原因，是生产性财产如土地和资本在各个阶层中极不均等的分配。这是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主要根源。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的资本以及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经济和政治权贵手里，使他们能够通过教育增加人力资本，从而控制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就像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类似的不平等也导致富国日益趋富，穷国则停滞不前。所以，任何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努力，不仅必须重视增加对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如通过增加就业提高劳动报酬），而且必须注重逐渐改变他们在社会中所占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比重。在经济增长中财产的再分配或许更能够增进分配的平等。这一结论直接导致了我们在下面在论述政策选择时所持的立场。

## § 9 政策选择的范围：一些基本考虑

发展中国家需要弄清如何最有效地实现其减少贫穷和收入分配过度不平等的目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在减少贫穷和

不平等的同时保持甚至加速经济的增长。由于在此着重考察的是如何改善总的收入规模分配，特别是提高据说占总人口40%的最下层的收入水平，因此重要的是，了解经济中决定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考察政府能够通过什么样的干预方式改变和修正这些因素的影响。

### 9.1 干预的领域

我们能够确定，政府的政策可能干预4个较为广阔的领域，这些领域是与发展中国家中决定收入分配的4个主要因素相联系着的。

1. 功能分配：即对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报酬，这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使用效率和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决定的。

2. 规模分配：只要了解生产资料和劳动技能在人口中的配置及其在一定时期的变化，就可以把一个经济中收入的功能分配转化为规模分配。因为个人收入的分配最终取决于财产占有和天赋技能。

3. 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稳定或减少社会上层的规模分配。这些税收增加了政府收入，并且将市场自发决定的个人收入水平，转换为经过财政校正的个人“可支配的”收入，即个人或家庭可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或用于储蓄的实际货币数量。

4. 通过税后公共支出直接地（如公开拨款）或间接地（如开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提供某些免费供给，对初级教育的补助）增加穷人的收入，以稳定或增加社会下层的规模分配。这些政策能够把穷人的实际收入提高到市场自发决定的收入水平之上。

### 9.2 政策选择

在上述4个领域中，有许多政策可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选

择。以下简要说明一下其中某些政策的性质<sup>⑩</sup>。

### **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政策，转换收入的功能分配**

这是一种传统的经济手段。对此有争议的是，作为制度局限和政策缺陷的结果，劳动的相对价格（基本上是工资率）往往高于市场供求自由决定的水平。比如常被引证为劳动价格“扭曲”的一个例子是，即使面对着大量的失业，工会仍然人为地将最低工资定在较高的水平（即高于供求自发决定的水平）。由此人们认为，降低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如通过降低国营部门的工资或给予雇主国营工资补贴），将使雇主在其生产中使用劳动替代资本，从而提高社会就业总水平，并且最终将提高穷人的收入，因为穷人通常唯一占有的是自己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人们也往往正确地指出，资本设备的价格在“制度上”被限制在人为较低的水平（即低于供求自发决定的水平），这是由下述社会政策所导致的，诸如刺激投资、减免纳税、利息补贴、过高汇率，以及对拖拉机和自动设备之类的资本品进口优惠等等。如果把这些特别优惠和补贴取消，使资本价格提高到真实“稀缺”的水平，生产者将会努力增加使用较为丰富的劳动资源和减少使用相对稀缺的资本。此外，资本的所有者（物质的或货币的）将不再得到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很高的人为经济报酬，从而他们的个人收入将会降低。

在任何经济中生产要素价格都起着最终信号和权力的作用，因此“纠正生产要素价格”（即降低劳动的相对价格和提高资本的相对价格），将不仅会增加生产和效率，而且由于为现存的失业或准失业的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也会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此外，还会降低资本所有者的人为的高收入。所以，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消除，将铲平通向美好前景的道路，更有效的经济增长，将会与较高的就业、较少的贫困和更大的平等一起到来。

本书第8章论述就业和选择“适宜”的生产技术时，我们还将更广泛地研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可以指出，传统的关于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讨论很富有价值，“纠正生产要素价格”将有助于减少贫穷和改善收入的分配。但实际效果如何将取决于：劳动相对价格降低和资本相对价格上升之后，厂商和农场愿意增加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法的程度，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在各国互不相同（详见第8章）。但分配状况会有所改善这是可以预料的。

**通过累进的财产所有权再分配，调整收入的规模分配** 对于给定的资源价格和每种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使用水平，我们能够估算出每种资产的总报酬。但为了把这种功能收入转换为个人收入，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财产的分配和所有权在总人口中的不同部分聚集的情况。在此我们或许已接触到一个经济中决定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因素。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个人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中财产所有权的极不平等和高度集中。在这些国家中，不到总人口20%的人之所以能得到50%以上的国民收入，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占有和控制了70%以上的生产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本和土地，但也包括表现为受过较好教育的形式的人力资本。当物质财产的所有权和教育仍然被高度垄断的时候，纠正要素价格既不足以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不可能消除广泛的贫穷现象。

因此，减少贫穷和不平等的第二项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政策，是注重直接削弱财产控制的集中程度、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受教育和谋生机会的不平等这些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的特征。这种再分配的古典手段，是针对农村中占人口70—80%的穷人，实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使佃耕者转变为小土地所有者，以促进他们努力提高生产和增加收入。但正如我们将在第10章读

到的，土地改革可能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脆弱的手段，因为经济体制中其它的制度弊病和价格扭曲，会阻碍小农场主获得他们所必需的下述生产投入：贷款、化肥、良种、市场设施和农业教育。

除此之外，“动态的”再分配政策可能将逐渐受到重视。比如，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可以把一定比例的年储蓄和投资转移给低收入阶层，以便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可以带来较平缓的和政治上更可接受的对财产增量的再分配。这往往也就是“增长的再分配”一词的含义。尽管这种从增长中进行的渐进再分配是否比对现存资产的再分配更为可行仍然是一个疑问，尤其是在权力分配极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但某种形式的财产再分配，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对于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大量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来说，看来都是一项必要的条件。

以教育和技能的形式表现的人力资本，是生产性财产所有权不平等分配的一个方面。对此社会政策应该为更多的人创造较广泛的受教育机会，以增强他们的谋生能力。但正如土地改革的情形，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并不能够确保穷人好起来，除非具备一系列配套的政策，例如为受教育者提供更多的生产性就业机会，才能使这些增加的人力资本得到利用。关于教育、就业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本书第11章将进一步讨论。

**通过累进收入和财产税，调整（减少）上层收入的规模分配**  
凡是着眼于改善最下层40%人口的生活水平的国家政策，必须确保有充足的财源才能把纸面上的计划转为现实。增加财源的主要途径，是对收入和财产两者实行直接的和累进的征税。直接的累进收入所得税是对个人和公司的收入课征，富人为此所负担的税率高于穷人，财产（即积累的资产和收入的证券）税一般针对个人和公司的财产，但有的包括累进的遗产税。无论上述哪种税，税负大多数落在高收入阶层身上。

不幸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对各

阶层应该征收的累进税与实际缴纳的税额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纸面上的累进税制在现实中往往相反，这就是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的赋税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比高收入阶层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穷人的收入来源和消费支出通常易于课税，如从其工资中截取所得税，按人头征税，或通过对香烟、啤酒之类的商品附加销售税间接地征收。另一方面，富人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物质和货币资产的报酬，对此他们往往匿而不报。同时他们也有权力和办法逃漏税而不必害怕政府的惩罚。因此，切实贯彻收入和财产的直接累进税，尤其对最高收入的阶层要严格执行，这是再分配政策中最迫切的任务（参见第16章有关发展的税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通过直接的转移支付及对商品和劳务的国家分配政策，调整（增加）下层收入的规模分配** 把征税后用于社会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直接分配给那些最穷的人，可能是消除贫困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政策手段。例如，发展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公共医疗设施，为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为幼儿园的儿童提供营养补贴，向偏僻的乡村供应清洁水和电力，等等。此外，对城乡穷人直接给予货币和食物补贴，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保持基本生活品价格低廉，也都是国家消费补贴的形式。所有上述政策，都有助于提高穷人的实际个人收入水平，使之高于其从市场的自然所得。

### 9.3 摘要和结论：需要配套的政策

从本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长、贫穷和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解决上述问题仅靠一、两项孤立的政策不行，而需要“成套”的互补政策，包括如下三个基本方面：

1. 制定一项或一套纠正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政策，以确保市场或制度规定的价格能为生产者和资源供应者提供准确的（即经过社会校正的）信号和刺激。纠正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助于提高



生产效率、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与此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可能还在于鼓励自力更生的技术研究和有效地发展、鼓励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法（见第8章）。

2. 制定一项或一套促使财产、权力、教育机会和谋生机会的分配最终发生结构性变化的长远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属于狭义的经济学之外，涉及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的、体制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结构。如果不实行这些激进的结构变化和财产再分配，无论眼前取得的成就（如通过流行的革新）或一段时间后的逐渐变化（通过政治手段）如何，要想根本改善城乡劳苦大众的生活条件，将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的。

3. 制定一项或一套修正收入规模分配的政策措施。具体的有如：对富人实行法律强制的收入和财产的累进所得税，对穷人采取直接救济以及增加由政府提供的消费品和劳务。

#### 9.4 最后的问题

我们认为，上述整套政策将为所有与贫困和不平等作斗争的国家，提供一套完整的参考计划。但对于这一整套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的政策，人们最后还是有必要考虑一个远非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依赖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政府贷款、私人投资、技术和商品进口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依赖于发达国家的价值、信号、理想、观点和惯例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是否能够积极地采取增加平等和减少贫困的政策？换句话问，在保持平等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能否在与世隔绝的国家（如中国）实现？或许不是这样，而是在仍然积极参与尽管高度不平等但相互依赖性却与日俱增的全球经济秩序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成为自力更生掌握自己经济和社会命运的主人吗？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和每个肯思考的人都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在本书的结论一章中，我们将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并给予一些可能的答案。

## 注 释

① 马哈布·乌尔哈克：《1970年代的就业和收入分配：一项新观察》，见《发展文摘》1971年10月号第7页。

② 以美国统计学家C.洛伦茨的名字命名。他在1905年发明了这一简便的图式，用以说明各阶层人口与他们相对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

③ 关于完全平等的一项更为精确的定义，会考虑到人口中的年龄结构和在各家庭的“生命周期”中预期收入的变化。M.帕格林：《不平等的趋势和计量：一项基本修正》，见《美国经济评论》1975年9月。

④ 每个工人的“边际”产品的总和必然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后者将以国民收入的形式进行分配。从数学上看，总产品不过是 $0$ 和 $L$ 之间边际产品曲线的积分，这是因为边际产品函数是总产品曲线的导数。即： $TP=f(L, \bar{K})$ ； $MPL=f'(L)$ 。

⑤ M.S.阿鲁瓦利亚、N.卡特和H.钱纳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贫穷》，见《发展经济学》杂志1979年9月第6集第306页。

⑥ 对于贫困问题的性质和范围的进一步分析，可参见世界银行报告：《贫困、增长与人力资源的发展》，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8。

⑦ 图5.6在考察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时，注明了库兹涅茨假设着重在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并非库兹涅茨假设本身的一项严格检验。参见钱纳里的文章：《贫困与进步》，《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9。

⑧ I.阿德曼和C.T.莫利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平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⑨ 同上，第186页。尽管有些资料相互矛盾，但加里·菲尔兹的下述文章还是反映了巴西的情况：《谁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对1960年代巴西经济成长的重新考察》，见《美国经济评论》1977年9月第67卷。

⑩ 论述这一问题的最早和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是沃尔特·盖伦逊和哈维·利伯斯坦因写的：《投资详估、生产率和经济发展》，见《经济学季刊》1955年8月第343—370页。

⑪ 最经常被用于评判这种争论的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式，在附录5.1作

了简要的介绍。

⑫ 另一种意见根据台湾和南朝鲜的经验，反对发展必然与平等相矛盾的观点，参见古斯塔夫·拉尼斯：《发展与收入的再分配，一些反证》，见《挑战》杂志1977年9—10月号。

⑬ 例如，参见联合国关于储蓄来源的各项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显示小农和个人似乎属于储蓄最多者。也可参见古斯塔夫·拉尼斯：《投资评估、生产率和经济发展：一项经验的评论》，见《经济学季刊》1962年5月；K.L.格普达：《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储蓄：进一步的证明》，《经济纪录》1970年6月。

⑭ 经验证实关于农村的储蓄和投资的这一讨论，参见基恩·格里芬：《农村发展：政策的选择》，见E.O.爱德华兹编：《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74年版，第190—191页。

⑮ 对1960—1973年期间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解释进行的最近的经验研究，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计量的证明。一般说来，改善分配和减少贫穷的政策会刺激增长而非阻碍增长，参见诺曼·L.希克斯：《增长与基本需要：是否二者择一？》，见《世界发展（1979）》，第985—994页；复印件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10。

⑯ 这一说明引自阿鲁瓦利亚和钱纳里：《经济分析的概念结构》，见钱纳里、杜诺依著：《增长的再分配：一项政策手段》，华盛顿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73年版，第2—4页。

⑰ 关于政策选择的更详细介绍可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11，由小查尔斯·R.富兰克所写的文章，理查德·威伯定名为《不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和政策选择》。

## 概念复习

奢侈品与必需品 (Luxury versus necessity goods)

消费者需求和收入分配 (consumer demand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的“规模”分配 (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收入的“功能”分配 (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5等分制和10等分制 (quintiles and deciles)  
高度扭曲的收入分配 (highly skewe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收入不平等 (income inequality)  
洛伦茨曲线 (Lorenz curve)  
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绝对贫困 (absolute poverty)  
“散点”图 ( “scatter” diagram)  
经济增长的“性质” ( “character” of economic growth)  
“利益扩散”的发展理论 ( “trickle down” theory of development)  
福利指数 (welfare index)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数 (GNP growth rate index)  
“均权”指数 (equal—weights index)  
贫穷加权指数 (poverty—weighted index)  
财产所有权 (asset ownership)  
生产要素价格扭曲 (factor—price distortions)  
再分配政策 (redistribution policies)  
累进的收入和财产税 (progressive income and wealth taxes)  
累退税 (regressive tax)  
间接税 (indirect tax)  
补贴 (subsidy)  
“配套”政策 ( “package” of policies)

## 问题讨论

1. 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现在看来都同意，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不能充分准确地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他们论证的根据是

什么？请举例说明。

2. 区分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规模”和“功能”分配。你认为哪一个概念更为适当？请解释。

3. “绝对”贫困的涵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对第三世界国家绝对贫困的衡量？

4. 什么是贫穷人口的主要经济特征？这些特征启示我们制定注重贫困的发展战略时要把握什么？

5. 从本章所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可见，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绝对贫困的范围和分配平等的程度，并没有正或负的必然联系。假定这些资料的确属实，这对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和制度结构具有什么重要性？

6. 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之间有什么关系？举例说明如何运用它们衡量一国收入分配的平等或不平等。

7. 本章断言决定一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是该国生产性和有酬性资产的分配状况。请举不同的生产性和有酬性资产为例来说明这个观点。

8. 经济（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与较平等的个人收入分配这两个目标必然矛盾吗？请简述支持和反对这个观点的论据，并说明自己的看法。

9. 据说国民生产总值是有片面性的衡量社会发展和经济福利的指标，请解释这一观点的涵义，并用假设或真实的事例说明。

10. 设置等权的、尤其是贫穷加权的社会福利指数有何作用？这些福利指数在什么条件下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同？请解释你的答案。

11. 据说经济增长是消除绝对贫困和减少不平等的“必要的但非充分的条件”，理由何在？

12. 简述不发达国家政府改变和修正其国民收入规模分配的主要的政策选择范围。你认为哪些政策是绝对必需的？哪些是重要但非关键的？解释你的答案。

## 附录5.1

### 生产要素报酬、储蓄与经济增长：数学图解

本章所述收入不平等最有益于储蓄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通常是以标准的新古典（即不同生产要素的比例）增长模式来证明的。假设总生产函数为

$$Y = f(K, L, t) \quad (\text{A5.1})$$

式中K代表资本货物，L是劳动力，t表示技术变化的趋势。假定技术进步是一个常数，生产函数（A5.1）可重写为

$$Y = A(t) f(K, L) \quad (\text{A5.2})$$

设常数A(t)为每年1.06。最后假定生产函数是线性齐次的，以致

$$\alpha Y = A(t) (\alpha K, \alpha L)$$

设  $\alpha = \frac{1}{L}$ ，那么则有

$$\frac{Y}{L} = A(t) f\left(\frac{k}{L}, 1\right) = A(t) f\left(\frac{K}{L} \textcircled{\text{O}}\right) \quad (\text{A5.3})$$

运用公式（A5.3），可以在图上描绘出每个工人的产量（Y/L）与由此推算出的每单位资本的产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变化和资本劳动比率（K/L）的变化。也可用于描述在储蓄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功能分配的份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详见图A5.1。

在图A5.1中，右上象限是既定技术水平下的生产函数（A5.3）；技术变化使这一函数向上移动。我们指定原点以下的Y轴表示劳动的投入量，面积OQRS为所使用的资本货物量（OS · RS = K/L · L = K）。与此相似，原点左边的X轴表示劳动的投入量（OST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左上象限的OAZT的总面积为实际产量（OT · OA = L · Y / L = 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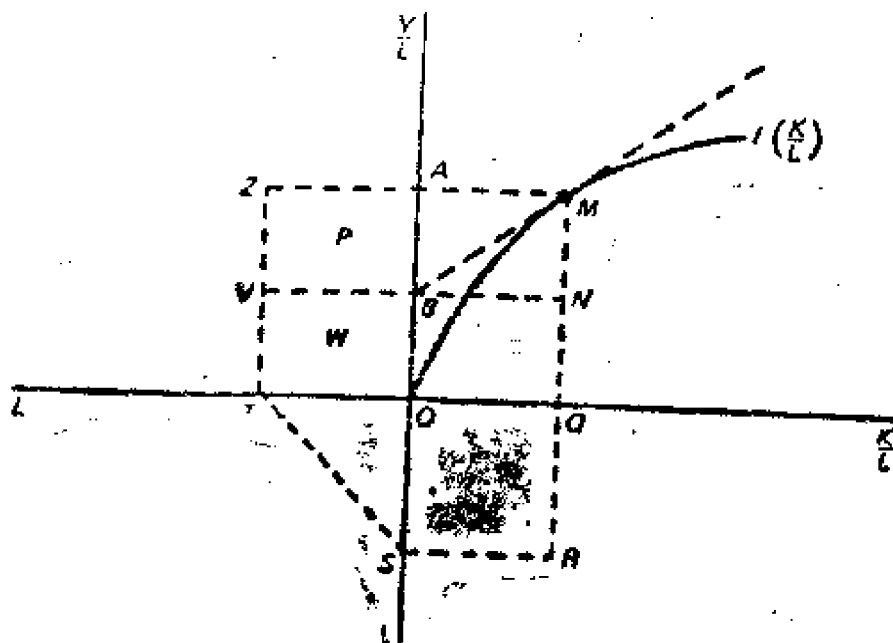


图 A5.1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现在我们以  $P$  表示“利润”，或国民总产品中分给资本的报酬份额，以  $W$  表示国民总产品中劳动所得的份额，则

$$\begin{aligned} \frac{P}{K} &= \frac{Y - W}{K} = \frac{Y/L - W/L}{K/L} \\ &= \frac{f(K/L) - W/L}{K/L} \end{aligned} \quad (\text{A5.4})$$

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生产者会采用每单位资本能获得最大利润 ( $P/K$ ) 时的资本劳动比率 ( $K/L$ )。这即假设生产者在某一时期内会追求“商业储蓄”和“再投资”的最大化，在这整个时期不断增加潜在的产量，使资源在该（不确定）时期的终点移向生产消费品并在该点使消费达到最大化。这就是以“大推进”为名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实质。盖伦逊和利伯斯坦因等人发展了这一理论。<sup>③</sup>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理论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将上式 (A5.4) 的左端 ( $P/K$ ) 对 ( $K/L$ ) 微分，并设该式等于 0，则有

$$\frac{d(P/K)}{d(K/L)} = \frac{(K/L) \cdot f'(K/L) - f(K/L)}{(K/L)^2} + \frac{W/L}{(K/L)^2} = 0 \quad (\text{A5.5})$$

或

$$\begin{aligned} f(K/L) &= Y/L & (\text{A5.6}) \\ &= (K/L) \cdot f'(K/L) + W/L \end{aligned}$$

式中  $f'(K/L)$  是函数  $f(K/L)$  的导数。但由于

$$(Y/L) - (W/L) = (P/L), \text{ 则由} \quad (\text{A5.6})$$

式  $(P/L) = (K/L) \cdot f'(K/L)$ , 在图A5.1中  $AB = MN$  必然等于  $(P/L)$ ; 生产函数在M点的切线方程为

$f'(K/L) = (P/L) \div (K/L) = (P/K)$ 。根据定义, 如果距离  $AB$  是  $(P/L)$ , 距离  $OB$  必定是  $(W/L)$ 。因此, 该切线与  $Y$  轴的交点, 能够表示工资领取者所得的相对收入份额即  $BA/OA$ 。

由上可见, 生产要素的报酬率及劳动与资本所得的相对和绝对的国民收入份额, 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如果后两者平衡增长, 报酬率和相对收入份额将不变, 绝对份额则增加; 如果劳动的增加快于资本货物的增加以致  $(K/L)$  下降, 对劳动的报酬率会下降, 但对资本的报酬率可能上升或下降。假如  $(W/L) / (P/K)$  不变 (即相对于  $MN/BN$  的距离  $OB$  不变), 则使生产函数向上移动的技术变化也将保持“中性”。

要使  $f'(K/L) = P/K$  在任一时点最大, 意味着使  $BM$  的斜率最大, 这在图5.1就是使  $B$  点重合于  $O$  点, 在此劳动所得的绝对份额 ( $OBVT$  或面积  $W$ ) 是零! 当然, 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意识到这是荒谬的, 显然必须付予工人至少能够维持生存的工资。但他们认为工资必须维持在这一水平, 以便在此限制条件下让  $P/K$  最大化, 在某一时期内使储蓄最大化并从而在将来某一 (未指定的) 点时消费能够增加。③



## 注 释

① 引自罗伯特·索洛：《技术进步和总生产函数》，见《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1957年8月第312—320页。

② 盖伦逊和哈维·利伯斯坦因，见前引书（本章末注释第7条），例如作者们建议：“在当前条件下成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尽可能多地引进现代技术为转移”，因此需要的是“最新式的设备和初期较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第370页）。

③ 参见本章“增长与收入分配”一节对这种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批评。

## 第6章 人口问题争论

世界如何正确解决人口不断膨胀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理事詹姆斯·格兰特

今天各国政府和人民影响未来人口的做法如何，将会为顺利进入下一世纪的发展战略创造条件。

世界银行行长A.W.克劳森

### § 1 数字与争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人口估计已接近49亿。联合国的乐观预测表明，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61亿多。其中，有4/5以上的人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该预测成为现实，那么，对于生活水平，国家和个人的尊严以及选择的自由，即对“发展”来说，其经济的和社会的含义将会是什么？这种预测的结局无法避免吗？或者，它将根据第三世界的发展尝试的成败来确定吗？最后，更重要的是：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否象许多发达国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如此严重的问题；或者象其它一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所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不发达基本问题的一个现象，是富国与穷国之间不平等地利用全球资源的一个表现形式？

这些问题和其它一些问题正是当今世界在有关世界人口增长与人类福利问题上的兴趣焦点和争论的核心。1974年8月，在布

加勒斯特举行的第一届世界人口会议上，这场争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已表现得十分明确并被一再重申，虽然1984年8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人口会议上，上述调子有所降低。因此，本章的前半部分试图既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国内问题出发，又从世界角度出发分析人口争论的性质和来龙去脉。在第7章，我们将更仔细地考察人口经济学并认真检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共同努力解决全球性人口问题时可能采取的各种政策。

## § 2 基本问题：人口增长与生活质量

世界人口现在已接近50亿，但每年还在继续增加8 000万人，其中7 000多万人是出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人口增长并不单纯是一个数字问题。正如第3章已经明确过的，它是一个有关人类福利与发展的问题。人口的迅速增长会给整个人类的福利带来潜在的严重后果。如果发展承担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收入、健康、教育和一般福利——的改善，而且还包括他们的自尊、尊重、尊严和选择自由的话，那么，有关人口增长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现在的人口状况将会对发展目标的实现有什么影响？这一点不仅关系到这一代人，而且关系到未来的几代人。反过来，发展又如何影响人口的增长呢？

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的一些主要问题如下：

1. 在当前的和将来的人口增长水平下，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口的迅速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会使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包括住房、交通、卫生和安全等更为困难？
2. 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妥善解决未来几十年里劳动力的激增问题？就业机会是否会很充足？或者，仅仅抑制住失业水

平的上升就是一个主要成就吗？

3. 世界穷国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对人类摆脱绝对贫困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世界的食物供给和分配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不仅满足预期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且还能够提高人们的营养水平，使每个人都获得充足的食物？
4. 如果未来的人口增长率已定，发展中国家是否能扩大保险范围，提高卫生和教育系统的质量，以便使每个人至少都有机会充分享受卫生保健服务和接受基础教育？
5. 低生活水平在多大程度上是限制父母自由选择理想家庭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贫穷与家庭规模之间有无联系？
6. 经济上较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穷国解决其日益增长人口食宿问题的重要因素？富人对财富贪得无厌的追求，对于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准来说，是不是一个比绝对增加穷人数量更有害的力量？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构成人口问题实质性的东西并不单纯是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口的增长率或人口的运动，而是象人口研究局前任局长伯纳德·贝雷尔森经过深思熟虑后指出的：

……人类的生活质量：用繁荣代替贫穷，教育代替愚昧，健康代替疾病和死亡，环境优美代替环境恶化，为后代儿童创造充足的发展机会以打破我们现有的局限。……人口趋势如果对我们有利的话，可以给予人们选择自由，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因此，人口政策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使生活过得更美好的手段。这就是人口问题所要考虑或者必须考虑的内容。①

## 从历史数字看人口增长的 过去、现在和将来<sup>②</sup>

### 3.1 从历史看世界人口的增长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已有200万年的历史了，其中大部分时间地球上的人的数量少得可怜。大约在1.2万年以前，当人类最先开始通过农业获取食物时，世界上的人口数量估计还没有超过500万，比今天居住在墨西哥城、拉各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曼谷的人口还少（见表6.1）。2000年前纪元开始时，世界人口增加到2.5亿，还不到今天中国人口的1/4。而从公元元年到产业

表6.1 世界人口增长的历史过程

年 代	人口 (估计数)	各个时期年平均增长率 (估计数)
约公元前10 000年	5 000 000	
公元元年	250 000 000	0.04
公元1650年	545 000 000	0.04
公元1750年	728 000 000	0.29
公元1800年	906 000 000	0.45
公元1850年	1 171 000 000	0.53
公元1900年	1 608 000 000	0.65
公元1950年	2 486 000 000	0.91
公元1970年	3 632 000 000	2.09
公元1985年	4 890 000 000	1.7

资料来源：W. S. 汤普森和 D. T. 刘易斯：《人口问题》，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65年第5版，第384页

联合国：《1971年人口统计年鉴》；

人口调查局：《1984年世界人口资料表》。

革命开始时的1750年左右，世界人口成倍地增长。达到7.28亿，只少于今天印度的人口数。在其后200年间（1750—1950年），世界人口总数又增加了17亿。仅仅在最近35年里（1950—1985年），世界人口几乎又翻了一番，在1985年初达到49亿。如果这种增长势头持续到2000年的话，世界人口将增加到62亿。

现在，我们的分析从人口增长的绝对量转到人口增长的相对量（百分率）上来。从表6.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近300年以前的人类历史中，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比零大不了多少（即0.002%或 $20^0/00000$ ）。当然，由于大的自然灾害和区域性人口增长率的变动，这种增长率总的水平并不稳定，世界人口数量变化起伏不定。到了1750年，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了150倍，由每年的0.002%提高到0.3%。进入20世纪50年代，人口增长率再次加速上升，以3倍的速度迅速提高到每年增长1.0%。今天，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上升幅度要低于前30年，但它几乎又一次成倍增长，达到年平均1.7%的水平。<sup>③</sup>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和倍增时间的关系在表6.2的最后一列中得到了说明。我们可以看到，在1650年以前，世界人口的倍增，要经历将近3.5万年或近1400代人的时间；而在今天，在不到45年或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人口就实现了倍增。<sup>④</sup>还有，从公元元年和产业革命开始期间，世界要增加4.8亿人口，需花费1750年的时间；而在目前的增长率条件下，增加同样数目的人口，只需要6年。

总人口趋势急剧变化的原因是，在几乎全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人口比率的变化不管是提高还是降低，都要受到饥荒、疾病、营养不良、瘟疫和战争的强烈影响——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波动起伏的高死亡率。今天，在20世纪这些因素正日益受到技术手段和经济手段的控制，其结果是现在的人口死亡率低于其它任何历史时期。特别是最近30年，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

表6.2

历史回顾:世界人口增长率和倍增时间

时 期	近似增长率 (%)	倍增时间 (年)
人类早期	0.002	35000
1650—1750年	0.3	240
1850—1900年	0.6	115
1930—1940年	1.0	70
现在 (80年代)	1.7	43

资料来源: W.S. 汤普森和D.T. 刘易斯, 《人口问题》。

现代卫生保健事业在全世界的扩展, 使得死亡率下降, 从而引起了世界人口前所未有的增加——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尤其是如此。例如,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死亡率在最近的20—30年里下降了50%, 而这些地区的出生率只是在最近才开始降低。

总之, 今天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人口发展已经从一个以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为特征的漫长历史阶段迅速地过渡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 死亡率急剧地下降, 而出生率,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 才刚刚开始从他们历史的高水平上降低。

### 3.2 世界人口结构

**地理区域** 世界人口受地理区域, 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以及年龄结构的影响, 分布极不平衡。1985年, 世界人口有3/4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不足1/4生活在经济发达国家。图6.1说明的是1984年世界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对2000年世界人口分布的预测。

假使目前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率已定, 实际上欠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率要高得多, 那么, 到2000年, 世界人口的地区分布必然会发生变化。到那时, 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很可能比1950年多近40亿, 比1980年多18亿。这些新增人口将有60%分布在亚洲。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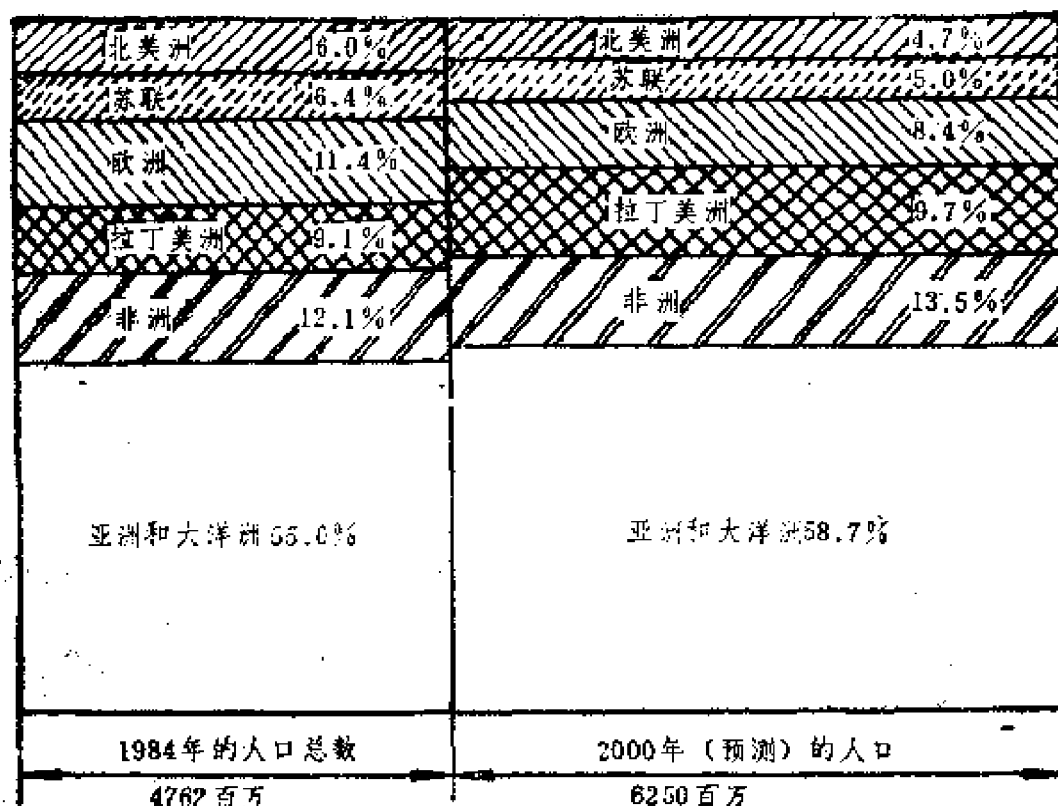


图6.1 1984年和2000年(预测)的世界人口地区分布状况

资料来源：人口调查局，《1984年世界人口年鉴》。

1950年算起，这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将扩大300%。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随着近10亿人口的增加，它们的人口总量也将相应地增大400%。到2000年，第三世界三个大陆的人口总数将占世界人口的80%以上，而在1950年是70%，1980年为76%。与此相对应，欧洲、苏联和北美洲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从30%跌落到不及20%。

最后，我们要考察人口的国家分布。表6.3列举了1984年15个人口大国的情况，它们的人口总和占到世界人口的近70%。虽然这些国家属于所有的大陆，既有发达地区的，也有不发达地区的，但有意义的是从人口年增长量的角度来考察它们。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与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每年增加到世界上的人口数量要超过后者。例如，排列在第10位的尼日利亚每年人口增长



的绝对量要两倍于排在第4位的美国。同样，排在第6位的巴西，它每年的新增人口大于排在第3位的苏联。

表6.3 1984年15个人口大国的年人口增长情况

国 家	1984年 人口总数(百万)	1984年 自然增长率(%)	年净增人口(百万)
中 国	1034.5	1.3	13.45
印 度	740.4	2.0	14.92
苏 联	274.0	1.0	2.70
美 国	236.3	0.7	1.65
印度尼西亚	161.6	2.1	3.39
巴 西	134.4	2.3	3.09
日 本	119.9	0.7	0.70
孟加拉国	99.6	3.1	3.09
巴基斯坦	97.3	2.8	2.72
尼日利亚	88.1	3.2	2.82
墨 西 哥	71.7	2.6	2.02
联邦德国	68.4	-0.2	-0.12
越 南	5.3	2.3	1.34
意 大 利	56.0	0.2	0.13
英 国	5.5	0.1	0.05

资料来源：人口调局：《1984年世界人口年鉴》。

**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趋势** 人口增长速度是一个定量指标，它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国际间净迁移所引起人口的规模年增长（或年减少）的净比率。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出生抵消死亡后的增长，用专门的术语说，它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差额。今天，虽然国际间的净迁移的增大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因素，但其数量却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它曾是北美、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人口增加的非常重要的来源，同时也是西欧人口相应减少的重要根源)。所以，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增加几乎完全取决于本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差额。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的差别可以用这样的事实简单地予以说明，即，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生育率）总是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世界国家的死亡率也高于发达国家。可是，两个世界死亡率的差额实际小于它们出生率的差额。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现在已接近2.1%（不算中国是2.4%），而经济发达国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只有0.4—0.7%。图6.2展示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现状及未来的趋势。从中可以注意到，7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的总水平达到了2.35%的顶峰，现在它正处于缓慢的下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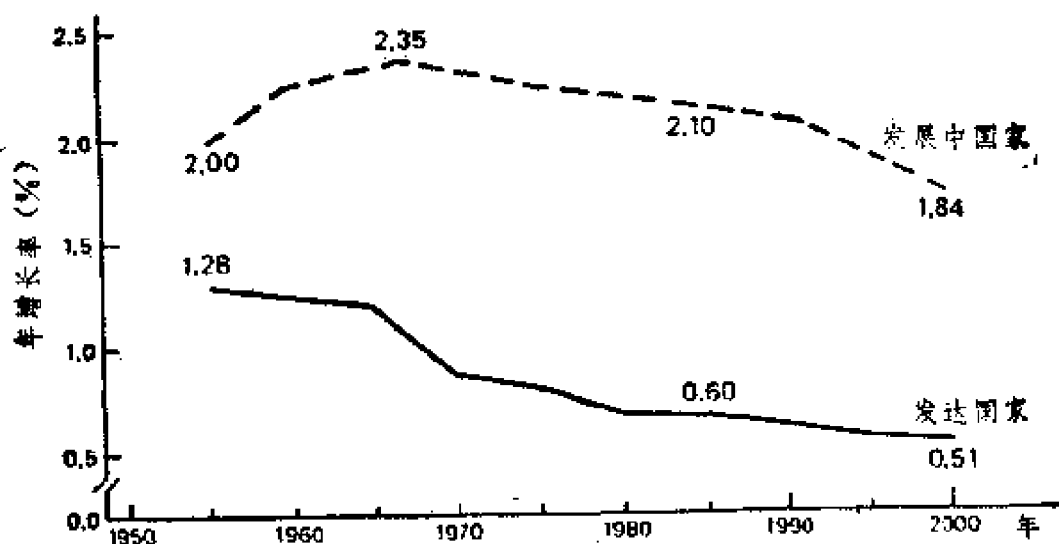


图6.2 1950—2000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

正如我们的分析所指出的，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之间人口增长率的差别主要来源于前者和后者之间出生率的巨大差别。重温第2章，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生率都在30%—50%之间徘徊，而与此相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出生率

都低于20%（见表2.3）。此外，欠发达国家今天的出生率实际已高于产业革命前西欧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早婚和几乎普遍结婚。但是，现在欠发达国家实际的生育率已开始出现降低的迹象，特别是在象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这些经济和社会已经迅速发展的地区。表6.4记录了第三世界国家目前出生率下降的情况和对本世纪末出生率下降的预测。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近期出生率的下降只是对东亚和南亚情况的描述，而在非洲现存的高出生率预计至少要持续到90年代。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死亡率的差距已经在缩小，其主要原因无疑是整个第三世界卫生条件的迅速改善。疟疾的防治，天花、黄热病和霍乱的现代接种运动，公共卫生设施的普及，水源的净化，营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教育服务，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了死亡率的下降。在过去的25年里，亚洲部分地区和拉丁美洲的死亡率下降了50%，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死亡

表6.4 1950—2000年的人口（粗）出生率（‰）

	1950—55	1960—65	1970—75	1980—85	1990—95	1995—2000
世界	35.6	34.0	30.3	28.1	25.4	23.8
发达国家	22.7	20.3	16.7	15.9	15.2	14.9
发展中国家	41.8	40.0	35.5	32.1	28.3	26.2
非洲	48.1	47.6	46.1	45.0	40.1	36.9
中东	47.9	48.0	46.3	44.2	40.0	36.9
拉丁美洲	41.4	39.9	36.9	34.4	31.3	29.6
中国	39.8	33.8	26.0	20.1	18.0	17.4
东亚	36.6	38.3	30.1	26.1	22.4	20.3
南亚	43.2	44.1	40.5	36.9	31.0	27.8

资料来源：联合国，《1950—2000年的世界人口趋势和前景》，纽约联合国1979年版，表2-A和2-B。

率降低了30%多。尽管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要比发展中国家多20年，然而在最近25年间，这个差距已在急剧缩小。例如，1950年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是35—40岁，发达国家的平均期望寿命是62—65岁。1980年，由于不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提高到56岁（提高了42%），而工业国家的期望寿命只提高到72岁（提高了13%），所以，两个世界期望寿命的差额就锐减为16岁。今天，因为依然存在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非洲成为世界上人口期望寿命最短的地区，它仅有49岁。与此同时，欧洲则是世界人口期望寿命最长的地区。在哪里，现在平均期望寿命已接近73岁。表6.5说明了1950—1980年第三世界死亡率急剧下降的情况。

**年龄结构和抚养负担** 今天，世界人口非常年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15岁以下的儿童几乎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一半，占发达国家人口的1/4。例如，1983年，尼日利亚人口的48%和肯尼亚人口的50%都小于15岁。与此可比较的数字有：墨西哥的44%、叙利亚的48%、巴基斯坦的45%和印度的39%。在这样一种年龄结构的国家里，抚养率——即（小于15岁）年幼人口与（15—64岁）经济上的就业成年人口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负担儿童的数量几乎是发达国家的2倍。例如，在瑞典和苏联，劳动力年龄组（15—64岁）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65%，他们只需要分别负担21%和27%未成年人口的抚养。相反，在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加纳这样的国家里，实际的劳动力和被抚养的儿童各占总人口的近50%。一般地说来，人口增长率越高，总人口中被抚养的儿童数就会越多，劳动者为非劳动者提供的抚养就越困难。

### 3.3 出生率：出生率同收入水平、GNP增长率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高出生率一般是与一国的贫穷相联系的。可是，由于高出生率通常是与国民平均低收入联系在一起

表6.5 1950—2000年的人口(粗)死亡率(‰)

	1950—55	1960—65	1970—75	1980—85	1990—95	1995—2000
世界	18.3	14.4	12.0	10.6	9.2	8.7
发达国家	10.1	9.6	9.2	9.7	10.1	10.1
发展中国家	22.2	16.8	13.2	10.9	9.0	8.3
非洲	26.9	22.4	18.8	15.4	12.0	10.6
中东	25.3	20.9	16.6	13.4	10.4	9.2
拉丁美洲	14.5	11.5	9.3	7.7	6.5	6.0
中国	20.1	13.6	9.4	8.3	7.8	7.7
东非	30.0	11.8	8.7	7.4	6.7	6.6
东南亚	24.6	19.8	15.8	12.5	9.9	8.8

资料来源：联合国：《1950—2000年的世界人口趋势和前景》，表2-A和2-B。

(欠发达国家)，而低出生率一般又是建立在国民平均高收入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然而，由此就推论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导致出生率的降低，这样的一种认识是错误的。

请看例证。表6.6列举的是12个第三世界国家1981年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1960—1981年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和收入分配率(20%高层人口的收入与40%低层人口收入相比的倍数)以及它们的出生率。

图6.3的3个图形描述的是3个主要收入变量的每一变量与出生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或非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表6.6中已经得到了说明。在图6.3(a)中，相对于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勾画出它的出生率，用它来检验这样一种假设：在出生率和国民平均收入之间接近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在图6.3(b)中，也可以相对于一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描绘出它的出生率，来看看较快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与较低的生育水平密切相关。最后，在图6.3(c)中，描绘出出生率，把它与收入分配率对比，看一看较低的收

表6.6 12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收入  
增长率、收入分配与出生率的关系

	1981年的 出生率(%)	1981年的 人均国民总 产值(美元)	1960—1981 年人均国 民总产值增 长率(%)	1960—1981 年粗出生 率的变化率 (%)	20%高层人 口收入与40 %低层人口 收入相比的 收入分配率
巴 西	30	2 220	5.1	-28.6	9.5
哥伦比亚	29	1 380	3.2	-32.2	6.8
哥斯达黎加	30	1 430	3.0	-36.5	4.6
印 度	35	260	1.4	-18.8	3.1
墨西哥	36	2 250	3.8	-20.6	5.0
秘 鲁	36	1 170	1.0	-20.2	8.7
菲律宾	34	790	2.8	-27.4	3.8
塞内加尔	48	430	-0.3	0.1	6.4
南朝鲜	24	1 700	6.9	-43.7	2.7
斯里兰卡	27	300	2.5	-24.3	2.3
台 湾*	21	1 170	6.2	-41.3	3.8
泰 国	30	770	4.6	-32.1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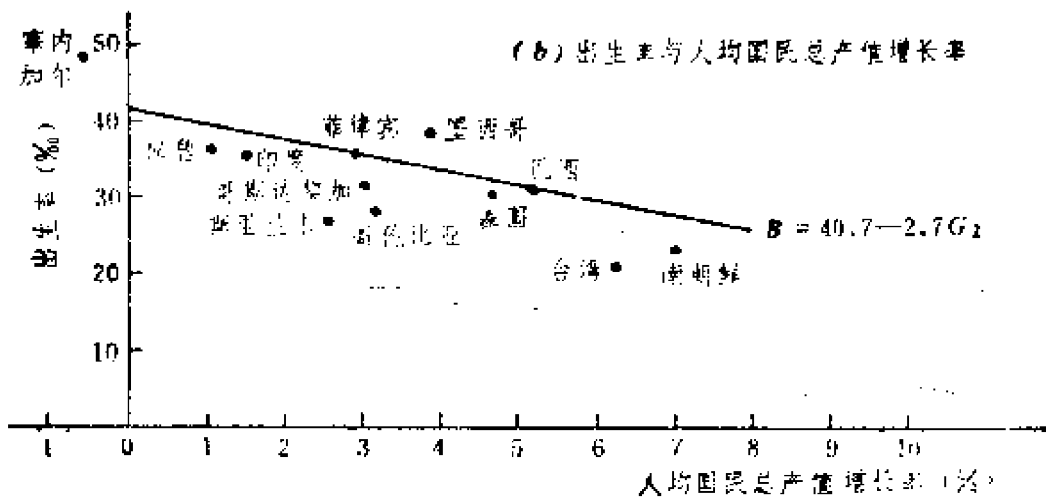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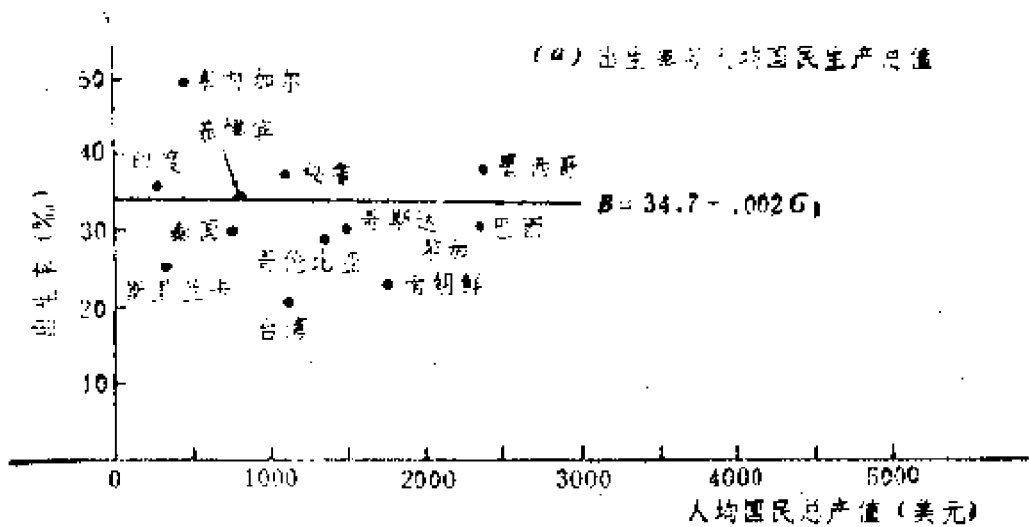
\* 台湾是1977年的数字。

资料来源：《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附录表1，表20和表27。

入分配率(即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是不是与较低的出生率相联系。

从图6.3 (a) 中,我们马上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水平和出生率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和相反的关系,至少在我们考察的12个国家里是如此。菲律宾、印度、秘鲁和墨西哥这些国家出生率都比较高,人均收入水平却差别很大。同样,象斯里兰卡、南朝鲜,和台湾出生率较低,他们的人均收入却从300美元到1700美元。所以,我们可以否定这样简单的假设,即较高的人均收入必然与较低的出生率相联系。这个结论至少在我们以上列举的12个欠发达国家的范围内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图6.3 (b)。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和出生率之间显示出一种负相关关系。然而，像秘鲁、印度、菲律宾和墨西哥这样出生率近乎相同的国家，他们的收入增长却有很大差别（从秘鲁的年平均1.0%到墨西哥的3.8%）；此外，有些国家（如斯里兰卡与南朝鲜）出生率也同样较低，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别在200%以上（比较斯里兰卡的2.5%和南朝鲜的6.9%）。⑤因此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出生率降低之间的联系是微乎其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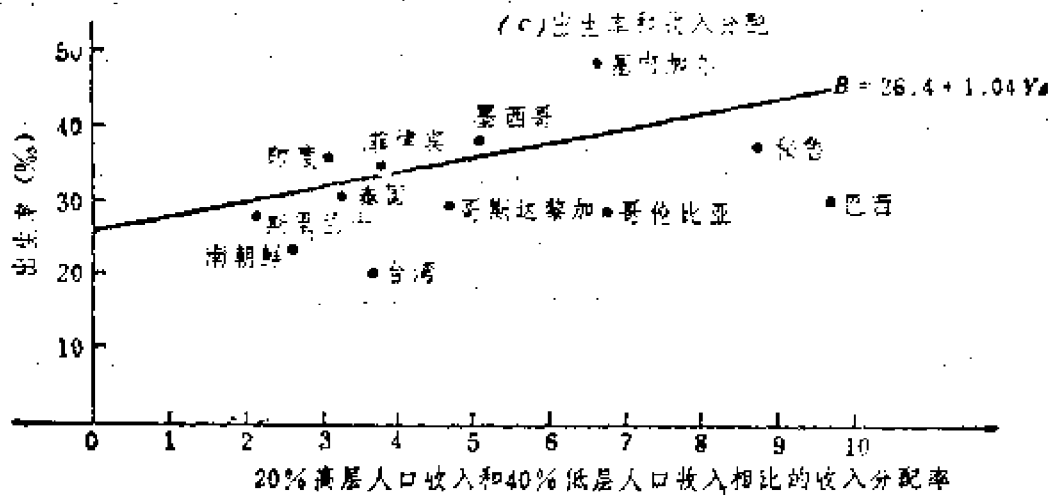


图6.3 12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与出生率的关系

注:  $G_1$  是人均国民总产值;  
 $G_2$  是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率;  
 $Y_a$  是收入分配率;  
 $B$  是出生率。

最后, 在图6.3 (c) 中, 如果把有关国家的出生率和它们对应的收入不平等加以比较, 那么, 我们就可以发现, 出生率的高低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大小之间有某些联系。这12个国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小组——一组是收入不平等较小和出生率较低相对应的小组(如台湾、斯里兰卡和南朝鲜); 另一组是收入不平等较大但趋于减小和较高出生率相对应的小组(如印度、泰国、菲律宾、墨西哥、塞内加尔、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

由此, 我们可以暂时推论如下: 某些力求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国家, 或者为更多的人们扩大经济增长利益的国家, 与那些愈加不平等地分配经济增长利益的国家相比, 它们能够更好地降低人口出生率, 即使后一类国家平均国民收入水平既高, 人均收入增长率也快, 上述情况也依然如此。⑥然而, 假如某个发展政策能够适应于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 那么, 较高的国民生



产总值增长率就可能带来生育率大幅度的降低，把南朝鲜和台湾与巴西和泰国相对照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直接向贫穷和低生活水平宣战，与仅仅使经济最大限度地增长相比，前者或许是降低出生率的更有效的方法。其理由是较高的生活水平为选择合适的家庭规模提供了必要的动力。而普遍的贫穷则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趋向于保持高出生率。其原因是，缺乏适当收入、就业、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家庭，在今后的生活中，除了依靠其子女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保障。这些家庭相对于他们自身的规模陷入了“不发展的陷阱”中，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的低下，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的自尊和尊严因此动摇，他们选择一种理想家庭规模的自由遭到了贫穷和经济动荡的压制。

### 3.4 人口增长潜势

或许，对人口增长了解最少的方面要数出生率实际下降后人口增长的趋势了。人口增长有一个固有的连续趋势，一个强有力的势头。就象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刹闸以后仍然要继续滑行一段一样，人口增长的这种势头在出生率下降后还可以持续10年。

人口增长潜势的存在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高出生率不可能在一夜之内就被改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影响着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的力量，不会因为国家领导人的极力主张而轻易地消除。从欧洲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出生率降低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因此，即使发展中国家把限制人口增长当作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但要把全国的生育率降低到期望水平，仍然需要若干年的时间。

第二个不明显的原因与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关。我们知道，高出生率国家的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儿童和青少年（有时高达50%）。在这样高的生育率的人口中，年轻人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父母，当这代人成年后，这种潜在的父母

数量要比今天的父母多得多。其结果必然是，即使这些新父母仅仅拥有能够替代他们数目的孩子（即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它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每对夫妇4个孩子），4口之家的父母总数仍将大于上一代6口之家的父母总数。这意味着，在出生率重新稳定下来之前，人口总量仍将继续增加。

我们假定 X国的总人口是600，它是由100个6口之家组成的（每家都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当这些家庭的400个孩子长大成人后，我们再假定他们全部结婚，结成200对育龄夫妇。现在，假设一对夫妇两个孩子（1男1女）的新家庭取代了一对夫妇4个孩子的旧家庭，并且第一代父母已经死亡，那么，X国的总人口将由600增加到800（即200个4口之家）。当4口之家的孩子也长大成人，结婚生育后，如果每对夫妇仍然只生两个孩子，那么，200个4口之家的总人口仍是800。所以，X国只有经过两代人或大约50年的时间才能使它的人口稳定下来。这就是为什么高出生率的国家要降低人口增长率必须花费许多年时间的原因。往往政治家、计划工作者，甚至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口增长潜势的数学。他们错误地认为，就象人们控制储蓄和投资的比率或者控制税率和税收水平一样，人口增长率也很容易在短期内被控制住。

现在，我们假定在1980—1985年期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都已降低到现在还为多数发达国家所特有的“替换”水平（大致每个家庭两个孩子）。即使这个假定能够成立，第三世界的人口仍将持续增长数十年。实际上，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只有达到比1970年还高88%的水平时（即增加22亿多人口），它才能稳定下来。墨西哥、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于它们的人口增长潜势建立在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上，因此，它们仍将经历一个人口大幅度的增长过程。

如果我们假定欠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降低到“替换”水平的时

间是在2000—2005年期间，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组完全不同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内在潜势导致了人口增长158%即增加40亿人口的时候，第三世界的人口才能稳定下来。这个行将增加的人口已经超过1975年的世界人口总数！它鲜明地突出了这些国家在生育率能降低的时刻，最后的人口规模的重要性。在上述例子中，意味着仅仅20年人口就增加18亿，几乎相当于目前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2/3。

表6.7 在两种不同的(假设)生育率前提下人口增长的“潜势”和预期的人口增长

国 家	1970年的 人口(百万)	2005年人口 达到最大规模 (百万)		在1970年基数 上的增长(%)	
		替 换 时 间			
		1980—1985	2000—2005	1980—1985	2000—2005
印 度	534	1 062	1 366	88	156
巴 西	94	192	266	104	183
孟加拉国	69	155	240	125	248
尼日利亚	65	135	198	108	205
巴基斯坦	57	112	160	96	181
墨西哥	51	111	168	118	229
菲律宾	38	79	119	108	213
埃 及	34	64	92	88	171
欠发达国家	2 530	4 763	6 525	88	158
发达国家	1 122	1 482	1 610	32	44
世 界	3 652	6 245	8 135	71	123

资料来源：托马斯·弗里杰卡：《人口增长的前景》，纽约人口委员会1973年版，  
参考图表。

表6.7用表格醒目地说明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现时和预期的人口增长潜势的“数学”。可以看到，象孟加拉国、墨西哥、菲律宾和尼日利亚等目前那种高出生率的国家，有着极高的、内在的人口增长潜势。我们也可注意到，即使印度人口增长潜势的百分率与埃及相同，并且到2000年两国都达到替换出生率的水平，印度现有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到2000年它将持续增长出比埃及多7.5亿的人口来。

无论出现哪种生育水平，这些例证都生动地说明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无疑都要发生人口大幅度的增长。当这些国家确定了它们未来人口规模的期望目标时，它们就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即不管采用哪种战略方案，结果人口都要增长80%—125%。但是，那些真诚相信减缓人口增长速度是其最大利益的国家，不应该由此而丧失信心。因为，正如我们从上面例证所看到的，每年的生育率不降低，在生育率最终稳定下来之前，那就意味着，人口规模将比现在还要多许多倍。

#### § 4 人口问题争论：一些冲突的见解

在讨论具体目的和目标以前，我们应当看到，在对于人口迅速增长是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更是如此。这些意见冲突之明显，争论之热烈，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得上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届世界人口会议。<sup>①</sup>一方面，人们应该认识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增长并不是低生活水平、损害人的自尊和限制自由的唯一根源，甚至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基本的原因。另一方面，试图论证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没有严重地恶化和增大不发达的3个组成部分。特别是第1和第3个组成部分（参见第3章——译者注），那将是相当幼稚可笑的。在对

待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不是一个严重的发展问题上，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意见。以下对这些主要论点的概括构成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基础，这就是，在既定的具体目的和目标的前提下，哪些共同的意见能够实现它们的要求。<sup>⑧</sup>

#### 4.1 人口增长实际上不成其为一个问题

我们主要可根据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人的意见，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三条。

1. 问题不在于人口增长，而在于其它一些问题。

2. 人口增长是一个虚假问题，它是由居于支配地位的富国凭借组织和制度的力量蓄意制造的神话，其目的是为了使欠发达国家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和从属地位。

3. 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来说，人口增长实际上是合乎需要的。

**其它问题** 许多富国和穷国的有识之士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口增长，而在于一个或几个其它问题上。这些问题如下。

**不发达** 如果正确的战略方针得到积极的贯彻，并导致较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尊重和扩大的自由，那么，人们将会满足自己的需要。最终，人口问题就会自行消失，就象目前所有经济上先进国家里出现的情况一样。按照这种观点，不发达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发展应是唯一的目的。随发展而来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机制，将或大或小地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和调节人口分布。只要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无知、体弱多病以及落后的心理状态中，大家庭就将继续成为“社会保险”的唯一真正源泉（即使他们想选择小家庭，父母也将否定这种选择的自由）。持这种见解的人们推论道：在这些穷户缺乏限制家庭规模的动机时，节育计划注定要破产，这正如在过去年代里发生的事情一样。

**世界资源的损耗** 人口问题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只涉及到稀缺的自然资源和物力资源可用与使用之间的关系。现存的事实是，仅占世界人口1/3的发达国家几乎消费了世界资源的80%。例如，北美和欧洲的消费者直接和间接消费掉的食物、能源和其他物质资源几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16倍。因此，从世界有限资源损耗的观点出发，发达国家增加1个孩子和欠发达国家增加16个孩子具有同等的意义。按照这种说法，发达国家应该用降低超高水平的消费来代替他们对欠发达国家限制人口增长的要求。不发达国家高生育率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低生活水平，其次主要是富国对世界稀缺资源的“过度消费”。富国和穷国的富人中间的富裕增长与穷奢极欲的消费习惯结合起来将是世界的主要忧虑所在，而不在于人口增长。

**人口分布** 按照这一观点，引起人口问题的不是人口数量本身，而是人口的空间分布。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很多国家的地区（如巴西的东北部和亚马逊河流域），按照它们可用的或潜在的资源，这些地区实际上是人口稀疏地区。许多国家的其它一些地区则是稠密的人口集中于狭小的地域（如中爪哇和欠发达国家大多数人口密集的城市）。所以，政府不仅要努力节制人口增长，而且应该根据可用地和其它生产资源的情况，努力削减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以造成更加合乎自然规律的人口分布。

**蓄意制造的虚假问题** 否定人口增长是一个主要的发展问题的第2种论点，接近于在第3章讨论过的不发展的新殖民主义依附理论。它基本上认为，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口增长的极不协调是由富国一手制造的。富国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企图压制穷国的发展，以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尽管在历史上，富国人口的大量增加曾经加速了它们的发展进程，但是在今天，富国却迫使穷国采取积极的人口控制计划。

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持同样的见解。他们认为，富国及其同盟和国际上的代理人如种族主义和实行种族灭绝者等控制人口的力量，正在企图相对地或绝对地减少世界上穷人的数量（其中大多数是非白种人），因为，这些人口总有一天会对富人的利益，对优等白种人和上流社会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世界范围内的节育运动被看作是发达世界恐惧的表现，发达国家面对旧国际秩序的直接受害者对这种秩序可能发出的根本挑战感到恐慌不已。

**人口增长是合乎需要的**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人口增长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sup>⑨</sup> 众多的人口为在生产上建立有利的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供给足够并且廉价的劳动力，以及达到较高的产出水平提供了必要的消费需求。这种理论还认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农村有着辽阔的尚未开垦但宜于耕作的土地，仅仅使用较多的人力去有效地耕种，这些土地就可以产出极丰富的农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地区实际上是人口不足。据说热带非洲、拉丁美洲、甚至亚洲的部分地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据考证，在遥远的过去，非洲很多地区生存的人口比今天的人口还要多。<sup>⑩</sup> 造成非洲农村人口现状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奴隶贸易，而且也是由于义务兵役制，封闭的“居留地”和过去的殖民政府的强制劳动政策造成的。例如，16世纪的刚果王国据说大约有200万人口，但是，到了殖民统治时期，经历了300年的奴隶贸易，这个地区的人口降低到还不及原来的1/3。今天扎伊尔的人口勉强勉强才能够得上它在16世纪的人口数字。<sup>⑪</sup> 东非和西非的其它地区，到处可以提供类似的例证——至少在那些提倡加速非洲人口增长的人们眼中是如此。

人口膨胀论的支持者在谈到人口与可耕地（包括：已耕地、休闲地、牧场和森林）的比例时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总共

有14亿公顷的可耕地，实际耕种的面积只有1.7亿公顷或平均每个农村人口近一公顷。因此，只有12%的可耕地被利用了。极低的农村人口密度被看作是增加农业产出的一个严重缺陷。同样的道理也被用来解释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的国情。

其它三种非经济学的观点，多少有点站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边，来完善“人口增长是合乎需要”的理论。首先，某些国家声称，人口增长对于防范邻国的扩张主义企图，保卫人烟稀少的边疆是必要的。其次，在欠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种族集团和宗教团体，他们对大家庭的赞赏态度，出于道德和政治上的原因，理应受到照顾。最后，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通常被看作依赖于众多的和年青的人口。

即使不是在事实上，至少也是在表述的概念上和在发展中国家有影响的人物那里，这些论点采取了一定的现实主义态度。显然，有些观点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比对其它国家更有效。关键的问题是，第三世界的代言人阐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意见和观点。所以，需要我们对那些与此对立的观点认真加以考虑。这些反对观点（主要是发达世界的观点）认为，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确实是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种观点。

#### 4.2 人口增长确实是一个问题

主张有必要用专门的计划和政策来降低人口增长的观点，其代表性的内容或多或少是建立在以下4种论点上。<sup>⑬</sup>

**“鹰派”的人口论** 持人口增长是一个严重问题的极端观点，企图把世界上的经济弊病和社会罪恶统统归罪于过度的人口增长。无约束的人口增长被看作是今天人类面临的主要危机。据说正是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才造成了人民贫穷，生活低下，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和环境破坏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诸如“人



口炸弹”，“人口爆炸”这类令人压抑和蛊惑人心的言词才被随心所欲地滥用。实际上，这种极端的论点几乎把世界上的粮食饥荒和生态灾变全部归咎于世界人口数量的增加。<sup>④</sup>他们声称，在某些象印度和孟加拉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即使“控制”家庭规模有必要采取象强制绝育那样严厉的强迫性措施，“世界”（即不发达世界）人口的稳定或下降仍是当今社会最紧迫的任务。

**计划生育工作的措施** 一种不太极端或不太严厉的反人口增长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家庭，只要他们有限制自身规模的愿望，他们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向人们提供口服避孕药、子宫内避孕器（IUD）和与日俱增的通过男性结扎输精管来“自愿”绝育的节育手段。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和许多当地的诊所合作，把计划生育计划既建立在向人民宣传现代节育方法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向人民提供廉价、安全可靠的节育手段的基础上。

**人权** 1968年，联合国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这项决议指出：“每个人能够决定自己的家庭规模是一条基本的人权。”至少是在富裕社会，持同样见解、比较时兴的说法是：控制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包括法定的流产和避孕，是每个妇女的基本权利。由于母亲和孩子的健康直接与生育的间隔期有关，所以，这种论点就把提倡计划生育的“选择自由”建立在卫生和家庭规模的坚实基础上。

**发展加人口计划** 在认为第三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是一个严重问题的观点中，这个论点比上述大多数论点都更为重要。其基本论点是：人口增长强化和加剧了与不发展条件相联系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特别是它阻碍了改善新一代儿童生活的进程。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严重地阻挠着有限的政府收入为新增人口提供起码的经济、卫生和社会服务。这些都进一步阻碍了现存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知道，普遍的绝对贫困和生活低下是大家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父母老年经济上的安全感也是一个原因。因此，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最终形成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水平上人口增长减慢或停顿的必要条件。但是，按照这个论点，它还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发展只是给予人民限制家庭的动力和刺激，它还需要计划生育计划向人民提供避免意外怀孕的技术手段来与之配合。象法国、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兴的台湾、南朝鲜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普遍的计划生育诊所也能降低人口增长率。然而，发展加人口计划的拥护者还是认为，计划生育服务措施能使其它要求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国家，比没有这些服务措施时，更快地做到这一点。

## § 5 目的和目标：求大同存小异

尽管在关于人口增长的起因和重要性上似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领域。1984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人口会议上这一点表现的尤其突出。作为这种共同基础的道德标准都来源于第3章讲过的发展的“内含”和前几章提到的196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以下四点主张构成了这个共同的或一致的意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 作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特征的低生活水平，严重的不平等和限制选择自由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增长。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应该从国内、国际社会经济秩序的“二元”性质去寻找。
2. 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人类生活质量和物质利益的问题。因此，欠发达国家的人口状况，连同发达国家的富裕一起，被认为是与世界资源的质量、

分配和使用有关，而与发达国家“原有的”资源无关。

3. 人口的迅速增长会加剧不发展问题，使发展的前景更加渺茫。我们知道，除了大灾大难外，无论现在采用哪种控制生育的方法，人口增长潜势都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将持续大幅度增长数十年。所以，高人口增长率虽然不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但它却是世界上某些特殊国家和地区不发达的重要因素。
4. 许多真正的人口问题不在于人口总量有多大，而在于人口的集中。特别是因为人口迅速地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使得这个问题在城市地区表现的尤其突出（见第9章）。所以，在某些国家中，更合理、更有效的人口分布已经成为降低人口增长率的切实可行的选择。

从以上意见和发展观点以及暗含的人权标准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下三个目的和目标包括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待人口增长问题的所有见解。

1.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人口的规模、分布和增长被看作是一个现存的或潜在的问题。在哪里，限制未来人口增长的任何战略目标都要既针对人口变量本身，又要瞄准不发达的、根本的社会经济条件。诸如绝对贫困、严重不平等、普遍失业（特别是妇女失业）、限制妇女接受教育、营养不良和糟糕的卫生设施等问题应该给予优先考虑。这些问题的改善是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扩大个人选择最适宜家庭——更小家庭规模的极其重要的动力基础。
2. 为了通过发展的诱导动力带来更小的家庭规模，为希望控制生育率的人们进行宣传和提供技术手段的计划生育计划应该建立起来。
3. 发达国家必须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降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目标，这不仅需要支援避孕药物和资助计划生育诊

所。而且，更重要的是，（a）通过计划来削减发达国家对可利用的稀缺原料和非再生资源的非必需消费，从而减少他们对世界这类资源的过度消耗；（b）真正地承担起义务来根除第三世界国家和本国的贫穷、愚昧、疾病和营养不良；（c）应该从他们华丽的词藻和国际社会经济交往中认清，“发展”是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不是单纯地控制人口。

现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了第7章对人口“经济学”更深入的分析。我们愿意鼓励读者，就这一章提出的各种观点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判断，把它作为正在继续进行的关于人口增长前途和结果的世界性争论的一部分。

## 注 释

① 伯纳德·贝雷尔森：《1974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见《人口和计划生育》1974年1月第15期第47页。

② 这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1974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第3—20页。新增的有价值的资料来源于最新的人口统计趋势和对现代问题及战略的回顾，请参看G. 麦克尼科尔和M. 内奇：《人口增长：当代的问题和战略》，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12。

③ 然而，在人口增长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开始出现下降的迹象，世界人口的增长已达到它的顶峰。关于这个转折点的初步验证请参阅，B. 贝雷尔森、W. 帕克·莫尔丁和谢尔登·西格尔：《人口：现状和政策抉择》，见1980年5月《社会科学和医学》第三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健康”第14章1980年5月。特别见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篇第4章。

④ 如果对此问题感兴趣，还有一种计算“倍增”时间的简易方法，即用增长率除70。例如，年平均增长率为2%的资产、人口、国民生产总值

等，经过35到36年的时间，自身将增大1倍。

⑤ 79个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率之间不确定关系的更多例证请参见，德里克·T·希利：《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与实际产出增长的考察和分析》，澳大利亚南部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系1974年版。

⑥ 关于这个观点的最新论证参见，A.K.巴达切利亚：《收入不平等和生育率：观点比较》，见《人口研究》1975年第29期第5—19页；大卫·马拉维菲：《人口增长和满足基本需要的政策》，《世界发展》1978年第6期11/12第1251—1259页；特别应参看罗伯特·里佩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平等和生育率》，巴尔的摩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⑦ 关于这场争论的叙评参阅J.芬克利和B.克兰：《布加勒斯特的政治：人口、发展和国际经济新秩序》，见《人口和发展评论》第1期第87—114页。尽管在1984年8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口会议上这种争论已经不多，但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头脑和讨论中的地位却依然很突出。

⑧ 关于这些分歧观点更详尽的讨论，参见迈克尔·泰特尔鲍姆：《人口和发展能否协调？》，见《国外大事》1974年7月第749—757页。

⑨ 例如，可参见科林·克拉克：《“人口爆炸”的神话》，见《发展研究院学报》苏塞克斯1969年5月。

⑩ 参看沙米尔·阿明：《人口不足的非洲》（提交1971年12月在阿克拉举行的非洲人口会议的论文）。

⑪ 同上，注②。

⑫ 同上，第3页。

⑬ 泰特尔鲍姆：《人口与发展》，第752—753页。

⑭ 例如，参阅保罗·R和安妮·H.埃利希：《人口、资源与环境：人类生态学问题》，旧金山，W.H.弗里曼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莱斯特·R.布朗：《人类的关注：稳定世界人口战略》，纽约诺顿出版社1974年版。

## 概念复习

倍增时间 (Doubling time)	期望寿命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人口增长率 (Rat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青年抚养率 (Youth dependency ratio)
自然增长率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	人口年龄构成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总生育率 (General fertility rate)	人口增长潜势 (Hidden momentum of population growth)
出生率(粗) (Crude birthrate)	替换生育率 (Replacement fertility)
死亡率(粗) (Crude death rate)	人口分布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婴儿死亡率 (Infant mortality rate)	

## 问题讨论

1. 在过去的10年间,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地增长。试比较或对照不发达国家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和现代发达国家早期的人口增长率,请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推动第三世界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抚养负担的关系是什么?所谓的抚养负担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重还是轻?为什么?
3. 从统计数字看,第三世界的出生率与(a)人均国民总产值;(b)人均国民总产值增长率和(c)收入分配平等或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着特定的统计关系?如果确实存在的话,请说明,在出生率和上述几个变量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4. 请解释人口增长“潜势”概念的含义。在第三世界人口趋势的预测中，为什么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5. 简单评述反对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视为一个严重问题的论点。
6. 简单评述赞成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看作一个严重问题的论点。

## 第7章 人口经济学与发展

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首先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

《第一个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布加勒斯特1974年

经济发展是解决人口和相互关联问题的主要因素……国内和国际的努力应把实施人口与发展的总体计划放在首位。

《第二个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墨西哥城1984年

最近几年，经济学家逐渐开始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发生了兴趣。然而，进行这类分析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区分开原因和结果。是经济发展加快延缓了人口增长呢？还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促进或者阻碍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什么？它们的影响有多大，在什么范围内发挥作用？这一章，我们将考察人口经济学的三种主要分析方法：人口过渡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新“微观经济学”的生育率理论。我们的目的在于评价这些不同方法在阐明上一章提出的主要目的和目标时所处的地位。最后，我们将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角度分析处理全球性人口问题的政策选择，并做出结论。

### § 1 人口过渡理论

人口过渡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代所有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现代人口历史中同样的3个发展“阶段”。在这些国家经济现代化以前的漫长岁月里，高出生率和几乎与它相等的高死亡率的结



合，导致了人口稳定或者相当缓慢的增长。这是人口历史的第1阶段。当近代化以及与近代化相联系的事物如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较好的食物和较高的收入等引起了死亡率的明显下降，人口的期望寿命逐渐从40岁上升到60岁时，人口历史的第2阶段就开始了。然而，死亡率的下降并不直接伴有生育率的降低。结果，人口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人口剧增。所以，第2阶段标志着人口过渡的开始（即人口从稳定或缓慢的增长过渡到飞速的激增）。最后，当现代化与发展的力量及影响使生育率下降时，就进入了第3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同时降低最终会使人口增长很少或根本不增长。

图7.1粗略地描述了西欧人口过渡的3个历史阶段。在19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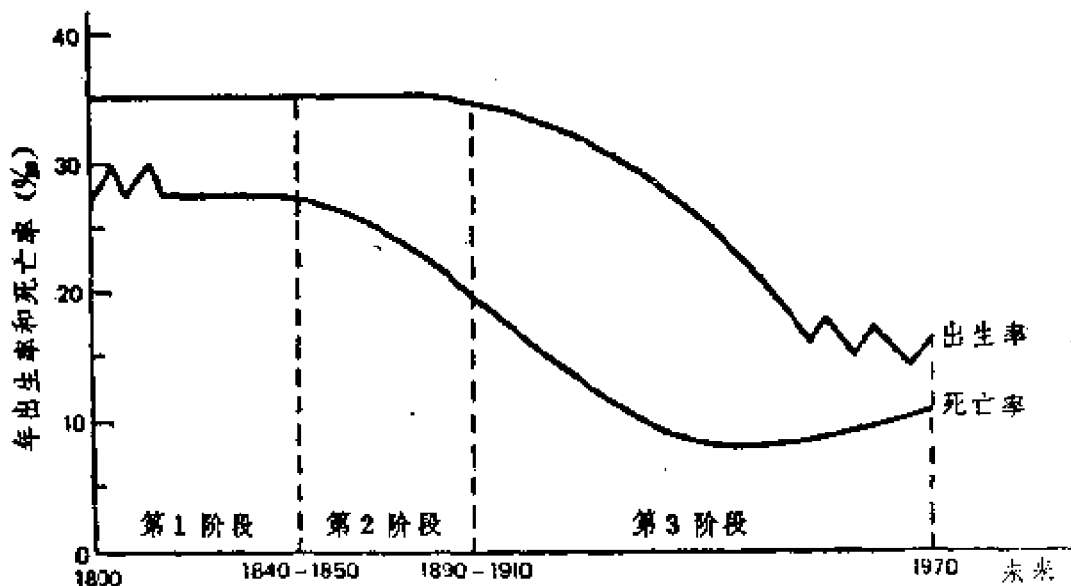


图7.1 西欧的人口过渡

开始前，西欧的出生率停留在35%左右，同时，死亡率在30%上下波动。结果形成每年大约5%或不到1%一半的人口增长率。由于经济状况的改善和通过近代医学技术及公共卫生手段实行疾病控制和死亡控制的逐步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死亡率开始缓慢下降。这时，西欧人口史上的第2阶段即西欧人口过渡阶段就

开始了。出生率的降低（即人口史上的第3阶段）直到19世纪晚期才真正开始，并且主要集中在20世纪——即集中在现代经济增长后的数十年，集中在死亡率下降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晚婚和独身，西欧出生率最初的水平普遍比较低，即使在最高点上，它的总人口增长率也很少超过1%。到20世纪后半期，西欧人口的过渡行将结束。19世纪初存在的那种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关系被颠倒过来，出生率变得起伏不定，而死亡率则静止不动或只有轻微的上升。这后一种现象完全是由西欧现代人口老龄化的分布状况造成的。

图7.2说明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历史，这是不同于西欧人口历史的第二种过渡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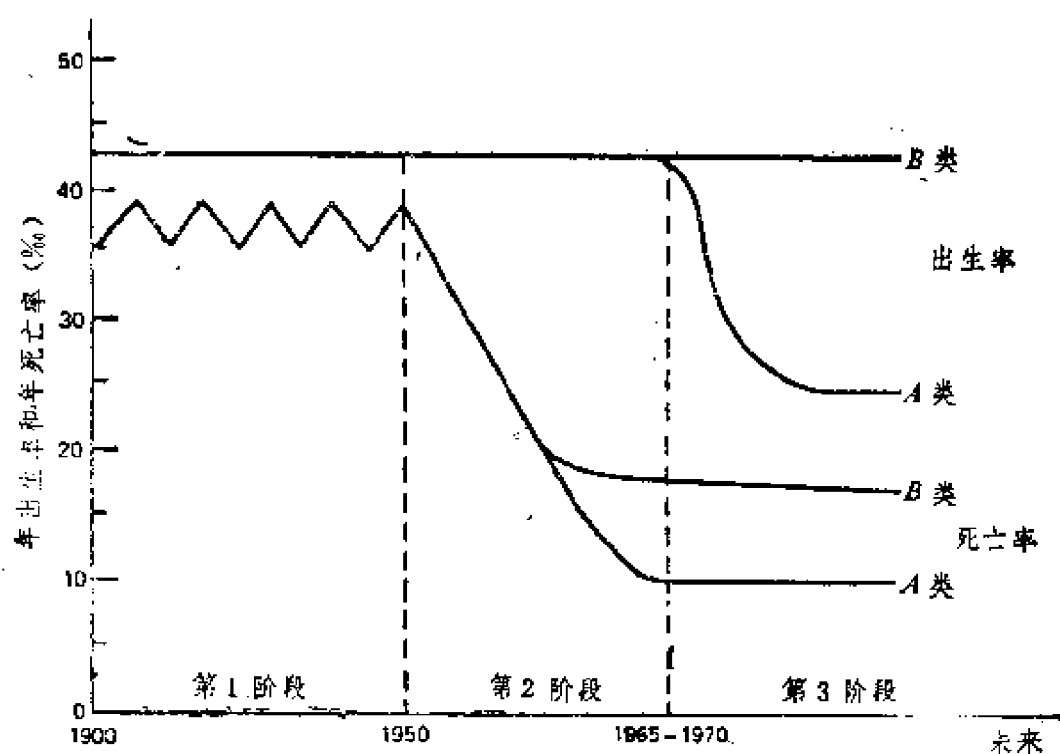


图7.2 第三世界国家人口过渡的开始

资料来源：《世界人口增长》，华盛顿国家科学院1963年第1091号出版物第15页。

今天，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比西欧前工业时代的出生率高得

多。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倾向于早婚，结果在既定的人口规模中，家庭数目更多，育龄时间更长。20世纪40年代初，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人口过渡的第2阶段开始并波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这时，进口现代高疗效医药技术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使用引起死亡率的下降，其速度要快于19世纪的欧洲。然而，第三世界国家出生率的空前高水平（某些国家高达40%以上）意味着，2.0%—2.5%的年人口增长率已成为它们人口过渡第2阶段的一个特征。

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过渡第3阶段的情况，我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在图7.2的A类中，现代死亡控制方法和生活水平迅速、普遍的提高相结合，导致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时下降，死亡率降低到10%，出生率迅速降低到20%和30%。某些著名的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哥斯达黎加、古巴和斯里兰卡等，其总人口增长率已迅速下降，进入人口过渡的第3阶段。70年代末，另外几个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多米尼加、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似乎也进入一个与A类相仿的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时期。

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多数国家可归入B类。在这些国家里，由于长期的普遍赤贫和生活低下，除了初期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外，并没有出现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低生活水平导致高出生率的持久存在，从而使人口增长率停留在较高的水平上。这类国家大多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国家，它们仍停留在人口过渡的第2阶段上。

所以，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才可能有一个出生率降低、人口缓慢增加的时期？围绕这个问题，建立了许多传统和现代的人口与发展经济理论。其中，两个最著名的理论是传统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新“微观经济学”的生育率理论。

## § 2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 2.1 基本模型

早在175年以前，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就提出了一种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时至今日，这个理论仍然具有生命力。在写于1798年的《人口原理》一书中，马尔萨斯使用了报酬递减概念。他假定一国人口有一种普遍的增长趋势，除非通过减少食物供给的方法来控制它，否则，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平均30—40年就要翻一番。<sup>①</sup>同时，由于固定生产要素和土地的报酬递减，食物的供给只能大致按算术级数增长。实际上，每增加一部分人口，就只能耕种更少的土地，人口食物的边际分配已开始降低。由于食物的供给和人口的发展不能保持同步增长，人均收入（为简单起见，把它限定为农村社会的人均食物产品）具有一种下降的趋势，一种使人均收入降低到一定规模的人口勉强糊口或者刚刚够得上最低生活水平的趋势。所以，马尔萨斯坚决主张，摆脱长期生活低下或“赤贫”的唯一办法是使人民实行“道德抑制”和限制后代的数量。由此，有人也把马尔萨斯称为现代节育运动之父。

现代的经济学家把马尔萨斯的思想称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或者简称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在图7.3中，我们可相对于国民平均收入水平绘出人口增长率曲线和总收入增长率曲线，把这两条曲线的轨迹作一比较就可以说明马尔萨斯的基本模型。

在纵轴上，我们标出两个被考察要素（即总人口和总收入）百分率变动的正负值；在横轴上，同样可得到国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值。首先，让我们来观察说明（纵坐标上）人口增长率与

(横坐标上) 国民平均收入水平  $Y/P$  之间关系的曲线  $P$ 。在国民平均收入最小值  $y_0$  上, 人口增长率的变化是 0, 这形成稳定的人口规模。因此,  $y_0$  描述的是“赤贫”的概念。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抵, 人们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绝对水平, 这相当于人口过渡论的第 1 阶段。在超过  $Y_1$  (以右) 的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上, 人口规模在死亡率下跌的作用下开始增大, 这时, 较高的收入意味着饥饿和疾病的减轻。由于出生率总是被限定在生物极限内, 下跌的死亡率推动了人口的激增 (即人口过渡论的第 2 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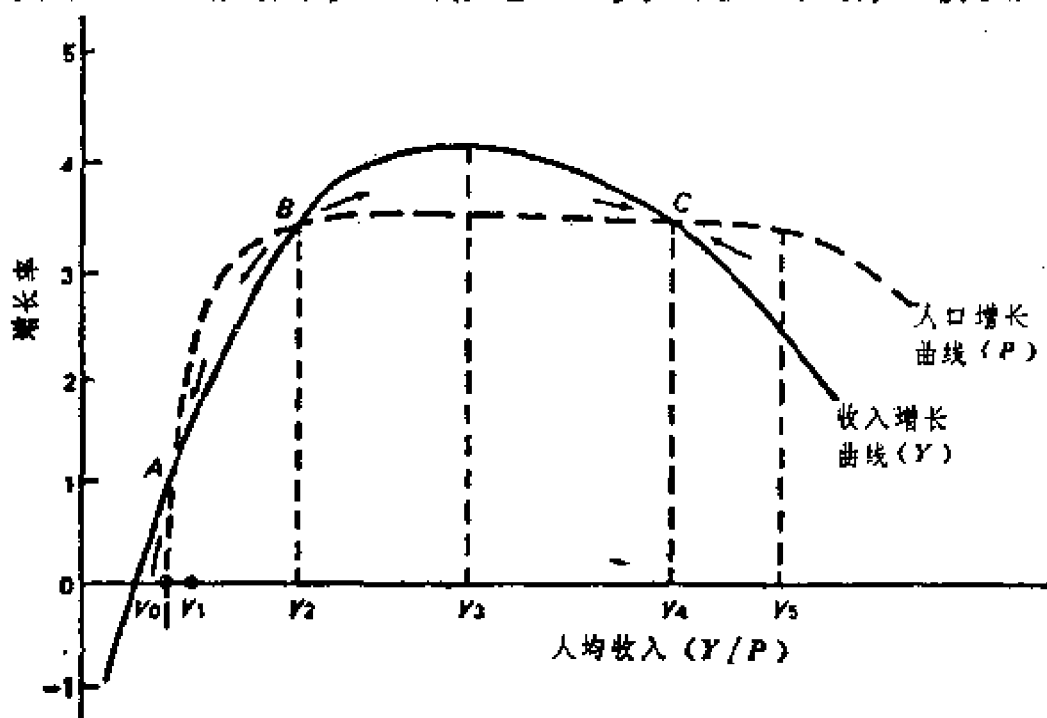


图 7.3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在国民平均收入水平值  $y_2$  上, 人口增长率达到了它的最大值, 约为 3.3%。假定, 保持这个水平直到更高的国民收入 ( $y_5$ ) 成为现实, 那么, 根据人口过渡论第 3 阶段的内容, 出生率将开始下降, 人口增长曲线变成下倾曲线并再次向横轴逼近。

马尔萨斯理论的其它部分, 需要我们用图形来表示总收入增长率 (不考虑人口增长率) 和国民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然后, 再把两个 (即总收入和总人口) 比率加以比较。如果总收入

(总产品)是迅速上升的,按照定义人均收入肯定也会上升;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总收入的上升速度,则人均收入肯定要下降。在图7.3中,总收入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首先呈现的是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总收入增长速度也就越快。其经济原因是储蓄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成正比例变化。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能够产生较高的储蓄率,并由此带来更多的投资。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见第3章),较高的储蓄率就意味着较快的总收入增长速度。但是,当人均收入超过一定点( $y_3$ )时,由于投资增加,更多的人寻求工作,而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却固定不变,收入增长曲线就停止上升并稳定下来,然后开始下倾。这个点就是马尔萨斯模型中的收益递减点(注意,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在内)。所以,总收入增长率曲线在概念上类似于生产论中的总产品曲线。

在图7.3中,两条曲线相交成A、B、C3点。在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中,A点相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值是 $y_1$ 。它是一个均衡点——在A点左右任何小小的运动都会使人均收入均衡值重新回到 $y_1$ 。例如,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从 $y_1$ 走向 $y_2$ 时,人口增长率就会超过总收入增长速度(即在纵坐标上曲线P的点都高于曲线Y的点)。我们知道,当人口增长快于收入增长时,人均收入肯定要下降。所以,A点右方的箭头说明,人均收入一定会从 $y_1$ — $y_2$ 之间所有的值上返回到它的最小值 $y_1$ 。同样,在A点左方收入增长快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也会使人均收入水平的均衡值重新回到 $y_1$ 。

按照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解释,除了通过“预防”(节育)控制人口增长外,穷国永远也不可能把它的人均收入提高到最低生活水平以上。在缺乏预防控制的条件下,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方法(饥饿、疾病、战争)必然发挥其控制的作用。

现在我们就结束对人口陷阱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 $B$ 点是一个“非均衡点”。假如在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方法敲响丧钟之前，人均收入（由于投资和工业化计划的强大冲击）能够迅速从 $y_1$ 跳跃到 $y_2$ ，那么，人均收入将继续增长，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C$ ，反映到人均收入水平上就是 $y_4$ 。从这个意义说， $B$ 点是一个非均衡点，它左右的任何运动都会继续下去，直到达到 $A$ 点或 $C$ 点才能稳定下来。

## 2.2 对基本模型的批评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建立起一个简单而富有魅力的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不幸的是，这个理论是建筑在许多过分简单的假定和假设基础上的，它经不起经验的检验。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人口陷阱提出批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模型（实际是马尔萨斯本人）忽视了或者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抵消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阻力。正如我们在第4章分析过的那样，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已经与以科学发明、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为形式的一系列技术进步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递增而不是递减的规模收益已经成为现在增长时代的显著特征。虽然马尔萨斯关于土地供给有限的假设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那个时代，他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提高土地质量（即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来相对扩大可用土地的数量，尽管这时土地的数量与从前相差无几。

在人口陷阱的图形上，迅速和持续的技术进步可通过收入增长（总产品）曲线的上移表示出来。这样，在所有人均收入水平上，收入增长曲线在纵坐标上都高于人口增长曲线。这在图7.4中得到了说明。因此，人均收入将一直稳步增长，所有的国家都有可能从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魔影下逃脱出来。

对人口陷阱的第二个主要批评是针对模型的另一个假设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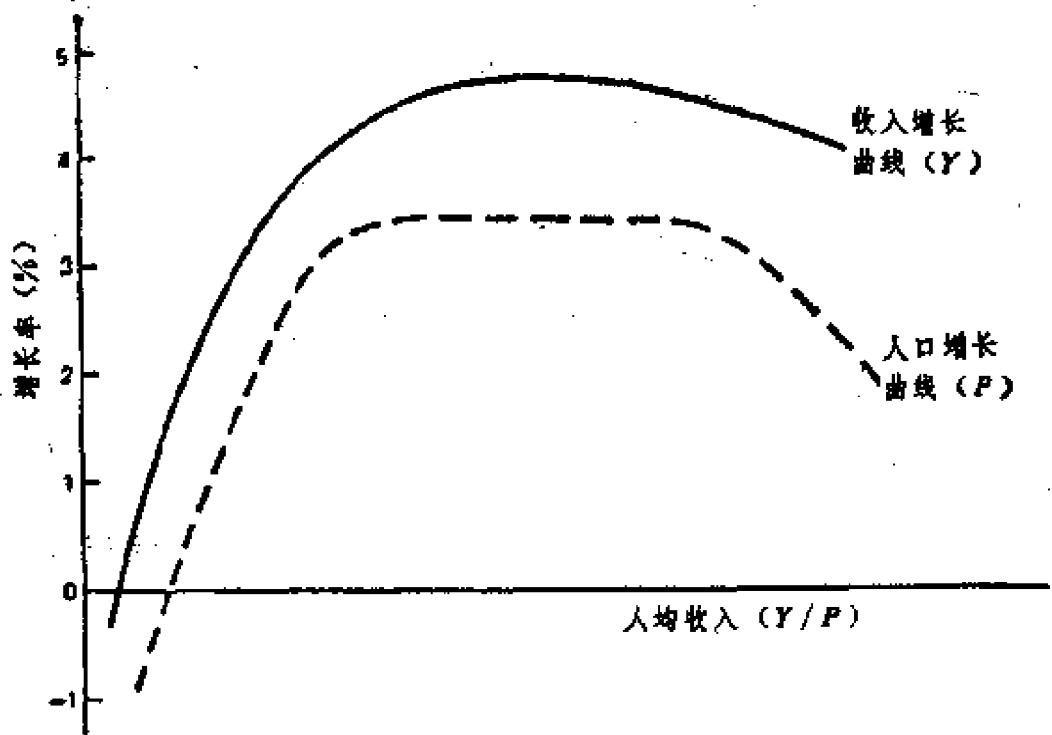


图7.4 技术（和社会）进步使一国避开人口陷阱

提。模型假定一国的人口增长率与它的人均收入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根据这个假定，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条件下，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能够协调增长。但是，我们在第6章已经分析过，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之间并没有显露出明确的相关关系。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现代医学技术和公共卫生设施已经造成了死亡率的急速下降，而且死亡率已经不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图6.2（a）中看到的，出生率似乎与人均收入水平也没有确定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对于人口增长来说问题不在于人均收入总水平有多高，而在于这些收入如何分配。一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发展宗旨或许比总经济变量和简单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更能决定人口增长率。

因此，当我们把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时，应该摒弃这个理论，理由如下：

1. 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和威力。



2. 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之间宏观联系的假设基础上，而这个假设经不起经验的验证。
3. 他们错误地把决定人口增长率的基本变量看成是人均收入。更好的和较正确的解决人口和发展问题的方法应当集中到微观经济学的家庭规模决策。家庭规模决策的基本因素不是社会的总生活水平，而是各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只有各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才能决定其需要子女数目的多少。

## § 3 生育率的微观经济理论

### 3.1 一般分析

近几年来，经济学家试图对人口过渡第3阶段中下降着的出生率作出比较圆满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说明。为此，他们开始更加密切地注意决定家庭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因素。他们吸收了传统的新古典学派有关家庭经济和消费者行为的思想，把它们作为自己分析的基本模型，并利用经济学原理和最优化原则来解释家庭规模的抉择。

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假定，某个消费者对于一系列物品（即效用函数）有其特定的喜爱或偏好程度，他总是试图在个人收入约束和有关的价格水平下，从这些物品的消费中取得最大的满足。这个理论对于生育率的分析也是适用的。在这里，儿童被当作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在欠发达国家中也可看作是投资），生育率成为消费者（家庭）对（与其它物品相对的）儿童需求的合理的经济反馈。通常的收入和替代效应被假定为供给。也就是说，如果其它要素保持不变，理想数量的儿童预期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变动成正比例变化（这种直接的关系不适合于贫穷社会。在那里，理想的儿童数量是由与其它消费品和增加收入的因素，即妇女就业相对的儿童需求强度决定的）。相反，理想的儿童数量

也会随着儿童价格（费用）的变动和对（与儿童相对的）物品的偏好强度的变动成反比例变化。这些关系用数学表述如下：

$$C_{\alpha} = f(Y, P_c, p_x, t_x) \quad X = 1, \dots, n$$

这里：

$C_{\alpha}$  是对存活儿童的需求（在低收入社会婴儿死亡率很高， $C_{\alpha}$  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Y$  是一定的家庭收入水平。

$P_c$  是儿童的“净价格”（即预期“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差额。其中，预期成本主要是指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效益”是指儿童的潜在收入和对老年人的奉养）。

$p_x$  是所有其他物品的价格。

$t_x$  是对儿童用品的偏好。

在正常（新古典学派）条件下，我们预期可以得到：

$$\frac{\partial C_{\alpha}}{\partial Y} > 0, \text{ 家庭收入越高, 对儿童的需求就越大 (因为, 函}$$

数  $C_{\alpha}$  和  $Y$  是正相关关系,  $\frac{\partial C_{\alpha}}{\partial Y}$  是正值)。

$$\frac{\partial C_{\alpha}}{\partial P_c} < 0, \text{ 儿童净价格越高, 对儿童的需求就越小 (函数}$$

$C_{\alpha}$  和  $P_c$  是负相关关系)。

$$\frac{\partial C_{\alpha}}{\partial p_x} > 0, \text{ 所有其他用品对于儿童的相对价格越高, 儿童}$$

的需求量就越大。

$$\frac{\partial C_{\alpha}}{\partial t_x} < 0, \text{ 对儿童用品的偏好强度越大, 儿童的需求量就}$$

越小。

图 7.5 用图形说明了生育率的经济理论。它的横轴是理想（存活）的儿童数  $C_{\alpha}$ ，纵轴是父母消费品总量  $G_p$ 。

家庭理想的儿童数量可通过表示父母对物品和儿童合理组合

主观评价的无差异曲线予以说明。每条无差异曲线都有无数个商品/儿童的组合，在每个组合上，都可以得到同等程度的满足。任何“较高”无差异曲线上的点（或者说是商品和儿童的组合）——即远离原点曲线上的点——与较低无差异曲线上的点相比都表示更高程度的满足。但是，每条无差异曲线都是一条“同等满足”的轨迹。

图7.5只有4条无差异曲线： $I_1$ 、 $I_2$ 、 $I_3$ 和 $I_4$ ；而在理论上，占据整个象限，包括所有商品/儿童组合点的一系列无差异曲线是可能存在的。在图7.5中，预算约束线a-b表示家庭选择物品和儿童组合的“购买”能力，在a-b线上或低于a-b线的所有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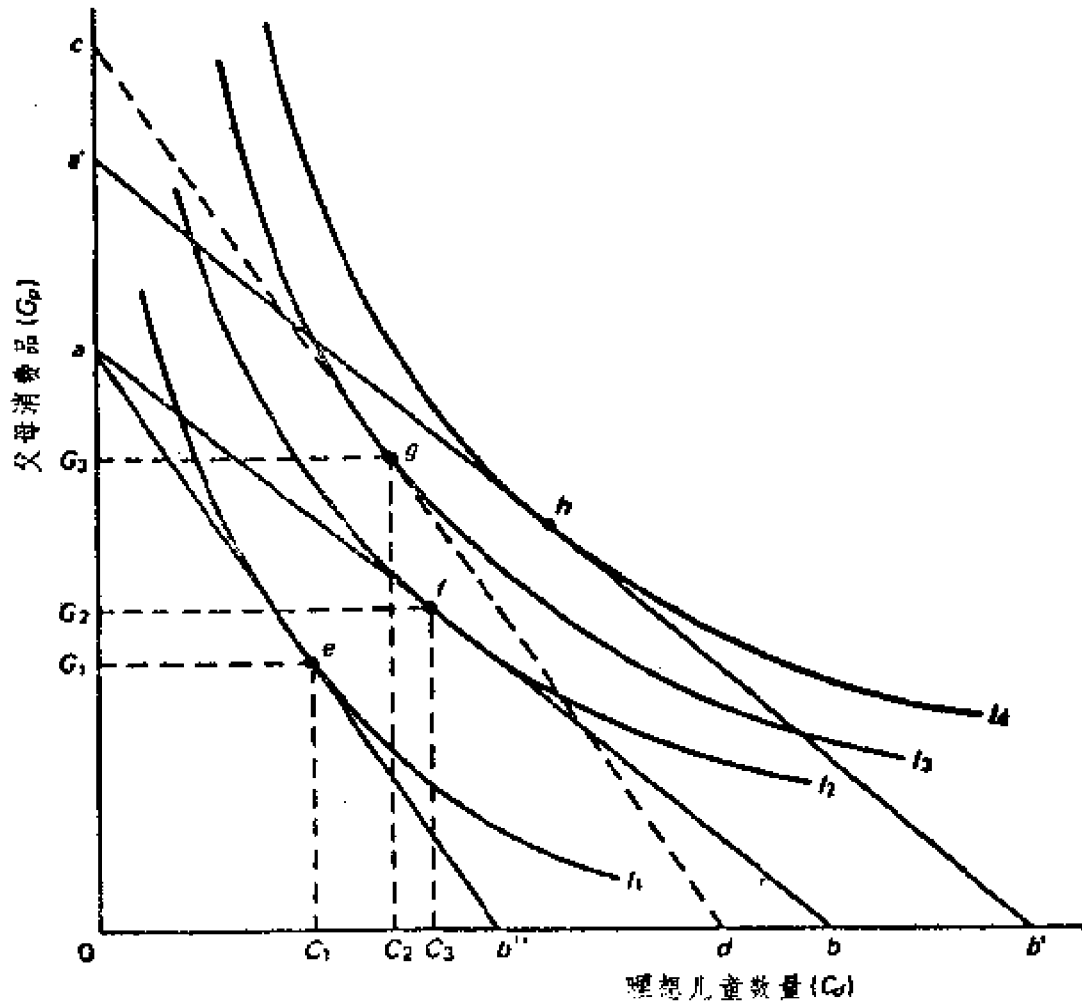


图7.5 生育率微观经济理论的图示

(即在三角形 $oab$ 内的所有组合)可以由家庭根据可预测的收入情况和儿童与物品的比价来决定。这种情况可以用预算约束线 $ab$ 的倾斜来表示,预算线的斜率越大,儿童对于物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根据生育率需求的基础理论,家庭对所有可望得到组合的选择,是建立在家庭主观偏好的基础上的,每对儿童和物品的组合都能使家庭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在图中,最理想的组合是预算约束线 $ab$ 和无差异曲线 $I_2$ 的切点 $f$ <sup>②</sup>,它对应的儿童需求和物品需求分别是 $C_3$ 和 $G_2$ 。

在图中,家庭收入的提高表现为预算线从 $ab$ 向外平行移动到 $a'b'$ ,它使家庭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抚养更多的儿童,从而使家庭得到更高水平的满足( $I_1$ 线上的 $b$ )——在这里,象大多数商品一样,儿童被假定为“普通”商品。在低收入国家这是一个重要假设,在哪里儿童作为未来财力保证的源泉常常被看作是主要的需求。

同样,儿童对于其它商品的相对价格(机会成本)的提高会促使家庭用商品来代替儿童。当其它要素(即收入和偏好)固定不变时,儿童相对价格的上升将致使家庭消费的效用最大组合出现在更低的无差异曲线上,表现在图上就是预算线绕 $a$ 点旋转到 $a-b''$ ,均衡点从 $f$ 滑到 $e$ 。

最后,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假如由于妇女就业机会的扩大或与儿童税有关的工资上涨超过了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引起家庭收入和儿童净价格同时提高,那么,在图7.5中,预算约束线向上移动和向下旋转都会发生并且将逼近 $c-d$ 线。这时,会出现一个新的效用最大组合点,在这个点上,每个家庭将拥有更少的儿童数(试比较 $g$ 点和 $f$ 点)。换句话说,低收入家庭的较高生活水平与儿童相对价格提高的结合(不管它是直接由财政手段造成的,还是间接由妇女就业机会扩大带来的),将促使家庭在增长其福利的同时,只需要较少的儿童。这恰好是一个生育率微观经济理

论的例证，它可以说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 3.2 发展中国家对儿童的需求

我们已经知道，生育率的经济理论假定，家庭对儿童的需求取决于家庭对一定量存活（通常是男性）儿童的偏好（在高死亡率地区，父母会生育出比他们实际期望数目更多的儿童，因为有些儿童不能生存下来），取决于这些被抚养儿童的价格或“机会成本”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特别是在贫穷社会，儿童被看作是经济上的投资品。因为，各种形式的儿童劳动和这些儿童长大成人后对老年父母的奉养构成了这种投资的“预期收益”。正如库滋涅茨教授在以经验为依据的深入研究所指出的：

它们(指欠发达国家)是多生多育的国家。因为，在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大部分人口都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寄托在更多的孩子身上。儿童被看作是家庭劳动力的供给，一种赌注，也是在一个毫无保障的富人社会中的经济与社会保障。<sup>①</sup>

另一方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决定家庭规模的内在心理和文化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开头2个或3个孩子被看作是“消费品”，对于他们的需求丝毫不受有关价格变动的影响。

所以，在生育率的经济理论中，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选择机制被假定为主要调节作为投资的新增儿童或边际儿童，在对新增儿童的抉择中，父母要权衡抵付费用后的经济利益。我们知道，这种经济利益主要是指从儿童劳动（通常是农村的儿童劳动）和对年老的父母提供的财力支持中取得的预期收入。与这个经济利益相抵的是两个重要的“费用”要素。

1. 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即，如果她不呆在家中照料孩子所能挣得的收入）。

2. 儿童的教育成本（既包括机会成本也包括实际费用），也

就是说，用“高质量”、高成本的文明儿童来取代“低质量”、低成本的愚昧儿童。因为，前类儿童预期可挣得高收入，后类儿童只能取得低收入。

应用于欠发达国家的家庭生育率理论，利用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思路”推论道：当由于妇女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扩大，或由于学费的上涨，或由于制定了最低年限的童工法，或者由于财政上的资助建立了老年社会保障计划等使儿童的价格或成本有所提高时，父母将需要更少量的“新增”儿童，用儿童的质量来代替儿童的数量，以母亲的就业收入来代替孩子的儿童劳动。因此，一种诱导家庭情愿接受更少儿童的方法是：通过为年轻妇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高薪工作来提高孩子的抚养“价格”。

### 3.3 某些经验论据

智利、菲律宾、台湾和泰国的统计为生育率的经济理论投了一张信任票。例如，统计资料表明，妇女较多的非家务就业机会，儿童较高的就学率，特别是小学和中学前几年的较高的就学率，总是与较低的生育率水平联系在一起。<sup>④</sup>当妇女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后，她们赚的钱往往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会增大，并生育更少的孩子。此外，统计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儿童死亡率下降和其后的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假如家长期望一定量的存活儿童，那么，增长着的收入和较高的生活水平就能够降低儿童死亡率，增加头胎存活率。结果，要增加同等数目的存活儿童，较低的出生水平就成为必需。这个事实突出地说明，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第三世界的生育率水平，改善公共卫生和提高儿童营养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当增长的收入能够使家庭负担更多的孩子时，这些统计资料似乎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父母往往把资金投放到少量的、有教养的孩子身上，用儿童的“质量”来代替儿童的数量，

因为这些受教育的孩子最终有能力挣得更多的收入。另外，较多的收入往往也会降低生育率。因为，收入增加将引起对物质产品需求的相对增大，特别是在低收入阶层中，先前被预算约束排除在外的那些物品被纳入了需求。在低收入国家里，超过社会负担能力和最低理想数的新增儿童将成为“劣等物品”，也就是说，超过最低生活水平的临界值，较高的收入将诱导家庭自觉需求更少量的儿童。

### 3.4 发展和生育率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对以上分析作一概述。在发展中国家，当大多数人特别是贫苦阶层的人们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时，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将成为降低生育率的最有效的力量。由于以下因素，贫苦阶层的生育率能够降低。这些因素是：

1. 受教育妇女人数的增加和妇女地位及状况的改观。
2. 非农业妇女工资性就业机会的扩大。这会引起传统的儿童抚养价格或“成本”的上升。
3. 通过扩大直接就业和增加夫妻工资的方法或通过收入和财产重新分配的方法来提高家庭收入水平。
4. 改进公共卫生计划和改善父母及子女的营养状况，使婴儿死亡率得到降低。
5. 在家庭的触角之外，完善老年保险和其它保险体系，以减轻父母对子女的依赖。

总之，在第三世界国家，为贫苦阶层提供更广泛的有利的就业、教育和卫生服务，不仅可以增进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即他们的“发展”），而且能够有力地激发他们需求更小家庭的动机（即“选择的自由”），这对于降低人口增长率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在这种动机存在的地方，切实可行的计划生育计划才能成为有效的手段。

## § 4 若干政策分析

鉴于以上的分析，同时根据在第6章中讨论过的各种广泛的目的和目标，为了降低世界人口长期的总增长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各国政府及各国际援助组织能够考虑采用哪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呢？有三个方面的政策可以对世界人民当前及将来的经济福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 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用来影响，甚至“控制”其人口增长和分布的那些一般的和特殊的政策。
2. 发达国家政府在其国内能够减少对有限的世界资源的过度消费、促进更平等地分享世界经济进步所带来的好处的那些一般和特殊政策。
3. 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其人口政策目标的那些具体方法。

下面我们将逐一予以论述。

### 4.1 发展中国家能够做什么<sup>⑤</sup>

正如我们从第6章提供的各国资料和微观经济学关于人口生育率的理论分析及实证材料中所看到的，影响家庭要养育孩子的主要原因，是和我们在这本书第一篇中已经分析过的和发展这个概念联系最密切的那些因素。因此，在从人口的高增长率向低增长率的过渡过程中，某些发展政策是特别重要的。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绝对贫困；减少收入的不平等；扩大各种（特别是对妇女的）教育机会；向男女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施各种现代化的公共医疗保健计划，特别是向城乡贫苦群众提供清洁的水源和卫生设备；通过用更多更好的食品，提高营养、增进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最后，向更多的人民群众更加平等地提供其它



种种社会服务。再说一遍，实际上无论是人口的数量，还是父母缺乏理性，都不是造成欠发达国家“人口问题”的根本原因。相反，是赤贫的普遍化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为家庭的人口众多和人口的大量增长提供了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虽然如此众多的长期发展政策对于人口增长的基本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在短期内降低出生率，欠发达国家还可以采用一些更加特殊的政策。他们基本上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控制”人口出生率。

1. 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和系统教育（正规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的成人教育），规劝人们建立小规模的家庭。
2. 他们可以实施计划生育计划，提供各种保健和避孕服务以鼓励人们的行为符合需要。占欠发达国家人口近90%的47个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了这种由政府发起或由官方支持的计划（见表7.1）。如今仅有几个大国如缅甸、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扎伊尔还没有实行这种计划。
3. 对于生育，他们可以审慎地运用各种经济刺激和限制性措施。例如，通过取消或减少产妇的产假和各种福利；减少或取消对养育超过一定数量孩子的家庭的经济鼓励，以至采取强制性的经济处罚；建立各种老龄社会保障事业和童工最低年龄法；提高学费和取消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各种高额的公共补助；最后，通过各种直接的现金支付对人口少的家庭给予补助。尽管目前在30多个欠发达国家中实现了某些奖惩性的人口政策，但只有新加坡、印度、台湾、朝鲜和中国在试行各种奖惩性的人口政策以减少家庭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新加坡在分配有限的公共住房时，并不优先照顾人口多的家庭。同时，还把有工资收入的产假限制到最多生育2个孩子，并按照孩子的数量比例收取接生费，减少对养

表7.1 1960—1984年实行计划生育制度降低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和地区

	1960年 以前	1960— 1964年	1965—1969 年	1970—1974 年	1975—1979 年	1980—19 84年
亚洲	印度	中国 斐济 南朝鲜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马来西亚 尼泊尔 新加坡 斯里兰卡 台湾 土耳其	孟加拉国 香港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也门
拉丁美洲			巴巴多斯 多米尼加 共和国 牙买加 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	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 墨西哥 波多黎各	危地马拉	海地 洪都拉斯 秘鲁 巴西
非洲			埃及 纳加 肯尼亚 毛里求斯 摩洛哥 突尼斯	博茨瓦纳		阿尔及利亚 布隆迪 冈比亚 莱索托 卢旺达 塞内加尔 乌干达 津巴布韦
总计	1	4	18	9	2	13

资料来源：人口委员会资料库，1984年11月。

育3—5个孩子家庭所得税的减免权。1984年，新加坡甚至实行对母亲有大学文凭的所有儿童给予入学优先照顾，而对没有大学文凭的母亲仍然实行不许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惩罚性政策。这样做的理由是（尽管这种理由值得怀疑）：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所生的孩子比一般孩子要聪明。因此，应鼓励多生这样的孩子。而那些缺乏教育的妇女由于被认为智力低下，所以，应该限制她们的生育。在印度，一个茶叶种植园试行了一种女工在未怀孕期的个人储蓄制度，储蓄额根据女工生育孩子的数量按比例决定，如果哪个女工生育的孩子过多，她的全部存款就会被宣布作废。当该女工到了45岁更年期时，她就可以得到她的全部储蓄，做为她不再生育孩子的一种社会保险。台湾的农村也实行了一种试验，为了支付年轻夫妇头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当地政府把一笔基金存入银行。但是，如果哪对夫妇生育了第3个孩子，他们就部分地丧失了对这笔基金的享用权，如果他们有了第4个孩子，便完全无权享用这笔基金了。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专门用来鼓励每个家庭少要孩子的同时，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了鼓励人们减少家庭人口，南朝鲜也已实行了全国性的奖惩制度，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只要夫妻有一方做了绝育手术，他们的孩子就可以享受助学金和免费医疗的优待。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拥有了最全面的奖惩性的人口政策。1980年，中国发动了一场目的使人口的年出生率在10年内降到1%的新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由于政府制订了1个家庭只生1个孩子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1982—1983年中国采取了严厉的同时往往是残酷的措施，各种社会和政治的强制措施包括：育龄妇女要

想获得合法的生育指标，就必须向当地的街道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头胎生育一般都能得到批准。但是，要想生第2胎，一般只能是第1胎的孩子有严重的先天不足或该妇女再婚时才能得到批准。经济上的强制措施中还包括对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优先照顾。生育2个或2个以上妇女一般就不能晋级提薪，还要实行严厉的罚款，有时这种罚款能超过中国人均收入的10倍。同时，还要对生第2，第3胎的妇女征税。在这种严厉的国家政策下，再加上人们强烈的想要男孩的习惯，据报道，杀害女婴的事件有了惊人的增长。

最初的结果似乎表明，这些经济的和社会的试验措施正在实现他们的人口目标。7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内，印度曾推行了一项以输精管结扎为主的节育计划，如果男人们同意接受“自愿”的绝育手术的话，他们就能够直接被发给一笔现款，发给半导体收音机，或者是免费赠送观看足球锦标赛的入场券。但是，这项措施在政治上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在连续的几年中阻碍了国家计划生育计划的实施。然而，中国的新的人口控制计划的影响则更加难以预料。通过采取严厉的社会和经济措施实现一个家庭只生一个的目标，从而使人口下降所带来的好处是否能抵得上人们对于孩子的价值的传统家庭观念的急剧改变所付出的代价，只有时间才能做出判断。在居住着80%人口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对这种人口政策的明显抵制。

4. 各国政府想用消除当前城市对于农村在各种有利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方面的不平衡的办法，来转移迅速发展中的城市地区人口。在第10章我们将会看到，当前，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都越来越强调农村的发展，这部

分地是为了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增长浪潮，从而促进人口的地区分布更加合理。

5. 各国政府可能想直接通过国家立法和种种惩罚的权力，来迫使人们不要让家庭的人口过多。因为明显的理由，只有几个国家会想采取这样的强制办法，这样做不仅在道义上往往令人厌恶和从政治上无法实行，而且这样做还几乎总是极其难以进行监督管理。1977年3月的印度大选，英·甘地政府的失败主要就是由于人民对政府强制实行的绝育措施普遍反对的结果。她在1980年重新执政，到1984年被刺为止，一直许诺不再强制推行生育控制政策。而中国目前的政策则近似于公开的强制。
6. 最后，如果不做出种种努力以提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随之提供有利于晚婚和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种种条件，那么，任何一种政策措施都不能做到有效地控制人口出生率。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多种方案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为妇女提供在社会上就业的机会。由于能够获得挣取收入的机会，这可以使青年妇女在经济上变得能自立，并由此而使她们在选择伴侣和决定婚期问题上更能自主，从而改善了妇女的地位，使得她们有可能推迟结婚。女性就业增加了家庭收入，这也可以减轻妇女早嫁的家庭压力。已婚妇女的就业为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作出了保证，减少了妇女对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对男性儿孙在经济上的依赖。此外，妇女就业还可以使妇女在养育子女与挣取收入发生矛盾时，权衡多生儿女的机会成本。妇女就业为妇女真正提供了一个对于早婚和多生育子女的替代选择，而早婚和多生育通常是由于妇女没有自己的经济收入的结果。妇女就业带来的更进一步的好处是，它减弱了妇女和社会的隔绝，这种隔绝往往是推

行计划生育活动的一个障碍。工作岗位还可以成为宣传节育知识和节育措施，以及从女工们那里获得实行晚婚少育的社会支持的基地。中国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证。

#### 4.2 发达国家在其国内能够做什么

当我们从全球观点来研究人口问题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人口数量及其分布与许多非再生性资源的枯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象美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6%的国家，每年使用的资源占世界每年所用资源的40%，世界20%多一点的人口每年利用的资源占世界的80%。这样，我们正在解决的显然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些数量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财富不断增长和世界收入分配极其不均对许多非再生资源枯竭的影响；这些资源如石油、某些重要金属和其它原材料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从食物的消费方面来看，象小麦、玉米和水稻这些基本的粮食作物，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人类直接从食物取得能量供给的主要来源(占52%)。间接的粮食消费(如用粮食喂养牲畜，然后再变成牛肉、家禽、猪肉、羊肉、或间接制成奶、酪、蛋以供消费)构成了食物性能量供给的其余重要部分。从资源方面来看，世界耕地的70%以上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然而，普通的北美洲居民比印度、尼日利亚或哥伦比亚的人们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和各种相应的农业资源(土地、化肥和水源等)要高出4倍。说到能源，它可能是现代社会第2位最重要的资源。1984年，人均的能源消耗水平(石油、煤、原子能和水利发电)美国是巴西的25倍，印度的60倍，尼日利亚的191倍，埃塞俄比亚的351倍！发达国家私人汽车、家庭和办公室里的空气调节器、电动剃须刀等对能源的消耗越多，意味着在欠发达国家中可用于发展小型家庭农场的能源实际上更少。或者，这意味着穷苦人家为了得到这些宝贵的资源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资源的运用方面，人们可以举出其它许多类似的十分不平等的例子。大概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举出无数个富有的发达民族对许多稀缺的非再生性资源的不必要和代价高昂的浪费例子。因此，关键在于，任何一个通过社会鼓励和计划生育来限制第三世界人口的增长，以实现人口和资源之间更合理的均衡的世界性发展计划，还必须包括富裕民族为使他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作风简朴化而有计划地承担的责任。这种变化将使穷国能利用这些资源来推动对减缓人口增长所必须的社会经济发展。

除了使生活作风和消费习惯简朴化之外，富裕国家为减小当前的世界性人口问题能够采取的另一项非常积极的国内政策可以是，放宽穷苦的非熟练工人及其家属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向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进行国际移民的法律限制。19世纪和20世纪初从西欧和南欧向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进行的农民在国际间的迁移是减轻当时欧洲各国经济不发达和人口压力问题的重要因素。今天的第三世界各国不存在这样的“安全阀”或出路。然而很明显，世界上许多人口稀少的地区和许多劳动力缺乏的国家还是能够从这种人口的国际性迁移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的（见第19章）。

#### **4.3 发达国家怎样才能帮助各发展中国家实现人口计划**

各发达国家政府和多国援助组织还可以有一些办法帮助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成功地实现他们的人口政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落后国家在努力发展他们的本国经济中，各发达国家（包括目前各富裕的阿拉伯产油国）向他们提供真诚援助的意愿。这些真诚的援助不仅包括大量政府和私人资金的援助，而且包括改善贸易关系，更加切合实际的技术转让，帮助提高当地的科研能力，改进国际贸易的定价原则，以及对世界上稀

缺的自然资源更为平等的分配（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这些及其它方面的国际经济关系将在第3和第4篇中加以考察）。

富裕国家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还可以在直接降低人口出生率的两种活动中发挥重要的援助作用。其一，是对于节制生育技术、口服避孕药、现代宫内避孕器、自愿绝育手术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几年来，由于国际援助组织、各私人基金会和发达国家的援助机构的资助，这些研究一直在进行。为了进一步提高避孕技术的效果，同时将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需要对这方面的研究予以鼓励。

其二，包括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公共教育和人口政策的研究等活动提供资金援助。这是发达国家对人口问题提供援助的传统的和主要的方面。对这些活动提供的资金总额从1960年的200万美元左右急剧地提高到了80年代初期的近30亿美元。但是，如果这些资金（特别是对那些仓促推行的计划生育计划提供的资金）相反被直接用来帮助欠发达国家提高其国内最贫穷人民的生活水平的话，它们是否能更有效地实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标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当人民还不想减少家庭人口时，周密制定的计划生育计划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 § 5 政策目标的争论、权衡与选择：

### 若干结论

为了使第三世界国家限制其人口增长和使富裕国家拿出稀缺的世界资源用于发展，我们对可能的政策抉择进行了探讨，基本上想说明按照既定的发展目标，可能采取的政策范围。但是需要将各种政策的各种可能的并往往相互矛盾的结果加以权衡。例如，为了减少总人口的增长而降低出生率，为了避免城市的过分



集中，改变既定人口的地区分布而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这是两个共同的人口目标。但结果都是，为降低人口出生率而制定的主要战略之一——提高教育水平，特别是妇女的教育水平——恰恰是促使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我们将在第9章讨论。这样，虽然提高教育可能会减少家庭人口，但它同样可能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城市人口的拥挤，随之产生种种社会的、人身的和心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同时采取一种发展农村的政策。这种政策除了要提高人们的健康、文化和社会福利之外，还要提供更多的农村就业门路，以便当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时，受过更多教育的男人和妇女能依然留在农村发展生产，同时少生育孩子。

除了对目标可能产生的矛盾进行分析和权衡之外，发展中国家中的政策制定者甚至比发达国家中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项算约束。因而，他们应当根据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的观点对各种可能的政策加以选择。如果多用1卢比、1铢或1先令的费用搞计划生育、各种营养补充项目、发展教育、扩大就业或各种直接的鼓励和限制措施，那么，它们会不会更有利于降低出生率？遗憾的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在经济发展中可能有许多其他的目的和目标比降低出生率更为重要。所以，人们不仅必须根据如经济和最优化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还要对各种可能的目标中哪一种符合需要，哪些是重点的明确的价值判断来作出抉择。

虽然，花大量的经费制定各种先进的计划生育计划以直接降低人口出生率，在某些人口稠密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这不必是一个主要的发展目标。人口增长的下降，似乎更是各种直接为了提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穷苦大众的生活水平的政策的自然结果。经济的真正发展一般会促使人们少生育孩子。然后各种精心设计、认真执行的计划生育计划和其

它直接的人口政策才能发挥重大的实际作用。只有在能有效地致力于克服贫穷的全国和地区性的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第三世界的问题才能成功地获得广泛的解决。这种观点不仅是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一致意见，而且也体现了参加布加勒斯特第一届世界人口会议的100多个国家的完全一致立场，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宣布：“有效地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首先是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变。”<sup>⑥</sup>

## 注 释

① 几何级数是指像1.2.4.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这样的数列，其中后面的数字是它前一数字的倍数。如同复利，几何级数很快就可以变成很大的数字。

② 在f点，并且只有在f点上，最后一个单位的商品和儿童消费的边际效用才会相等——这是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参看P.W.贝尔和M.P.托达罗：《经济理论》，内罗毕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41—55页。

③ 参看西蒙·库兹涅茨：《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间人口生育率的差别：构成和意义》，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1974年讨论论文第217号第87—88页。

④ 参看保罗·舒尔茨：《人口生育率的决定：政策评价的理论、证明和应用》，桑塔莫尼克城加利福尼亚兰德公司1974年1月。

⑤ 对于巴西、中国、南朝鲜、台湾和斯里兰卡等第三世界国家人口政策进行的有价值的评论参见G.麦克尼科尔和M.内奇：《人口的增长：当代的问题和战略》，《为经济发展而奋斗》阅读材料。

⑥ 《世界人口行动计划》，布加勒斯特1974年8月A. I部分。

## 概念复习

计划生育计划

降低生育率的经济刺激和抑制措施

(Family-planning programs)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for fertility reduction)
人口过渡	
(Demographic transition)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降低生育率的私人与社会利益及代价
(Malthusian population trap)	(Private versus social benefits and costs of fertility reduction)
“宏观”的人口-发展关系	教育和生育率的关系
(“Macro” population-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relationship)
边际效用	对儿童的“投资”
(Marginal utility)	(“investment” in children)
生育率的微观经济理论	
(Micro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妇女时间的“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of a woman's time)	

## 问题讨论

1. 简述人口过渡理论。试说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约处在这种过渡的哪个阶段？
2. 所谓的家庭或微观经济学的生育率是怎样与消费者选择理论结合的？你认为经济刺激和抑制措施对决定家庭规模有无影响？试举例说明你的见解。
3. “世界的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数量增长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而资源有限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同时，也是由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请对这段话加以评论。
4. 简要概括并评论第三世界国家在降低或抑制人口增长率时可能采取的政策。

## 第8章 失业：问题、现状与分析

城市人满为患，失业不断增长……“边际劳动者”，也就是游离于城乡之间，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不幸者现在已经超过了5亿，到1990年将达到20亿，我们难道能够想象人类秩序能在这样之多的人受苦受难的基础上维持下去吗？

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 § 1 就业问题：几个基本争论点

从历史上看，西欧和北美的经济发展理论被说成是：经济活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且无论国内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是如此。当城市工业规模扩大时，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农村中节约劳动型生产技术的发展则降低了农村对人力的需要。这两个现象相结合，使西方国家有可能将它们的人力资源依次有效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以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基础，也主张必须集中力量，推动城市工业的持续增长。因此，城市被认为是“增长中心”和经济发展的焦点。不幸的是，这种迅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在多数情况下，已被证明不能获得根据历史经验所期望得到的结果。

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同时受到历史上罕见的、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入、农村劳动生产率停滞和城乡失业和就业不足不断增长的困扰。实际上，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发展不协调

的最惊人的标志大概就是大量失业的存在。在广大穷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公开失业的人数总是占劳动力的10—20%之间。而在教育程度不断提高、15—24岁之间的年轻人中，失业率更高。另外，城市和农村都还有更多的劳动力处于“就业不足”状况（见表8.1）。他们既没有补充的收入（如果他们全部时间处于就业），也就没有机会（如果他们部分时间就业）来使他们的非常低的收入水平提高到那些在现代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工作的人的收入水平。由于这个问题和整个第三世界的贫困化密切相关，所以就业问题在研究不发达问题中占据中心位置。

但是，失业问题的范围，远远不只是单纯的就业机会少或劳动力利用不足以及长时间工作的人生产率低。它还包括，人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对就业的看法和期望与城乡实际适合他们的工作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城市中养成的厌恶体力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思想以及培养“白领工人”的教育制度，都给要加速发展国民经济的穷国造成极端紧张的局面。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失业问题，有许多方面是独特的，从而对这个问题有各种非常规的经济学分析。归结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1. 欠发达国家劳动力中长期饱受失业和就业不足之苦的人数远远超过工业化国家陷于失业的人数，甚至在“大恐慌”最严重的年代也是如此。

2. 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失业问题的原因要比发达国家复杂的多，因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需要各式各样的政策，绝非凯恩斯式的单纯扩大总需求的政策所能济事。

3. 重要的是要记住，不管第三世界国家失业问题的规模和原因如何，它总是和悲惨的贫困处境和低下的生活水平相联系的，而这种情况现在的发达国家从未经历过。因而现在迫切需要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采取一致的行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发达

国家需要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同时，发达国家也应该检查和调整其对第三世界的传统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地区贸易、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政策。

由于不可能公正地评价第三世界各式各样的国家中许多错综复杂的就业问题，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将集中研究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的两个问题：

1.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工业的迅速增长不能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

2. 尽管城市失业水平很高而且不断增长，为什么还有大批人继续自各个农村地区向已经人满为患的城市迁移？

对这两个问题的大量调查表明，为什么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与现在发达国家历史经验有明显的差别，以及为什么不断增长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也不是像50—60年代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初期能自己纠正的一种“过渡现象”。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它们是欠发达国家内部以及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深远得多的经济社会动乱的征兆。

本章的目的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并加以分析。本章开始先对第三世界国家目前和未来的失业问题趋势进行定量剖析；然后讨论就业的性质及特征以及失业贫困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失业问题以最简单的话来说，可以看成是现代化部门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缓慢而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增长迅速所造成的后果，尤其是人口总量增长和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所造成的。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探讨需求因素在传统和现代就业决定模型中的作用方式，而供给因素我们将在第9章分析讨论，在那里我们将着重研究城市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问题，并对不能解决不发达国家就业问题的各种政策进行总结。

## 第三世界失业的现状：例证和概念

我们首先观察有关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质和量。

### 2.1 就业和失业：趋势与对策

在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国家的计划机构以及国际援助组织等对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更加关注。这就使对失业问题的数量方面的研究更为广泛和精细。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ILO）在70年代初期，着手规划雄心勃勃的世界就业方案时，在哥伦比亚、肯尼亚、斯里兰卡、印尼、菲律宾等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和在其它国家进行的类似调查，都证实失业问题的现实严重性以及将来很可能更加恶化。

表8.1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自1960年到1990年就业与失业问题的发展趋势，其中不仅表明了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而且分别列出了亚、非、拉各洲的数字（1990年是估计数）。我们首先看到，失业总数从1960年的约3 650万增加到1973年的5 400万以上，增长了46%，平均每年增长3%，超过了同期就业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从整个发展中国家来看，失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就业的增长。

当我们把1973年就业不足的2.5亿包括进去以后，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比率就达29%，而非洲的劳动力利用不足的比率高达38%。通过表8.1还可以看出，当劳动力不断增长时，边际失业率（不能找到正规工作的新劳动力的比率）很有可能高于平均比率。虽然，亚洲、拉丁美洲的劳动力利用不足的程度比较低，但失业问题不论从性质上、还是从数量上，其严重性丝毫不亚于非洲。例如，虽然亚洲的失业率比非洲要低，但失

表8.1 发展中国家60—90年代的  
就业与失业(千人)

指 标	1960	1970	1973	1980	1990
整个发展中国家*					
就 业★	507 416	617 244	658 000	773 110	991 600
失 业	36 466	48 798 <sup>†</sup>	54 130	65 620	88 693
失 业 率(%)	6.7	7.4	7.6	7.8	8.2
失业与就业不足的 总比率(%)△	25	27	29		
非 洲	31	39	38		
亚 洲	24	26	28		
拉丁美洲	13	20	25		
整个非洲					
就 业★	100 412	119 633	127 490	149 390	191 180
失 业	8 416	12 831	13 890	15 937	21 106
失 业 率(%)	7.7	9.6	9.8	9.8	9.9
整个亚洲•					
就 业★	340 211	413 991	441 330	516 800	660 300
失 业	24 792	31 443	34 420	43 029	59 485
失 业 率(%)	6.8	7.1	7.2	7.7	8.3
整个拉丁美洲					
就 业★	66 793	83 620	89 180	106 920	140 120
失 业	3 258	4 527	5 820	6 618	8 103
失 业 率(%)	4.7	5.1	6.1	5.8	5.5

资料来源:扬威·沙伯罗,《1960—90年代的就业与失业》,《国际劳工评论(112)》1975年第6期表3和附录。

• 不包括中国

☆ 包括就业不足

△ 没有计算1980年和1990年的数字



业人数的绝对量却是非洲的许多倍（如1973年亚洲失业人口是3 440万，而非洲的失业人口是1 390万）。

从对1990年所作的预测分析中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失业率将会稳定上升，失业人口总数将几乎达到9 000万。再加估计的就业不足的人数（既包括失业和半失业的人，也包括那些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人），到80年代中期，数字可高达6亿。虽然这些数字是比较粗糙的估计，但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 2.2 劳动力的现状与未来

在欠发达国家中，寻求职业的人数主要取决于该国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年龄结构。在整个人口增长和当地劳动力增长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不管从总体上说人口增长率高如何，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组合不同都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样是3%（或30%），但在自然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50和20、40和10的情况下，其劳动力的内容有显著差别，因为人口的年龄结构在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条件下和在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条件下是显然不同的，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结果也不一样。出生率只对新增人口的数量产生影响，而死亡率却对不同年龄的人都有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的分在只有不均衡的特点。一个存在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社会经济中，需要被抚养的人口（即人口中1—15岁的人）比重较大，所以，现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最近出现的死亡率迅速下降的趋势，正在使目前劳动力数量增加，同时，持续的高出生率却创造出高的抚养比率并迅速地扩大未来的劳动力数量。

第二，生育率下降对劳动力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影响，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效，即使在生育率下降非常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原因就是我们在第6章分析的所谓“人口增长潜能”现象。例如，1985年欠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了50%，但到

本世纪末时的男劳动力数量只下降13%，绝对数从12.7亿下降到11.1亿。当然，也不能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其影响，如果从长期来看，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因此这一事实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今后十几年将成为劳动力的人口现在已经出生，而今后20年的劳动力数量是由目前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决定的。

根据目前所作的劳动力预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近10年内，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将以平均2.2%的速度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将以平均2.1%的速度增长（参见表8.2）。在未来

表8.2 1960—2000年的劳动力增长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1960—70	1970—80	1980—90	1990—2000
发展中国家	1.8	2.2	2.2	2.1
发达国家	1.2	1.2	0.7	0.5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2.4	2.6	2.3	2.0
拉丁美洲	2.4	2.7	3.0	2.7
中东和北非	1.9	2.6	2.9	2.2
下撒哈拉非洲	2.2	2.2	2.5	2.6

资料来源：《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表27。

25年中，拉丁美洲各国在第三世界内，劳动力增长速度可能最高。但是，如果根据实际数字来看，预计欠发达国家中就业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劳动力增长的百分比率。一项比较可靠的预测认为，在2000年寻找工作的人数将比1970年多9.2亿人以上，其中50%的人集中在南亚，25%的人集中在东亚（见表8.3）。

### 2.3 劳动力利用不足的明确界限

要对失业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就不但应该看到那些明显无事可做的、公开失业的人们，而且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对

表8.3 1970—2000年的劳动力预测

	劳动力用百万单位 (百分比)			
	1970	1980	1990	2000
发达国家	498.3(33)	554.7(30)	593(28)	649(25)
欠发达国家	1013.5(67)	2180.9(70)	1547(72)	1933(75)
地区				
南亚	430.1(43)	549.0(43)	691(45)	886(46)
东亚	379.6(37)	467.3(37)	519(33)	602(31)
非洲	125.8(12)	160.3(12)	212(14)	277(14)
拉丁美洲	76.2( 8)	102.0( 8)	129( 8)	172( 8)

资料来源：《ODC:1979年工作报告》，表A—13（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局的数字编制）。

劳动力利用不足的现象给予充分的重视。埃德加·爱德华兹教授在他对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所进行的全面考察报告中，曾正确指出：“除了考察众多失业者外（其中许多人只能通过从事家务劳动而获取微薄收入），还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时间（他们当中许多人每天每周和每年都愿意多干一些时间）；（2）工作强度（这个问题影响到健康与营养状况）；（3）生产率（就业者由于缺乏用以进行工作的辅助材料，就会降低生产效率。甚至这些也只是影响工作效率的最明显的方面，还有必要考虑诸如动力、态度和文化上的阻力（如歧视妇女等因素）。”<sup>①</sup>

因此，爱德华兹对劳动力利用不足区分为以下五种形式：

1. 公开失业：包括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种形式（自愿失业在这里是指一些人不愿意接受他们能够得到就业机会的职业而造成的失业，这也意味着这部份人能够从就业以外的途径取得收入）。

2. 就业不足：是指一部份人实际工作的时间（每天的、每周

的或者每个季节的) 小于他们愿意工作的时间。

3. 表面上有工作但又利用不足: 这种类型既不能算作失业, 也不能包括在就业不足类型里。但在事实上, 他们工作量不足。它包括: a. 变相的非充分就业: 许多人表面看来是在农场或政府工作, 但实际上, 他们所提供的劳务根本就无须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往往私有企业在社会的压力下也大量存在着这种隐蔽型的就业不足。如果把工作在就业人中间公开进行分配, 那么隐蔽型的就业不足就会转化为公开的就业不足。b. 隐蔽失业: 是指那些从事“第二选择”非职业活动的人, 比如从事教育和家务劳动等不合意的工作。主要因为 (i) 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不一致; (ii) 对妇女来说, 受到既定社会习惯的约束, 所以没有工作机会, 因而教育机构和家庭就成为他们“最后不得不选择的雇主”。此外, 那些继续接受教育的人中, 有许多人可能是能力差, 如果不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就不能在取得职业的竞争中获胜。c. 提前退休: 这种现象在行政机构比较明显, 并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在许多国家, 在人们寿命延长的同时, 退休年龄却下降, 其原因就是为了减轻来自下面的失业压力, 以提供就业机会。

4. 职业损伤: 是指那些由于工作时间过长, 工作量过度, 但缺乏营养和必要的卫生保健措施而受到损害的劳动者。

5. 不生产的工人: 指那些能够进行生产性劳动的人, 但由于长时间补充资源不足, 使其投入所得只能维持生存。<sup>②</sup>

虽然, 以上列举的欠发达国家劳动力利用不足的几种表现形式高度相关, 并且每一种表现也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 但是为了方便起见,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 我们只讨论失业和就业不足这两个具体问题。

## 2.4 失业、贫困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

高度的失业与就业不足、普遍贫困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就大部分情况而言，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者只有部分时间工作的人也应属于很穷的人。当然，那些在国营或私营部门就业，并取得固定收入的人则属于典型的中上等收入阶层。虽然那些有全日工作的人较富裕，但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认为任何没有工作的人都是穷人。这里还存在着—批“自愿失业”的城市工人。这部分人是要找—种与他们的学历或者技术水平相匹配的工作。他们拒绝接受那些他们认为是下等的工作，因为他们能够获得来自外部的经济收入的支持（如亲戚、朋友或当地的借贷者），这种人虽然也算作失业，但他们并不贫困。同样的道理，许多人从每天的工作时间看，他们整天工作，然而每天收入微薄。许多在所谓城市“非正规”部门单干的劳动者（即小商小贩、干零活儿的和修理工）也属于此类。上述这些人虽然也可算作充分就业，但往往也很穷（见附录9.2）。

尽管在以上的分析中对失业与贫困之间有必然联系这一点持保留态度，但在欠发达国家中，付给最穷的人合理的报酬，提供更多的生产性就业机会等措施，仍然是减少贫困和收入的不均等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我们在第5章所作的分析已经表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并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办法。解决贫困问题需要的是长期、全面的社会经济措施。当然，采取增加就业机会，收入平等化的政策对解决问题肯定仍是大有益处的。因而在任何一个以解决贫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就业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 2.5 工业产出落后于就业增长：1950和1960年代在确定重点上的失误

在50和60年代，发展经济学著作中一个有名的教条就是认为，只有通过资本积累的提高和高速的工业增长才能实现成功的经济发展。所以通过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部门，以解决国内市

场的需要和吸收城市经济中出现的“过多”或“剩余”的劳动力，才能使欠发达国家最快地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我们在第9章中将会发现，这样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由于农村不熟练劳动力到城市来寻找极为短缺的工作机会，而使中心城市过度的增长。

非常不幸的是，认为现代工业部门具有吸收这些来自农村的迁移者能力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现代城市工业部门没有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是20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明显的失败之一。例如表8.4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值增长3—4个百分点，才能带来就业一个百分点的增长。

所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其原因在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只占整个劳动力总数的10—20%。例如制造业雇佣了全国20%的劳动力，那么，只有每年增加15%的就业机会，才能吸收总劳动力中新增的3%（即 $0.2 \times 0.15 = 0.03$ ）。在表8.4中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制造业部门能以如此高的速度创造就业机会。实际上，在任何经济制度下，这种工业部门的就业速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不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历史上城市发展状况有明显的差异。19世纪的西欧，工业化的进程比城市化的进程快得多，工业中就业人口百分比也总是高于生活在城市的人口百分比。例如，1856年，法国生活在20000人以上的城市的居民占人口总数的10%，而同时在制造业就业的人则占20%；1870年，德国居住在城市的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2%，而同时却有近30%的人在制造业工作。所以，当时法国和德国的人口以每年不超过1%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只需每年增长3.3%就可以吸收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

相反，目前在不发达国家中，工业化的进程明显低于城市化

表 8.4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就业

地 区 及 国 别	制造业年产值增长 (1963—1989)	制造业就业增长 (1963—1989)
非 洲		
埃塞俄比亚	12.8	6.4
肯 尼 亚	6.4	4.3
尼日利亚	14.1	5.3
埃及 (UAR)	11.2	6.7
亚 洲		
印 度	15.9	5.3
巴基斯坦	12.3	2.6
菲 律 宾	6.1	4.8
泰 国	10.7	-12.0
拉丁美洲		
巴 西	6.5	1.1
哥伦比亚	5.9	2.8
哥斯达黎加	8.9	2.8
多米尼加共和国	1.7	-3.3
厄 瓜 多 尔	11.4	6.0
巴 拿 马	12.9	7.4

资料来源：大卫·马拉维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就业》，《经济杂志》1974年9月第84期。

的进程。几乎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城市居民的百分比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制造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的百分比。例如在1980年，巴西生活在50 000人以上的城市居民的百分比是52%多，而同期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则只占人口总数的20%。哥伦比亚的城市比率已达51%，而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只占17%。我们列举这些不

同经济环境的国家作例子，主要就是为了说明，企图依靠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来解决失业的政策是不现实的。况且即使现代工业部门增长了，也会带来劳动节约型生产的偏好，使解决就业的目的破产。

### § 3 就业决定的经济模式

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许多就业决定模式，其中大多数模式或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或是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的情况。他们通常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决定问题时往往不加思索地把这些模式照搬过来。所以近年来，从一些比较实际的就业决定模式中所引伸出来的政策结论往往和传统理论大相径庭。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研究四种主要的就业决定模式。首先要研究的是渊源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古典就业模式和凯恩斯就业模式，可以说，这两种模式对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就业问题没有多大用处。第三和第四种也是从新古典传统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就业模式。前一个是产出-就业的宏观模式，它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资本积累、工业增长和就业增长的相互关系上，后一个是价格刺激微观模式，它比较注意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劳动）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这两个模式与凯恩斯模式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就业方程的需求方面，从而强调政府干预对增加劳动力需求的作用。第五种模式，即综合模式，我们称之为“劳动迁移的二元结构模式”或者“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的模式”，这个模式全面考察了就业决定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它将成为我们第9章研究的对象。这个模式比起新古典模式要稍现实一些（虽然它也渊源于传统理论），它企图达到说明第三世界国家基本经济活动格局的目的。



在这一章，我们只讨论以上五种模式的前四种，然后在下一章用较大的篇幅分析第五种就业决定模式。

### 3.1 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型

**弹性工资和充分就业** 以消费者主权、个人效用和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和经济效率等理论为特点的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中有许许多多的“个别”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任何人也没有能力影响价格或工资，就业水平、工资率与其他价格和经济中使用的生产要素都同时由供求两种力量决定。只要追加的那个劳动力生产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即边际物质生产量乘以该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市场价格）大于该劳动力的成本（即现行工资率）生产厂商就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由于假定边际产品递减，并且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所以劳动力边际产品的价值和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就会象图 8.1 那样向负方向倾斜，因此只有在工资率连续下降的条件下，生产厂商才会雇佣更多的工人。

从供给方面来看，假定个人行为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因而他们根据边际效用，把其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两个部分。工资率的上涨会和娱乐时间的价格（或机会成本）增长相等。当其中任何一项的价格上升时，一般说来，对其需求的数量就会下降，并会为其他项所替代。因而在工资率不断提高时，劳务供给就会增加，导致劳动力总供给曲线向正方向倾斜（在第 9 章，我们将分析一个更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两种可供选择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图 8.1 描绘出了这个劳动力总供给曲线。

我们从图 8.1 中可以看出，只有在工资均衡点  $W_e$  这一点上，工人们愿意提供的劳动数量和雇主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才正好相等，任何高于这一点的工资，如  $W_2$ ，就会使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而引起劳动力相互之间的就业竞争，最终导致工资率下降到  $W_e$ ，如果工资率低于  $W_e$ ，如  $W_1$ ，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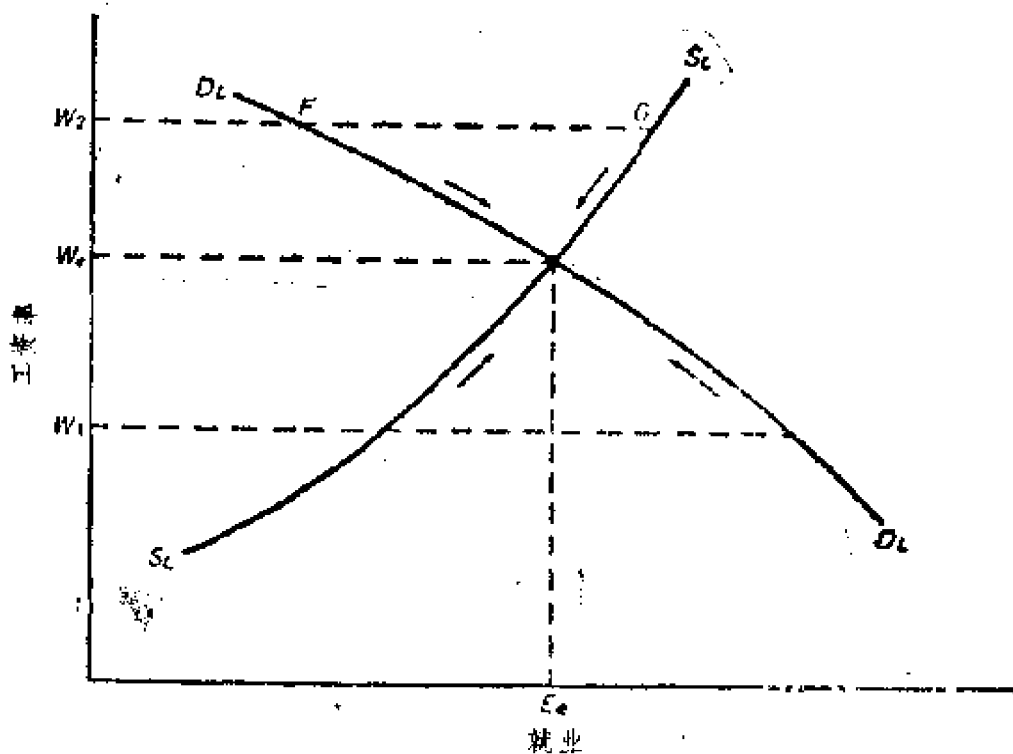


图8.1 传统经济学中供求决定的工资和就业

就会超过供给，从而在生产者之间展开竞争，最终又导致工资水平上升到均衡点 $W_e$ 。在 $W_e$ 这一点上，总就业量为横轴上的 $E_e$ 。如果我们要下定义，这就可以称之为充分就业。也就是说在均衡工资的水平上，也只有在这个工资水平上，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找到职业，从而这里不再存在非自愿失业者。换言之，在传统均衡经济学理想化了的弹性工资理论里，从来不会有失业！

**传统的自由竞争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局限性** 传统的自由竞争模式对我们真正了解第三世界国家工资和就业之间的现实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在现实中，由于工资率主要由一些“制度性的因素”包括工会的压力、政府的法定工资标准、跨国公司雇佣工人的策略所决定，工资率一般没有下降弹性，许多劳动力在工资上升时寻找职业，但却无工可做，这样非自愿性失业（尤其是就业

不足)的现象就会普遍出现,例如,在图 8.1 中,如果工资是由于制度的影响定在  $W_2$ , 那么这里就会有超额的劳动力供给 FG。但我们在下面的和下一章的分析中将会发现,对一个象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来说,虽然它不同于其它的生产要素,“影子”价格的概念对于分析发展政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从我们研究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导致发展中国家中的失业问题来看,古典模式还是有用的,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⑤

### 3.2 凯恩斯模型

**需求不足与就业缺口：简单模型** 西方世界在 30 年代开始了大萧条。像这样的大萧条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现代增长时代还没有经历过。普遍、明显的长期失业现象和低水平的国民产出使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理想化的古典主义眼界。很明显,传统的工资理论和就业决定理论中的有些解释很不合适。

对此出现了两种主要理论,解释出现了什么情况。英国的琼·罗宾逊教授和美国的爱德华·H·张伯伦教授在微观方面的“不完全竞争”理论说明了由一家(垄断)或几家产品销售者控制市场(寡头),或者由一个或几个资源购买者控制市场(买方垄断和买方寡头)的本质及其影响。这个理论说明,这种不完全竞争的每一个场合,资源(包括劳动)都不会得到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将会比以完全竞争为特点的产品和资源市场生产的产品要少。这种“市场失灵”往往为在经济系统中弥补垄断和其它形式的集中销售力量在产出和就业方面的消极影响增加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辩护和经济理论的基础。在第 15 章,我们将进一步详细讨论市场失灵问题,把它与其它理论放在一起,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制订发展计划的基础。

另一个对严酷的大萧条经济现实做出反应的、迄今为止更有影响的理论是在宏观方面。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决

定一般理论。这个理论在当时看来是就业的“一般”理论，但现在，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中，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就业的“特殊”理论。<sup>④</sup>下面让我们扼要考察一下简单凯恩斯模型，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

凯恩斯理论基本上是从经济的“潜在产出能力”——在给定技术水平下充分、有效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产出水平——与有关的总需求水平的联系中解释国民产出和就业决定的。在最简单的凯恩斯“封闭”经济的总需求中包含三个基本成分：（1）私人消费者对各种产品和劳务的总需求（C代表消费）；（2）私人企业对投资货物的总需求（I代表投资）；（3）政府对消费与投资货物和劳务的需求（G代表政府消费和投资）。那么，国民收入水平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水平（Y）就可以简单表示为：

$$\text{国民收入 (Y)} = \text{消费 (C)} + \text{投资 (I)} + \text{政府支出 (G)}$$

$$\text{或简单写为： } Y = C + I + G \quad (1)$$

对一个有外贸的“开放”经济来说，人们要加上表示出口（X）和进口（M）的符号。二者的差额构成贸易“顺”差（即 $X - M > 0$ ），于是出现总需求的追加部分；或者贸易“逆”差，它会减少国民收入。因而，对一个开放的经济来说，方程（1）可以写为：

$$Y = C + I + G + (X - M) \quad (2)$$

但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我们只使用方程（1）。国民收入或支出（Y）是由总需求水平决定的（即 $C + I + G$ ）。这种国民产出水平，我们假定只与国民就业有关。例如，正象在国民生产函数中表达的， $Y = f(N, K, t)$ ，其中 $f'N > 0$ ， $f''N < 0$ 。在任何给定的技术水平上（t）和给定的土地和固定资本（K）情况下，整个国民产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与不同就业水平有关，这就是说，国民产出较高是与较高的就业水平相联系的。但

是由于任何社会总的就业水平受到参加经济活动的劳动力规模的限制，因而存在只有在充分就业状态下才能取得的某种特定的最大国民产出水平。这种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国民收入有时称为“潜在产出”，可以表示为 $Y_F$ 。

凯恩斯理论的要点，以及它与古典模型相区别的因素在于这样一个论点，即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天生就会保证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 $Y$ )，恰恰与潜在的、充分就业时的国民收入( $Y_F$ )相等。这完全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的状况。这在图8.2中表示。在图(a)， $C$ 加上 $I$ 加上 $G$ 的总和得到国民产出水平( $Y_1$ )，它比潜在的充分就业水平上的产出( $Y_F$ )要低。因此在总生产函数的图(b)中 $N_F$ 与 $N_1$ 之间的“缺口”说明失业水平。那么由此可以得出，如果消费与投资都已经由国民收入的现有水平决定，总需求能够增加的唯一途径是政府增加其总的开支，从 $G$ 到 $G'$ 。于是，为了要增加国民产出水平和随之消除失业、填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的缺口，政府的“赤字”支出就成为必须。

这样，凯恩斯主义为减少和消灭失业所开的药方就相当简单了，那就是：通过直接增加政府开支或通过政府政策间接鼓励私人更多地投资(例如，商业贷款的低利率、免税、投资补贴)增加总需求。只要经济中存在失业和过剩生产能力，产品和劳务供给就会对较高的需求自动做出反应。具有较多收入和较高就业水平的均衡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这种模型应用于发展的局限** 在把凯恩斯模型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时，用不着列举它的所有缺点。我们必须注意的缺陷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由于模型是从发达国家经济中产生的，因此，模型是基于构成这些国家特点的完善的产品、生产要素和货币市场机能的、制度和结构的、隐含的假设之上的。特别是，它是基于对发达国家正确但对发展中国家并不正确的这样一个假定，即

企业和农场会通过迅速扩大产出和就业，很快地、并有效地对产品需求增加的情况做出反应。但是，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增加产量和提高就业水平的主要障碍一般说来并非需求不足，而是结构和制度对供给的限制。缺乏资本、原材料、中间产品，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加上商品和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组织效能低下，运输和通讯条件落后，缺乏外汇以及富人以进口产品为主的消费模式——所有这些还有其它结构和制度上的因素，都同增加政府和个人需求是解决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就业（和贫困）问题的有效措施这种简单想法相矛盾。实际上，在供给方面存在严重限制的条件下（即国民产出的总供给曲线对价格“没有弹性”），通过政府赤字财政所扩大的总需求只会导致价格提高和长期通货膨胀。这曾是50年代和60年代还有80年代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经历。70年代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大部分也可以归因于供给的限制，特别是在原材料、能源和食品方面的限制。

凯恩斯模型对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第二个主要局限性也与发展中国家的供给有关，即与城市产业部门劳动的供给有关。正如我们在第9章讨论农村——城市迁移的经济学时所说明的，通过增加总需求所创造的新增的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作很可能吸引更多的来自农村的移民。由于城市工资一般比农村平均收入高得多，因而创造的每个城市工作会吸引三个或四个农村中的人出来寻找工作。最后结果可能是，通过实行为减少失业所设计的凯恩斯主义注重刺激需求的传统政策所创造出的新增城市工作，在实际上却可能使城市的失业增加！而且，由于许多农村移民是有生产劳动能力的农民或低酬农场工人，这种为增加就业和产出所设计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可能会降低全民就业和产出总水平！

我们可以从很多理由出发，特别是从结构和制度上的制约和刺激乡村——城市间迁移的现象出发得出结论，凯恩斯主义宏观就业决定模型对理解和处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用处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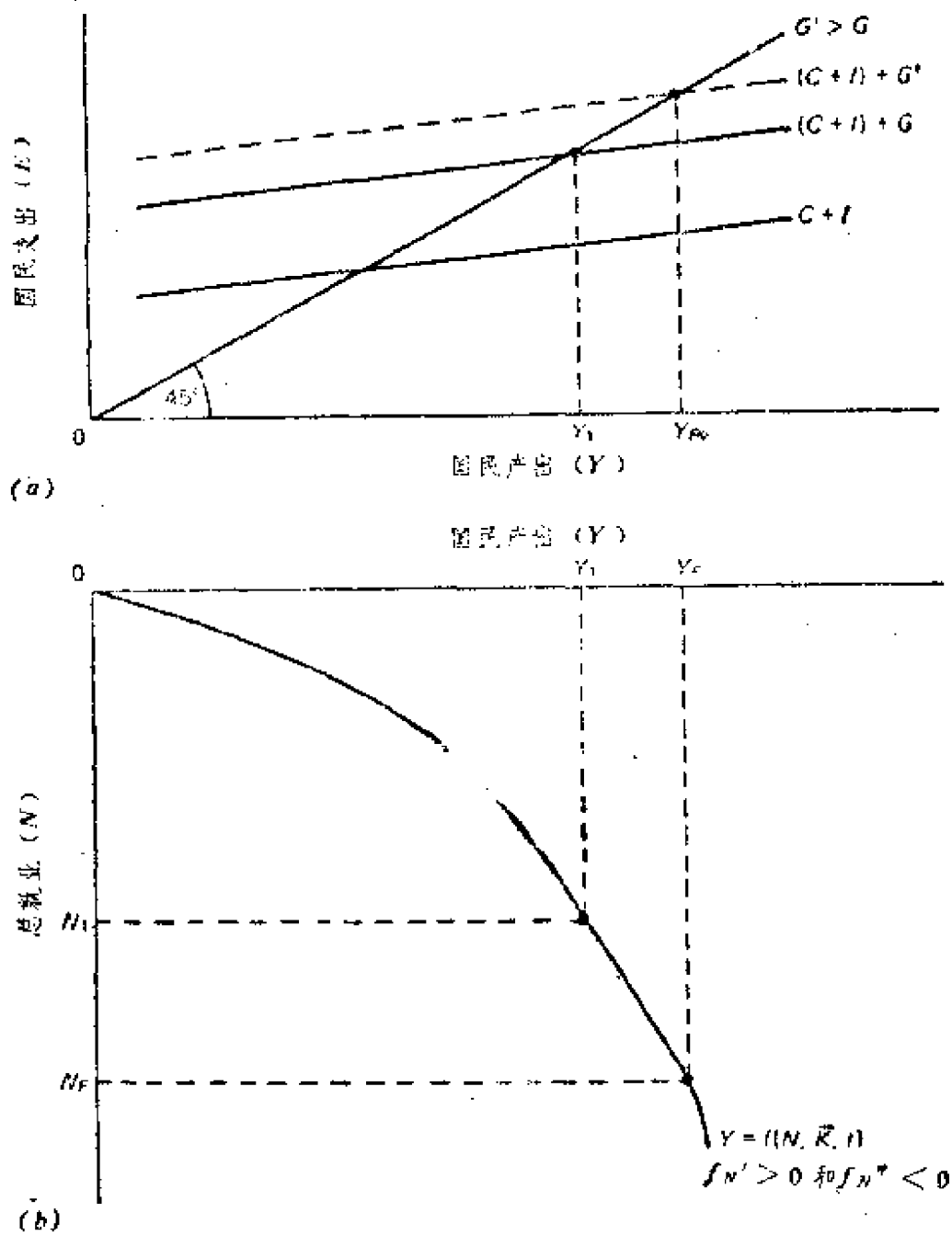


图8.2 凯恩斯就业决定简单模型

### 3.3 产量增长与就业增长：相互冲突还是一致？

增长模型和就业水平：相互抵触的论点 在50年代和60年

代,支配着许多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是发展了的凯恩斯模型,它集中研究通过加速资本形成,迅速提高国民产出水平的政策(这在80年代初期在“供给”方面也是明显的)。由于在“静态”的凯恩斯模型中,就业水平仅与GNP水平有关,因此,通过最大限度增大GNP的增长率,第三世界也能够使它的吸收劳动比率达到最大。用来描述增长过程的基本理论工具是我们在第3章中提到的简单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虽然后来出现了这个模型的许多复杂的变种,但其基本思想仍是一样的。在模型中,经济增长一方面被解释为储蓄率和随之而来的物质资本积累变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被解释为资本/产出比率(即新投资的物质生产率)变动的结果。假如给定总资本/产出比率,那么,通过把储蓄率和投资率最大化就可以使国民产出和就业增长最大。新凯恩斯主义的这一观点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把重点放到形成国内储蓄和外汇,以把尽可能多的投资用到不断增长的产业部门中去的观点。于是,以迅速工业化为目的的“大推进”就成为发展与增长的秘诀。

但是正如我们在表8.4中所见,虽然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中工业产量增长率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但就业增长率却大大落后,在不少国家里甚至停滞不动。为什么工业产量迅速增长并没有产生就业相应的迅速增长?

这基本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定义中可见,产量(Q)增长率减去劳动生产率(Q/N)增长率,近似等于就业(N)增长率,即:

$$\frac{dQ}{Q} - \frac{d(Q/N)}{Q/N} = \frac{dN}{N}$$

因此,如果产量每年增长8%,而就业只扩大了3%,这个差额则应归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后来修改过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体现了技术上的变化,但原来的模型却没有特别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它是一个“固定系数”模型(即它假定产出水平变化与



资本变化之间存在固定关系)。这个固定的资本/产出比率在模型的早期形式上相应就有一个固定的产出/劳动比率(即有一个固定的劳动系数)。因此,从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假定出发,国民总产品(GNP)增长10%,就业也总是增长10%。但是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生产某既定产量的产品所需要的工人就会减少,因而10%的产量增长只会导致例如3%的就业增长。

劳动生产率提高与较高的资本/产出比率相联系这一现象可以通过附录5.1(第5章)描述过的、比率可变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帮助,解释得更清楚(起码从理论上是如此)。请回忆,这个储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模型(经济发展只解释为最大的产量增长)想要说明,较高的资本/产出率(即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生产方法),利润所占比重就更大,储蓄率就更高,因而就会产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能够导致产量增长最多的储蓄率,即“最理想的”储蓄率,只有通过采用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才能产生。因而,产量最高和就业增长幅度最大被视为相互“冲突的”目标。

**增长与就业一致的观点** 一般说来,人们希望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人们更希望提高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所有资源的产出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由各种原因引起,有些原因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好的,有些就不那么好。教育上的改进、培训和管理水平提高都是人们希望的人力资源生产率提高的形式。但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资本替换了劳动,或者由于进口了复杂、昂贵的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和设备,比如拖拉机、电动工具、全自动纺织机器、重型建筑设备,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在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可能就不那么令人称心。这种资本积累不仅会浪费国内宝贵的资金,而且会限制新的就业机会的增长。而且,进口不适宜的、昂贵的节约劳动的资本设备事实上会降低生产要素的总生产率,从而,虽然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平均生产成本却增加了。换句话说,由于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虽然平均劳动成本

下降，但是平均总生产成本却可能会上升。在欠发达国家进口为发达国家大规模生产设计的昂贵机械设备时，由于本地市场太小，不能有效利用这些复杂设备的现象经常出现。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典型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古典模型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它们所暗含的经济政策，能够、也往往确实带来产出的迅速增长，但只能创造缓慢的就业增长。如果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的GNP增长率，这种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创造就业是同样重要的目标，或者是更重要的目标的话，那么与此不同的政策（例如，强调促进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如小规模农业和制造业）也许更为适宜。

而且，只有牺牲产量增长才能取得较高就业水平还远非不言而喻的。正如假定收入增长与这些收入更公平的分配是互相排斥的目标这一50年代和60年代的常识最近受到广泛挑战一样，许多经济学家现在也确信，注重就业的发展战略（从而也是间接注重贫困问题的发展战略）也似乎是一种加速而不是延缓全面经济进步的策略。<sup>⑤</sup> 考虑到农村和小规模生产部门的增长和发展，这种观点就特别正确。就业增长意味着穷人的收入增加，它又进一步预示对地方生产的、主要是消费品的产品的更大需求。由于这些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大多数比国内外大规模生产出的许多产品的劳动密集程度高，因此，劳动增加与收入增长就会成为自动加强的现象。它们最终会导致更高的国民总产出增长率和总就业增长率。但是为了取得这个双重目标，也许需要一种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和推广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补充政策。这使我们谈到就业决定的第四个模型。

### 3.4 适用技术与就业产生：

#### 价格刺激模型

**技术选择的图示** 在第5章和以前章节的其它地方，我们曾

简要讨论了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及其对贫困和就业问题的影响。但是，由于“新古典主义价格刺激”学派的思想在发展中国家关于就业问题的争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在这里回顾一下这些理论是重要的。

价格刺激模型的基本主张相当简单，而且大部分是包含在新古典主义公司理论内容中。根据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生产者（企业和农场）被假定面临一组相应的既定生产要素价格，并利用使它成本最小化的资本和劳动组合进行它所希望的产出水平的生产。进一步假定，利用从高度劳动密集到高度资本密集的各种各样的生产技术，它们都可以生产出这么高的产出。这样，如果资本的价格比劳动的价格昂贵得多，那么它们就会选择相对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如果劳动的价格比较高，节约化的企业或农场就会利用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方法——这就是，它将少使用贵的生产要素——在这个例子里是劳动。

图 8.3 描述了传统经济学对技术的选择。假设所讨论的企业、农场、工业或整个经济只有两种生产技术可供选择：技术或制作方法 OA，相对于（同质）劳动，它需要更多的（同质的）资本投入；技术或制作方法 OB，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点 F 和点 G 代表每一制作方法单位产出水平，而连接 F 和 G 的线段  $Q_1FGQ_1'$  则是等量单位产出线（注意，在传统的新古典模型里，假定存在无数种这样的技术或制作方法，因此等产出线具有典型的凸状曲率，例如图 4.5 有这种情况）。

根据这一理论，理想的（成本最低的）资本劳动组合（即有效或“适用”技术）是由相对的要素价格决定的。目前假设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反映了它们的稀缺价值或“影子”价值，而且在图 8.3 中，所希望的产出水平是  $Q_1$ 。如果资本比劳动便宜（价格线 KL），生产就会使用资本密集的制作方法 OA，在点 F 上进行。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和资本的市场价格中，劳动是相对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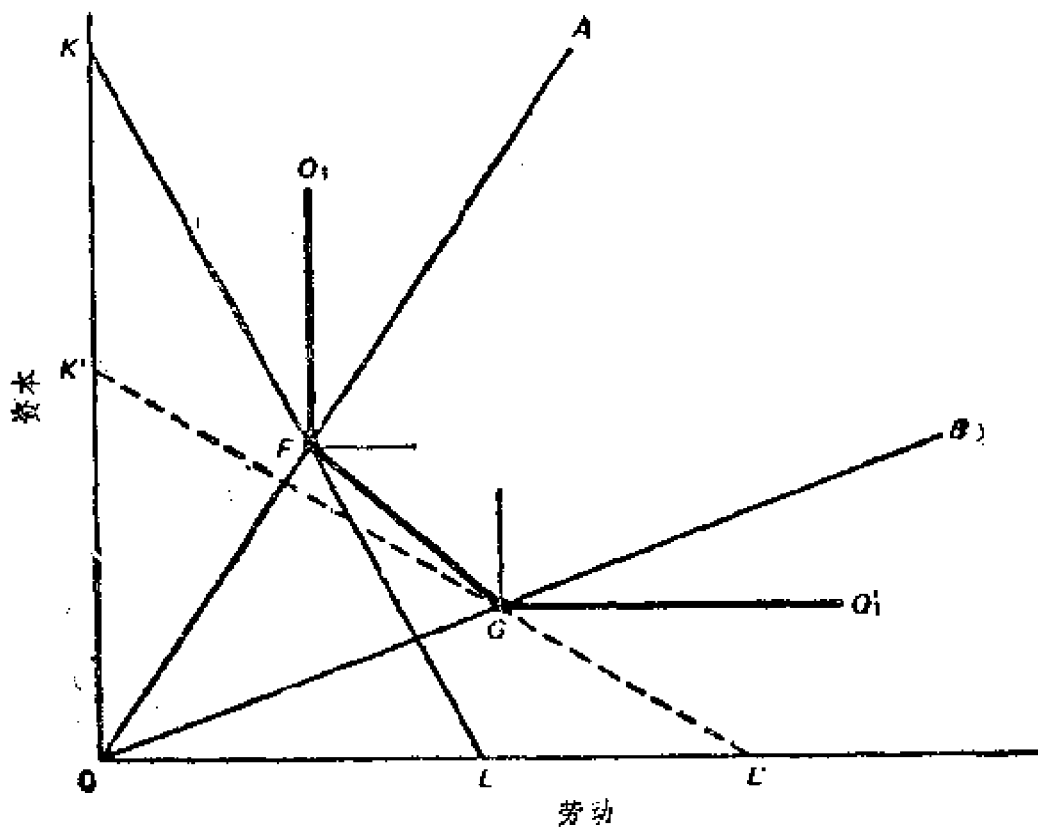


图8.3 技术选择：价格刺激模型

(丰富)的要素(点划线 $K'L'$ )，生产就会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 $OB$ ，而在点 $G$ 上进行。因此，目前应用的任何生产技术中，假如其它情况均保持不变，劳动力的价格相对降低，在理想的生产策略下，就会导致用劳动代替资本（注意，如果资本密集制作方法 $OA$ “优于”劳动密集制作方法 $OB$ ——即，如果技术 $OA$ 在各种产出水平上都比 $OB$ 需要的劳动和资本少——那么在任何要素价格比率下，都要采用资本密集技术。⑥见221页的进一步讨论）。

**要素价格扭曲和适用技术** 假设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有丰富的劳动供给，但只有很少的资金或实物资本，人们自然会认为生产方法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但是事实上，人们通常发现不管在农业还是工业中，生产技术都是重型机械化的和资本密集型的。大型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星罗棋布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农

村田野上，人却在一旁懒散地看管着机器。明亮的新工厂配有最现代化的和复杂的自动化机器和设备是城市工业中常见的现象，工厂大门外却是一群群闲荡的工人。这种现象可以肯定不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农场主和工厂主在经济上不合乎理性的结果。

根据价格刺激学派的解释，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各种结构上、制度上和政治上的因素，劳动的实际“市场”价格和资本的实际“市场”价格分别高于或低于它们各自应有的真实稀缺性和“影子”价值。图 8.3 中，“影子”价格比应是点划线  $K'L'$ ，但实际的（扭曲的）市场价格比却由线段  $KL$  表示。由于工会的压力，政府鼓励的最低工资法，范围不断扩大的雇员附加好处和跨国公司的高工资政策，相对形成高市场工资结构。在以前的殖民地国家里，高工资结构通常是根椐欧洲生活水平和“辛苦”补贴所制订的离国服务人员工资级别的残迹。另一方面，慷慨的资本折旧、低利率、对资本货进口的保护贸易制度（见第13章）的低税率或负税率、税收折扣、高估的汇率（也见第13章）等等，一起人为地使（稀缺的）资本保持低价。

这种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直接结果是鼓励在农业和制造业生产中采用不适当的、资本密集的生产方法。注意，从个别企业和农场使成本最低的个人观点来看，选择资本密集的技术是正确的。他们仅仅是对生产要素市场现存的价格结构信号做出合理的反应。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没有充分利用资本、特别是没有充分利用劳动的“社会”成本可能是巨大的。政府为“使价格正确”所设计的政策——即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通过采用较为适宜的生产技术，不仅能增加就业，而且还能更好地、全面利用稀缺的资本资源。<sup>①</sup>

**劳动-资本替换的可能性** 但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对实际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在第三世界各种工业的生产方法中。劳动能够替换资本的程度，经济学家称之为“替换弹性”，而且把它大概

解释为所使用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即劳动—资本或L/K比率）的百分比变化与资本和劳动的价格的（即 $P_K/P_L$ ）已知的百分比变化的比率。在数学上，替换弹性可以定义为

$$\eta_{LK} = -d\left(\frac{L}{K}\right) / \frac{L}{K} + d\left(\frac{P_K}{P_L}\right) / \frac{P_K}{P_L}$$

例如，如果在制造业部门资本的相对价格增长1%，而劳动/资本比例因此增长1.5%，制造业的替换弹性就等于1.5。如果 $P_K/P_L$ 下降了比如说10%，而同时L/K仅下降了6%，那么这种工业的替换弹性就是0.6。较高的替换弹性（比例大于0.7）表示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水平和组合有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修改生产要素价格可能是产生更多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

一般说来，在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进行的大多数替换弹性经验分析都显示系数在0.5到1.0之间。<sup>①</sup>这个结果表明，相对减少工资（或直接减少工资，或使工资保持不变而提高资本价格）10%，将会使就业增长5%到10%。但是，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全部劳动力事实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制造业工作，并通过工会定工资，因此，即使工业部门就业增10%，这整个结果还不足以解决就业问题，但它可以对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做出贡献。因而，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政策在任何注重就业的全面发展战略中确实起重要作用。

## 注 释

① 埃德加·O.爱德华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福特基金会关于一个研究项目的报告》，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0—11页。

③ 有很多人也会争辩说，弹性工资模型对欠发达国家小规模工业(所

谓的城市非正规部门见附录 9.2) 和农业劳动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用的说明。在城乡传统工业中工资决定更富有弹性和竞争性是正确的。对这些情况而言, 古典的充分就业理论几乎不适用。

④ 例如, 见达德利·西尔斯:《特别事例的限界》, 牛津经济学和统计学学院学报1965年5月。

⑤ 产出增长与创造就业是一致的、而不是冲突的发展目标的著名论据之一, 见 P. 斯特里顿和 F. 斯图亚特:《发展中国家产出与就业目标的冲突》, 牛津经济论文集 1971年7月版, 第145—168页。还可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15。

⑥ 已被应用到欠发达国家的这一论点最初是由 R. S. 艾考斯在他的有创见的文章《欠发达地区的要素比例问题》中详细阐述的:《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9月。

⑦ 从理论, 经验, 政策角度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见霍华德·派克:《鼓励使用中间技术的政策》, 《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16。

⑧ 问题根据的有用概述见大卫·马拉维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的就业问题》, 《经济学杂志》1974年9月。另外的资料包含在霍华德·派克的上面文章中。

## 概念复习

补充资源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城市化 (urbanization)

劳动利用不充分 (underutilization of labor)

公开失业 (Open unemployment)

不充分就业 (underemployment)

变相不充分就业 (disguised underemployment)

隐蔽失业 (hidden unemployment)

自愿失业 (voluntary unemployment)

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就业缺口 (employment gap)

生产要素总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小规模工业 (small-scale industry)  
新古典价格刺激模型 (neoclassical price-incentive model)  
产出—就业时滞 (output-employment lag)  
古典模型 (classical model)  
“均衡”工资率 (“equilibrium” wage rate)  
弹性工资 (flexible wage)  
“影子”价格 (“shadow” price)  
凯恩斯就业模型 (Keynesian employment model)  
总需求 (aggregate demand)  
充分就业 (full employment)  
“潜在”产出 (“potential” output)  
赤字支出 (deficit expenditure)  
“固定”投入系数 (“fixed” input coefficients)  
“大推进”发展理论 (“big push” theory of development)  
替换弹性 (要素) (elasticity of (factor) substitution)  
适用技术 (appropriate technology)  
劳动力 (labor force)

## 问题讨论

1. 讨论第三世界国家就业问题的本质。在你的讨论中包括考察劳动没有充分利用的各种表现形式。
2. 为什么要这么关心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问题？为什么它们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发展问题？
3. 比较和对照第三世界国家当代城市化的进程和西欧北美的历史经验。它们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这些区别是怎样产生的？
4. 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与贫困和不平等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存在任何关系的话）？
5. 欠发达国家工业的迅速增长大都不能产生同样迅速的就业增长的基本



经济原因是什么？如此巨大的“产出—就业时滞”是不是现代工业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谈一下你的答案。

6. 凯恩斯就业决定模型似乎为充分就业提供了简明的政策药方，这些药方过去25年在工业发达国家大体上说取得可被证明的成功。利用同样的方法解决第三世界就业问题的局限是什么？凯恩斯主义政策药方实际上会恶化城市失业问题，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解释你的答案。

## 第9章 城市化与国内和国际间的 人口迁移问题

在本世纪最后25年，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居民总数将从1975年的6.5亿增加到16亿多，增加数将近10亿。

《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

我们确信，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是纠正目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偏重城市的倾向。

《1974年关于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报告》埃德加·爱德华兹

### § 1 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困境

在这一章，我们将着重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使人倍感头痛的问题——劳动力大量地、不断地从农村涌入非洲、拉丁美洲的新兴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在第6章，我们曾引证了一些资料说明了世界人口，特别是第三世界人口近几十年迅猛增长的状况。据最低估计，在2000年世界人口将在60亿—80亿之间，尽管这个估计是在最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情况下作出的。但是，不论这个估计是否确切，至少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增加将是整个世界城市人口增加数中最突出的部分。

我们考察了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和前景之后，在这一章，我

们就要在城市高失业率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对一个著名的城市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模型进行评价。然后再研究与全球性难民问题密切相关的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在最后一部分里，就进一步对不发达国家政府愿意采取的、试图解决农村人口过多地向城市迁移和已经人满为患的城市中的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各种政策进行分析和评论。

### 1.1 城市化的趋势和前景

战后人口问题中的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急剧膨胀，而且将来似乎还会进一步膨胀。在1950年，居住在第三世界城镇的人口仅有2.7亿，约占世界城镇人口总数的38%。但据联合国最近（1980年）的统计，1975年世界城镇人口已达15.6亿，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少数的大城市中。并且他们预计，在2000年，超过21.2亿或者说约占世界城镇居民总数60%的人口，将分布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注意：这个数字比世界银行1979年所作的估计要高，因为联合国的数字中包含有中国，而世界银行的数字中没有包含中国）。这表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镇人口将新增166%或者13.2亿。实际数字到时可能会高于或低于现在所预计的21.2亿人，这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图9.1为我们提供了4个第三世界地区和中国城市人口预计在1950—2000年之间增长的分列统计，表9.1则为我们更具体地列举了一些国家的详细情况。

就个别城市而言，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纽约和伦敦目前人口增长率每年仅在1%以下，而在非洲的许多城市如内罗毕、拉各斯和阿克拉却已超过了7%，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城市也超过了5%。表9.2列出了发展中国家的15个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情况，其中13个城市在1975—2000年间人口将增长1倍多。实际上象雅加达和波哥达几乎将增长2倍，显然这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达

(续表)

肯尼亚	336	597	1145	1592	2223	4314	8125
摩洛哥	2345	3412	5236	6551	8265	13126	19704
尼日利亚	3595	5642	9009	11449	14811	25665	45041
塞内加尔	563	704	930	1070	1265	1896	3002
南非	5261	7424	10281	11934	14154	20417	30109
苏丹	572	1212	2571	3722	5305	10014	16551
赞比亚	428	742	1293	1704	2235	3802	6260
拉丁美洲	67511	106559	162355	198366	240592	343304	466234
阿根廷	11205	15172	18616	20436	22300	25818	28875
巴西	19064	32996	53253	66621	82172	119271	163027
智利	3558	5145	7048	8044	9116	11390	13460
哥伦比亚	4334	7665	13209	16946	21212	31102	41779
厄瓜多尔	911	1490	2384	2971	3707	5735	8564
危地马拉	921	1317	1889	2269	2763	4193	6384
墨西哥	11348	18458	29706	37318	46660	71069	102293
尼加拉瓜	397	609	930	1163	1457	2256	3396
秘鲁	474	631	853	1003	1205	1800	2708
巴拉圭	2811	4265	7605	9619	11942	17498	24132
委内瑞拉	2739	5084	8048	9795	11776	16364	21125
亚洲	217595	341738	482032	573894	688579	991212	1411847
泰国	1786	2649	5150	6838	9531	18192	32095
印度	59247	76577	106994	127177	154524	235837	360688
印度尼西亚	9362	13522	20295	25079	31293	49477	76612
伊朗	4087	7249	11601	14959	19209	30162	43138
伊拉克	1819	2937	5461	7272	9414	14525	20366
尼泊尔	183	285	440	550	708	1245	2275
菲律宾	5695	8350	12387	15244	18902	29198	43988

(续表)

南 朝 鲜	4347	6843	12766	16682	20921	29915	37807
斯里兰卡	1106	1772	2736	3359	4108	6090	8660
叙 利 亚	1071	1677	2708	3393	4290	6776	10105
土 耳 其	4441	8181	13536	17106	21482	32684	45482

资料来源：联合国编，《城乡人口增长的现状与未来》，纽约1980年版。

表9.2 15个第三世界的大城市1975年人口状况及对其2000年的预测

城 市	1975年 人口(百万)	2000年 人口预测(百万)	1975—2000 预测增长率(%)
墨西哥，墨西哥城	11.9	31.0	160
中国，上海	11.6	22.7	96
巴西，圣保罗	10.7	25.8	141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9.3	12.1	30
巴西，里约热内卢	8.9	19.0	113
中国，北京	8.7	19.9	129
印度，加尔各答	7.8	16.7	114
印度，孟买	7.0	17.1	144
南朝鲜，汉城	6.8	14.2	109
埃及，开罗	6.4	13.1	104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5.7	16.6	191
菲律宾，马尼拉	4.5	12.3	173
印度，新德里	4.4	11.7	166
伊朗，德黑兰	4.3	11.3	162
哥伦比亚，波哥达	4.0	11.7	193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研究报告》第68期表4.7。

表9.3 贫民区居民占城市人口的比重

拉丁美洲	比 重
哥伦比亚, 波哥达	60
墨西哥, 墨西哥城	46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42
中东和非洲	
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	79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70
扎伊尔, 金沙萨	60
埃及, 开罗	60
土耳其, 安卡拉	60
亚 洲	
印度, 加尔各答	67
菲律宾, 马尼拉	35
南朝鲜, 汉城	29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26

资料来源：人口问题委员会，《关于“世界人口增长与全球安全”的报告》①第3号第2页。

国家同样的时间内的增长速度都要快。①

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同时，贫民区的数目也不断增长，从里约热内卢的法拉瓦区，利马的简温尼斯印地安人居住区到加尔各答的巴斯特区和达卡的贝德温利区，这种相同户区每隔5—10年就能增加一倍。如今在发展中国家中，贫民区的居民已占整个城市人口的1/3以上，在许多国家的城市中，贫民区的居民已占其人口总数的60%以上。在大多数贫民区既没有清洁的生活用水，也没有废物处理系统和生活用电设施。例如，在大开罗市，目前就面临着1千万人如何使用只够200万人使用的供水系统的困难。

最近，一份关于世界人口政策的报告<sup>②</sup>清楚地表明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对城市人口膨胀的目前水平和将来趋势的关注程度。据这个报告分析，1978年，在158个国家中，有73个国家（其中68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认为他们国家的城市人口的地理分布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其它的66个国家（其中42个是发展中国家）认为其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不大令人满意”。只有6个发展中国家认为他们国家城市人口的分布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几乎所有国家对其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表示“不能令人满意”，认为国内的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是构成城市人口增长的最突出的因素。统计数字表明，从农村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人口增长中占35—60%（见表9.4）。因此，1978年在116个发展中国家中，90个国家按联合国的研究结论，开始实施旨在减少或停止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趋势的政策。

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普遍存在对城市持续膨胀的不满。这些持批评意见的观点中，值得注意的主张是认为各国政府应立即制定能制止城市膨胀的发展政策。实际上，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50—60年代，一味强调工业现代化、技术尖端化和大城市膨胀的传统发展政策，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然带来两种后果。一是造成经济机会分布的不平衡，一是必然将农村劳动力持续不断地推入城市。现在企图通过一系列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新政策，以阻止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扩大趋势，难免使人产生疑问：这有可能吗？甚至有人还要提出“这样做是否合适”的问题，尽管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城市的持续膨胀和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扩大趋势，毫无疑问是80和90年代发展和人口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表9.4 1970年部分发展中国家自农村向城市的  
劳动力迁移在城市人口增长中的作用

国 家	平均人口增长率 (%)	迁移人口在人口增长 中的比重 (%)
阿 根 廷	2.0	35
巴 西	4.5	36
哥伦比亚	4.9	43
印 度	3.8	45
印度尼西亚	4.7	49
尼日利亚	7.0	64
菲 律 宾	4.8	42
斯里兰卡	4.3	61
坦桑尼亚	7.5	64
泰 国	5.3	45

资料来源：《迫使城市增长的因素》世界研究报告第38号1980年8月第10页。

表9.5 城乡失业率（占职业人口的百分比）

国 家	年 代	城 市	城市失业率	农村失业率
非 洲				—
阿尔及利亚	1966	城市地区	26.6	—
贝 宁	1968	城市地区	13.0*	—
布隆迪	1963	首 都	18.7*	—
加 纳	1960	大 城 镇	12.0	—
	1970	2个大城市	9.0*	—
象牙海岸	1963	首 都	15.0*	—
肯 尼 亚	1968—69	首 都	10.0*	—
	1968—69	次大城市	14.0*	—
摩 洛 哥	1960	城市地区	20.5	5.4
尼日利亚	1963	城市地区	12.6	—



(续表 1)

国 家	年 代	城 市	城市失业率	农村失业率
塞拉利昂	1967	首 都	15.0	—
喀麦隆	1962	最大城市	13.0*	—
	1964	首 都	17.0*	—
坦桑尼亚	1965	城市地区	7.0	3.9
	1971	7个城镇	5.0*	—
扎伊尔	1967	首 都	12.9	—
拉丁美洲				
阿 根 廷	1968	首 都	5.4	—
玻利维亚	1966	城市地区	13.2	—
智 利	1968	城市地区	6.1	2.0
哥伦比亚	1967	城市地区	15.5	—
哥斯达黎加	1966—67	首 都	5.6	—
危地马拉	1964	首 都	5.4	—
萨尔瓦多	1961	首 都	6.6	—
圭 亚 那	1965	首 都	20.5	—
洪都拉斯	1961	首 都	7.8	—
牙 买 加	1960	首 都	19.0	12.4
巴 拿 马	1960	城市地区	15.5	3.6
	1967	城市地区	9.3	2.8
秘 鲁	1964	首 都	4.2	—
	1969	首 都	5.2	—
乌 拉 圭	1963	城市地区	10.9	2.3
委内瑞拉	1961	城市地区	17.5	4.3
	1968	城市地区	6.5	3.1
亚 洲				
印 度	1961—62	城市地区	3.2	1.7
印度尼西亚	1961	城市地区	9.5	—

(续表 2)

国 家	年 代	城 市	城市失业率	农村失业率
伊 朗	1966	城市地区	5.5	11.3
朝 鲜	1963—64	城市地区	7.0	1.8
马来西亚 (西)	1967	城市地区	11.6	7.4
菲 律 宾	1967	城市地区	13.1	6.9
新 加 坡	1966	城市地区	9.1	—
斯里兰卡	1959—60	城市地区	14.3	10.0
叙 利 亚	1967	城市地区	7.3	—
泰 国	1966	城市地区	2.8	—

• 此数字表示只统计了男性劳动力。

资料来源：P.贝尔奥琪：《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失业问题》，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73年版，第49页。

J·盖格勒：《国内的劳动力迁移》，见瑞奇曼德和库伯特合编：《新的世界和第三世界》加利福尼亚1973年哲人丛书。

## 1.2 城市的失业和就业不足

迅速的城市化过程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城市求职者供给的增加。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需求，其结果是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率非常高。表 9.5 提供了34个国家失业情况的详细资料。但这个资料只说明了公开失业的情况，并未包括许多经常性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在目前，这个问题甚至比这些资料所能说明的问题要严重得多。而且，这些所提供的资料出自60年代，它所表明的失业率要比现在的水平低得多。但无论怎样，这个表毕竟能够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当时就已经存在着非常高的失业率了。36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已经高达15%以上，有22个国家也已经超过了10%。

除了伊朗的农村失业率高于城市外，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失业率是乡村失业率的2倍。47%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率是农村失业率的3倍，这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发达国家，城市失业率相对来说一直较低，并且一般来说，农村的失业率要比城市的失业率高。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把城市中那些分散的，部分时间工作的劳动力统计在内，那么城市过剩劳动力（包括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劳动力）的总数就会超过30%。而且，如果我们着重考察年龄在15—24岁之间这一阶层的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新迁入城市的劳动力），那么这个数字就超过50%。既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产生城市膨胀和高失业率的主要因素，那么，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就是非常必要的。

## § 2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

几年前，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被认为是令人振奋的现象。因为，国内的人口迁移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城市工业化必然要求从农业部门中分离出一部分必需的剩余劳动力来，以满足其需要。由于人力资源的流动通常被认为是从社会边际生产量为0的地区，向不仅社会边际生产量是正数，而且由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产量不断增长的地区流动，因而，这个过程从整个社会来说被认为是有益的。这个过程在第3章讨论刘易斯发展理论时已经全面阐述过。正如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原所长理查德·朱利所指出的那样：“那些经济学家（即强调劳动力迁移重要性的人）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制定怎样的政策可以解放劳动力以加强其流动性，而不是去考虑如何采取措施制止劳动力的迁移，所持理由之一是，为了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把农村中的足够劳动力解放出来，投入城市的工业化。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何其荒唐啊！”<sup>③</sup>

与上述观点相反的一种意见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速度不仅超过了城市职位创造的速度，而且远远超过了城市和服务业吸收这些劳动力的能力。这个结论已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历所证实。劳动力迁移已不再为经济学家视为解决城市劳动力需求增长的有效手段了。相反，人口的迁移不仅应该视为城市长期存在劳动力过剩的主要原因，而且它还是加剧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引起城市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口迁移从两方面直接加剧着城乡经济结构的不平衡。首先从供给方面来看，由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在人口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潮流中居主导地位，因此，国内的劳动力迁移使城市求职者的增长比城市空前的人口增长更快。这种现象一方面使城市劳动力供给膨胀，又同时使农村宝贵的、有价值的人力资本不断减少；第二，从需求方面来看，由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大多数职位需要大量的补充资源的投入，使得城市的职位创造远比农村职位创造困难，代价也更为昂贵，此外城市增加工资的压力和强制性供应补贴，连同不能使用更为“适宜的”更为密集的技术，意味着现代部门产出增长的份额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出现的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增长与劳动力需求迅速下降，就有可能使短期的人力资源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转为长期的周期性的城市过剩劳动力越来越多的问题。

然而，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比起它所带来的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明显恶化的问题要更为广泛。实际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对其经济发展过程本身、甚至人力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并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只是在它对一般经济增长和对这种增长性质，特别是经济增长分布状态的影响的背景下，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才日益受到重视。

因此，我们在开始时必须认识到，超出就业机会的农村劳动向城市的迁移既是第三世界不发达的一个症状，又是加剧不发达

状况的因素。如何理解国内和国际劳动力迁移的原因、决定性因素及其结果，是能否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过程的性质及特点，制定以社会所满意的方式影响发展过程的适宜政策的中心问题，在强调劳动力迁移现象的中心地位时，有一个简单而又关键的环节是要认识到的：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社会经济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劳动力迁移的进程，而这个进程本身又会反过来改变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甚至人口增长的模式。因此，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既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农村，或者城乡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那么它们就都会影响或改变劳动力迁移的范围和性质。虽然其中某些政策对劳动力的迁移可能具有更直接更密切的关系（如工资收入政策和增加就业的方案等），但同样存在着一些不甚明显，从长期来看却是至关重要的其他政策手段。这些政策包括，土地所有权的处理、商品价格、信贷的分配、税收、鼓励出口、进口替代、商业与汇率政策、社会服务的地理配置、公共投资项目的性质、对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态度、人口结构和计划生育、教育制度的结构与方针、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政府对国际技术转让和新兴工业布局的政策性质等。在这里，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一个国家内部，对许多国家来说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劳动力迁移的极端重要的意义，并综合劳动力迁移及人力资源配置，以及这二者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这两个方面的密切关系，全面规划，以改进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

此外，我们不但需要了解人们为什么要迁居和他们做出这个决定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而且应当更好地了解劳动力迁移对城乡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如果发展政策和劳动力迁移二者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其中哪一个是最主要、为什么？在目标不同，有时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政策和进行权衡（如限制国内劳动力迁移、扩大农村地区教育机会等）？在本章的后

半部分中，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求解决上述以及其与劳动力迁移、失业、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

### § 3 发展中国家国内人口迁移的一般情况

理解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原因以及劳动力迁移与城乡相对经济机会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分析第三世界国家就业问题的核心。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劳动力的绝大部分来自劳动力的迁移，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现在是而且将来仍是新求职者供给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如果劳动力迁移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那么，要了解城市失业的性质和原因，就必须对劳动力迁移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政府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政策也应以此为基础，比如应该了解哪些人到城市来和为什么到城市来的问题。

#### 3.1 迁移过程

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极其复杂，因为迁移是一个在经济、社会、教育和民族等因素影响下的人所做出的选择过程。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对它的影响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就是在一定的地区和不同的人中也是不同的。许多早期的研究者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上，他们虽然承认经济因素的作用，然而没有仔细地研究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他们研究强调的方面不同，如：1. 社会因素：认为劳动力迁移的愿望，往往是想从社会组织的传统压制下摆脱出来。2. 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和自然灾害，如洪水、旱灾等。3. 人口因素：包括农村死亡率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出生率的上升。4. 文化因素：是指城市“大家庭”关系的安全性以及“城市光明前途”对人们的吸引力。5. 交通通讯因素：由于城市中发达的交通设施，为城市服务的教育制度

和电影、电视及广播的普及所带来的现代化的吸引力所引起。

当然，上述非经济因素的确与劳动力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现在不论是经济学家还是非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这些经济因素不仅包括来自农村传统部门的“推动”和城市相对高工资的“拉进”，而且包括由城市高失业而产生的潜在的向农村地区的“反推进”。

### 3.2 迁移的特征

为了方便起见，在这里把迁移的主要特征分为三大类，人口的、教育的和经济的。

**人口特征：**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向城市迁移的人口构成已趋向于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青年男女，在非洲和亚洲的某些国家如肯尼亚、加纳、尼日利亚、印度、泰国、南朝鲜和菲律宾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结论。近年来，随着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妇女在劳动力迁移人口所占的比例也不断增长。在拉丁美洲、南亚和西非的许多国家中，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事实上，在拉丁美洲，妇女已经成为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主流，其原因就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拉丁美洲国家的城市文化水平较高。<sup>④</sup> 妇女的劳动力迁移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随家庭迁移到城市的，另一种是独自来到城市的。后一种类型近年来增长最快。

**教育特征：**许多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在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迁移之间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必然关系。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人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与进行迁移的可能性成正比例。如巴农与萨伯特在坦桑尼亚的一项对人口迁移进行综合研究的报告证明了这种结论。特别是就城市就业机会下降对移民教育程度的不同影响而言更是如此。中学辍学者目前占劳动力迁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

大。对这种现象如果按照巴农和萨伯特的解释就是，城市中有限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按照教育程度来配置的。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人就业的可能性较大。但只有初等教育程度的人则很难保证有就业机会，因此这部分人在迁移者中的比例自然要下降。

**经济特征：**多年来，在城市迁移者中占百分比最高的是那些在农村没有土地、缺乏技术而无法生活的贫困农民。在殖民地非洲，以季节性迁移为主，移民收入水平各不相同，一般是到城市寻找短期工作。但近年来，由于欠发达国家城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稳定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情况已发生变化。似乎来自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男女移民都有，只是由于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穷人，所以移民的大多数也都很穷。

#### § 4 农村—城市人口迁移的经济理论

在第4章，我们已经发现美国、西欧的经济发展史，基本可以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来概括。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农村的传统部门完全被农业活动所支配，城市部门则集中精力于工业化，那么，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无疑就是通过农村—城市的人口转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入工业的一种劳动力再分配。这种农村—城市的人口迁移现象不仅会发生在国家内部，也发生在国际间。城市化几乎成了工业化的同义语，这种模式曾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蓝本，例如最初刘易斯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就持这种观点（见第3章）。

然而，60—70年代出现的大多数事实把刘易斯两部门发展模式的有效性降低了。这就是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尽管城市失业率不断上升，但庞大的人口仍然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人们必须另辟蹊径，以解释这种现象并找出解决其所带来的问题的对策。在许多文章中，我曾试图创造一种新理论来解释这种看起来（至



少在经济学家看来) 似乎相互矛盾的现象: 在城市失业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自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为什么还在持续? ⑥

#### 4.1 托达罗模式的文字表述

首先假定, 劳动力迁移是一个必然的经济现象。对一个迁移者来说, 尽管城市存在着失业问题, 但他作出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仍是合乎情理的。托达罗模式认为, 人口迁移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其中一个基本前提是, 迁移者可以考虑城市和农村各种劳动市场的就业机会, 他们通过迁移选择那个能取得最大“预期”收入的工作。预期收入是由城乡部门的职业差异而带来的实际收入差距和一个新的迁移者获得一项城市职业的可能性来计量的。图 9.4 是一个表示劳动力迁移的决策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网络。

从本质上看, 这个理论假定, 一个现实的或是潜在的劳动力将把在城市部门中一定时间的预期收入(即劳动力迁移的费用和所得报酬的差)与现时农村普遍的平均收入相比较, 如果前者大于后者, 那么他就会迁移。

在下面的图解中, 假定一个不熟练或者半熟练的农村工人, 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 即在一个平均每天实际收入是50单位的农场工作和一个根据其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 迁移到城市可得到每天为100单位收入的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对于只强调收入差别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常用的经济模式必然认为劳动力迁移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是非常明确的, 即工人自然要选择高收入的城市职业。但是这种劳动力迁移的模式大体是从先进工业经济中演绎出来的, 并且暗含假定在这些国家存在着充分就业或接近于充分就业。认识到这两点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 劳动力迁移的决策只是单纯依据能否获得高收入这一因素, 而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实现。根据一般的经济学

理论，这种类型的劳动力迁移不管在迁出的地区还是迁入的地区，在劳动力供求因素的作用下会导致城乡工资差距的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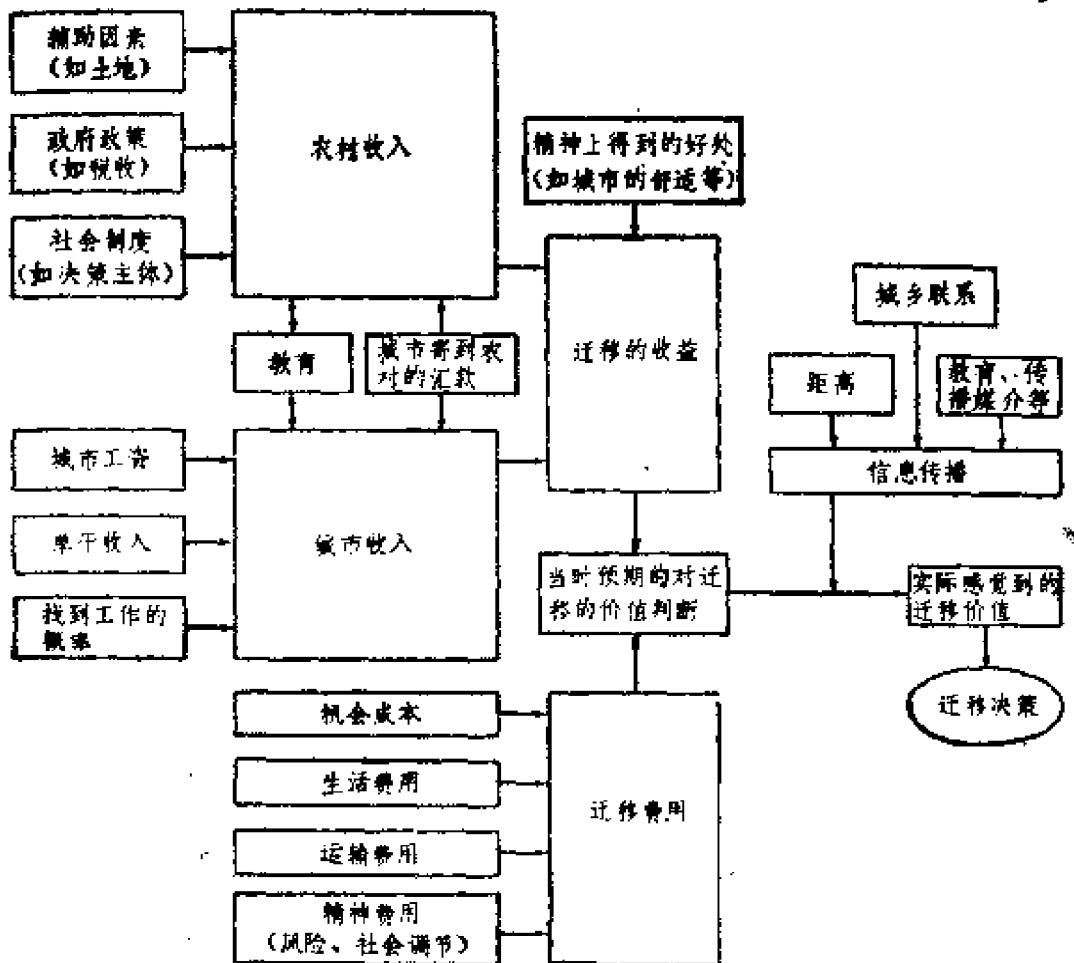


图9.2 劳动力迁移决策过程分析示意图

资料来源：D. 拜尔利：《非洲自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理论政策及其运用》，《国际迁移评论》1974年。

不幸的是，就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和经济结构来看，这种分析并不切合实际。首先，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着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而使迁移者并不能马上获得所期望的高收入职业。实际上，出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迁移者或者将完全失业或者在

“传统的”或“非正规的部门”中找一些临时的、或部分时间工作的如小商小贩或修理商之类的短工。因为在这些部门，工作的技术性不强，竞争也相对较弱，新劳动力进入也较容易。所以，一个人在作迁移的决策时，必须在获得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失业者或就业不足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假设一个迁移者在一年里取得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是5比1的话，那么他希望在城市能得到比农村高2倍的收入就没多大意义。因为他实际上能获得城市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只是20%，从而在一年内得到的实际收入也只是20单位，而不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一个城市工人所期望得到的100单位。所以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成功可能性只有20%的条件下，迁移者追求城市职业的愿望就是不合理的，即使在城乡收入差别达100%也同样如此。当然，如果成功的可能性有60%的，预期的城市收入是60单位，那么，即使城市存在着很高的失业，迁移者在一定时期内去城市碰运气也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再接近一些事实，假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面临大多数迁移者是由15—24岁之间的年轻人组成的情况下，迁移决策必须以对长期甚至永久收入的预期为基础。如果某个人预期在开始阶段找到有固定收入工作的可能性较小，但有希望随着在城市交际的深入，使这种可能性提高，那么，即使在最初或者整个期间，预期的城市收入也许比预期的农村收入还低，但对他来说，进行迁移仍然是合理的。只要在移民者计划期间内预期城市收入的“现时价值”超出农村预期收入的“现时价值”，做出迁移的决定就是无可非议的。这点在本质上就是图9.2描画的过程。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模式中不是象在完全竞争模式下把城市工资率拉平，而是这种迁移成为把乡村和城市预期收入拉平的均衡力量。例如，如果农村平均每天的收入是60个

单位，而在城市是120个单位，那么当将来更多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不再被视为有利的现象时，50%的失业率就必然在城市出现。由于期望收入是由工资的实际水平和获得职业的可能性决定的，那么，尽管城市有相当大比例的失业率，持续的劳动力迁移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用上面数字来说就是，如果城市失业率为30%或40%，那么劳动力迁移就会继续进行。

如果作一个简单地总结，托达罗模式有以下四个特点：1. 劳动力迁移主要受人们来自相对经济利益和费用这些合理的经济上的考虑的刺激。其中经济上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有心理上的考虑。2. 劳动力迁移的决策取决于“预期”的而不是实际的城乡工资差异。其中，预期的差异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异和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这两个变量互相作用决定的。3. 获得城市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往往和城市的失业率成反比例关系。4. 劳动力迁移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即使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很大也是很可能的，城市高失业率是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城乡经济机会严重不平衡的必然结果（对托达罗模式的数学分析见附录9.1）。

#### 4.2 某些政策建议<sup>①</sup>

在上面的分析中，起初看起来我们低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作为调节机制，在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分配劳动资源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种分析确实对工资和收入、农村发展和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们包括：

**缩小城乡就业机会之间的不平衡的必要性** 由于假定迁移者往往受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所诱惑，那么，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就业机会的不平衡就至关重要了。尽管城市就业水平不断上升，只要允许城市工资水平以一个较高的速度上升，那么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就会刺激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迁移。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地

区，不仅增加了城市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最终使农村地区发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农忙季节这问题更突出。

**开创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 传统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药方(即主张提供更多的在城市现代部门的就业机会，而没有同时考虑改善农村的收入和就业问题)，可能适得其反，即城市就业机会越多，造成城市失业水平越高。这里预期收入与取得报酬的机会间的不平衡再次成为决定性的问题，城市就业机会增多会重新引起人们对高收入的期望，从而导致城乡经济机会不平衡的加剧。由于假定迁移率与城市较高工资和较高就业机会(或可能性)成正比，那么，任何既定城乡收入差异为正的情况下(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城市收入一般是农村收入的3—4倍)，城市出现的较高的就业率将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甚至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速度更高。创造任何一个新职业，都可能使居住在农村的2—3个劳动力迁往城市。如果有100个新创造的职业，那么就会涌入城市300个新的迁移者，最后导致产生200个失业者。所以，这样一种用来减少城市失业的政策，不仅可能促使城市失业率的提高，而且还可能使农村生产水平下降。

**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迁移和失业** 托达罗模式包含有这样的政策含义，就是应该减少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过度投资，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更应如此。由于城乡劳动力迁移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创造新职业的速度，在城市就出现了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从而使得在选择新雇工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约束标准。在每个受教育的组别内部，这种选择标准也许大多是偶然的，但许多调查者发现，一般雇主都喜欢把雇工的学历或者在校的年限作为主要的选择条件。在支付同样工资情况下，人们显然喜欢雇佣有较高学历的人，即使多受的教育根本无助于所担任的工作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那些过去要求小学学历就能

胜任的工作现在要求中等学历（如清洁工、邮递员和档案管理员等），过去需要中等水平就能担任的工作现在却需要大学水平的人（如公务员、打字员和图书管理员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城市工资既定的情况下，在现代部门就业的可能性，对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说就较大，对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则相对小。所以，对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来说，他们的预期城乡收入差异也将更大，而且将更加愿意从农村迁往城市。所以，托达罗模式通过对许多不发达国家现状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经济学定理，就是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越愿意向城市迁移。

如果从教育政策方面来看，不妨可以预测，当城市可能提供的新就业机会少于申请就业的人时，学生们将面临着不断增加的继续接受高一级教育的压力，民间对提高教育程度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获得城市新职业所派生出的要求，它会促使政府继续增加初等教育以上教育机构的投资。但是，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高学历失业者”的可能性也就愈大。政府在初等以上教育机构及设施方面的投资将会造成一大批闲置的人力资源。在第11章我们将具体地讨论教育经济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工资补贴和传统的对稀缺要素的价格制订会阻碍生产** 在第8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一项标准的促进城市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办法，是通过制订“恰当的”价格的办法，或许采取工资补贴（即政府给雇主雇佣的每个职工固定的补贴额）或者直接由政府雇佣的办法，来消除价格扭曲。由于各种制度上的因素所造成的城市实际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市场的或者恰当的工资水平，因此经常可以听到人们正确地提出通过价格调整或补贴制度来消除工资扭曲，会鼓励采用更加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根据上面关于刺激劳动力迁移的意见，这种政策在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导致失业水平的提高。当我们同时考虑城市和农村这两大部门时，一项工资补贴政策对整个经济福利的作用就不能立刻看清楚，这一点

将主要取决于城市失业水平的高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大小以及在城市创造出更多职业时，刺激劳动力迁移的程度。

**应该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规划** 仅在城市就业需求方面起作用的经济政策，比如工资补贴，政府直接雇佣，消除价格扭曲和对雇主在捐税方面进行刺激等，从长期来看，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的效果如果直接和调整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经济政策相比可能要小得多。然而很清楚，如果能把这两个方面的政策结合起来，就最适合需要了。

农村发展政策对达到农村发展的目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许多精通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专家都认为，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并纠正政府制定政策时，对城乡产业部门（例如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发展过分偏重，恢复城市和乡村在实际收入方面的适当平衡。

如果在降低城市工资水平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就需要通过小型的和中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进行审慎的投资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增长，以不断扩大就业机会，这一切都必须能够同时扩大农村的经济基础。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制定创造性的、精心设计的农村综合发展计划，把现在对城乡劳动力迁移的不必要经济刺激降低到最低程度。这些计划的重点应放在寻找农业或非农业的生财之道，提高就业，提供卫生设施，改进教育，发展基础设施（电力、供水和交通等）提供其他的农村生活条件方面。只有完全符合不发达国家城乡经济实际的综合规划，才能成功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多地向城市迁移问题。

但是，认为迫切需要制订正确的政策来抑制农村移民过多地涌入城市，并非意味着企图扭转有些人所说的这个“历史必然趋势”。相反托达罗迁移模式的内容是，现在日益需要的是这样一种一揽子政策，这种政策不会通过人为制造城乡经济机会的严重不平衡而加剧城市化的历史趋势。

### 4.3 国际性人口迁移与世界难民问题

**国际性人口迁移的趋势和前景** 出于寻找较好经济机会的人口迁移不仅仅存在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城乡之间，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事实上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许多国家奉行的“门户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政策和国际航空、运输的日益发达，使人们能够为了寻求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从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迁移。同时，由于第三世界各国也存在着高低不等的收入水平差距，上述的劳动力迁移也在第三世界各国之间大量出现。

目前，国际性的劳动力迁移主要发生在以下六个地区：西欧、北美、大洋洲、中东、南非和南美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在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性质有着明显的差异。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的劳动力，既有短期性质的，也有永久性的。在欧洲，劳动力迁移的主流是短期性的和以家庭重新团聚为目的的永久性迁移。在北美和大洋洲，国际性的劳动力迁移大多是永久性的，但是近年来这种性质的劳动力迁移已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非法迁移者的增长，特别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越来越多。在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中，劳动力迁移主要是永久性的，其主要趋向于选择人口稀少的地区或者是需要某种特殊技艺的地区。在中东和南非，大多数迁移者属于短期性的体力劳动者。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劳动力迁移的类型也有较大的差异，在劳动力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其它落后地区向工业化国家迁移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劳动力迁移的现象，但这种迁移主要局限于邻国之间。例如向欧佩克迁移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其阿拉伯邻国，向南部非洲（包括南非和津巴布韦）迁移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赞比亚、莫桑比克、马拉维。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既是劳动力迁移的输入国，又是劳动



力迁移的输出国，其中以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阿根廷最为典型。阿根廷一方面从邻国吸收体力劳动者，一方面又为邻国输出专业技术人材；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给委内瑞拉、美国、和加拿大输出工人的同时，又从海地输入大量合同工在其甘蔗田里工作。

由于各国统计资料不一致，因此，要对目前劳动力迁移的人数进行估计是困难的。原因在于现在存在着数量巨大的非法移民，而要对非法移民进行统计和预测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就目前的一些数字来看，劳动力迁移人口（合法）最多的地区是西欧和中东。1973年，西欧有650万就业的外籍工人，主要分布在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sup>⑤</sup>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后，随着西欧经济的衰退，西欧劳动力迁移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出现了劳动力大量输入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在西欧国家寻找就业机会的外籍工人非常有利，但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迁移者却是非常容易被中东劳动力市场吸收的。而在南欧—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从西欧归回的劳动力要在国内重新就业就困难多了。

1980年，据统计在中东的移民劳动力总数为270万<sup>⑥</sup>，这些迁移者主要来自埃及、北也门、南也门、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印度。虽然，由于近年来亚洲籍的迁移者人数在不断增多，阿拉伯籍的迁移者占总数的比例在持续下降，但是阿拉伯籍的迁移者仍然占中东迁移者总数的70%。就是在亚洲籍迁移者中占总数比例较大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不过占该地区外籍工人总数的23%，其它亚洲籍迁移者主要来自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南朝鲜。在许多中东的劳动力输入国家中，外来的劳动力已在其整个劳动力总数中占大多数。而在象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就是在其整个人口总数中，外籍移民也占大多数。这种后果使中东国家非常不欢迎永久性的劳动力迁移，并对外籍工人限制举家迁移，给予很少的经济社会福利，不给予政治权利等。

震撼世界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虽然传统上倾向于去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和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行永久性迁移的劳动力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但其它地区的劳动力迁移也还是没有有什么重大变化。向北美洲短期性迁移的劳动力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向大洋洲短期性迁移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国。随着短期性劳动力迁移的增加，在美国也就大量出现了非法移民问题，这就给统计全部劳动力迁移人数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劳动力的迁移还没有在美国产生特别重大的震动。向南非迁移的大多数劳动力是属于短期性的，其主要来自南非的一些邻国，大部分人受雇于矿山。向南非其它一些国家迁移的劳动力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大多是来自邻国的短期性迁移。在中东（包括北也门、南也门、巴基斯坦和约旦）、南部非洲（包括莱索托、博茨瓦纳）和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劳动力输出国中，劳动力的国际性迁移已经对其国民经济形成了重要的影响。例如，1975年，约旦和北也门已有占其全国劳动力总数28.2%和20.3%的人生活在国外。与此类似的莱索托和博茨瓦纳，在1976—1977年间，约有33.3%和20%的劳动力长期在国外。1982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居住在美国的人占其总人口的6—10%之间。

**国际性人口迁移的经济影响** 按照古典学派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的模式，国际性劳动力迁移既有益于劳动力输出国又有益于劳动力输入国，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有益无害的现象。<sup>⑩</sup> 一个国家的工资比另一个国家相对较高，对劳动力来讲，就是表明这样的事实：高工资的国家劳动力是相对短缺，低工资的国家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自然应从低工资的国家向高工资的国家迁移，这无疑对有关的各方都是有益的。劳动力输入国得到相对短缺的劳动力，迁移的劳动力得到了相对较高的工资，对劳动力输出国来讲，如果国内存在着失业，这样就会减少国内解决就业问题上的

困难；如果国内已经是充分就业，这只会引起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而不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原因在于来自国外的汇款可以弥补由于劳动力外流而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即使迁移的劳动力属于永久性的或者不把收入寄回国内，劳动力输出也只会减少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而不会引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因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会因此减少。

有一种分析发展中国家结构性问题的理论认为，国际性劳动力迁移是有益的、特别是有助于劳动力输出国解决结构性问题。按照这种理论，国际性劳动力迁移对劳动力输出国来讲至少有五点好处：第一，有助于减少国内失业；第二，迁移者对国内家庭成员的汇款，会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和储蓄的增长，从而对物质资本的形成提供刺激和外汇来源，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第三，过剩劳动力从乡村中流出会提高土地-劳动的比率，改善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乡村收入水平，从而刺激了乡村部门的经济增长；第四，归国的迁移劳动力会带回在发达国家学会的先进技艺，从而有利于国内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且无须国内支付培养费用；第五，允许国内处于不利状况的劳动力迁移到国外，并取得高工资，从而有助于改善劳动力输出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总而言之，对劳动力输入国来讲，虽然由于外籍工人的存在而必须付可观的社会费用，但是只要国内存在充分的就业机会，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的有益性就是无可置疑的（在美国也许例外）。与此相同，由于迁移者获得了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有利的生活环境，国际性劳动力迁移也是有益于劳动力个人的。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对整个劳动力输出国来讲，上面所列出的几点情况几乎都是一种幻想，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的有益性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劳动力输出国的许多客观事实足以否定上述有益性。下面让我们深入分析上述5条假定的“有益性”。

失业的减少 人们一般认为不熟练的和失业的工人向国外迁

移自然会减轻对国内相对短缺就业机会的压力。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据估计，由于50%外迁工人的归国，使国内的公开失业率上升了一倍。但是，事实上通过迁移寻找较高收入工作机会的并不总是不熟练的劳动力。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为“人材外流”的问题而头痛，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生、工程师和其它专业技术人员都流向了工业化国家和欧佩克国家，以寻找高收入的工作。即使在蓝领工人阶层中，迁移劳动力中占比例较高的仍然是有熟练技术的工人。例如在中东，由于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的建筑业突飞猛进，使得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许多熟练建筑工人被“挖走”。这就造成这些劳动力输出国在缺乏必要的熟练建筑工人同时，又陷入其它工人失业增加的困境。原因在于熟练工人往往可以带领不熟练的工人进行工作。据估计，每个熟练工人可以带1—2名不熟练的助手进行工作，但是由于大量熟练工人的外流，一旦造成熟练工人的总量短缺，就必然加剧国内不熟练工人的失业。

**资本的形成** 认为国外汇款通过加速资本形成而带动长期经济增长的观点，在现在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怀疑，原因在于来自国外的汇款往往被迁移者的家庭成员用于消费而很少用于储蓄。例如，在巴基斯坦，约80%的汇款被用于直接消费或者不动产的购置，虽然大量的汇款增加了消费需求，但并不能相应地促进供给的增加，至少在短期是这样的。为了增加供给，必须加快资本的形成，但这就需要支付外汇来进口必需的机器和设备。从这种角度来讲，那种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就会和投资发生对立——因为相对短缺的外汇也需要用来进口许多消费品。如果政府试图采取限制消费品进口的政策，那么由于消费需求的过大，价格水平就会居高不下。国外汇款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如何，取决于一个国家通过国内生产吸收旺盛需求的能力。我们在前面分析的状况在那些低收入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是在较低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膨胀性的物价上涨和消费需求过大。

乡村农业的经济增长 在刘易斯模式和其它一些的经济理论中，大都认为发展中国家乡村部门中存在的就业不足和失业，是由于过高的劳动-土地比率导致的低生产力和低人均收入造成的。因此，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出来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它使得过剩劳动力流出并在国外找到一个收入较高的工作，对仍然留在乡村的劳动力来讲，就会减轻对相对短缺的土地的压力。对后者来说，较高的土地-劳动比率会带来较高的人均收入，从而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同时更高的收入也会进一步鼓励仍然在乡村工作的劳动力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从而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但在我们看来，有两个因素会妨碍这种“有益性”的产生。第一，如果乡村的迁移者把高收入寄回家，按照社会习惯，这种收入就会引起闲暇对劳动的替代。结果，农业总产值只会有小幅度的增长甚至下降。在不赞许经济活动要妇女参加的社会中，这种对劳动力生产活动的传统制约，可以增加国外汇款的流入，但引起农业产出值的下降。原因在于本来当时的许多生产活动应由妇女来承担（由于本地男性劳动力的相对缺乏），而国外汇款的流入使妇女不参加生产活动也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第二，这里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一旦乡村地区面临着主要是年轻、强壮劳动力外流的状况，这就可能超出当地就业的均衡状况。因为即使由于原先劳动力的迁移减少就业压力后，本地工资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只要国外的预期工资收入仍然较高，对劳动力来讲，就没有什么理由仍然在国内停留。这使得国内从土地短缺、劳动力过剩的格局向劳动力短缺、土地过剩的格局转化。实际上，这种格局的转化已经在北也门、约旦等国出现。这些国家不得不处于由于乡村劳动力过度迁移、农业生产总值下降的困境之中。事实上，约旦已经不得不输入农业工人以弥补国内农业工人外流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

**人力资本的形成** 认为迁移的劳动力在国外工作时获得了技术，以后回到国内可以运用这些技术的观点，有二点假定值得怀疑：第一，它假定迁移者在国外找到了比在国内工作时更高技术水平的职业并且学到了较熟练的技术；第二它假定这些工人将回到国内并且能在国内运用他们所学到的技术。

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这二点假定是没有什么现实基础的。很简单，不熟练的迁移者往往在海外也得不到需要较高技术的工作。进一步讲，即使技术工人在东道国最后不做技术工作，而屈就看门人或清洁工的工作，也比国内技术性工作的报酬高得多。结果，迁移者不但没有学会新技术，而且把原有的技术也荒废了。关于第二种假定的情况可能性较小。更为现实的倒是迁移者找到更具技术性的工作，并且学得一定的先进技术后，往往是不愿意回国。原因在于对他们来讲，在国外有更多的提升机会。这种情况在迁移到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中更是如此。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吸引并鼓励更多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永久性居住。退一步来说，就是愿意回国的劳动力，回国后也会发现他们学得的新技术是不能在国内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运用的。他们在国内现有的生产技术水平下成为“过于熟练”的劳动力。

**收入的分配** 关于“国际性人口迁移”有益性的理论还认为国外的迁移者往往是出自于国内处境最不利的阶层。实际上，构成向国外迁移洪流的主要组成部分恰恰是中等收入家庭，因为劳动力迁移需要有一个最初投资的问题（如筹集代理费、机票、纳税等），这些投资显然是贫困阶层所难以承担的。因此，来自国外的汇款只会流入中等收入家庭，使其富上加富。实际上，在汇款的流入加剧了主要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升的情况下，无力把工人送到国外的家庭的处境甚至会更糟。

**结论** 除了对上述认为国际性迁移对输出国有好处的假定所作的几点批评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与此有关的不同意见。第

劳动力输入国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意控制劳动力的流动，而劳动力输出国对此却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劳动力输入国。从长期来看，一旦东道国突然遣返外籍工人，而劳动力输出国又不能找到有效的办法迅速扩大国内就业机会，劳动力输出国的经济就必然会被回归工人的巨流冲击而发生混乱。当然，近期内，在外籍工人正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东道国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德国、瑞典等是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的。总而言之，对一个不能采取有效政策减轻对国际性劳动力迁移过分依赖的国家来讲，短期内迅速安置大量的归国劳动力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第二，曾经有人认为允许工业化国家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只能使个别发展中国家享受到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的好处，但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却是个损失。假如发展中国家不愿意以低廉价格提供劳动力的话，那些劳动力短缺而资金充裕的国家就会把它们劳动密集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来。这种企业的迁厂比国际性劳动力迁移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刺激不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

从结论中可见，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相对于私人利益的社会利益，并不像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鼓吹者们所说的那样大。对于劳动力输出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如果国际性劳动力流动给劳动力输出国带来熟练工人的外流、过多的消费需求、农业生产的下降和收入分配恶化等及上面讨论过的隐藏着任何危险，对他们来讲，国际性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弊病显然大于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对允许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的政府来讲，就必须采取富有成效的手段以控制国际性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 4.4 日趋严重的难民问题

不论在国内或者国际间，一部分劳动力的迁移主要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种族方面的原

因，这就形成了日益增多的世界性难民。据最近的统计预计，全世界共有1260万难民，其中1/3强是各国国内的难民。非洲地区存在的难民有630万，占世界难民总数的一半；其次是亚洲，包括中东在内，共有580万难民。不论是从原籍还是从避难地区来看，占总数90%的世界难民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从原籍上看，埃塞俄比亚（380万）、巴勒斯坦（180万）和阿富汗（150万）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区。其它突出的难民来源是柬埔寨、黎巴嫩、伊朗、乌干达、乍得和南非。从外国难民的避难地区来看，索马里（150万埃塞俄比亚难民）、巴基斯坦（140万阿富汗难民）和约旦（716 400名巴勒斯坦难民）这些国家负担的难民人数最多。从外国难民占人口总数的比率上看，索马里（1:3）、约旦（1:5）和吉布提（1:10）这些国家最高。在接受难民的国家的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500美元以下的有索马里、吉布提、喀麦隆、苏丹、巴基斯坦和扎伊尔。由于许多贫穷国家为了接受这些不幸的人们，承担了与自己力量不相称的负担份额，难民问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sup>①</sup>

对那些接受难民的国家提供帮助的主要是少数国际和私人救援组织，个别政府和地区的组织只能起补充的作用。在国际救援组织中，最大的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和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后者主要是援助巴勒斯坦难民。联合国的其它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近也在这方面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1981年，这些特殊的救援机构的预算达7亿美元。私人和非官方机构有红十字会、红新月会、自愿救援组织国际委员会，以及不计其数的宗教和非宗教的团体等。地区性组织象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和非洲统一组织（OAU）也作了一定的努力。

然而现行的世界难民政策存在着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这些政策沿袭了联合国官方的所谓难民的定义，即“由于种族、



宗教、民族、特殊社会团体成员或政治见解方面的原因，本人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受到迫害，因而远离祖国并且不能、或出于以上顾虑，不愿利用其本国的保护的人”。这个定义起源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欧洲难民问题。现在看来，这个定义不大适用了，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难民离家出走，尽管他们已经脱离了天灾内乱、全面的恐怖和镇压，但从他们个人讲仍然“有充足的理由担心受到迫害”。假如他们个人难民的身份不能得到承认，或许就会在“叛国”的罪名下被遣送回国蒙受迫害。2.许多躲避战争或内乱蹂躏的难民被迫在国内避难，他们应该和逃出国境的难民一样得到帮助。

联合国的定义忽略了这些可能性，因此，许多难民无法得到国际组织的援助。并且，联合国的定义往往被个别政府用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政府经常不顾这个定义，把来自“敌对”国家的逃亡者作为难民来欢迎，另一方面，他们又援引这个定义，拒绝承认逃离“友好”国家公民的难民身份。联合国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已经失效，如在柬埔寨的问题上，由于其成员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对难民提供救济的问题上，联合国就几乎无能为力了。

其次，现行的世界难民政策旨在为难民在最初避难地区提供救援，直到他们能够在接受他们的第三国（这些国家通常是工业化国家）定居下来为止。这样实质上是把历史拖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时，对欧洲难民提供援助只是帮助他们在西方国家定居下来。在这些西方国家中，难民是受到欢迎并很容易被接受。相反，目前第三世界的难民并不为西方国家所欢迎，在他们能在西方国家定居之前，肯定要等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定居者占难民总数的比例来看，绝大多数难民从来没有获得定居权利。并且，那些最终在西方国家定居下来的难民，他们所能找到的地区与其在国内时的各方面相差很大，常常受到不友善的待遇，在这里个人的生活完全依靠自己具有的技能 and 学历，而这些对于

他们来说恰恰是最缺乏的东西。

作为改善现行难民政策的基本方案，已经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a）修改官方的难民定义；（b）采取一种针对发展的难民援助政策。

**官方的难民定义** 对目前联合国难民定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主张采用一个新的定义，以适应各种不同性质的今天的难民问题。特别提出新的难民定义应该：（a）适应所有难民，即在国内避难和逃出国界的难民都应包括；（b）对所有的由于战争、政治动乱或高压而产生恐惧感，离国出走人都应适用。有人还提出，对于逃避由于政府管理不善或腐败造成的贫穷和经济混乱的人也应包括在难民之内。欧洲的个别政府已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准备按照这样的定义执行，即承认那些由于受压迫或者国内政府管理无能而无法施展才能而离国出走的人的难民或准难民的身份。

**适应发展的策略** 一种与当前救济和第三国定居政策相对立的改革方案，主张对最初避难国或起因国给予针对发展的援助。人们希望，对当前没完没了地接受难民的最初庇护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这些国家就能在其经济内部吸收难民，而不是承担经办永久性难民营的重担。这将解决难民在西方国家寻找最后避难地问题，或许可以把难民安置在与他们人种相同的国家，并能给这些国家的经济一定的刺激。对最初避难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性援助，就会使政治解决更顺利，难民接受更顺利。

但是，这种意见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如果这种援助使外国人的居留长期合法化，那么最初避难国将会不愿意接受长期的发展援助，同时由于援助前景的诱引，起因国也就不可能或不愿意实现政治解决。其次，提供捐赠性援助的国家，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就可能会发现不断提供更直接的人道主义的救济基金比提供短期难以见效的长期经济发展援助对自己更有好

处。再次，这种政策可能造成工业化国家可以不接受外国难民，从而推卸他们在援助难民问题上的责任。

因此，不论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人口的迅猛增长、失业人数的增加和社会政治的持续动乱交织在一起，将使近年内的世界难民问题更加严重。

## § 5 提要与结论：制订综合的移民与就业战略

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我们从不同方面叙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有可能制定的改善非常严重失业状况的政策。在这里我们概括了我们以为是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制订一项综合性移民与就业战略的“一致”意见。它有6个要点。

1. **创造一个城乡经济适当平衡的局面。**城乡经济机会适当平衡，对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两方面的失业问题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措施。要做到这一点，主要应该使农村部门综合发展，在农村普及小型工业和使经济活动和社会投资面向农村。

2. **扩大小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由于某些产品（大多是一些基本消费品）比其它产品的单位产出和单位资本所要求的劳动要多，因此产出的“产品组合”构成明显地会影响就业人数的多少。要扩大城乡的这些主要是小型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1）直接地通过政府的投资和刺激，特别对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的经济活动的投资和刺激；（2）间接地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从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得到的收入），使穷人获得收入。这些农村穷人的消费需求结构和富人相比既较少地需要进口的产品又是劳动密集型的。

3. **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现有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通过取消各种资本补贴，限制城市工资水平的提高来纠正价格扭曲，无疑会增加就业机会，并能促使人们更好地利用稀缺的资本资

源。但这些政策能起多大的作用，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起作用是不清楚的。此外，移民问题对此的影响还必须搞清。根据第8章中所说的理由，可以肯定单凭正确的价格政策本身不能使目前的失业状况得到重大改变。

**4. 选择适宜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在农村的农业和城市的工业中，创造就业的长期计划成功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几乎完全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的技术、机器和设备（基本是劳动节约型的）。必须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作出努力，通过发展发展中国家本地的技术研究和他们自身的消化能力，减少这种依赖性。这首先可以联系到的就是应该对小型的劳动密集型城乡企业的发展作出努力。这些企业发展重点可以放在发展能够满足农村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成本低、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方法，这种农村基础设施具体包括道路、排灌、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显然，这是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援助能取得最丰硕成果的领导领域。

**5. 改变教育和就业之间的直接联系。**近年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发现了“知识阶层”失业的问题。这就给人们提出了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保持一个适宜的数量比例的问题。从现在来看，正规教育已经成为每一个要获得工作机会的人的必经之路。由于现代部门就业机会的增加远远赶不上毕业人数的增加，因而就有必要延长教育的年限，压缩毕业人数。对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关系将留待第11章再充分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节制过分要求增加在校时间的一种办法（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对现代部门职业的要求）是，政府——它往往是大雇主，将招工办法和工资结构建立在另一种标准的基础上。此外，如果在农村地区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经济机会，就更容易引导教育体制面向农村发展的需要。但是，目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照搬西方的制度，把目标放在培养学生去胜任最多能容纳20—30%

劳动力的小型现代部门的工作，许多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技术训练都被大大地忽视了。

6. 使国际性劳动力迁移内在化。我们在第4章已经讨论过，存在劳动力过剩、失业或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向劳动力短缺、工资收入高的国家输出劳动力的现象，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具有稳定的好处。实际上，在今天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或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迁移的劳动力只具有数量上的意义了，而不像在19世纪时期的欧洲，这种国际性的劳动力迁移在经济和数量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性劳动力迁移对于劳动力输出国的个人及其家庭成员来讲无疑是有益的，但对整个国家来讲，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的“纯收益”（除掉收益的成本，包括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就未必是有益了。这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输出国能否通过制止专业技术人员的过度外流，控制由于国外汇款而引起的消费需求膨胀，改善由于劳动力外流而带来的农业生产的下降和减少由于劳动力迁移带来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等一系列政策和手段，能使国际性劳动力迁移对社会潜在的好处内在化。当然这些政策和手段必须按照迁移者的年龄、技术程度和收入水平分别对待和处理。最后，由于难民问题是国际劳动力迁移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他们的处境采取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政策要比单纯经济方面的手段更有用。

## § 6 人口问题评论

读者也许注意到我们还没有提出一项积极的人口政策作为我们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主要战略。降低过高的人口增长率无疑对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能减少未来新的在城市和国外求职者增长的规模。然而我们知道对今后15—25年来说，欠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数量已为现有的生育率所决

定了。但这并不是否认需要尽可能降低生育率，特别是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如此。在我们提出的优先考虑的政策范围内，之所以没有包括一项积极的、政府支持的计划生育计划的原因就在于，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分析的，上述每一项政策都会通过提高贫困阶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办法，间接地降低人口出生率。

## 注 释

① 为了增加更多的关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方面的知识，可参考迈克尔·P.托达罗的《城市化的灾难》一文，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第17章，以及白处德·瑞纳德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政策》一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联合国社经理事会人口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人口政策考察简报》E/CN.9/338号1978年12月第27—28页。

③ 理查德·乔利：《劳动力自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范围、原因、问题与政策》，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业机会的展望》，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4页。

④ 帕米拉·布瑞格：《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见：《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研究报告》1971年107号。

⑤ H.N.巴尔农和R.H.沙伯特：《劳动力迁移、教育与城市劳动力过剩》，见OECD发展研究中心：《就业问题专题系列报告》1975年10月。

⑥ 例如，见迈克尔·P.托达罗：《工业化问题分析：欠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失业》，见：《耶鲁经济学文集》之8，1968年第2卷第329—492页；《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和失业的模式》，见：《美国经济评论》59卷1969年第1期第138—148页。

⑦ 关于发展中国家试图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势头的全面分析可参见阿兰·B.西蒙斯：《对试图强制人口迁往指定中心城市和地区方案的评估》，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19。

⑧ 联合国：《国际性人口迁移的政策和规划》，纽约联合国出版社

1983年版；第20页。

⑨ 同上，第40页。

⑩ 例如，见J.S.布克斯和C.A.辛克莱：《国际性劳动力迁移与阿拉伯地区的发展》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80年。

⑪ 有关难民问题的数字和政策依据的分析，可参见查尔斯·凯利：《世界性难民问题的政策：针对发展的战略实例》纽约人口委员会1982年。这一部分引用的数字出自凯利的文章。

⑫ 例如，参见埃德加·爱德华兹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纽约福特基金会1974年版，第1—46页。

## 概念复习

推动和拉进劳动力迁移的因素 (Push and pull migration factors)

就业概率 (Job probabilities)

迁移者的待业时间 (Migrant time horizon)

城市惯例工资 (Institutional urban wage)

劳动力需求曲线 (Demand curve for Labor)

预期收入 (Expected income)

非正规部门 (Informal sector)

现值 (Present values)

收入差异 (Income differentials)

城乡经济不平衡 (Urban-rural economic imbalances)

诱导性劳动力迁移 (Induced migration)

经济和社会的基础结构 (Economic and social infrastructure)

工资津贴 (Wage Subsidy)

难民 (Refugee)

## 问题讨论

1. 为什么说，在今后的20年内，相对于降低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来说，城市膨胀可能成为一个更重要的“人口政策”问题？试解释之。

2. 简述托达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模式的主要假设条件及其特点。

这个模式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政府制定的使城市就业机会增加的政策，在事实上会导致更多的失业。试分析导致这种自相矛盾后果的原因是什么？

3. “解决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过度迁移，导致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加深这一严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恢复平衡”。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的逻辑推理过程，并举出政府推行的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机会均衡政策的一些具体事例。

4. 多年来，发展经济学中一个传统的观点是，在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和加快工业就业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矛盾。为什么说这两个目标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要大于它们之间的矛盾？解释理由。

5. “理顺价格”的含义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对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调整会带来充分的新的就业机会？在你们的讨论中，如何给“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6. 试区分国际性劳动力迁移的经济决定性因素和世界性难民问题的政治经济背景，对这两种不同的问题，需要什么类型的解决对策？

## 附录 9.1

### 托达罗劳动力迁移模式的数学公式

托达罗模式的基本理论在本章已经作过分析。它假定认为，个人在做出劳动力迁移的决策时，其依据是对最大限度收入的追求和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估计；它还假定，一个决定迁移的人企图获得按自己的文化程度或技术才能一般在城市能得到平均收入；不过，它假定一个迁移者知道他进入城市后立即获得工作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失业或者就业不足。所以，一个迁移者的预期收入就由城市现代部门的现行收入和在现代部门就业的概率所决定。而不是为城市“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不足或者城市的失业总状况决定。

如果我们用  $V(0)$  表示扣除迁移者待业时间后，预期的城乡



“净”收入的现行价值， $Y_u$ 、 $Y_r(t)$  分别表示一个迁移者在城市和农村期间的平均真实收入， $n$  是迁移者计划待业时间的长度， $r$  是反映迁移者选择待业时间长度的扣除率，那么决定是否迁移就取决于

$$V(0) = \int_{t=0}^n [P(t)Y_u(t) - Y_r(t)] e^{-rt} dt - C(0)$$

的值是正还是负，其中 $C(0)$ 表示迁移的费用， $p(t)$ 表示在 $t$ 期间内，一个迁移者在平均收入的水平下，在城市就业的概率。

在任何一个时期内，在现代部门就业的概率 $p(t)$ 直接与现存的失业大军或就业不足的求职者所选择的待业时间的概率 $\pi$ 有关；如果我们假定对大多数迁移者来说这种选择步骤是偶然的，那么在进入城市后，他们在 $x$ 期间内，从现代部门获得职业的概率

率 $p(x)$ 就是 $P(1) = \pi(1)$ 和

$$P(2) = \pi(1) + [1 - \pi(1)] \pi(2)$$

从而 $P(x) = p(x-1) + [1 - p(x-1)] \pi(x)$ 或者

$$p(x) = \pi(1) + \sum_{t=2}^x \pi(t) \prod_{s=1}^{t-1} [1 - \pi(s)]$$

其中 $\pi(t)$ 等于在 $t$ 期间内新职业的空缺与在此期间求职者的累积总数的比率。

从这个概率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给定 $Y_u(t)$ 和 $Y_r(t)$ 的任一水平上，迁移者在城市的时间愈长，获得职业的概率也就愈大，从而在这个期间内的预期收入也就愈高。

用这种方式精确说明概率的变化，有两个优点：1.它避免了由于假定迁移者在进入城市初期，要么得到平均收入，要么就分

文不得而造成的绝对性。它往往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就业不足的迁移者在寻找固定职业的同时，可以在城市“非正规”部门或者传统部门多多少少得到一定收入。2.它多少对很少有选择的假定作了一些修正。因为一个迁移者被选中的概率会随着他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而变化，从而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理论，即在城市居住时间长的迁移者比一个初来乍到的迁移者具有更广泛的信息渠道，所以他们的预期收入也就比后者高一些。

假定我们现在将这种模式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引入一个简单的城乡劳动力总供求动态平衡模型中，在任何时期内，在城市部门获得职业的概率  $\pi$  与新职业的创造率成正比，但求职者与现有就业机会成反比，即：

$$\pi = \frac{\lambda N}{S - N} \quad (\text{A9.1})$$

其中， $\lambda$  是城市新职业创造率， $N$  是城市就业水平， $S$  是城市劳动力总量。

如果  $W$  是城市实际工资率， $r$  是农村平均实际收入，那么预期的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则是

$$d = W\pi - r \quad (\text{A9.2})$$

或者将A (9.1) 代入A (9.2) 则有

$$d = W \frac{\lambda N}{S - N} - r \quad (\text{A9.3})$$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的基本假定仍然是城市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预期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函数

$$S = fS(d) \quad (\text{A9.4})$$

如果城市职业创造率是城市收入  $W$  和政策参数  $a$  的一个函

数，例如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通过发展进口替代来增加就业，进口替代就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我们可以得到

$$\lambda = f_a(W, a) \quad (\text{A9.5})$$

其中假定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a} > 0$ ，如果城市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化所致，那么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就可以表示为

$$\frac{\partial S}{\partial a} = \frac{\partial s}{\partial d} \cdot \frac{\partial d}{\partial \lambda} \cdot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a} \quad (\text{A9.6})$$

将 (A9.3) 式微分后代入 (A9.6) 可得

$$\frac{\partial S}{\partial a} = \frac{\partial s}{\partial d} \cdot W \cdot \frac{N}{S-N} \cdot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a} \quad (\text{A9.7})$$

如果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超过职位创造速度的增长，那么城市就业的绝对数量就会增加，

即 如果  $\frac{\partial S}{\partial a} > \frac{\partial(\lambda N)}{\partial a} = \frac{N \partial \lambda}{\partial a}$  (A9.8)

那么，将 (A9.7) 和 (A9.8) 合并，我们就有

$$\frac{\partial S}{\partial d} \cdot W \cdot \frac{N}{S-N} \cdot \frac{\partial \lambda}{\partial a} > \frac{N \partial \lambda}{\partial a} \quad (\text{A9.9})$$

$$\text{或者 } \frac{\partial s/s}{\partial d/d} > \frac{d(s-N)}{W S} \quad (\text{A9.10})$$

或者最后将  $d$  替换，则有

$$\frac{\partial S/S}{\partial d/d} > \frac{W \cdot \pi - r}{W} \cdot \frac{(S-N)}{S} \quad (\text{A9.11})$$

公式 (A9.11) 表明，如果相对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frac{\partial s/s}{\partial d/d}$

(其中  $\frac{\partial s/s}{\partial d/d}$  也可以称作“反映劳动力迁移的函数”) 的城市劳动力供给弹性大于实际城乡收入，即城市工资所占比重乘以失业率  $s - N/s$ ，那么整个失业水平就会绝对地上升，相应地公式 (A9.11) 则表明，失业率越高，增加失业水平的城市劳动力供

给弹性也随之越大，而不论城乡预期实际收入差异如何变化，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如果把实际数据代入这个不等式（A9.11），就会被一个相当低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所证明，例如，如果城市实际工资是60个单位，农村平均收入是20个单位，就业概率是0.50，而失业率是20%，那么在城市劳动力供给弹性大于0.033的情况下，失业水平就会上升，

将数字代入（A9.11），我们就会得到

$$\frac{\partial s/s}{\partial d/d} = \frac{0.50 \times 60 - 20}{60} \times 0.20 = 0.033$$

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里，需要较多地对这个弹性系数的经验数值有一个了解后，才能准确地预测到，通过政策因素来增加就业的措施对整个城市失业水平的影响有多大。

## 附录 9.2

### 城市的非正规部门

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问题的许多争论，焦点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二元性上，即资本密集，大规模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生产规模较小的传统部门并存。近年来，这种二元性分析已经特别广泛地运用到城市经济中来，城市经济也被分为“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

在70年代初期，通过对一些大量新增城市劳动力没有在其失业统计上表现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调查，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曾经被“正规”的承认。这些新增的大量城市劳动力看起来创造了自己的就业或者在一些小型的家庭企业工作。那种“单干的”劳动力主要从事沿街出售叫卖、代写书信、磨剪子磨刀、收集废品和贩卖鞭炮、耍蛇、卖淫和贩卖毒品等职业。其它一部分人则从

事修理、木工、小手艺人、理发师和佣人等职业。后来的研究表明，各地的城市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的比例（合法的）占20—70%，平均约占50%（见表A9.1）。据目前的预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以空前的速度继续增长（从1950年到2000年，人数将从2.75亿增长到20亿），使得城市和乡村的正规部门根本无法吸收这么巨大的劳动力数量，因此将解决失业问题的重点放在非正规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无疑是万灵妙方。

非正规部门以大量小规模生产和劳务活动为特点。这些活动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采用劳动密集的简单技术进行的。在这个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往往很少受过正式的教育，一般也没有什么技术，并缺乏资金来源。结果，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工人工资要比

表9.1 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中比例的估计情况

地 区	比 例 (%)
<b>非 洲</b>	
阿比让，象牙海岸	31
尼日利亚，拉哥斯	50
加纳，库马斯	60—70
肯尼亚，内罗毕	44
塞内加尔，城市地区	50
突尼斯，城市地区	34
<b>亚 洲</b>	
印度，加尔各答	40—50
印度，阿合买巴德	47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45
斯里兰卡，哥伦坡	19

(续前表)

地 区	比例 (%)
马来西亚, 西马来西亚城市地区	35
新加坡,	23
泰国, 城市地区	26
巴基斯坦, 城市地区	69
拉 丁 美 洲	
阿根廷, 科尔多瓦	38
巴西, 圣保罗	43
巴西, 城市地区	30
巴西, 里约热内卢	24
巴西, 贝热和内特	31
智利, 城市地区	39
哥伦比亚, 波哥达	43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圣多明哥	50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48
厄瓜多尔, 奎多	48
萨尔瓦多共和国, 圣萨尔瓦多	41
墨西哥, 一般地区	27
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与蒙特雷	42
巴拉圭, 亚松森	57
秘鲁, 城市地区	60
委内瑞拉, 城市地区	44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40
牙买加, 金斯敦	33

资料来源: S.U. 塞瑟若曼: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 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81年版。

正规部门的工人工资低得多。此外，非正规部门的工人也无法享受正规部门能够提供的职业安全、完善的工作条件和养老金等保护措施。绝大多数非正规部门的工人都是刚从农村地区来，又无法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人，他们的动力仅仅是为了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生存。因为这比依赖自己家乡的资源进行生产以获得必须的利润要强得多。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口都卷入这种赚钱活动之中，他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很长。大多数人居住地方都是非法地在空地或者贫民窟里建造的，这里一般都没有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象水、电、排水设备、运输、教育和卫生保健等。

就与其它部门的关系来看，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可以使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从贫困和就业不足中摆脱出来，当然，他们所处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也比以前好不了多少。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也有较紧密的联系。正规部门要依靠非正规部门为它提供廉价的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非正规部门反过来又依靠正规部门的发展为它提供较高的收入和消费者。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非正规部门只是以人为的低价格向正规部门的工人提供原材料、基本生活品，才使得正规部门能够维持自己政府所授与的经济强大和合法地位。

非正规部门在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重要性不再存在什么争异。但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非正规部门是否仅仅是那些等待走入正规部门的人们的停留地？或者是人们在被正规部门吸收之前，尽可能舒适生活的一个只暂时存在的过渡阶段？是否应在事实上促使非正规部门成为城市劳动力就业与收入的主要来源？

对于后面观点的支持和赞同可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论。根据产量和就业的比率来看，正规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基础。为了吸收更多的城市劳动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正规部门至少必须使就业率达10%以上，这就意味着正规部门必须

以相当的产值速度进行发展，因为正规部门就业的增长速度往往是低于产值的增长速度的。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是不大可能的。因此，除非找到城市失业问题的其它对策，否则，这种由非正规部门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负担将继续加重。

实际上，非正规部门已经在为城市劳动力提供就业和收入方面倾尽了全力。如前面提到的，它已经平均吸收了整个城市劳动就业的50%以上。另外，一些材料表明，非正规部门已经创造了整个城市工资收入的近1/3。

此外，人们提出的另外一些观点也是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第一，一些材料证明，非正规部门即使在目前敌视的政策环境下也创造了剩余，这种政策环境是指正规部门在信贷、外汇和税收等方面得到的优惠，非正规部门是得不到的；第二，由于非正规部门的资本密集程度较低，因此，非正规部门雇佣一个劳动力所需要的资金只是正规部门的一小部分。这样对资金总是严重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又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储蓄；第三，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培训费用明显低于正规部门。因此，非正规部门可以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第四，在半熟练和不熟练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非正规部门可以对他们产生需求。虽然正规部门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但它是不能吸收那些半熟练和不熟练劳动力的；第五，非正规部门较多的可能采用适用性技术和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从而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第六，非正规部门在对被浪费原材料的重新利用和收集废品，包括从废金属到香烟头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它们的许多产品都成为工业部门的投入品和一些穷人的基本消费品，最后，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可以保证穷人的收入分配在经济发展中得到改善，因为现在多数穷人是在非正规部门得到收入。

然而，非正规部门的发展也不是没有任何不利之处的。发展非正规部门的主要缺点之一在于它加强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与非



正规部门吸收劳动力之间的联系。农村部门来的移民在非正规部门获得职业的失业率低、等待时间短。因此，非正规部门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巨大的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都难以吸收的迁移劳动力，从而加剧了城市地区的失业问题。此外，非正规部门在城市地区的高度集中还引起了一系列环境方面的问题。许多非正规部门的经营导致了污染、交通拥挤（由于人力三轮车）或步行困难（由于街边的小摊小贩）。因此，贫民窟密度和低收入居民住户的大量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服务设施的恶化，给城市地区带来了大量问题。所以，制定旨在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

对发展非正规部门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经济学著作中讨论得不多。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曾经提出几点一般性的建议。首先，政府应该放弃现在对非正规部门的敌视态度，并且采取积极的态度扶持它们。其次，为进行计划，应对这些小企业进行登记注册，以设法从它们那里了解更多的情况。由于非正规部门的结构主要取决于有无技术，因此，政府应该给那些对当地城市经济比较有益的非正规部门提供劳动力培训上的方便。通过这种途径，政府可以在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和发展方面起重要的作用，从而使非正规部门从事对社会最有价值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措施通过提供适当的技术和鼓励措施，从而促进非正规部门中合法活动的发展，限制不合法的活动。

资本短缺也是影响非正规部门生产经营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对这些企业提供信贷无疑会促使其扩展，创造更多的利润，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当然，改进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果给非正规部门的企业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合理的配置（如为小货摊提供特定的地区），还会有助于减轻非正规部门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果不能以直接的方式进行，

可以通过引导非正规部门在城市的郊区或小城镇发展，这些地区往往和居民区相邻较近，从而可以减少城市的密度。特别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手段和我们在第9章讨论过的政策相配套，非正规部门在城郊地区的发展还有助于我们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

总之，在我们确信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城市贫民失业和增加其收入的同时，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许多解决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的步骤之一。

## 第10章 农业变革和农村的发展

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冈纳·缪尔达尔

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重担，必将落到经济中农业活动占优势的部分，即农村。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弗兰西斯·布兰查德

### § 1 农业进步和农村发展的迫切性

如果迁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城市的人口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的话，那么，边远的农村地区经济停滞的原因就可以大体上得到说明。农村就是人民生息的地方。在第三世界，有19亿以上的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辛勤劳作所得无几，靠农业为生往往只能勉强糊口。本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人口为26亿多。各种预测表明，到200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约31亿。像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厄瓜多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和中国这些彼此不同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农村人口都明显地占他们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在非洲这个比率更高，因为几乎每一个非洲国家的农村人口都在其总人口的3/4之上。尽管大量人口迁往城市，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地区人口的绝对数量的增长，至少在今后10年中仍将比城市大。

比单纯数字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即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民的绝大多数（几乎70%）仍然居住在农村，并主要从事只能勉

强维生的农业。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活命，不管经济领域获得了什么“进步”，都不曾给这几亿人带来任何好处。在那些对于这种朝不保夕生活的不稳定性以及避免种种冒险的重要性几乎毫无所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看来，这些人每天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行为似乎大都是不合理的。如果要搞“发展”并且使之能够持续下去的话，那么这种发展一般必须从农村地区开始，特别是必须从农业部门开始。贫困的普遍化、不平等的扩大、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失业的日益严重等这些重要问题，都在农村地区经济生活的停滞而且往往是倒退中找到了根源。

人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是被动的和辅助性的。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的发展要求经济结构有一个迅速的改变，从一个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现代化的工业和服务性的社会。结果，农业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不断发展的工业生产提供大量廉价食物和劳动力，工业则被认为是任何一种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中起能动作用的“主导部门”。第3章中讨论过的阿瑟·刘易斯的著名的两部门模型理论，是发展理论的一个杰出代表。这种理论强调工业的迅速发展要与一个能为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廉价食物和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的发展相适应。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于是否值得如此强调迅速实现工业化是没有信心的。大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农业部门在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远非只是一个被动的、辅助性的部门。一般来讲，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部门，在任何一种经济总体战略中应该是一个起能动和主导作用的部门——这至少对当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讲是如此。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发展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变化之一是，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没有这种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工业增长

或者是毫无意义；或者，即使获得成功，也会使普遍贫困、不平等和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造成国内经济的严重不平衡。

因此，第三世界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要考虑到五个主要问题，因为它们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1. 农业的总产量和人均劳动生产率怎样才能以一种既直接有利于普通的小农场主和无地农民，同时又还能提供充分的剩余粮食支持不断发展中的城市和工业部门的方式大幅度地增长？2. 怎样才能有步骤地将生产率低下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庄改造成为高生产率的商业企业？3. 当传统的小农和农业劳动者反对改革时，他们的行为是顽固和不合理的呢？还是在他们的特殊的经济环境中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呢？4. 各种经济刺激是否足以鼓励农民增产？或者是否对农村的整套耕作方法也要进行制度和结构方面的改革？5. 增长中的农业生产率是否足以改善农村生活，是否必须要进行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公共设施方面的相应改革？换言之，我们所说的“农村发展”的含义是什么？以及这种发展怎样才能获得成功？

在这一章中，我们的探讨从对过去20年中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农业部门的相对停滞的简要同时实事求是的说明开始，接着，叙述和分析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并试图总结出其中一些重要的相似处和不同点，然后，考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学，同时讨论第三世界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商品化农业转变的各个阶段。在此，我们不仅要考察各种经济上的因素，还要考察小规模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社会、制度和结构方面的条件。最后，我们探讨农村发展的意义，同时，对为提高第三世界农村地区生活水平而制定的各项可供选择的政策进行评论。中国在农村发展方面有些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本章以对这些经验和教训的简单评论作为结束。

## § 2 在发展的几个10年中农业的停滞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但是在这种经济的全面增长中,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在增长份额中占绝大部分,据报道,这两个部门的年产量总是以10%以上的比率增长。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产量的增长在这几十年中却停步不前,结果便使得农业产值在全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表10.1表明,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中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量的大部分,但是农业部门的产量在社会总产量中占的份额却低得多。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在国民总产量中占的比例都不曾超过35%,这种情况和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各发达国家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业产量对社会总产量的比例总是至少和农业生产中的就业人数对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一样。当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农业的就业比例明显地两倍于农业生产占社会总生产的比例,这种事实清楚地反映了农业生产率与制造业和商业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表10.1 1982年第三世界的农业产量和就业情况

第三世界国家	农业劳动力的%	农、林、渔业产量占GDP的%
南 亚	69	35
东亚(包括中国)	66	29
拉丁美洲	39	23
非 洲	66	31

资料来源:《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3.21。

表10.1特别是第5章中,我们讨论过的绝对贫困的部门分布的资料有力地说明,为了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通过加速农业的

发展，与农村的贫困进行直接的斗争是必要的。仅仅考虑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幅度地增长是不够的。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表10.2和图10.1所看到的，过去30年中人们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到1970年为止的过去20多年中，总的看，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无论是人均粮食生产还是人均农业生产（不仅包括粮食，还包括不能食用的农产品，如棉花、麻和橡胶）的年增长率都不到1%。此外表10.2表明，20世纪60年代农业生产的这两个方面的生产成果的增长率都大大低于50年代。实际上，在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部门完全停止了发展。总的来看，人民在这10年后和10年前的人均粮食生产量相比，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提高。由于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注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种状况在70年代多少有了一些改善。结果，从1970年到1980年人均粮食生产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长——这几乎相当于他们50年代的水平。遗憾的是，80年代初人均粮食生产又一次下降了。与此相反，在那些发达国家中由于人口增长的大量下降，人均粮食生产则不断以更快的年增长率提高。

表10.2 第三世界国家人均粮食和人均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停滞) 1950--1980

地 区	人均粮食生产增长 (%)			人均农业生产增长 (%)		
	1948/52 —60	1960—70	1970— 80	1948/52 —60	1960—70	1970— 80
拉丁美洲	0.4	0.6	0.9	0.2	0.0	0.7
远东 (不包括日本)	0.8	0.3	0.7	0.7	0.3	0.6
近东 (不包括以色列)	0.7	0.0	0.7	0.8	0.0	0.4
非洲 (不包括南非)	0.0	-0.7	-1.2	0.3	-0.5	-1.4
所有发展中国家	0.6	0.1	0.5	0.6	0.0	0.3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1	0.9	1.3	1.0	0.6	1.2

资料来源：K. 格里芬，《土地政策：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世界发展》1973年 第11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81年附录表8.5A第361—362页。

从表10.2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共同的普遍发展趋势在第三世界每个主要地区都存在。拉丁美洲的人均粮食生产有了一些增长，但从总体上看，农业生产在60年代却没有任何增长。非洲的情况更令人沮丧，在这个时期那里的人均粮食生产急剧地下降了，这种情况到70年代更加糟糕。这表明，过去20年中一般的非洲人因粮食消费水平下降而困苦不堪。在典型的非洲人的生活消费标准中，由于粮食的消费仍占绝大部分，所以总的人均粮食消费以近15%的比率下降，这就意味着，从整体上看非洲在1960至1980年间变得更加落后了。

亚洲的农业生产状况仅仅稍微好一点。在近东地区这种增长率和1960年前相比也下降了。60年代期间，他们的人均粮食和人均农业生产都趋于停顿，而70年代粮食生产的大量增长略微提高了人均生产量。在远东地区，尽管70年代期间人均粮食和人均农业生产每年以0.6%的比率增长，但它们的增长速度也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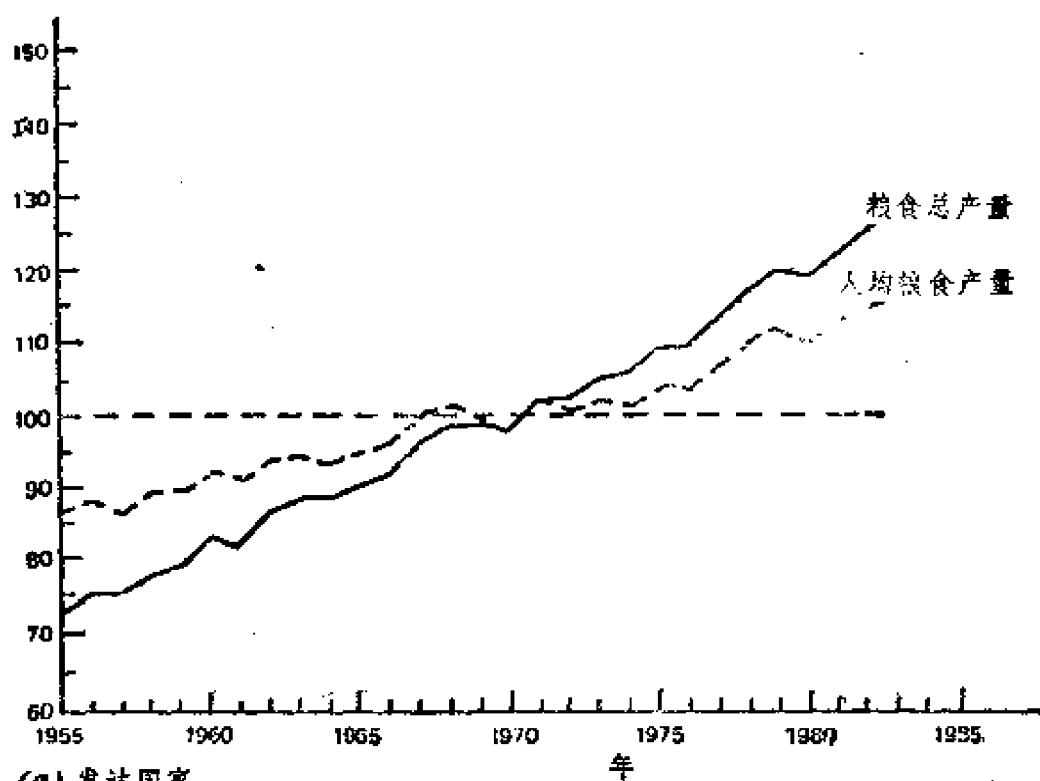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断定，尽管本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给人留下了某些深刻的印象，但总的来看，农业部门的发展微不足道，而且在某些地区它甚至还下降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都以农业为生，表10.2的数字证实了我们在第5章中所讨论过的问题：第三世界贫困的深度和广度在过去20年里一般是加深了。当人们认识到，人均粮食消费总额掩盖了消费分配方面本质上的不平等（就如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往往掩盖了绝对贫困的程度一样），这种情况就显得格外清楚。

最后，利用图10.1考察一下80年代初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粮食生产情况与1969—1971年的基本情况相比，在1982年只有极微不足道的增长。尽管从1970—1982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41%，但欠发达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人均粮食产量仅仅提高了15%。70年代中期，中非和南亚许多



地区生产上的这种问题和持续严重的干旱与饥馑共同导致了世界粮食和化肥价格的空前上涨。人口增长、资源愈益缺乏和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等问题合在一起向人们准确无误地表明，那些将收入的80%花在食物上的相当多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地恶化了。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价格虽然提高了一倍（就和70年代初所发生的一样），但这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贫困之中的人民来讲，却无法抵消已经提高了的生产费用。当时这种费用的上涨只能使为维持生存所必须的食品减少到勉强维生或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准之下。

在非洲的下撒哈拉地区周围这种现象特别严重。80年代期间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已经一再提出了粮食严重短缺的警告。在非洲的大多数国家中群众的人均热量摄取量现在已经低于了正常标准的最低限度。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估计，4.65亿的非洲人民中有1.5亿以上由于口粮缺乏而经受着营养不良的苦痛的折磨，而1973—1974年严重的饥荒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对更多



(a) 发达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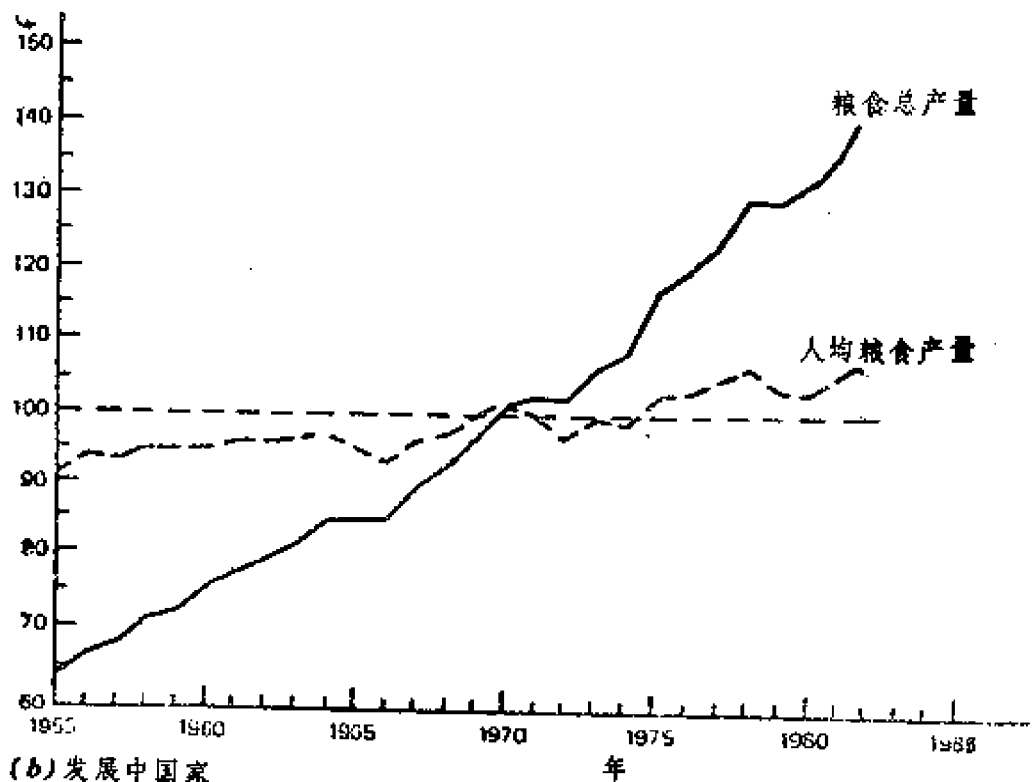


图 10.1 粮食生产指数 1955—1982 (1969—1971=100)

资料来源：美国海外开发署：《美国的对外政策和第三世界》1983年记事册，纽约普雷格出版社 1983年版，表 D—1；《联合国 1983 年世界经济调查》表 III—12。注：不包括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非食用的纤维产品，如棉花、麻和羊毛；或者不提供人体热量的产品，如烟草、咖啡、茶叶和香料。(a)发达国家指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非、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的人民的身体造成了永久的因营养不良而产生的损害。此次的受灾地区开始于塞内加尔西海岸的佛得角，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撒哈拉地带横贯非洲大陆，到达埃塞俄比亚。相应的 1982—1984 年的饥荒，粮食危机的影响更为蔓延，除了撒哈拉地区各国之外，包括赞比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和安哥拉等 22 个国家都受到了饥饿的严重威胁。

第三世界国家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这个经济发展时期中对农业部门的忽视。这种忽视农业和相应的片面强调对城市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大都可以逐个

地从为了迅速地实现工业化而错误地强调了发展重点中找到根源。而这种片面的认识在两个10年中充斥了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战略。在一份对18个欠发达国家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大部分时间中投资总额的分布情况的典型调查表明，分配给农业部门的投资大约只占国家总投资的12%，虽然这些国家农业生产几乎构成他们国民生产总值的30%，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60%以上。<sup>①</sup>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已看到的，这种忽视农村发展以及相应的强调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地流入正在第三世界各国大量涌现的都市中。

由于这一发展过程令人失望的结果，以及认识到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国农业的发展变化，所以在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70年代末起的几乎是一味地强调迅速实现工业化转变成了，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加现实地评价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决定性重要意义。但是，要想了解怎样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首先要了解第三世界各国农业制度的性质，特别是要了解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向商品化农业转变的各种经济形式。

## § 3 第三世界土地制度的结构

### 3.1 世界上农业的两种类型

当考察当代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农业现状时，我们认识到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简单地比较一下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能使人清楚地了解这一点。<sup>②</sup>实际上，世界上的农业有两种显著不同的耕作类型：（1）发达国家的高效率农业。在这些国家中劳动生产力和人均产量都很高，所以极少数量的农民就能生产出满足全国人民需要的粮食；（2）发展中国家的生

生产率低下（或效率不高）的农业。在这些国家中，农业部门在许多情况下几乎难以维持本部门人民最起码的生活水平，更顾不上满足不断增长中的城市人民的需要了。

这两种类型农业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表10.3所表示的它们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悬殊差别充分地说明了这种情况。1960年发达国家的农业总人口大约为1.15亿，他们的总产值达到780亿美元，农业人口人均约680美元。相反，此间不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人均产值仅52美元。换言之，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出13倍还要多。各种预测表明，这种差距到本世纪末将扩大到40：1。

表10.3 1960、1980和2000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和农业生产

	1960		1980		2000	
	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农业人口(百万)	115	850	75	1 230	50	1 480
农业总产值 (10亿美元)	78	43	125	77	186	135
人均农业产值 (美元)	680	52	1 660	63	3 720	91

资料来源：R. 韦茨：《从农民到农场主：一种革命的发展战略》20世纪基金会研究报告之一，20世纪基金会1971年版。

在各发达国家中，农业生产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稳步增长了。这种增长是由于技术上和生物学方面的种种革新使得劳动和土地的生产率水平提高的结果。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加加快了。结果，更少的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明显。19世纪初，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70%以上，而现在则不到6%。例如，美国农场主在1820年生产的粮食仅仅为供其自身

消费的粮食数量的4倍；100年后，到了1920年粮食产量提高了1倍，这时一个农民完全可以供养8个人；32年之后农业生产力又提高了1倍；仅仅12年多之后，农业生产力再次提高了1倍；到1980年为止，一个美国农民生产的粮食足够供养几乎75个人。此外在这期间，北美洲一般农民的收入也在稳步增长<sup>③</sup>。

当我们转而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生产发展过程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许多落后国家中农业的生产方法在此期间的改变相当缓慢。在这一章的后面，我们发现这种技术上的停滞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之于自给自足的农业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和收成的不确定性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对现有的各种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那些缺少肥沃土地的地区，特别是整个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已经导致了单位面积土地上以农业为生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在既定的同样的耕作技术和使用传统的非劳动投入（例如，简单的工具、畜力和未经改良的种子）的情况下，根据收益递减规律我们知道，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在一块面积已定的土地上从事耕作，他们的边际（和平均）生产力将下降。其最终结果就是农村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平的不断恶化。

为了防止大规模饥荒的发生，为了提高普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亚、非、拉的农业生产及土地和劳动这两方面的生产率都必须迅速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在自己的粮食生产方面应该提高自给能力。但是，如果不进行一些经济上、制度上和结构上的重大改革，他们在本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北美洲的粮食供应的严重依赖还会增加。

### 3.2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统农业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有权有势的土地所有者手中。拉丁美洲和亚洲次大陆的许

多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在非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有相对较多的未耕地可供开垦，这就使得农业生产具有不同的结构类型；但是从农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以上三个地区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

在许多发达国家中，人们认为以上三个地区中农业生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的是家庭。正如韦茨教授所指出的：

对于由家庭成员构成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大量农户来说，农业不仅是一种职业或一种获取收入的来源，还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在传统社会中尤为明显。在那种社会中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并为耕种这块土地而从事着长期的艰苦劳动。耕作方法方面的任何进步必然会相应地给农民的生活方式带来种种变化。所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生物学方面的各种革新，不仅必须要适合当地的自然和经济条件，更要适合当地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水平、价值观念和生产技能，他们必须了解可能会发生的种种变化，还必须乐于接受这些革新，并能切实实行它们。<sup>④</sup>

这样，尽管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中，许多不同民族中的农业制度有着显著的区别，但它们某些主要方面的相似使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概括和对比。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它们之间在制度和结构方面的相似远远大于其区别，这三个地区自给自足的农民具有许多相同类型的经济行为。我们首先考察拉丁美洲和亚洲农业制度的各主要特征。

**亚洲和拉丁美洲：相似和不同之处** 尽管这两个地区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和文化，但在农民的生活方面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弗朗西斯·福兰德曾用以下简洁的语言描述了这些共同点：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都是这样一种农业劳动者，他们最关心的是维持自身的生存。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维持生

存。他们可能是耕种一小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然而更多的是通过租佃或抵押的方式从地主或货币贷放者那里获得一小块土地，辛勤耕作，以满足他自己及家庭最低限度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挣取比正常标准还低的工资向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农业公司出卖劳动力，以此来维持这种最低需要。那种因气候或者市场状况有利给他带来的盈利只是一种偶然的收益，事先是无法预料的。他的命运一般是负债而不是盈利。所以，在使用他的可机动处置的资本时，他所采取的生产技术是经过反复权衡的；他不是采用机械化的设备而是使用人力和畜力，不是施用化肥而是施用人畜粪便，不是进行试验性的栽培而是栽种世代相传的种子和作物。

既没有有效的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障，又没有最低工资法来缓和他的困境，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和行动都直接关系到他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在那些农民占人口比例大部分的国家中，传统的粮食作物，或者薯类作物的种植在农业生产中占统治地位，农户们自己就能很方便地把这些粮食加工成每天的食品，这些作物在墨西哥是玉米，在印度尼西亚是水稻，在巴西是木薯，在中国是大豆。印度的农业是典型的传统农业，他们耕地的75%被用来种水稻、小麦、谷子、大麦和小扁豆这类粮食作物。如果这些作物歉收了，就像1972年在马哈拉斯特拉那样，农民就会陷入为了几根香蕉而出卖耕牛的绝境<sup>⑤</sup>。

尽管为了生存逐日逐时的斗争充斥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在非洲也是如此，虽然那里的农村结构和制度明显的不同），但他们的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却有显著的区别。在拉丁美洲，农民的苦境根源于大庄园——小农制。在亚洲，农民的苦境则主要根源于那分散了同时又高度密集因而显得更为窄小的地块。

**拉丁美洲的大庄园——小农制和资源的利用不足** 在拉丁美洲的确也和亚洲、非洲一样，土地所有制的结构不仅是生产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农村生活中全部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基本特征。这种土地所有制结构是以大庄园和小农户并存而闻名的两重性的农业生产类型，它从殖民时代就开始在拉丁美洲盛行了，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结构基础上，产生了拉丁美洲很多地区独特的社会组织。大庄园制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在拉丁美洲它是那些大到能雇佣12个人以上的农场。相反，小农户是那些最小的农场。这些农场由于太小，一个家庭（两个劳动力）在其中劳动都达不到一般国家和地区正常的收入、市场条件、资本和技术水平。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在拉丁美洲，占人口1.3%的土地所有者却占有全部耕地的71.6%。如果我们把墨西哥、玻利维亚、古巴这些在过去60年中进行了剧烈的土地改革的国家除外的话，拉丁美洲的土地所有制结构似乎都属于同样的类型，它基本上是：少数大庄园主控制了农田的大部分，而为数众多的小农户则不得不在一小块贫瘠的耕地上辛勤劳作以勉强度日营生。而且，他们还必须随时准备替大庄园主从事无偿的季节性劳动。

表10.4 形象地说明了在7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土地不平等分配的情况。而那些构成农场总数90%的小农户所拥有的土地，顶多只占农业总耕地面积的17%。在那些国内人口稠密的国家——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秘鲁，小农户制格外盛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中占农场总数还不到7%的大庄园，所拥有的农业耕地却高达农业总耕地面积的82%。在阿根廷大庄园的平均规模是危地马拉的小农户平均规模的270倍，而大庄园的规模往往是小农户规模的1732倍。在像危地马拉那样的国家中，国内大量迅速增长的人口拥挤在那日益显得狭小的贫瘠土地上，著名的微型农户已经成了



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例如，危地马拉目前7.5万个微型农户的平均农业收入还不到小农户平均农业收入的1/3，是大庄园平均农业收入的约1%。<sup>⑥</sup>微型农户的农民甚至无法满足维持自身生存的各种需要。所以，为了获得维持他们的家庭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食物，他们被迫为低得可伶的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

表10.4 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土地所有制  
结构中的大庄园和小农户

	小 农 户		大 庄 园	
	农 场 的 百 分 比	占 有 土 地 的 百 分 比	农 场 的 百 分 比	占 有 土 地 的 百 分 比
阿 根 廷	42.2	3.4	0.8	36.9
巴 西	1.1	0.5	4.7	59.5
哥 伦 比 亚	6.2	4.9	1.3	49.5
智 利	36.9	0.2	6.9	81.3
厄 瓜 多 尔	19.9	16.6	0.4	45.1
危 地 马 拉	88.4	14.3	0.1	40.8
秘 鲁	88.0	7.4	1.1	82.4

资料来源：西尔逊·弗泰德：《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54页。

但是，大庄园和小农户制并没有囊括拉丁美洲农业土地所有制的全部形式，还有相当大量的农业生产是由那些以“家庭”农场和“中等规模”的农场而闻名的形式进行的。前者雇佣2—4个工人（而小农户只能雇佣不到2个工人），而后者（有时它也被称为是“多家庭”农场）雇佣4—12个工人（仅仅次于大庄园）。从表10.5我们可以看到，在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这些中等的农场生产了农业总产量的60%以上，在对农业劳动力的雇佣方面也达到了类似的比例。

与拉丁美洲国家其他类型的农业组织相比，这种大庄园效率

表10.5 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土地所有制结构的简要说明

	小农户	家庭农场	中等规模的农场	大庄园
阿根廷				
总耕地面积 (%)	3	46	15	36
农业产值 (%)	12	47	26	15
就业量 (%)	30	49	15	6
巴西				
总耕地面积 (%)	—	6	34	60
农业产值 (%)	3	18	43	36
就业量 (%)	11	26	42	21
智利				
总耕地面积 (%)	—	8	13	79
农业产值 (%)	4	16	23	57
就业量 (%)	13	28	21	38
哥伦比亚				
总耕地面积 (%)	5	25	25	45
农业产量 (%)	21	45	19	15
就业量 (%)	58	31	7	4
危地马拉				
总耕地面积 (%)	14	13	32	41
农业产量 (%)	30	13	36	21
就业量 (%)	68	13	12	7

资料来源：西尔逊·弗泰德：《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55页。

较低。这种大庄园的低效率却与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土地所有者手中所得到的经济和社会效果结合在一起。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大农场（或企业）比小农场（或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资源，这是由于大型企业能够利用各种大规模生产的长处降低成本。就农业而言，大型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有效利用，要求有大面积成片的土地，否则，这些先进的机械设备就将基本上无法利用。然而，最近来自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料清楚地证明了，小农场是大多数农产品的更为有效的（即低成本的）生产者。<sup>⑦</sup>例如，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小农户每公顷土地的产值是大庄园每公顷土地产值的2倍以上，是全部农业耕地面积平均每公顷产值的10倍以上。<sup>⑧</sup>由于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大农场与小型的家庭农场相比生产成本要低得多，所以这一事实和理论并不矛盾。实际上，人们会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源、特别是拉丁美洲大庄园的土地资源利用极不充分更能解释这种现象。从土地的实际耕作的单位面积产量来看，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和危地马拉的大庄园不仅全都低于小农户，而且还低于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sup>⑨</sup>此外，据估计巴西那些平均面积为家庭农场面积31.6倍以上的大庄园的生产投资则仅仅是家庭农场投资的11倍。大庄园的可耕地的相当大的部分因此而被闲置了起来。其最终结果就是，家庭农场的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是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大庄园的生产率的2倍以上（因此，单位成本也低2倍）。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将这些大量的不曾利用的可耕地向家庭农场进行再分配，很可能会提高全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率。根据简明的经济效益的标准来看，以上的道理是一讲就明的。然而，拉丁美洲的土地所有制和管理方法远非根据经济准则决定。它涉及拉丁美洲各国社会中的全部社会和政治结构。

土地所有权这种集中化的分配，在拉丁美洲就和在亚洲许多地区一样，是与封建的社会制度同时存在的。在封建制度下，广

大的小生产者都要依仗大地主的宽厚仁慈才得以生存。由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支持，大地主有权让小生产者们在他的领地上过着一种贫困的生活，甚至连这种生存机会也不给。在这种情况下，小生产者就失去了任何谋生的手段。为了获得这种谋生的权力，小生产者们或者将他们劳动成果的大部分交给地主（有时竟高达80%），或者在一年中不同的时期里，无偿地在土地的土地上服劳役。有时候，这些佃农们必须向土地出租者既交纳产品又提供无偿的劳役。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使地主不仅能享受经济方面的种种好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因此而获得各种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简而言之，拉丁美洲大庄园中肥沃土地的滥用和相对低的经济效益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即，土地所有者们之所以一贯珍视这些土地财产，并不是他们会对国家的农业生产因此而做出种种贡献，而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给他们带来了显赫的权势和声望（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是拉丁美洲所特有的现象）。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本章的后面讨论。结论就是，提高农业生产，特别是提高拉丁美洲土地所有制的效益，仅有能保证提供各种优良品种、更多的化肥，减小生产要素价格的不合理性，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改善各种市场设施等直接的经济政策还远远不够，它还要求对农村的社会和制度结构进行改革，以便向构成当前拉丁美洲农村总人口几乎70%的农民提供一种真正有利的机会，使他们摆脱掉目前经济上仅能维持生存和社会上的屈从地位。

**亚洲农民土地的分散化和进一步细小化** 如果拉丁美洲土地所有制中主要问题可以说是过于大量的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话，那么亚洲的基本问题则是过于大量的人集中在过于狭小的土地上。例如，印度的人均可利用的土地面积为0.29公顷，而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这个数额则各为0.20和0.07公顷。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情况就是众多的人口对有限的土地形成严重压力这种亚洲土地所有制独特现象的典型例子。该地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00多人，这种保持世界纪录的人口密度大概成为了这个地区的特征。<sup>⑩</sup>

在整个20世纪中，亚洲农村的各种条件都严重地恶化了。缪尔达尔教授指出，是三种主要的同时又相互联系的力量把传统的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了它目前这种分散的状态：（a）欧洲统治者的干预；（b）货币化交易的逐步推广和货币贷放者权力的扩大；（c）亚洲人口的迅速增长。<sup>⑪</sup>

简言之亚洲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在欧洲殖民化之前早就在农村村社周围形成了。当地的官员和农户各自为对方提供服务和产品——农民向官员提供产品和劳动，以此作为对获得公共土地使用权和受到官员保护的报答，而官员则向农民提供社会服务。分配、处置和使用村社中最宝贵的资源——土地的权力属于部落，或是属于村社全体居民，这种权力或者通过当地的官员，或者通过一种团体来执行。由于人口增长，或者由于象干旱、洪涝、饥荒这类灾害，或者由于战争、疾病等原因，土地可以在村社成员中重新分配。在村社内部，每个家庭都有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耕种土地的基本权力，同时，只有在经村社全体居民一致决议之后，他们才能被剥夺这种权力。

由于欧洲殖民者，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到来，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结构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土地所有制的某些方面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变化）。正如缪尔达尔所指出的，“殖民统治对这种变化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它直接通过对财产所有权的种种影响，间接通过加速当地经济的货币化步伐和人口的增长而实现的”。<sup>⑫</sup>在财产所有权方面，欧洲土地私人占有制通过法律得到了鼓励 and 确认。正如缪尔达尔所说的，欧洲土地的

私人占有制的强制推行而造成的主要社会后果之一就是：

虽然不正规，但却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复杂权力和义务结构的早期乡村生活的大规模崩溃。地主被赋予了处置土地的无限权力，并可随意将他想要榨取的贡赋，从过去的水平提高到对农民敲骨吸髓的程度。地主通常不承担保障公共安全和赞助各种公益设施的义务，因为这些职能已全由政府承担了。于是，地主的社会地位与其说是一个交纳各种土地税的纳税人，还不如说是从一个因对村社全体居民负有各种职责而索取贡赋的人变成了一个对农民和公众不负任何职责的单纯的所有者。<sup>③</sup>

当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地主可以免交大部分对他们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取的收入而征收的税赋。如今南亚洲典型的地主是一种离乡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住在城市里，把土地交给租佃农场主或交纳谷物地租的佃农去种。因此在许多方面，他们在农村村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类似于拉丁美洲的庇护人。其间唯一的不同是，前者是一个不住在本地的土地所有者，后者则经常住在他自己的大庄园上。但是他们对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一样的。

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建立，使得亚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中另一类身份不确定的“货币兑换人”，即高利贷者的权力得以提高，成为高利贷者。一旦私有财产制建立，土地就成了可以转让的财产。农民为了获得贷款可以把土地作为抵押品，当还不起贷款时，土地就会被抢占并转归那些一贯为富不仁的高利贷者所占有。同时，亚洲的农业生产，一方面随着当地新兴城市对于粮食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外部的欧洲各殖民大国对粮食需求的增长，从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农业。随着这种转变，货币贷放者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自然经济中，货币贷放者的贷放行为限于，在农业歉收时向农民提供资金使他

们得以渡过难关，或是家中遇到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情时向他们提供资金以敷非常的社交礼仪支出。贷款大多数都要以极高的利息用实物偿还（即以粮食偿还）。然而，随着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农民对于现金的需要变得越来越重要。购买种子、化肥和其他生产投入品都要货币。如果农民改种茶叶、橡胶和黄麻这些经济作物的话，那么为了购买口粮也要有货币。货币贷放者往往更感兴趣的是把还不起借款农民的土地转归己有，而不是对农民进行高利盘剥。货币贷放者通过向农民规定极高的利息率，或者诱使农民对其不善于经营和运用的巨额贷款提供担保，这样往往就能最终地占有农民的土地。然后，他们再把土地转卖给那些富有而又极想扩大自己土地的地主，从中赚取土地投机的利润。或者他们自己就成为有权有势的大地主。总而言之，主要是由于货币贷放者作用的结果，亚洲的农业劳动者已经看到了自身的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每况愈下。

改变亚洲传统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最后一种重要力量是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过去30年中的增长。对于这种人口现象，缪尔达尔指出：

在所有土地都已开垦的地区，人口的增长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不足取的，无论这是出于物质上和技术上的理由，还是出于社会、经济和习俗方面的考虑。人口的增长，首先反映在耕地面积不断地细小化和分散化上。此后，私有财产的出现，商业化农业的兴起和货币贷放的发展，往往一起促进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形成、小农土地的丧失和转移、以及无地农民数量的增长。<sup>④</sup>

农民最终的贫困是这种土地的分散化过程、经济上的脆弱和土地被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霸占去了的必然结果。

为了理解本世纪亚洲一些国家中农村条件的恶化，现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情况进行分析。1901年时印度人口为 2.86

亿，现在人口则为那时的2倍以上。印度尼西亚的人口从1900年时的2 800万增加到目前的1.6亿还多。菲律宾中吕宋岛的人口和1930年的100万比，几乎增长了5倍。在这种情况下，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土地财产的严重的分散化，所以现在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地区普通农民拥有的土地平均还不到1公顷。

随着这些土地财产的进一步缩减变小，农业产量就降到了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水准之下，经常性的贫困变成了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农民们不得不更多地向货币贷放者借利率高达50%甚至200%的高利贷，所以大多数债务人都无力偿还这些贷款，最后他们不得不卖掉土地，成为负债累累的佃农，这时由于耕地稀缺，他们又不得不交纳很高的地租。如果他们是分成制佃农的话，他们一般要将谷物的50%到80%交给地主。由于劳动力充足，所以工资非常低。结果农民丧失了任何其他收入来源。他们深深地陷入了长期的贫困之中，除了对农村进行重大的重建和改革之外，他们便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困境。然后，他们与他们的拉丁美洲的同行一样，逐渐地从小土地所有者沦为交纳谷物地租的佃农或分成制农民，接着又成为无地的农业劳动者，然后变成无业游民，最后流入各个现代化城市的边缘地区的贫民窟中。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恶化了，而且他们的自尊心和不愿受剥削的自由感也都泯灭了，而在以前，尽管那时的收入低，这两种感情可能是相对强烈的。这样，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万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跨入一个真正的向前发展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反而陷入了一个向后倒退的不发达的旋涡之中。社会学家米德·凯恩的日记中的摘录生动地描绘了南亚地区典型的农业劳动者的生活的不稳定性。他在对孟加拉国农村的一个叫做卡格帕尔波的小村寨做了两年的考察之后，于1979年回到了美国。在那之前他就对那儿进行过研究。

过去的一年(1978年)对于孟加拉国在经济方面来说，确



实是困难的一年。……这个村子平静的生活环境掩盖着一种长期的、艰苦的生活，以及一些不断恶化的社会过程。最近发生的旱灾引起了一连串的农业歉收，并加速了经济上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濒于破产的农民丧失了土地，最终变成了无地的农民；而同时，较大的农场主们则趁机扩大了土地。这个村子的一个典型事例将说明这一经济上的演变过程，同时说明去年的旱灾对那些勉强糊口的小农们所造成的各种影响。这个例子讲的是一个叫做艾米尔·侯赛因的农民，他大约50岁，除了妻子之外，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已婚的一个儿子和儿媳也和他生活在一起，全家仅有不到两英亩的耕地。年成好时，两英亩地上的产量刚好能满足他一家的生活需要。去年由于农业歉收，艾米尔的儿子曾一度不得不去打短工赚点工资。此外，为了购买必须消费的稻谷，艾米尔还从当地一个银行借了一笔贷款。他将贷款的一部分买了稻谷，然后叫他妻子把稻谷碾成米，再将米卖掉换几个钱。艾米尔家的一头耕牛又死了，这更加深了他家的不幸。这头牛是他在同年1月份用900塔卡买来的，4月份病死了。农业的歉收、耕牛突然死去，以及全家人没有能够利用的各种补充收入的来源，这一切合在一起，迫使艾米尔只好卖掉了1/10的耕地。

艾米尔·侯赛因一家的经历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在那些情况相似，或者更小一些小农中间，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由于他们都同样只有很少的土地，所以农业产量方面的细小变化就可能迫使他们卖掉土地或者负债累累。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运气的重要性和对农民极为不利的生活环境的不稳定性。耕牛的死去和旱灾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一头耕牛价值900塔卡，卖掉的1/10英亩土地价值1300塔卡。但如果耕牛不死的话，艾米尔家就不会被迫出卖耕地。即使是在农

业上的正常或者稍好一些的年景时，每个农民的个人经历也是大不相同的。在特定的一年中，农民的遭遇好坏如何，很大程度上是凭运气。然而，各个家庭承受天灾人祸打击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财产的多少、家庭人口的多寡和家庭的人口构成。其他的事情也一样，那些土地财产更少和具有特殊的人口构成的家庭（如缺少身强力壮的男人）就更缺乏适应能力，因而在艰难的时期就要冒更大的风险来承受打击。<sup>⑮</sup>

**非洲的维持生存的农业和粗放耕作** 和亚洲、拉丁美洲人民一样，在许多小块土地上从事勉强糊口的农业是非洲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方式。但是非洲农业制度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却和亚洲、拉丁美洲当前所实行的组织形式和结构有着显著的区别。除了像在肯尼亚的怀特高地这些从前的殖民开拓地和非洲东部、西部的一些大型的甘蔗、可可和咖啡种植园之外，非洲的热带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户们主要还是从维持生存的角度出发来安排他们的生产。由于非洲农业中基本的可变投入是农民家庭和农村的劳动力，所以非洲的农业生产制度被三个重要的特点支配着：（a）村社中勉强糊口的农业的重要性；（b）土地超过各种直接需要的数量，以至一般可以采取轮作的耕作方式，同时也降低了土地所有权成为一种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手段的价值；（c）同一个村子里的每一个家庭（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有使用村子周围的土地和河流的权力，但是不属于这个村子的家庭则被禁止使用这些土地和河流，即使他们可能是属于同一个部落的。

非洲的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的维持生存的农业在耕作制度方面的特点多数是由三种限制了农业产量提高的力量合在一起所造成的：

1. 尽管存在着不少的空闲和可供开垦的土地，但由于在开垦和耕种时只能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如短把的锄头、斧子、长把

的刀子或大砍刀，所以只能有有限的土地被农户们开垦和种植作物。由于在长期持续的旱季中缺乏饲料，或者是由于舌蝇猖獗的缘故，在一些国家中无法使用耕畜，传统的农业生产只得主要靠人力耕种小块土地。

2. 在一个农户能够用传统的耕作技术和原始的生产工具对一块有限的土地从事耕种的范围之内，小面积的地块一般都要求集约化耕作。结果，增加劳动投入，反而使其收益迅速递减。在这种情况下，在大片土地上实行轮作制，是在劳动力的供给有限的条件下的最经济合算的耕作方法。在实行轮作制时，一旦土壤中的无机化学元素由于作物的大量种植而被吸收殆尽时，新的土地已整理出来了，重新开始了播种和耕耘过程。与此同时，原来耕作的土地恢复肥力，又能再次投入耕种。在这个过程中不必施加农家肥料和化肥，尽管在非洲大多数的乡村中，人们对附近的地块施用某些形式的农家肥（大多数是家畜粪便）。他们对这些地块进行精耕细作，以延长这些耕地的土壤肥力的期限。

3. 在非洲的传统农业中，制约产量提高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在播种和除草这些最繁忙的作物生长季节中无法雇到足够的劳动力。而在其他季节中则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不足。由于播种期是随着雨季的来临而开始，同时非洲的许多地区一年中又只有一个雨季并且持续时间又长，所以在雨季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播种和除草季节中对农业工人的需求一般都超过农村劳动力的供给。

这三种力量作用的主要结果就是，非洲许多地区的农业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平。只要人口的规模保持相对的稳定，落后的生产力和采取轮作制的农业生产类型就能满足非洲大多数部落为维持生存而必需的粮食需要（除了遇到像70年代初非洲的撒哈拉大部分地区以及像1982至1984年整个非洲大陆所遇到的那种长期持续的严重干旱这种明显的气候反常之外）。但是轮作制因人口密度增加被废弃了，这是过去20年中发生的

变化。轮作制必然被在小块地上连续种植同种作物的耕作制度所代替。结果，对于其他非人力的生产性投入的需求便增加了，特别是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加纳和乌干达这些人口更加稠密的农业国情况更是如此。此外，随着众多城市的发展、货币经济的渗透和种种土地税的实行，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已经不复存在。混合的、专业化的商业化农业开始产生，而这种农业现在也的确在整个撒哈拉周围地区出现了。

**结论** 尽管我们指出了非洲传统的村社式社会制度与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广泛实行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但我们仍然可以以上面的分析为基础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三个地区中，小农在目前经济中的地位没有多大差别。维持生存仍然是第三世界农业的主要目的。即使非洲的小农似乎比那些典型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在经济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是在尼日利亚、肯尼亚和乌干达这些国家中，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正在迫使小农式的农业进一步分化变小。如果不将生产力落后的传统农业迅速改造成生产力先进的农业（这种改造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主要是通过审慎的土地改革，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构性的改革而实现的，在非洲这基本上则是通过改进耕作方式而实现的），那么，已经陷入贫困的广大农村居民在今后几年中将面临更加动荡不定的局面。

#### § 4 妇女的重要作用

第三世界的土地所有制中（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一个重要的，同时往往被人忽视的特点是，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占统治地位以及轮作耕作制为主要生产方法的非洲，几乎所有与勉强糊口的粮食生产有关的劳动都是由妇女承担的。留在家里的男人一般从事砍伐树木、清除灌

木丛等开垦荒地的工作，而随后的全部工作就全由妇女承担，包括搬走和烧掉伐倒的树木、播种、耕种、除草、收割以及最后为贮存或直接消费而将粮食扬净晒干。埃斯特·伯瑟鲁帕在她论述妇女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开创性的著作中，分析了许多非洲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的资料后发现，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表明大部分农业生产都是由妇女完成的。在有些地方妇女担负了农活的70%左右，有的地方几乎达80%。一般来讲，妇女在从事这些劳动时使用的只是最原始的工具，所以为了获得刚好能满足全家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她们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艰苦劳动，而男人们则往往到附近的种植园或进城去作工以赚取现金收入。

非洲妇女除了实际上担负了全部农业劳动之外，还往往在种植园里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完成除草、收割这类季节性或零星的农业生产任务的劳动后备军。然而她们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为满足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耕种那些小块土地。由于男人们在种植园里劳动所挣得的低微的工资往往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她们还得去种植园干些活以弥补不足。

非洲妇女在维持生存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中发挥作用较小，而亚洲妇女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她们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在维持家庭生存的农业中只起辅助作用。例如，在斯里兰卡和柬埔寨，妇女占农业劳动力50%以上，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占40%以上，在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占35%左右。导致妇女在生产中这种不同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亚洲和非洲不同的耕作方式。由于非洲采用轮作制，单位面积土地上只要投入少量劳动就能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这便使得妇女们实际上能够担负起全部农活，男人们便到种植园里去劳动。亚洲由于人口密集，在相对狭小的地块上投入大量的劳动仍不足以生产出满足起码的生存需要的农产品，结果，往往不得不全家每一个有劳

动能力的人都到种植园里去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以此来挣取足够的收入养家糊口。

因此，亚洲和非洲的妇女都在农业生产中肩负着沉重的担子，这付担子还包括她们在家庭内部担负的劳动：操持家务、烧水做饭、照看孩子。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每一种都有它特定的内容。“操持家务”一般包括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成捆成捆地往回背柴禾，或者到河边去洗衣服等这类家务事；“烧水做饭”一般包括每天几个小时的捣米、碾谷及用仅有的几只器皿在一小堆火上烧煮食物；“照看孩子”一般指同时看管几个小孩和哺育婴儿。亚洲和非洲的农村妇女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地里劳动，工作时间一般都比男人长。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挑重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她们所从事的劳动，技术落后，投资少，所以效率相对低下。遗憾的是，人们很少去提高妇女劳动的生产率，大多数经济发展的计划都是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中男子的劳动生产率。男人们一般有机会获得贷款，并被教给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妇女则仍旧用传统的耕作方法。结果，男女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来越大。无论是在粮食作物还是在经济作物的生产中，只要妇女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提高她们的劳动生产率，始终是第三世界各国从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向商业化和专业化农业转变的必要条件。

## § 5 小规模农业的发展经济学：从自然农业向专业化农业的转变

农业生产发展主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sup>⑥</sup>最初和最原始的阶段是纯粹的、生产力低下的维持生存的农业。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是“多种经营”或“混合”农业，在这个阶段，农产品的种植

一部分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消费，另一部分是为了向商业部门出售。最后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农业，这个阶段是专门从事为满足商品市场需要的高生产率的“专业化”农业。

混合市场型的发展中经济的农业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一种从维持生存的农业向专业化农业的渐进持续的过渡。但是，这种转变包含的内容远比农业经济结构的改组或是新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丰富得多。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大多数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个想要改造传统农业的政府都必须认识到：除了要使农业结构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需要外，各种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农村社会制度结构方面的深刻变革也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系列的变革，农业现代化或者是根本无法实现，更大的可能是，它将直接扩大横亘在少数富裕的大地主与广大的贫苦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及无地农业劳动者之间的鸿沟。

所以，在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经济学进行研究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从传统的维持生存的农业向现代化、专业化、商业化农业转变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要通过农户自己的努力，需要政府和当地各种机构的支持。这三个阶段可以大致论述如下。

### **5.1 第一阶段 维持生存的农业：风险、不确定性和幸存**

在传统的维持生存的农业中，生产和消费相等，并且一、两种主要农作物（通常是小麦、大麦、高粱、水稻或玉米）是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产量和生产率都不高，同时使用的只是最简陋的劳动工具；资本投入极少，土地和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在面积越来越小（或者不断更换的）地块上，收入递减规律就发生作用了。降雨量不足、土地被征用，或者以搜刮大量的债款为目的的剥削成性的高利贷者的出现，都

给农民经济的存在和农民维持其自身生存酿成威胁。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者都就业不足，尽管在播种和收获这些季节性的农忙时期中工人们可能全都被雇佣。农民们通常只耕种不需要帮工自己家就能顾得过来的那么多地，虽然他们当中不少人也间或雇1—2个无地劳动者。环境是严峻而又一成不变的。技术上的局限、社会制度的僵化、农村地区和各中心城市之间通讯系统及市场之间的隔绝与分裂，这一切必然阻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农业仍然处在仅能维持生存阶段。尽管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以及某些外国人错误地认为农民反对改革是无能和无知的表现。但实际情况却是，在既定的一成不变的环境中，由于周围的各种环境不确定、僵化的社会制度的禁锢，需要达到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产量，使农民在面临种种可供选择的机会时，他们多数都会经过反复审慎的思考，按一种最有利的方式采取行动。正如一位有见识的传统农业制度的研究工作者所说的：

尽管人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村一级的机构及其作用的类型几乎是数不胜数的，但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却有三个共同特点：1.在历史上都被证明是有效的，即都沿袭下来了；2.是相对稳定的，至少其变化总的速度在今天看来是令人难以满意的；3.种种改革的企图往往受到抵制，这一方面由于这些传统的机构及其作用已被证明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因为人类传统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因素结合成了某种类似生态学中的平衡的整体。<sup>⑩</sup>

在传统的新古典学派两部门生产理论中，土地（一般还有资本）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劳动是可变的投入。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些深刻的对维持生存农业经济学的认识。特别是，它以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形式为我们已考察过的传统农业生产力的低下提供了一条经济学上的理论根据。



不幸的是，这一传统的生产理论却不能让人信服地证明，为什么传统的农民总是反对耕作技术方面的革新改造，总是抵制优良品种或者其他经济作物的推广应用。根据这种正统的理论，一个以利润最大化或以获取合理收入为目的的农场主或厂商总是选择这样一种生产方法，即采用那种在成本既定时，能提高产量（在这种情况下是劳动时间的有效利用）或者是在产量既定时能降低成本的生产方法。但这种理论是以这样一种关键的假设为前提的，即农民都具备作物的全部投入—产出关系的“完备知识”，即他们都了解产出是稳定的生产技术投入的函数，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当这种理论在亚、非、拉美许多地区维持生存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应用时，它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了。

维持生存的农业是一种有很大的冒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生产，当人们的生存都成问题时，它更是如此。在那些农场规模极为微小同时生产上又极大地依赖变化无常降雨量的地区，农业的平均产量不高，遇到灾荒年景，农民们及其家庭就面临着严重的饥荒的威胁。处在这种条件下，农民生活中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达到收入最大化，还不如说是使家庭糊口维生的可能性最大化。因此，当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程度很高时，小农就很不愿将他多年来已经很熟悉并且已掌握了的传统生产技术和作物品种改变为一种能获得很高产量但却可能要承担更大的歉收风险的新生产技术和作物品种。当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时，避免一个“坏”年景（即全部作物歉收）对于农民比在几个较好年景中使产量达到最大化更为重要。用经济统计学的术语讲，尽量避免风险的传统农民多半更愿采用这样一种粮食生产技术，即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虽不高但“方差”也不大（即对于平均值的偏离不大），而不愿采用那些虽然能提高平均产量但也将冒方差更大的风险的技术和作物品种。

图10.2简明地表示了小农对风险的态度可能会怎样明显地阻

碍那些在经济上已经证明了的有利的革新创造的推广应用。<sup>⑧</sup>我们以纵轴表示产量和消费，以横轴表示时间，然后再画两条直线位置较低的那条横线表示为维持农民家庭生存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生理消费需要（MCR）。这可以认为是由生命机能所决定的不致饿死的最低水平，任何低于这个水平的产量对于农民及其家庭将是极大的灾难；上面那条斜率为正的直线代表在影响农村消费标准的主要文化因素既定的情况下，农民满意的粮食消费的最低水平（MDCL）。它假定MDCL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升，反映了传统社会受到外界影响后对消费水平预期的不断提高。生产者对于风险的态度在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和这两个参照标准比较，他在历史上曾经获得过的产量水平。

通过对图10.2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时间X处，农民A的产量水平非常接近其家庭的最低限度消费需要（MCR），他只能勉强养家糊口，不敢冒使产量降到MCR以下的风险，因此，他比农民B更具有一种使所冒风险最小化的内在要求；而农民B的产量则大大超过养家糊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接近于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满意的消费水平（MDCL）。所以，农民B比农民A一般更欢迎革新创造。

许多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革新方案都遭到了小农的冷遇，这是因为这些方案都没有向小农提供抗御作物减产威胁的充分保障（无论是财政信贷还是物质的“缓冲”存储方面的保障），不管这些威胁是真正存在还只是小农的猜测。如果理解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在维持生存农业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开始就不会犯把技术上落后、目光短浅、无知、或者象是落后僵化的普通殖民地“懒惰的当地人”等作为维持生存或传统农民的特征这种令人遗憾的错误了。此外，有关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传统的农民为什么对于某种在经济上“明显”有利的机会竟然无动于衷的细致周密的调查往往会向我们揭示：（a）地主占据了全部收获物；

或(b)高利贷者攫取了全部利润；或(c)政府的“担保”价格从未兑现过；或(d)小农根本就得不到各种补充投入品，化肥、杀虫剂，有保障的水源供应和各种充足的低息贷款，等等。

我们可以断定，传统农民的做法确实是有道理的，同时他们对于各种经济刺激和有利的机会是敏感的。我们不应认为，无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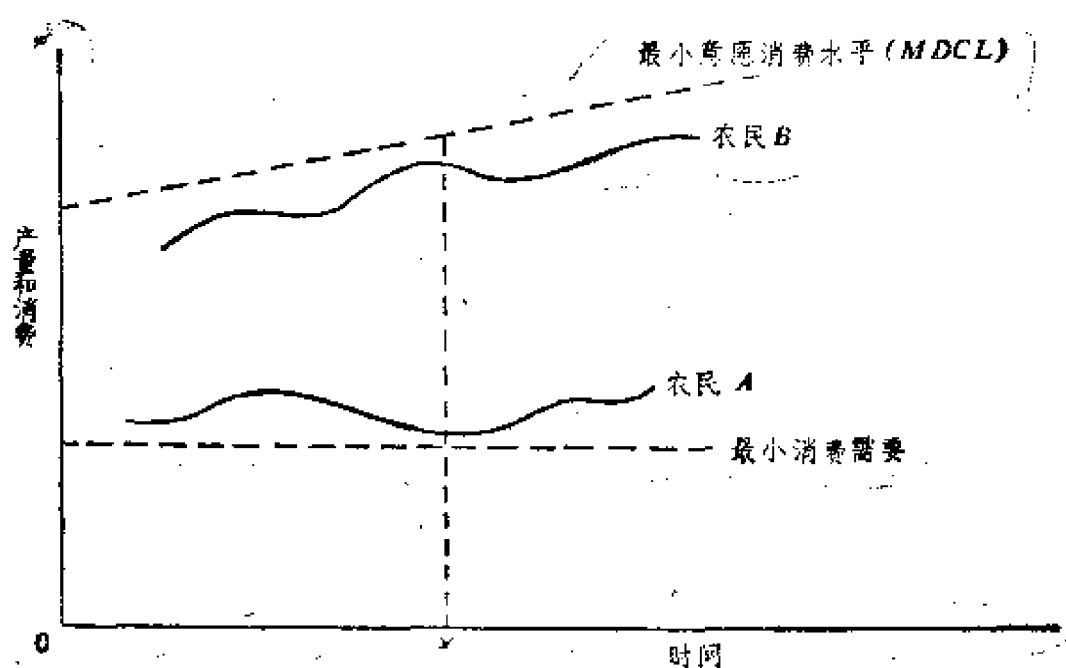


图10.2 小农对风险的态度：为什么有时抵制改革和革新是合理的

什么地方，只要没发生革新和改造，就是由于那里的农民愚蠢、没有头脑或者保守；相反，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一下那里小农生息劳作的环境，找出那些可能阻碍或破坏建设性的改革的种种具体制度上或者商业上的障碍。正如格里芬教授所指出的：

如果有时候农民对于建议推广的技术改造似乎不感兴趣，或是怀有敌意的话，这很可能是由于农民会要冒很大的风险，而得到的好处又不多的缘故，例如，由于当地的习俗或

土地占有制的状况，或者是由于各种信贷机构和市场销路不足，以及各种必要的投入品——包括生产知识——的缺乏。<sup>⑩</sup>

所以，对于小农的改造来讲，努力使他们冒的风险最小并消除各种商业上和制度上的障碍，是农业和农村发展最根本的必要条件。

## 5.2 第二阶段 向混合的和多种经营的农业的转变

企图一举把过去世代沿袭的传统的土地耕作制度改变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商业化的农业耕作制度是不现实的。在维持生存的农业中不加区别地推广经济作物，往往会导致农民丧失土地，使土地集中到高利贷者和地主手中，以仅仅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换来只能勉强糊口的生活。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可靠，再加上农产品价格起伏不定的风险，所以从小农的立场考虑，专门依靠几种经济作物比起纯粹的维持生存的农业来，可能更危险。

所以，多种经营和混合型的农业代表了从维持生存的农业向专业化农业转变的必然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已经开始种植新的经济作物，如水果、蔬菜、咖啡、茶叶和红花除虫菊，并经营简单的畜牧业，因而农业生产不再由一种主要产品所主宰了。当遇到一年中的“变相失业”成为普遍现象时，这些新的生产活动就可以充实农业劳动中这些正常的空闲时间了。在那些想要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极为丰富的农村劳动力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类型的农业尤其值得推行。

例如，如果在一年中土地只有在部分季节中被主要的农作物占用着，那么在其他的季节中就可以利用闲置的土地和家庭劳动力种植其他新的作物。可供选择的是，在非洲的许多地区，繁忙的播种季节劳动力供不应求，所以只有使用那些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如小型拖拉机、播种机或者牲畜拉的铁犁），腾出劳动力去从事其它的农活。最后，可以多利用能增加象小麦、玉米和水稻这些

主要农作物的产量的优良品种、化肥和简单的水利设施，腾出部分耕地来栽种经济作物，同时又确保了足够的主要的粮食产品的供给。这样，农民就可以有供市场销售的多余农产品，将这些农产品卖掉既可以提高自己家庭的消费水平，也可以将所卖得的钱投入农业生产以改进耕作。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还可以将由于主要农作物歉收而造成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同时又增加了一种可靠的、以前不可能获得的收入。

改造传统的农业的种种努力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农民提高他的生产力的能力和生产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农民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些社会的、商业的和制度方面的各种条件。特别是，如果农民能通过一种合理的可靠的途径获得贷款、化肥、水源、作物的栽培知识、农产品销售的各种便利条件等等，同时，他如果还能确实地认识到，他和他的家庭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传统的小农会对于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各种经济鼓励和新的有利机会会不感兴趣，没有反应。从得自情况各异的各种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的资料证明，只要具备了适当的条件，小农们对于各种经济鼓励和有利的机会的反应是敏感的，并且会对生产什么及怎样组织生产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农业之所以缺乏革新，一般的并不是由于农民对于革新的动力不足，或者是害怕变革，相反，在根本上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或有利可图的种种机会。

### **5.3 第三阶段 从多种经营到专业化：现代化的商品化农业**

专业化农业代表了在混合的市场经济中，私人土地所有制的最高级和最后的发展阶段。在各工业发达国家中，这是一种最通行的类型。这种类型农业的发展是和国民经济其它领域的全面发展

相适应相联系的。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生物学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国内市场的扩大，这一切都是专业化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对于专业化的农业来讲，用一些剩余农产品向市场提供商品供应已不再是农户的基本目的了。完全商业化的“利润”成了评价经营成败的准则，对人工的资源（如水利设施、化肥、杀虫剂、杂交良种等）和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使每公顷土地获得最高产量成了农业生产活动的目的。总之，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诸如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储蓄、投资和收益率、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高产的各种可能性、市场价格和支持性价格等，这些经济学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意义。对于资源利用的强调重点不再象在维持生存的农业，或是在混合型农业中那样往往只集中在土地、水利和劳动力上了。相反，资本的形成、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在促进产量和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业化的农场在规模和职能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包括从经营集约化的水果和蔬菜栽培的农场，到北美那种大规模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农场。在大多数情况下，高级的节省劳动的机械设备，如从大型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到飞机喷撒农药的技术，使得单个的农户就能耕种几千公顷的土地。

因此，所有专业化农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对一种特殊作物的栽种，在许多情况下还强调资本的集约化和节省劳动的生产技术的运用，以及注重实行使单位成本降低和使利润最大化的规模经济。从它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来看，专业化农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经营中，都和大型的工业企业没有区别。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特别是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有些最大的专业化农业生产是由一些大型的多国“农业综合”联合公司所经营和管理的。

#### 5.4 农业演进的各个阶段：小结

表10.6概括了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维持生存的农业、混合农业和专业化农业——这些基本特征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是相适应的。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正处在从维持生存农业向混合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当然，不包括那些分散的，在一国境内往往是由外国人所有的大规模专业化的种植园农业）。特别是考虑到农村和城市严重的失业问题，从混合农业进一步向全面专业化农业的转化，可能也不会成为每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主要目标。并且这种转变的实现，正如刚才所论述的，有赖于其他许多中、短期问题的解决，所以要想实现这种转变可能不是很容易的。对小规模混合型农业生产的改造不仅会提高农业收入

表10.6 农业发展三个阶段的不同特征

特征	自给自足农业	混合农业	专业化农业
产量构成	一种主要作物和多种辅助作物	多种经营	一种主要经济作物和多种辅助作物
生产目的	家用	家用和供应市场	完全为市场
劳动时间	季节性的	平衡运用	季节性的
资本投资	低	中等	高
收入	低	中等	高
收入保障	低	高	中等（价格波动）
收益率与产值之比	高	近一半	低
农民的专业技能	专业化	多样化	专业化
对一种支持性制度的依赖	无	部分	完全

资料来源：韦茨：《从农民到农场主：发展的革命战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

和平均产量，而且，如果这种改进是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还可以有效吸收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这为真正为人民的农村发展的成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现成的途径。

## § 6 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战略： 一些主要的条件

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小农场的收入、产量和生产率而使农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的话，那么，明确农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以及为实现农业的进步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途径和条件必然是互相联系的，但为了论述，我们可以把它们进一步分别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小规模农业发展的几条途径	农村普遍发展的条件
1. 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	1. 适应不断增长的粮食需要的现代化农业结构
2. 政府各种适当的经济政策	2. 建立一种有效的支持性系统
3. 各种支持性的社会机构	3. 改变农村环境以提高生活水平

我们来依次考察这六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

### 6.1 改进小规模农业

**技术革新**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新的农业技术和革新是农业主产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先决条件。然而，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农业产量的提高并不是由于采用了新技术，而仅仅是由于许多以前未曾开垦过的可耕地被开垦出来投入耕种的缘故。到目前为止，这些有利条件大多数已被开发利



用得差不多了，不大可能有进一步的重大发展。

提高农业生产可以有两种主要的技术革新途径。遗憾的是，它们对于第三世界农业发展的影响还不能完全肯定。第一种途径就是推行农业“机械化”以代替人力。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的推广（如大型拖拉机）对于提高每个工人的产量水平具有显著的作用。这对于那些缺乏劳动力、土地实行粗放耕作的地区更是如此。例如，一个工人驾驶着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几百名用传统的收割方式进行劳动的工人的工作量。

但是，在那些地块小、资金缺乏、劳动力充足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各种高度机械化的生产技术的推广不仅往往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不相适应，而且还总是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农村失业，同时还一定会必然降低单位粮食产量的成本。<sup>⑩</sup>由于这些机械的充分利用要求有成片大块的土地（这样，小块土地就要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这必然会使本来已经很严重的农村贫困和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因而这些机械的推广就成了是“反发展”的了。如果农业机械化把妇女排除在外的话，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论述过的男女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将会由此而进一步扩大。

相反，生物学（如杂交良种）和化学（如化肥、农药和杀虫剂等）这第二条主要途径方面的革新，在实质上毫无疑问会使土地收益递增，即，通过提高每公顷土地的产量而提高现有耕地的质量。它们只是间接地提高每个工人的产量。优良品种、先进的灌溉和轮作技术、越来越多的化肥、杀虫剂和除莠剂的使用、兽医学和动物营养学方面的新发展，这一切代表了现代农业中科学技术所取得的重大进步。这些措施是“规模中性”的技术，即，从理论上讲它们可以同样有效地应用于大农场和小农场。它们并不一定要求有大量的资本投入或者机械化的设备。所以，它们特别适用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同时为第三世界国家提高农业生产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各项价格政策和各种制度：提供必要的刺激** 遗憾的是，尽管各种新的小麦、玉米和水稻杂交良种（它们往往统统被称为“奇迹般的种子”或绿色革命的基础）是规模中性的，并且为小农场的发展提供了潜力，但是伴随着它们在农村经济中的推广应用的各种制度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却根本不是规模中性的。相反，它们往往只为那些有钱的地主们的既得利益和需要服务。由于这些新杂交良种需要增加水利设施、化肥、杀虫剂、贷款和农业的推广服务这些补充投入，而这些补充投入如果只向极少数大地主提供的话，那么绿色革命的有效作用就可能使广大农村劳动者进一步贫困化（亚洲和墨西哥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大地主们从这些补充性的投入和支持性的服务中得到的好处使得他们能够在竞争中比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从而最终把小土地所有者排挤出市场。大农场主有办法获得政府的低息贷款，小土地所有者则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高利贷者。其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土地进一步集中到极少数所谓先进的农场主手中。如果政府的各项政策和各种社会制度妨碍了小农积极参与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改造的话，原来具有巨大潜力、能够减轻农村的贫困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中的革新创造，却反而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sup>②</sup>

要求政府在政策上进行重大改进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与农产品价格的制定有关，特别是为当地市场而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大宗农产品的订价。在许多一意追求城市工业迅速发展的欠发达国家中，为了让现代化的城市工业能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他们一直实行农产品低价制。农产品价格既低于国际市场的竞争价，又低于国内市场的自由价。工农产品的比价对工厂企业主有利，对农民不利。由于农产品价格太低——有时比生产成本还低——所以农民缺乏为扩大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进行投资的刺激。结果造成当地的粮食产量总是供不应求，以前曾是粮食自给的许多第

三世界国家不得不进口粮食来平衡国内需求。这便造成了这些国家国际收支方面更为紧张的严重局面，从而使80年代初外汇和国际债务危机不断恶化（见第14、17章中对国际贸易和债务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因此，经济学家们对第三世界国家是否要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来促进农业生产的生长展开了争论。这些国家不仅必须进行制度方面和市场信贷方面的适当调整，还必须通过实行能真正反映国内市场形势的价格政策来刺激中、小农发展生产。<sup>②</sup>

## 6.2 农村发展的三个条件

现在我们将以上已经讲过的内容加以概括，将实际上构成实现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用三个命题系统地加以表述。<sup>③</sup>

**土地改革** 命题 I：农业结构和土地占有制的类型应该与提高粮食生产和促进较广泛地分享因土地所有制的改造而带来的好处这种双重目的相适应。

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大农场主，而只有通过政府和全体农民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成功。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第一步就是要让个体小农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保证，在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尤其如此。小农对于他的土地的依附是深刻的，这与他内心深处要求摆脱高压统治和获得自尊的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旦他的土地被剥夺了，或者由于债台高筑而渐渐陷入贫困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时，遭到破坏的就不仅是他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自我价值观和上进心及其家庭生活的希望很可能就因此而永远被摧毁了。

正是考虑到这些有关人的方面的因素，以及更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方面的原因，“土地改革”往往被认为是许多欠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在大多数国家中，土地所有制这种

严重的不平等格局大概就是现存农村收入和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唯一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构成农业发展特征的基础。如果土地的分配极不平等，农业生产者对农村经济的进步就不会抱什么希望。

土地改革通常要对土地所有权重新分配，或者剥夺大地主的土地，使之有利于无地或少地的耕种者。这种重新分配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把土地所有权转归那些实际上已经在这些土地上从事耕种的佃农所有（象在古巴、埃塞俄比亚、日本和台湾那样）；把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小农场所有（象在墨西哥那样）；把大地所有者的土地分给新移民（象在肯尼亚那样）；把大规模的私人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改造为或者先引导然后再发展为农民集体所有（如在中国和坦桑尼亚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土地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并且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主要的作用：把土地的所有权或者是对土地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权转交给那些实际在这些土地上从事耕作的人。

在需要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其它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有着普遍一致的看法。在缪尔达尔看来，土地改革是亚洲农业发展的关键。拉丁美洲的经济委员会（ECLA）反复说明土地改革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70年代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土地改革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份报告论述道，土地改革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这主要是因为，（a）收入的不平等和失业在农村地区已经更为严重；（b）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目前已经恶化了的不平等形成了进一步的威胁；（c）近年来已取得的以及今后可能取得的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种种突破（绿色革命）将主要被有权势的大地主们所占有，从而可能增强他们反对进一步改革的权力、财力和能力。

如果土地改革的方案能够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然后由政

府有效的贯彻执行（这是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这类努力中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将自给自足的农业转变为混合农业，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提高农业产量的基础就将被奠定。但是仅仅实行一种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方案是不能保证获得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成功的。这便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命题。

**各种支持性的政策** 命题Ⅱ：如果不建立各种政府的支持性制度使小农能够增加产量和提高生产力，向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鼓励、经济上有利的机会和获得各种需要的生产投入品的便利，小规模农业发展的全部优越性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

虽然在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土地改革是最重要的，但如果那些控制着生产（如银行、货币贷款机构、种子和化肥批发机构）、政府的支持性的公共事业（如各种技术和教育普及推广机构、政府的信贷机关、各种销售和存贮设施、农村的交通和铁路支线等）以及和投入产出两方面都有关的政府的价格政策（如对生产要素不合理价格的调整）的各种农村机构不进行相应改革的话，土改改革很可能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会破坏生产力。即使在那些不需要进行土地改革然而生产力和收入都很低的地区（如整个非洲和东南亚许多地区），这种从外部给予各种支持性的保护和政府的各种与农业投入、产出两方面都有关的适当的价格政策共同构成的广泛的网络系统，对于农业的持续发展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综合性的发展目标** 命题Ⅲ：农村的发展当它主要是依靠小农农业的进步时，它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a）提高生活水平，包括收入、就业、教育、保健、饮食、住房和各种有关的社会公共事业；（b）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在获得各种经济上的有利机会和收入方面的不平衡状况，以及农村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状况；（c）继续促进农业部门的改造速度和能力，并使之与日俱增。

这条命题是不言自明的，进而言之，农业发展的这三个目标的胜利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第三世

界国家人民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而且因为城市中不断增长的失业和人口拥挤问题只有通过农村环境的改造才能获得最终解决。通过恢复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的各种有利机会方面的均衡，创立各种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参加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奖励制度，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方面迈出巨大的步伐。

记住以上论述，现在我们对过去10年中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的一条实现农村发展的独特道路进行简要的考察，并以此作为本章的结束。

## § 7 中国农村的发展：一条独特的道路<sup>②</sup>

自从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人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和激烈的争论。人们提出的最多问题往往是：中国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这些国家正在努力要消除群众的贫困和建立一个强大、统一、自力更生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们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一些线索。但是据一位早就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讲：“中国在农村发展方面的经验，已经向每一个关心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揭示了一些至少应该开始考虑的极为重要的真理和原则。”<sup>③</sup>

### 7.1 人民公社

1979年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政治和体制改革之前（见附录10.1），中国的农村发展是以人民公社为基础进行的。人民公社是一个“包括某个农村地区各种必要的和可行的社会、经济和行政活动全部内容的，多目的的政治、行政和组织单位。”<sup>④</sup>人民公社从1958年就开始实行了，它代表了中国土地制度

改革规划的第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中国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特征，在这种制度下，农村人口的10%（地主和富农）拥有全部土地的70—75%。在1949年的中国革命时期，这些土地被没收并分给了贫苦的无地农民，但是农民们发现，在没有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公共机构的支持，要想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经济合理地耕种这些土地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在1949—1952年期间成立了“互助组”，这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二阶段。这些互助组的规模仍然太小，以至不能有效地购买各种生产投入品和有效地组织生产。因此1955—1956年便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最初是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以拥有100—500公顷土地的高级社为特征。这种合作社能有效地共同经营他们的各种生产资源，因而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是它们不适宜执行为持续发展农业所必需的各种经济、政治和行政职能。结果，在1958年土地制度的改革进入了第四个也是最后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把所有的高级社再合并起来转变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同时废除了当时还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土地个人所有制，实行公社所有制。”<sup>②</sup> 公社所有制包括该农村地区的全部土地、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和公社内所有的工业。

每个公社在组织上分成若干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又分成为若干个称为“生产小队”的基本单位。每个生产小队相当于一个拥有25—30个农户的自然村。生产小队的生产除了要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外，还要完成由公社分配给它的生产定额。一个公社的总人口和土地总面积可能在9 000—50 000人和3 000—12 000公顷土地之间。到70年代初，中国共约有2.6万个人民公社。<sup>③</sup>

## 7.2 贫困、就业和收入分配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通过用保证她的全体人民都过上最低水平生活的办法减轻了贫困，通过动员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到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中去的办法减少了失业，通过实际上废除

私有财产和所实行的工资和价格不变的制度缩小了个人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由于这种发展，中国普通农民的实际平均收入大幅度地提高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平均收入是相对平均分配的，据说最高的收入水平仅仅是最低收入水平的两倍。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平均收入的水平在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中往往掩盖了有钱的地主和贫苦的勉强糊口维生的农民之间的巨大差别。但是，在一个甚至更为基本的标准方面，中国政府官员们宣称：

“中国人民缺吃少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每一个中国人，无论男女，其基本的衣、食、住、教育和医疗保健都有了保证”。<sup>⑤</sup> 尽管这种声明可能有很大的夸张，但在第三世界中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有点根据地做出类似的声明。

### 7.3 中国的制度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六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最近被废除了，在此之前它有六个主要特征。第一个同时从历史来看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动员闲置劳动力从事土地改良、修坝筑堤、挖掘灌溉渠道、修筑公路和对现有耕地进行精耕细作的能力。所以，中国的农业产量一般增长很快，从1949年的1.08亿吨增加到1970年初的2.46亿吨。尽管中国人口多达10亿以上，但它现在已经是并且连续几年在粮食生产方面做到了自给并且有余。

中国的人民公社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它对农村经济活动开展多种经营的能力。这些多种经营包括农业、林业、渔业，最后还有各种小工业。这些只有在农业部门自身良好的基础已经建立了之后才能开展。据阿基兹讲：“在各种经济活动方面，这种连续的多种经营可以被认为是解决农村就业问题最重要的办法，因为它吸收了因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而可能产生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工人。”<sup>⑥</sup>

这种制度第三个主要的因素是，它能够通过将公社总收入的



15—20%转变为积累资金这样一种制度，实现农业资金的形成和农村现代化。然后这些资金被用于社办企业生产改造的投资，特别还以基本建设投资的形式购买机械化的农业生产设备。从经济鼓励的观点看，可能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深思熟虑的想通过提高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价格（即工农产品的“比价”）来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正如表10.7所表明的，一定数量的农产品能够交换的工业品的数量1970年比1950年几乎增长了67%。

表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1970年工农业产品比价

	(1) 农产品价格指数	(2) 农村地区工业品价格指数	(3) (1)和(2)的比率
1950	100.0	100.0	100.0
51	119.6	110.2	108.5
52	121.6	109.7	110.8
53	132.5	108.2	112.4
54	136.7	110.3	123.9
55	135.1	111.9	120.7
56	139.2	110.8	125.6
57	146.2	112.1	130.4
58	149.5	111.2	134.4
70	没统计	没统计	166.7

资料来源：约翰·格·格尔利：《中国农村的发展，1949—1972及从中获得的教训》，见E.O.爱德华兹主编：《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96页。

第四个重要的方面是，公社在向全体农村居民提供各种重要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方面起作用。公社用自己的储蓄兴办各类学校和医院。因此，人民群众就可以直接认识到他们自己劳动的社会意义。

公社制度第五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方面是那种独特的中国式的分散的农村计划制度，它强调最充分地开发本地各种资源，以满

足当地人民的各种需要。中国的计划与其它大多数国家的计划不同，它强调群众参加计划的制定，而不是由脱离实际的中央计划工作者来决定各种生产目的，和工业或地区性的发展方向。

第六，同时大概也是最重要的是，公社在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方面的战略地位。我们再来引用阿基兹博士的话：

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的主要目标不是尽快地实现物质进步或是建成一个消费社会，而是要建成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明确地表示关心每一个公民的幸福。这些目标和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秘而不宣或公开声称的目标都不同，在那些国家中，名义上是要实现经济的发展或增长，实际上则是以物质进步为主要目标，其最终后果一般都是少数特权者发财致富，或者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消费的消费社会。”在中国并不是没有金钱的刺激——他们试图满足每一个人的各种基本需要并实现实际收入的稳步增长——但是，挣取更多的金钱的愿望不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动力；主要动力是思想意识加组织。<sup>⑤</sup>

#### 7.4 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发展的意义

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从1958年成立以来，取得了伟大卓越的社会、经济进步。以下是这些进步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几个方面。

1. 把曾经是贫困和阶级分化的农村社会改造成了能满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粮食和各种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行之有效的许多生产单位；
2. 把农村经济改造成了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工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互相结合并共同发挥作用的多种经营的经济制度；
3. 创立了一种以平等和社会正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4. 发展了一种密切联系群众并以他们能切身体会得到的各种需要

和要求为基础的分散管理和计划的制度。

70年代初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许多学者曾经宣称，自从1949年革命以来的短短时期内，曾经把自己和世界其它国家完全隔绝开来的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没有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个至今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无法解决的难题”。<sup>⑧</sup>现在获得的资料对以前“官方”对这种农业制度种种成就的评说提出了重大的怀疑。<sup>⑨</sup>而且80年代初，中国新领导实行扩大私有制、提倡竞争、放开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使农业生产更加分散化的农村经济改革，表明他们对70年代末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不满意的。

尽管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存在着争议，但是基本的问题仍然是，中国的经验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在其他欠发达国家中，没有中国社会那种受到强有力广泛支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而这种基础对于中国取得农业生产和收入再分配的成功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贡献，这些国家能在他们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内有效地获得农业合作化的种种成就吗？他们能消除财富和收入方面严重的不平等吗？当他们不断受到各发达国家的汽车、时髦衣服、电视机、电冰箱和其它奢侈品这些大众消费品的“示范作用”的冲击时，他们还能满足于他们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只有衣、食、住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少量的如自行车、收音机和钟表之类的奢侈品这种情况吗？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源缺乏的小国，对这些国家来说，有没有可能在他们把自己和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开来时建成完全自力更生的国家？由土地私有制而产生的安全感和威望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中一种主要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在非洲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意识能被一种基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政治思想的公共义务感和动机所代替吗？这种替代能不能行得通？更重要的是，人们希望实行这种替代吗？

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国家和民族作为参考的话，这些问题是难以回答的。而且，过去25年中中国农村的普通居民真正获得的物质利益不是没有代价的；选择一种也许是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是以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为条件的。当起码的生存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时，选择的自由（例如在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家庭的人口多少问题）也许是相对不重要的，但随着各种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选择的自由必然会被认为越来越重要了。对于中国，我们可能会问，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国人民受国外各种影响的作用，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多长时间？

但是，即使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既没有可能也不想仿效中国的制度，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国过去20年的经验中学到许多东西。大概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提供种种经济和社会服务以支持各种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以此保证农业生产和推动农村工业发展的经验。虽然中国模式也许不能为其他那些资源条件不太好或是文化传统不统一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幅发展蓝图，但它确实提供了一幅怎样才能实现农村发展的草图。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验表明，即使对一个拥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也能够实现经济的发展。

## 注 释

① E.F.斯泽帕尼克：《几个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本的形成》，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农业计划研究》1970年第11期。

② 参看拉兰·韦茨：《一个革命的发展战略：从农民到农场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6—9页。下面的分析许多都是取自这本资料丰富，富有创见的书。

③ 同上，第7—8页。

④ 同上，第9页。

⑤ 弗朗西斯·M.福兰德：《亚洲和拉丁美洲土地所有制的变迁》，《世界发展（2）》1974年第4、5期第56页。

⑥ 塞尔索·弗泰德：《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54页。

⑦ 对这个问题的实证材料摘要，参看R.A.贝里和W.克莱因：《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和劳动生产率》，巴尔的摩和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章和附录B。

⑧ 弗泰德：《经济发展》，第56页。

⑨ 同上，第57—58页。

⑩ 福兰德：《亚洲和拉丁美洲土地所有制的变迁》，见《世界发展（2）》1974年第57页。

⑪ G.穆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性变化》，纽约众神出版社1968年版，第1033—1052页。

⑫ 同上，第1035页。

⑬ 同上，第1035页。

⑭ 同上，第1048页。

⑮ 米德·凯恩：《重访卡格帕尔波》日记，人口委员会政策研究中心1979年10月。

⑯ 参看韦茨：《从农民到农场主》第15—28页。

⑰ 小克利夫顿·沃顿：《自给自足的农民和风险·不确定》，《发展文摘（7）》1968年第2期第3页，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20。

⑱ 参看马文·P.米兰克尔：《自给自足的农业：问题的分析和概念的选择》，《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1968年5月第292—310页。

⑲ K.格里芬：《土地所有制政策：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世界发展（2）》，1973年第11期第6页。

⑳ 对这种现象的一个广泛分析，参看蒙塔古·尤德奈曼：《农业的技术改造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1年。

㉑ 对于绿色革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分析，参看基思·格里芬：《土地所有制改造的政治经济学》，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74年版。

㉒ 对于适当的价格政策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的激烈争论，可以参看吉尔伯特·T.布朗：《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价格政策》，见

《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21。

⑳ 对于农村发展的总体规划更全面的了解，请参看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农村发展》，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之22。

㉑ 本作者缺乏精辟的关于中国经济的第一手资料，这一部分的许多实际材料来自萨特杰·阿基兹：《中国农村发展的独特道路》，《世界发展（2）》1974年第2期第87—89页；约翰·G.格尔利：《中国农村的发展：1949—1972及从中所获得的教训》和E.O.爱德华兹主编：《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83—403页。考虑到这些作者对中国制度的赞同，他们的这些观点也许会带某些偏见，完全相反的观点见史蒂文·莫舍的：《中国农民：被破坏了的大地》，纽约佛利出版社1983年版。文章论述说，今天中国的农民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比1949年的解放前恶化了。

㉒ 阿基兹：《中国农村发展的独特道路》，第87页。

㉓ 同上，第83页。

㉔ 同上。

㉕ 格尔利：《农村发展》，第391页。

㉖ 引自阿基兹：《中国农村发展的独特道路》，第88页；要想了解相反的结论，见莫舍：《被破坏了的大地》。

㉗ 同上，第89页。

㉘ 同上，第90页。

㉙ 同上，第91页。

㉚ 例如见约翰·王：《中国农业发展经验的某些方面：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意义》；C.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纽约兰登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241—257页；以及S.费科特旺和A.候赛因，《中国的经济改革》，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版。

## 概念复习

人均粮食产量 (per capita  
food production)

主要食物 (staple foods)

维持生存的农业 (subsistence  
farming)

混合的或多样化的农业 (mixed

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the productivity gap)	or diversified farming)
农业产量 (farm yields)	机械化 (mechanization)
土地所有制 (agrarian systems)	示范作用 (demonstration effects)
大庄园 (latifundio)	人口密度 (population density)
小农户 (minifundio)	土地改革 (land reform)
微型农户 (microfundio)	杂交良种 (hybrid seeds)
家庭农场 (family farm)	“规模中性”的技术进步 (“scale-neut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中型农场 (medium-sized farm)	农业的推广服务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地主, 庇护人 (landlord, patron)	绿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
佃农 (tenant farmer)	农业生产合作社 (farmer cooperatives)
分成制佃农 (sharecropper)	政府的支持制度 (government support systems)
货币贷放者 (moneylender)	中国的人民公社 (chinese people's commune)
土地占有制度 (land-tenure systems)	风险和不确定 (risk and uncertainty)
轮作 (shifting cultivation)	经济作物 (cash crops)
	农村的综合发展 (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 问题讨论

1. 为什么分析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问题都要把重点放在对农业制度特别

是小农农业制度和农业部门的研究上？

2. 本世纪60—70年代这个称为发展的10年中，第三世界农业相对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令人感到不满的状况今后怎样才能改善？

3. 人们有时讲，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农业，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怎样才能从不同国家及从这些国家自身内部得到说明？

4. 比较，对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传统农业或小规模农业的性质。这三个地区的农业制度从总体上看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5. 解释本章开始时引用的缪尔达尔教授的“正是农业部门决定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斗争是否成功”，这句话的含义。

6. 人们有时说，由于小农似乎反对那些可能会大大提高农业产量的革新改造，所以他们是愚昧落后的。小农的这种反对是由于他们“缺乏头脑”，还是由于某些往往被西方经济学家们忽视了的其他一些原因？谈谈你自己的看法。

7. 本章中我们论述了从维持生存的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三个阶段，这些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8. 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在那些土地所有权分配极为不平等的地区（如主要是美洲及亚洲的部分地区），土地改革对改造和推动小规模农业进步虽不是充分条件但也是必要条件。土地改革和这句话各意味着什么？举出一些可能和土地改革相适应的支持性政策措施。

9. 农村的综合发展或全面发展是什么意思？你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种发展是否发生了？

10. 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通过一条独特的道路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这条道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被公认的成就是什么？

11. 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争论中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实现农村发展的经验是否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教益或战略？如果有，你认为有哪些方面？



## 附录 10.1

### 中国最近的农业改革<sup>①</sup>

由于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自1979年起对农村政策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包括扩大分散经营、提高物质刺激以及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因此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78—1982年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主要农作物如棉花、黄麻、食糖、油菜籽和蚕丝的产量也在稳步增长；1982年粮食产量超过了3.44亿吨；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从1978年的3.5%猛增到5年后的7%。<sup>②</sup>

农业政策方面最重大的改革之一是，最近推行了一种叫做“责任制”的制度。责任制就是，每个农户签订一份完成一定产量的合同，超过合同规定的多余产量留下来在农户和公社，现在叫“乡”或“行政区”之间进行分配。近年来，行政区几乎没有什么积累，因而农民具有了相当大的对自己所生产的剩余农产品的自由处置权。在有些地区，这种新的体制实际上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个体化。土地不是分给了集体而是分到了农民个人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向国家交纳粮食税（有些情况下，这种粮食税大大地减少以至被取消了）。因此，农户们可以对纳税之后的全部剩余农产品实行占有和自由处置。

农业政策上另一重大的改革是，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和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趋势。以前，中国的农业只强调粮食生产，有时甚至在那些土地不适宜栽种粮食的地区也是如此。现在，政府鼓励发展非粮食作物的种植，鼓励发展畜牧业、渔业、手工业和其他各种适合当地情况的生产活动，同时还鼓励农民从事小规模的建筑业、农机修理和制造、运输业等乡镇工业。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约占农业总产值的40%），还解决了占农村总劳动力1/10，即3000万人的就业问题。乡镇工业现已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

径。<sup>③</sup>在专业化生产方面，政府鼓励农民从事那些适合当地特点的专业生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现在可以用全部时间从事一种工作，如饲养家禽或看管果园等。

农业政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农民的利润刺激？首先，1979年国家将包括几种重要的农产品在内的全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0—30%；为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生产的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0%，对超计划交购的则实行加价50%以资鼓励；此外农民还有权以相对有利的价格向国家收购部门出售农产品和畜产品，以增加收入；为了让农民能更容易买到某些工业品，工业品价格已经降低了10—15%。其次，开放了农贸市场，用4.4万个农贸市场代替了实质上的物物交换经济，产品价格由买卖双方在市场上相互协商议定。最后，对“工分制”进行了改革，从而它不再主要是向农民分配口粮，而主要是一种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收入的制度。也许当前最根本的改变是逐渐取消了以前曾长期是中国农民生活依靠的人民公社（见正文）。5.5万个人民公社现在只发挥经济职能而不再拥有行政权力了，恢复了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内被废除了的“乡”政权。

虽然到目前为止，农村政策上的这些巨大变化给中国农村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但是，由于这些私人企业本质上具有造成和扩大经济分化的必然趋势，所以，它们的发展是否和中国政府长远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相一致，还有待今后的发展来证明。例如，鼓励农民个人办企业似乎就和政府竭力想要实现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发生了直接的矛盾：在农民从事个体生产的情况下，孩子将重新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财富（见第6章）。农民出于经济和传统习惯的考虑，很可能会抵制限制家庭人口的政策。这样，至少中国的两个主要发展目标——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限制人口增长和农村经济个体化以提高粮食生产很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 注 释

① 对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的全面论述见《世界发展》1983年8月第8期第11集上的专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改变》，以及斯蒂芬·费特汪与阿沙·侯赛因：《中国的经济改革》，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3年版和汤姆斯·魏恩：《价格调整、责任制和农业生产率》，《美国经济评论》1983年5月号73卷第2期。

② 统计数字引自克里斯托弗尔·瑞恩：《北京的农业政策开始使人受益》，《纽约时报》1983年4月10日。

③ 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专栏5.3。

## 第11章 教育与发展

学校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既是不发达的反映，又是不发达的结果，不发达造成了学校质量低劣和数量不足。但是，真正严重的危险是，不发达国家的学校有可能逐渐成为不发达恶性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上沃尔特前教育部长 约瑟夫·凯泽伯

事实上，任何认真的评论家都认为第三世界的教育早就应该实行重大的改革了。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  
所长 理查德·乔利

### § 1 教育和人力资源

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许会同意，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和特征的不是这个国家的资本或者物质资源，而是这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费雷德里克·哈比森教授说：

人力资源……构成了一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生产中的被动因素，只有人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人积累资本，开发资源，组成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推动民族的发展。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增进本国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本国经济中加以有效地利用，那么，它就

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进展。①

增进人类知识和技能的主要社会机构是正规化的教育系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相信或者必须相信，民族发展的关键在于迅速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和途径，教育越普及，人们所期待的社会发展也就越迅速。因此，所有的国家都在致力于这样的目标：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普及初等教育。这种努力已经成为政治上非常敏感，但经济上花费昂贵的不能触犯的“印度圣牛”。到目前为止，第三世界内外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教育规划者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对倍受崇拜的正规化教育表示异议。

然而，来自各方面的疑问正在不断地增加，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发展进程本身的特征和结果上。经过几乎30年的时间，支出了数以千亿美元的教育费用，注册学生的数目大大地增加了。但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般民众的生活困境几乎没有得到改善，绝对贫困化仍然在持续和漫延，贫富之间的经济差距逐年加大，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加入到失业者队伍之中。

把问题全部归罪于正规化教育体制的失败既愚蠢又幼稚。在此同时，人们必须认识到，当初为了无条件地扩大教育机会的数量而宣称的——它能够加速经济的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穷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扩大就业，并使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就业机会；有利于移入多样化的合乎道德伦理，民族传统的文化；促进“现代化”观念等——已经被证明是大为夸张的了，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完全错误的。

结果，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正规学校教育的扩大并不总是等于知识的普及；教师和学生所唯一关心的是获得毕业证书，学位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那种几乎完全着眼于现代城市部门就业准备的教育极大地扭曲了学生的志向；对正规学校的过度投资，特别是对中等和高等学校的过

度投资从社会的生产性活动（即直接创造就业）中抽走了稀缺的资源。因而正规化教育的盲目扩大，与其说是国家发展的推动力，不如说是国家发展的包袱。

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一方面受到本国发展进程的性质、规模和特点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影响本国发展进程的性质、规模和特点。正规教育不仅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中作为经济变革的动力发挥作用，而且还试图灌输那些可能有利于或者不利于民族发展利益的价值准则、理想、观念和抱负。教育攫取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日常开支的最大份额，占据了最大一部分成年人和儿童（几乎占第三世界人口的30%）的时间和日常活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渴求发展的最大的心理负担。因此，我们必须对发展中国家正规教育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和制度的制约因素进行考察。

教育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尚未最终定形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年轻的学科，60年代初才作为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出现。然而，当我们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兴办教育的基本动机，或者说对教育的“需求”是一种企图通过得到高薪工作来改善经济状况的期望，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可能使这一期望实现或者破灭的经济过程。

在这一章，我们的目的是根据前几章讨论中提出来的六个基本问题，探讨教育质量的提高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以及教育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这六个基本问题是：

1. 教育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和特征？反过来，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构和特征又如何影响教育体制的性质？

2. 教育、特别是第三世界教育体系的结构是加剧了，还是延缓了国内的贫困和不平等？

3. 教育、农村向城市移民和城市中的失业之间是什么关系？“受过教育的人”失业水平越来越高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现象？

4. 妇女教育与妇女对家庭大小的期望之间是否有联系？

5. 第三世界目前的正规化教育体制是趋向于促进，还是延缓农业和乡村的发展？

6. 第三世界的教育体制、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国际性迁移之间有什么联系？

作为这一章的开始，我们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状况作一简单的描述。我们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政支出水平、注册入学率、文化普及程度、退学率、以及教育费用和收入之间的差距上。在对影响学习的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回顾一下教育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这包括：影响正规学校教育的需求和供给的决定因素，个人与社会在教育投资上的成本和收益差别。然后，我们将详细讨论上边的六个问题，看看在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关键因素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能够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最后，作为这一章的结束，我们对那些试图改革现存教育体制，使之更有效地满足本国人民对教育的渴望和需要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进行评论。

## § 2 发展中地区的教育概况<sup>②</sup>

### 2.1 公共教育开支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规教育是最大的“产业”和财政收入的最大消费者。贫穷国家把大量资金投放到教育之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认为，有文化的农民，即便只有初等文化程度，也比没有文化的农民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对新的农业技术有更强的敏感性。受过特殊训练的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会读会写，能够更好地适应目前产品原料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不断增加的官方和

私人机构需要具有数学知识和抄写能力的中学毕业生去担负技术与行政职务。在原殖民地国家中，需要许多人去接替那些大批离去的外国人所留下的工作。现代的官方和私人部门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不可缺少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人力使用规划”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本身，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在为扩大教育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父母们认识到，在这个技术人力资源稀缺的时代，他们的子女能够受到的教育越多，获得有保证的、报酬优厚的工作的机会也就越多。特别是对于穷人，生活经历使他们认识到，受教育是使他们的孩子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压迫的结果，使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增长速度惊人。在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中，教育开支的比重迅速增加。60年代，亚洲国家用于教育的开支增加了两倍，非洲和拉丁美洲公共教育费用增加了两倍多。事实上，60年代和70年代教育费用增加的幅度超过了政府在其它任何经济部门财政支出的增加幅度。到80年代初，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已经达到了政府日常开支总额的20%到35%。虽然，就发展中国家的财政预算来说，这个比重已经相当大，但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的公共教育费用却只有27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教育费用达到人均428美元。

## 2.2 注册在校人数

1960年到1985年期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注册在校总人数从1.63亿增加到4.55亿——平均每年增加5%。虽然增加最多的是初等教育的注册人数，但是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增长的比重，最高已经分别达到了12.7%和14.5%。尽管如此，初等教育的注册人数仍然占了发展中国家注册入学总人数的近80%。



从适龄儿童在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实际就学率来看，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内部各国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非洲国家在这三个等级中都落后于其它国家，例如，非洲国家的适龄儿童在初等教育学校的实际注册率只有55%。表11.1比较了1960年和1981年一组中下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学生的注册率。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年初

表11.1 一些国家的学生注册比率

	按年龄组划分的注册人数比率 (%)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1960	1981	1960	1981	1960	1981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孟加拉国	47	62	8	15	1	3
埃塞俄比亚	7	46	1	12	—	1
印度	61	79	20	30	3	8
坦桑尼亚	25	98	2	3	—	—
斯里兰卡	95	100	27	51	1	3
印度尼西亚	71	100	6	30	1	3
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泰国	83	96	13	29	2	20
菲律宾	95	100	26	63	13	26
南朝鲜	94	100	27	85	5	18
巴西	95	93	11	32	2	12
墨西哥	80	100	11	51	3	15
哥伦比亚	77	100	12	48	2	12
发达国家	100	100	64	90	16	37

资料来源：《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25。

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生注册人数的增长都非常显著。

### 2.3 辍学率

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尚未完成学业就中途退学。例如拉丁美洲，据估计，有60%的学生不能完成初等教育。一些拉美国家的初等教育辍学率高达75%。亚洲和非洲初等教育的辍学率大约分别为20%和54%。但就具体国家来讲又有很大的不同，某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初等教育辍学率分别高达64%和81%。

1975年非洲国家中等教育的辍学率是38.7%，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是18%，欧洲国家大约是11.4%。随着中等教育辍学率提高而产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中等教育学校加入到受过教育的失业者队伍中。特别是在非洲，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 2.4 文化普及程度

在发展中国家，15岁以上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已经从1960年的60%下降到现在的51%。可是，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成年人中实际的文盲总人数，据估计，已从1960年的0.7亿增加到1985年的9亿多。文盲比重最高的是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分别占其成年人总数的73.7%和73%，然后是亚洲占46.8%，拉丁美洲占23.6%，欧洲和北美洲仅仅是2.5%和1%。关于各国文化普及程度的资料见附录2.2。

### 2.5 教育费用和收益

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学生在各级教育中所支付的教育费用严重不合比例的状况，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强烈的批评。然而，最初许多批评都是以零散的个人经验和说明性资料为依据的。70年

代，一项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教育费用差异的详细资料。<sup>⑤</sup> 现在我们引用这些资料，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育费用与初等教育的教育费用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差异。

表11.2比较了一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为各级教育每个学生平均支付的年教育总费用的比例。这个资料表明，在3个发达国家中，平均每个学生的年教育费用，中等教育与初等教育的比例是6.6:1，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比例是17.6:1。而在7个不发达国家，这些费用的比例分别为11.9:1和87.9:1。换言之，87.9:1这个数字说明，在不发达国家，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教育费用可以使88个适龄儿童受到一年的初等教育。在许多非洲国家（例如，塞拉利昂、马拉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教育费用的比例高达283:1。由于在一半以上的不发达国家中受初等教育的学生与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比例高于100:1（与之相比，发达国家的同一比例数低于10:1），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不发达国家把相当大的一部分预算教育费用花在了人数比重非常小的大学生和专业技术学校学生的身上。

如果把表11.3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均相对收入与表11.2的人均

表11.2 不同教育程度的年总教育费用的比例

国家组别	中等教育/初等教育	高等教育/初等教育
美国、英国、新西兰	6.6	17.6
马来西亚、加纳、乌干达、肯尼亚、印度、南朝鲜、尼日利亚	11.9	87.9

资料来源：G. 帕萨卡罗波洛斯：《教育的收益——国际性比较》，阿姆斯特丹埃尔塞维尔，1972年版，表8.2。

表11.3 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平均收入的比例

国家组别	中等教育/初等教育	高等教育/初等教育
美国、加拿大、英国	1.4	2.4
马来西亚、加纳、乌干达、肯尼亚、印度、南朝鲜、尼日利亚	2.4	6.4

资料来源：同上，表8.4。

相对教育费用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均相对收入的差别远远低于人均教育费用的差别。例如，看一下表11.2和表11.3右下角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欠发达国家大学生的平均教育费用是一个小学生平均教育费用的87.9倍，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却仅仅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平均收入的6.4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往往是人为的）差距。如果说相对收入是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反映，那么，高等教育与初等教育之间相对收入和相对教育费用的巨大差距就意味着，欠发达国家的政府过去在高等教育方面可能不明智地投入了太多的资金，这些资金如果用于扩大初等教育效益或许更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将来的相对成本收益率会继续支持扩大初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各级文化程度的相对就业率的变化。此外，虽然70年代的大多数经验研究表明，如果排除学生数量的因素，教育投资收益率最大的是在初等教育方面的投资。<sup>④</sup>但是，贝尔曼和伯索尔最近的研究却对这个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了疑问。<sup>⑤</sup>他们的研究表明，造成生产效率和收入差别的不仅仅是教育数量（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而且是教育质量（课程、教学和教学设施的质量）。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用较多的教育费用来提高现有学校的质量，用较少的教育费用

来扩大学校的数量——即：对人力资源进行“深化”投资，而不是扩大教育范围。然而，不幸的是这将引起敏感的公平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简略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 § 3 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基本问题<sup>①</sup>

#### 3.1 惰性和低效率

虽然上面的统计资料已经对学生注册入学率、辍学率、文化普及程度，以及教育费用和收益做了必要的概述，但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能用统计数字说明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多工业发达的国家也严重地存在。它们被概括为教育体制的惰性和效率低下。

我们从各级教育中令人怀疑的教育质量和陈旧的教育内容谈起。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副总干事所描述的：

学习的方式……仍然一成不变，死记硬背的方法，填鸭式地灌输，一旦考试的威胁过去了，所有这些没有用的包袱都被扔在脑后。考试制度不是用来评定学生的品行、才智、独立思考、反省和推理能力，而是鼓励弄虚作假、耍小聪明……如果把学校当作企业来评价，那么这里的状况是令人失望和痛心的，我们在教育部门中可以发现那种在其它任何经济部门都不能生存片刻的过时的工艺学。教学方法和学习技能……是生锈的、呆板而过时的。

学习方法简单和学习内容贫乏是与大多数教师能力差和缺乏主动性密切相关的，他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工资，没有兴趣，也没有机会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教育工作领导者的情况并不比教师的情况更好。

### 3.2 管理不善和被扭曲的刺激

看来最严重也最难解决的问题确实是在教育的管理领域——它的领导、组织和规划。这个领域是造成陈旧过时的、机能失调的教育方式不断延续的直接原因。由于缺乏对社会需要、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这些必要信息的了解，由于缺乏对教育改革实际的探索、尝试和评价，僵化状态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部分是因为从教育系统内部预测的社会上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它可能获得的资金和其它资源，但主要还是由于教育系统外部的社会需求、价格制订以及财政的和非财政的刺激所致。社会和个人对教育的需求成了无法实现的幻想，它常常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背离，与优先考虑的发展项目相矛盾。

这些需求有时也采取对教育系统进行政治干预和歪曲教育方针的形式。虽然施加于各级教育之上的政治压力，可以迫使教育系统满足其要求，但其结果可能与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或者与变化中的整个社会的真实需要没有任何联系。

### 3.3 初等教育与社会需要的失调

教育与社会需要的失调没有哪里比农村的初等教育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初等教育占据了第三世界教育费用的最大部分，即教育费用的50%，几乎相当于政府财政开支的10%，用于初等教育。70年代，初等教育用去了欠发达国家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3.8%，平均每年超过430亿美元。

如果说初等教育对促进民族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不同的欠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那么，人们一定会大大地怀疑，从发达国家照搬过来的、在内容和结构上毫无差别的教育体制对有着不同发展要求的欠发达国家是否同样地有效和适用？

初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农村初等教育的主要问题，以及教育为什么往往不符合贫穷社会的真正需要，通过下面的描述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

1. 不发达国家有70%以上的儿童生活在农村并在农村的学校读书。

2. 这些儿童的80%以上可能要终生靠农业劳动或农村中无需技术的雇佣劳动过活。然而，初等教育却几乎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能够在农村环境中发挥有效作用的、必要的知识、技术和观念(例如，农业耕作和管理、卫生学、营养学、以及社区发展等方面的知识)。

3. 典型的小学教育是为中学作准备的，它训练学生读、写、学习初级算术和最受重视的外语，此外，还常常包括朗读、背诵和反复练习，但从不培养学生独立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在那些初等教育为中等教育作准备、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作准备的发达国家教育体制中，特别强调读、写、算术和外语训练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据估计一个儿童掌握读写能力通常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因入学年龄不同而异)，掌握数学和外语甚至要更长的时间(即使外语确实有用)。

5. 在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指那些课程设置仅仅是为中等教育做准备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主要问题是：(a)由于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超过15%的小学生入学一年后便中途退学，另外还有10%的学生入学第二年后退学；(b)大约有50%的小学生不能学完四年的课程；(c)虽然有25%—30%的小学生完成了初等教育，但只有不到10%的小学生获得升入中学的机会；(d)能够完成中等教育的学生不足60%(在非洲这个比例更低)，而只有20%的中学毕业生能够进入大学；(e)那些不能升入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在现代部门中获得工作(这是中等教育所致力目标)的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很显然，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达国家全盘接受过来的、脱离本国条件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体制（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涉及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揭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认真地研究和很好地设计一个试验方案来回答下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sup>②</sup>：

1. 仅仅准备接受几年初等教育的儿童入学年龄应当是多大？

2. 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初等教育应该是全日制还是半日制？

3. 假定需要对儿童进行某种类型的正规教育，那么，对于那些注定要在农村生活一辈子的儿童来讲，读、写和初级算术是否属于应该最优先教育的内容？

4. 假定中学和大学都使用外语教学，那么，在小学中教授这种语言是否必须？

5. 假定由于经济原因，延长对教师的培训时间是不可能的（工资高低通常与受培训时间长短有关），那么，能否通过改进培训方式，更新课程内容以及建立对教学的审查制度的方法，使教学工作更为有效？

6. 如果孩子们认为他们忘记了所学的知识只是因为这些知识没有实践机会，那么，在他们成年之后再教给他们这些知识，他们是否能够接受和运用？

7. 那些在小学入学一年、二年或者三年后中途退学的孩子是不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如果学到了，那么是不是学到了较多的东西，如果没有学到，那么能否设计一套教学方案，以便使他们获得较大的收益？

8. 最重要的教学内容对于：（a）准备升入中学的学生；（b）准备在现代部门中取得工作的学生；（c）将继续留在农村的学生，是不是都一样，如果不是，那么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为各方面都提供均等机会的教育体制，以满足他们的不同要求？

9. 与上面第8个问题相联系，建立一套对学校教学没有过份影



响、公正合理、不易循私舞弊的录取方法（用于升学）是否可能？

10. 学校和社会是否应该相互配合？成年教育和儿童教育是否应该相互配合？大众教育（或者社区发展）是否应该为解决发展中的特殊问题服务？如果是这样，应该怎么做？

怀有民族发展抱负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希望使他们的初等教育（以及中等教育）对民族发展作出最大贡献，那么，就需要回答上边及其他一些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 § 4 高等教育的问题

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对发展中国家大学的作用做了可能是最好的概括，他说：

发展中社会的大学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对国家有直接重要意义的学科上，它必须对所在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人道主义的目标负责。……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社会中，我们只能把经费合理地用于大学——任何类型的——只要它能够真正促进我们民族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大学的任务是，培养理想、造就人材、为促进人类的平等、尊严和进步贡献力量。<sup>⑥</sup>

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比起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来是一个小得多的天地。在注册学生总数中，高等院校的学生不足5%，高等院校的教师 in 教师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不足8%。尽管高等教育有各种不同的教育机构（例如，高等专业学校、高等技术学校），但是，大学通常被认为是最高、最重要的教育机构。然而，很多观察家都已经发现，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象它们的中小学一样，背离了国家发展的轨道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许多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存在于中小学教育中的问题，现在又或多或少以加剧了的形式在大学重新出现。

造成大学现存问题的基本原因已经在大量文献中得到验证，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大学是模仿工业发达国家大学的结构和功能建立的。在过去20年中，发展大学的国家规划（有的甚至连最初步的设想也没有）导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仿照美国、法国、英国及其它工业发达国家的大学来建立和改造。由于受中世纪所形成的传统的强烈影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大学是由专业学科构成的。这种系和学科的结构被大规模地引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中，几乎没人仔细思考、认真追究这种教育结构和教育体制怎样才能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服务。“一流大学”往往是以国际流行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根据它对民族发展所做的实际贡献。然而，扩大招生的政治压力，沉重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学生们对更切实际、更有意义的教学内容的呼吁，近来已经引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领导重新思考大学的作用和职责，注意象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这样有创见的政治家所给予的明智劝告。<sup>⑩</sup>

#### 4.1 影响学习能力的因素：某些原因和结果

来自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广泛资料近来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儿童一生中早期有许多因素——母亲在妊娠期的健康和饮食习惯、婴儿在最初几年中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条件，等等——可以决定儿童是否能够很好地担负起学习及日后的生活任务。<sup>⑩</sup>图11.1描绘出这些早期因素（个人、家庭和家外环境）不仅影响儿童在学校期间的学习（后期因素），而且影响个人应变能力以及从这种改变中社会和个人在就业方面得到的收益。

例如，图11.1表明早期的营养不良和疾病会对儿童的读、写、数学运算以及清晰而有条理地思维（“认识的”能力）产生不良的影响，同样也会影响他获得和/或保持某项工作的可能性（就

业条件)，造成他工作上的低效率和工作成绩平庸。因此，家庭环境和儿童本身的健康状况对于儿童完成学业以及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效地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在学校中，来自低生活水平的贫穷家庭的儿童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儿童比，在竞争中经常处于劣势。例如，对学业完成情况的分析表明，以下4点是决定儿童学习能力的最重要因素：

1. **家庭环境** 包括：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的程度、居住条件和家庭中子女的多少；
2. **同伴的相互影响** 与之交往的孩子们的类型；
3. **个人素质** 遗传的智力和能力；
4. **早期的营养和健康状况。**

如果一个儿童入学时上面4个条件都很差，很多穷人家孩子的情况正是如此，那么教育对于培养他自我改善和提高经济地位的能力可能效果不大。事实上，他非常可能成为50%的辍学小学生中的一员。教育机会均等——所有国家公开声称的社会目标——对于那些有着非常不平等的社会背景的儿童们来讲，可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 § 5 教育经济学和就业

许多关于教育与一般经济发展和具体就业问题的讨论及有关文章基本上围绕着两个经济过程：(a) 在决定办多少学校，使什么样的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以及让他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上，由经济动机决定的需要与受政治影响的供给之间的相互作用；(b) 在各种层次的教育中，社会与私人收益成本之间的重大差别，以及这种差异对教育投资战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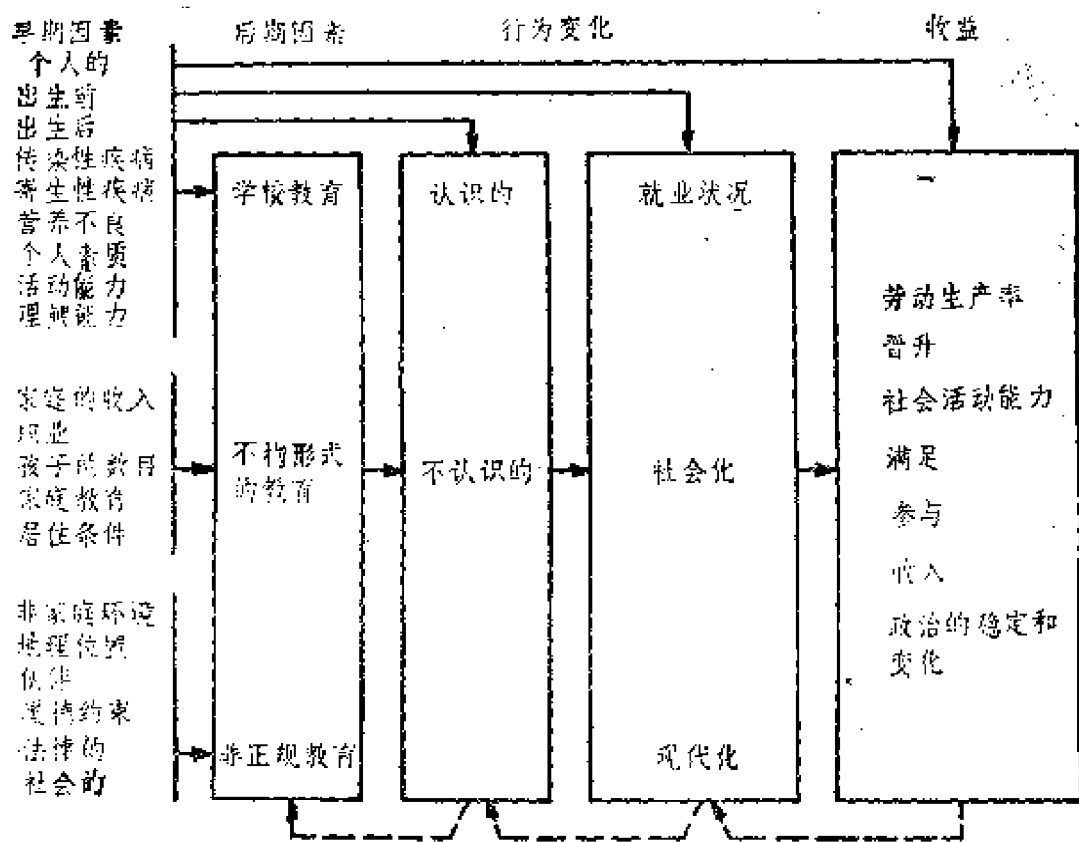


图 11.1 学习系统：原因、结果和相互影响

资料来源：约翰·图根斯，《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中的投资：国家战略选择》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1976年版，第96页。

### 5.1 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就业机会与教育需求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一个人所受学校教育的多少虽然受很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但人们仍可以认为，它也象其他任何商品和劳务一样，基本上取决于供求的影响。由于欠发达国家的教育大多是国家办的，因此，需求的决定作用就比供给的决定作用重要得多。在需求方面影响一个人希望接受多少学校教育的两个基本因素是：（a）受过更多教育的学生通过将来在现代部门中获得工作而挣到更可观的收入的前景（即：他本人及其家庭教育的“个人收益”）；（b）学生及其家庭所必须直接和间接负担的教育成本的多少。因此，

这种对教育的需求实际上是在现代部门取得高薪就业机会的“衍生需求”。由于在现代部门中就业机会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特别是穷人），对教育的需求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其内在的非经济的收益，而完全是因为它是能在现代部门中就业的唯一手段。这些派生利益必然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教育的成本。

在供给方面，各级学校的数量大部分取决于国内的政治进程，而往往与经济尺度无关。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日益要求扩大教育的政治压力，因此，我们很容易假定，公共教育的供给受政府教育经费支出水平的限制，而政府教育经费支出水平又受教育需求总水平的影响。

正因为对教育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供给（在政府财政开支允许的限度内），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一下决定派生需求的经济因素（与就业有关的）。

为取得进入现代部门的资格而产生的对教育的需求，看来取决于下面4个变量的共同影响：

**工资和收入差别** 这里的工资差别是指现代部门的工资与除它以外的其它部门（家庭农业、农村和城市中的自营职业等），为简便起见我们称它们为传统部门的工资之间的差别。在现代部门中，新参加工作者的工资是由文化程度决定的。与之不同，传统部门中的收入与受教育的多少无关。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收入差别越大，对教育的需求也就越大。因此，第一个联系表明，对于教育的需求与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工资差别成正比关系。根据经验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需求会较大。

**在现代部门中获得职业的可能性** 一个人如果顺利地完成了进入现代部门所必需的正规学校教育，那么，他在现代部门中得到一个很多人所无法得到的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大。显然，如

果城市毕业生的失业率上升，以及如果中学毕业生的供给继续超过了能够向他们提供的工作，那么，我们就需要再次用“预期”的工资差别来代替“实际”的工资差别（见第9章）。由于谋求职业的成功可能性与失业率成反比关系——即：在就业竞争中，具备某种工作条件的求职者越多，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能够证明对教育的需求，比方说，对中等教育的需求，是与现有中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成反比关系的。

**私人直接教育成本** 指的是个人为儿童教育实际支付的学杂费。它包括：学费、书费、服装费和其它有关费用。我们认为，教育需求与这些直接费用成反比——即：学费和有关的费用越高，个人对教育的需求就越低，其它费用亦是如此。

**教育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 儿童教育投资不仅仅包括实际的直接教育成本。特别是当儿童的年龄已经到了能够为家庭收入作出生产性贡献的时候，他每上一年学，就在实际上放弃了一笔可能挣到的货币收入，或者一部分家庭农场的产量。这种“机会成本”也必须作为影响教育需求的一个变量。我们可以认为，机会成本与教育需求成反比关系——即：机会成本越大，对教育的需求越小。

尽管还有一些重要的变量，其中许多是非经济的（例如，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父母受教育情况和家庭的大小），它们肯定会对教育的需求发生影响。但我们相信，把上述4个变量综合起来，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有关教育需求与就业机会供给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见解。

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处于某个发展中国家，在那里下面的情况是极为普遍的：1.对中小学毕业生来说，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非常大，约为100%。

2.中途退学的小学生在现代部门中就业的人数低于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在印度、墨西哥、埃及和巴基斯坦，最近还有加

纳、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那里的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亦是如此。

3. 雇主面对着众多的申请就业者，乐于用文化程度作为录用标准。即使就工作来讲小学文化程度已经足够了，他们也愿意录用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而不录用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

4. 政府在受过教育的人的政治压力下，强调按在职人员的文化程度规定工资标准，而不是按职务所需的基本文化程度规定工资标准。

5. 初等教育的学费往往是名义上的，甚至根本不存在；到了中等教育阶段，学费往往急骤上升；而高等教育阶段学费又降了下来，国家承担了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学费。

上述情况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就业和教育状况非常接近。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料，对教育的需求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相对于没有受过或受过较少正规教育的人而言，正规教育的程度越高，预期的“个人收益”越高，而个人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相对较低，于是教育需求也就不断上涨。由于有文化的人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现在人们要保持住职位就必须完成初等教育。但这也许只能维持一段时间，随着国内就业方面的供给和需求进程的推动，最终会使只有初等文化程度的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反过来促进了对中等教育的需求。但是，对初等教育的需求仍会不断增加，因为那些当初满足于没有文化的人，现在正被逐渐挤出了劳动力市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某个层次的教育作为终点越是无利可图，作为下一层次教育的中间阶段和前提，对这一层次教育的需求却越是增加！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增加各级教育的教学设施以适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如果政府的反映不够迅速，那么群众就会自己起来实现这种需求。肯尼亚山村社发起的“哈拉姆比”自助学校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人们知道他们

对教育的扶助很快会被政府所接替，所以，这种由村社赞助的中等教育学校很快就遍布全国。

所有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逐渐扩大其教育设施的趋势，从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讲，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财政承受能力极难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就业状况的每次恶化都进一步引起对各级正规教育的更大需求（和供给）。最初失业队伍中主要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无情的趋势，即随着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不断超过社会对他们的实际需要，失业队伍中的平均教育水平就逐渐上升。经历了不同的失业阶段后，个人的志向被迫逐步降低，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不得不屈就要求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作。文凭和学历成为就业的基本要求，而不再是进入高薪职位的“入场券”，更不用说这些文凭和学位所代表的教育程度了。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雇主不断提高招工的文化条件，用文化程度较高的雇员代替文化程度较低的雇员，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一旦文化程度超过职业需求形成规律，它就变得无法逆转，加之行业工会已经成功地使按文化程度支付工资成为协定，因此各种工作的现行工资将趋于上涨（即便是就业者的工作效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工资差别上存在的扭曲现象将被加剧，从而进一步刺激对教育的需求。

作为这种“教育取代现象”的结果，那些由于某些原因（几乎都是因为贫穷）不能继续接受教育的人，将作为无法就业的退学者被抛弃在一边。与此同时，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将在学校继续接受若干年的过度教育。在极端情况下，它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就像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在那里高等教育系统实际上成了人数众多的有文化的失业者的“最后的出路”<sup>⑩</sup>，这是一笔极其昂贵的失业救济金。而且，由于人们无法让学生在学校的逗留到退休，这支庞大的队伍最终要从学府的高墙后面走出来，进入挤得满满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在那些受教育多、调门也



高的人们中出现了更明显的失业趋势。例如，最近对孟加拉国的研究表明，在那里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47%。<sup>④</sup>

最后应该指出，许多人可能坚持认为，提供给他们的那些工作贬低了他们的学历。因此，尽管作为劳动力市场中需求一方的雇主企图用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代替现有岗位上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但是在供给方面，许多寻找工作的人对职业的期望超过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可能，因此，他们宁可继续失业一段时间，也不接受那些被认为是贬低了其学历的工作。结果就造成了由于供给方面的“磨擦”效应和“时滞”的作用，失业将存在于各级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中，当然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者中失业现象更为严重。一般情况下失业率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

## 5.2 社会 and 个人的成本与收益

对更高教育程度的顽强追求所付出的代价甚至比我们所简单描述的更加高昂。在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征的是，社会的教育成本（即机会成本，在有限的资金可以更有效地用于社会经济部门的情况下，被用来满足在更高教育程度上扩大教育的要求）随着学生在教育阶梯上不断攀登而急剧增加。然而个人的教育成本（由学生自己承担的费用）却增加得极为缓慢，或者实际上在减少。

社会与个人教育成本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形成了对需求的刺激，这种刺激对高等教育需求比对其它低层次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高等（或中等以上）教育需求被人为夸大了。但只有在完全利用社会费用的情况下，才能使教育机会适应这些扭曲的需求。因此，当这种教育制度不断增大教育需求时，社会成本的增加将比教育机会的增加更为迅速。从而就社会成本来言，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错误地用于扩大教育，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由于财政资金的缺乏而减少。

图11.2提供了个人和社会成本收益差距的图表，它同样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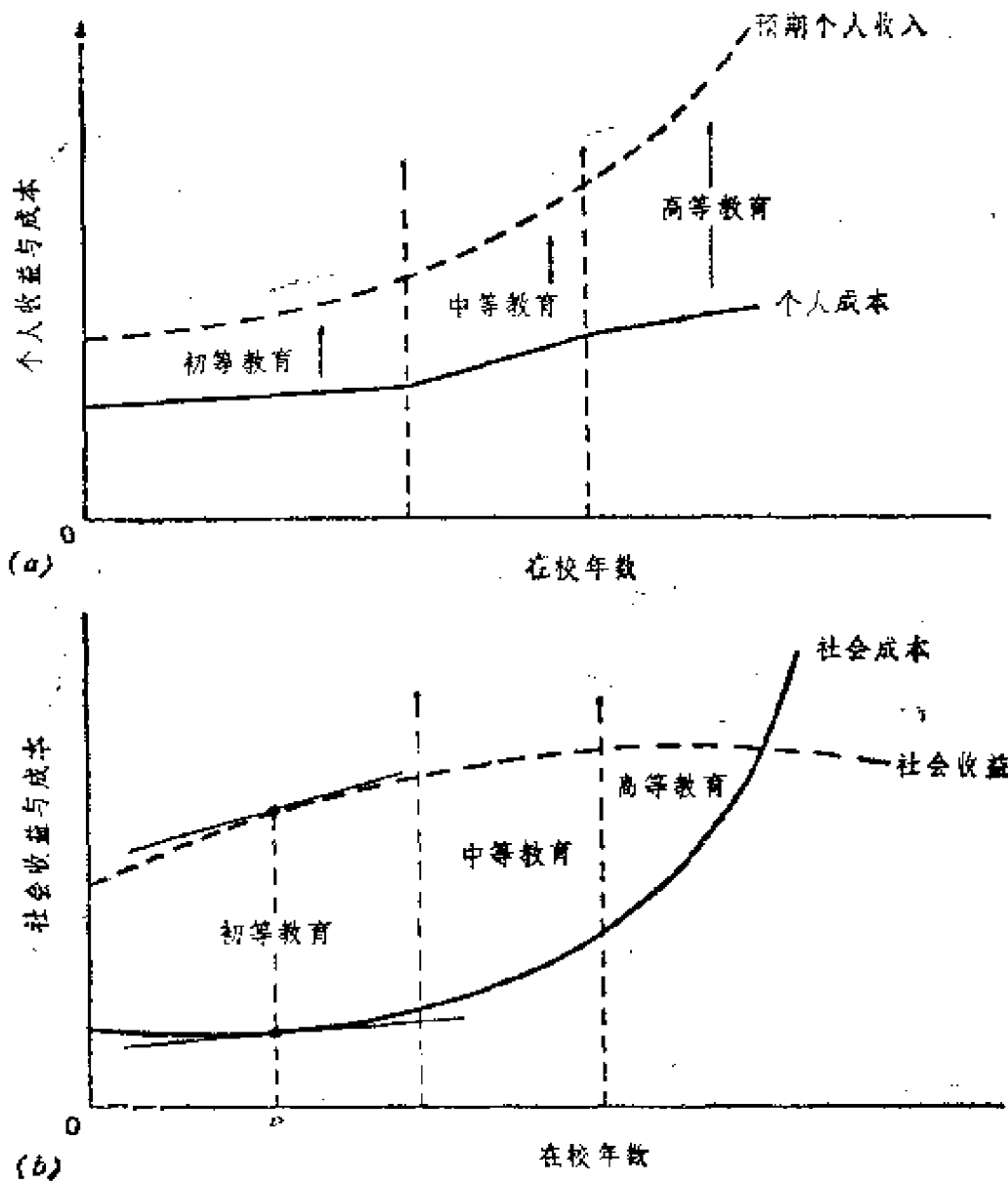


图11.2 个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的对比

明，当私人利益取代了社会投资标准的时候，这种差距如何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图11.2 (a) 中，根据完成正规学校教育的情况，对照了预期的个人收益与实际的个人教育成本。由于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原因，一个学生在校年数越多，他预期个人收益的增长速度比起他个人教育成本增长的速度增加得就越快。对学生

来说,为了取得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差距(也就是对教育投资的个人“报酬率”),最理想的策略是获得尽可能多的正规学校教育。

图11.2 (b) 根据在校年数多少画出了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的曲线,社会收益开始上升很快,这反映了小农和自营职业者由于接受了“基础教育”,掌握了读、写、算术以及一些基本的职业技能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在此以后,社会的“边际”收益随着正规学校教育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因此,社会收益曲线的斜率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社会成本曲线表明,在最初几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基本教育)中,社会成本增长率很低。然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成本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初等教育之后,边际社会成本的急速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在较高教育程度上昂贵的资本(校舍和教学设备)和经常性费用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对初等教育之后的教育实行了大量的补贴。

根据图11.2 (b),从社会角度看,最理想的战略(社会教育投资的最大“报酬率”)可能只有一个,这就是集中力量对所有学生进行至少OB年的正规学校教育;超过了OB年,社会边际成本将超过社会边际效益,为增加新的较高级别的正规学校教育所追加的投资将产生负社会报酬率。此外,根据贝尔曼—伯索尔最近的研究结论(见注释⑤),最理想的社会投资战略也许是提高初等教育的质量,而不是扩大它的数量。质量和数量之间的权衡可以在图(b)中通过向上移动社会收益曲线所得到的数据中反映出来。

因此,图11.2说明了个人和社会最理想的投资战略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冲突——当学生在教育阶梯上攀登时,只要个人与社会对教育投资的评价存在分歧,这种冲突就始终存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个人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的对立是由于政府和私人部门在工资差别,教育的选择和教育劳务的价格方面采取了不适当的政策而人为造成的。其结果是,教育的个人收

益超过了社会收益，这里我们还必须考虑失业不断增长的因素。只要人为的非市场刺激以不相称的预期收益和补贴成本的形式继续存在，并且提供学费鼓励人们用若干年时间“取得学历”，对个人来讲，虽然他可能已意识到现代部门的就业情况已经很紧张，失业率正在上升，但仍会坚持认为争取尽可能多的正规教育是最合乎他的私人利益的决策。除非这些不同的价格“信号”能够被调整得接近社会实际，否则，国家资源不合理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支过多地用于正规学校教育）的状况将继续存在，并可能进一步恶化。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能根据各个经济部门的必要与可能开发和分配人力资源、合理发挥作用的报酬——成本结构。在没有这种结构的地方，即给在现代城市部门工作的工人极高的工资补贴和根据学历安排稀缺的工作的地方（这种学历要求不断在提高），可能会出现两种人力资源不合理配置的状况：第一，随着教育系统造就的人才大大超过经济的吸收能力，许多学生需要去寻找工作。他们可能已经具备了从事某项工作所需的文化程度。但是，他们会发现这项工作已经被文化程度更高的人占据了。他们成为临时失业者，直到他们使自己的或许部分是由教育制度本身向他们灌输的，理想和抱负屈从于现代部门中失业这个痛苦的事实为止。第二，对于那些眼光已经降低并在现代部门中正式获得了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所受的若干年正规学校教育相对于他们所不得不承担的工作而言，已经成为“过度教育”。而对于那些在寻求现代部门中工作的就业竞争中完全失败了的人来说，他们或者加入到永久性失业者的队伍中，或者成为传统部门中的自营职业者。他们被取消了向为他们的教育进行如此大量投资的社会作贡献的机会。过高的工资、在许多情况下的过度教育、以及非生产性的受过教育的贫困失业者这种同时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国家稀缺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扩大教育的资源如果有选择地加以运

用,比如说用于农村所需要的公共工程的规划,那么这笔投资将向那些小学毕业生和受过较少教育的人提供十分宝贵的就业机会。

### 5.3 压缩人为扩大的教育需求的政策:使个人与社会的收益和成本趋于一致

由于民众的政治压力常常阻碍了对教育供给方面的实质性调整,因此,教育需求与生产性就业供给之间的不平衡不可能通过对教育供给的调整来纠正。而且,除非政策的注意力转向调节教育需求方面使其结构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比例,转向创造更多的农村和城市就业机会这样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否则,从失业大军中将产生出非常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面是一些与此有关的政策建议:

1.调整教育需求就要使教育的受益者(相对于家庭和社会整体)在接受各级教育的过程中,担负更多的、比例递增的教育费用(辅之以在较低的教育阶段给有才能的穷学生提供适当的助学金,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行借贷计划)

在这个政策建议中有三个原则,第一,个人担负的教育费用的比例应该有实质性的增加,不能象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个人教育费用仅仅是象征性的,这将缩减超出读写要求之外的教育需求;第二,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享受助学金的学生比例应该降低,其结果会使个人对教育的需求在高等教育水平上大大减少,而高等教育是社会花费最多,相对于社会实际需要而言的过度教育最为严重的地方。削减助学金的政策也是对一种合理批评的反应,这种批评认为,现行的不断增加助学金的教育计划是违背平等原则的。助学金实际上是借穷人的名义来补助富人;第三,个人承担的那部分教育费用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由受益者本人承担,而不应由他的家庭或者朋友承担。尽管少数家庭可能分享一部分收益,但是,将来实际增加的是受益者的收入。最理想的办法是受

益者应该用他将来的收入支付他现在的教育费用。当然，这个建议是指：个人教育费用应该直接来自他自己的财产，或者间接地通过借贷的形式偿还。偿还的方式可以是对他将来的收入征税，也可以是要他向社会贡献专长，例如为农村地区的社会事业服务。这种设想看起来对于中等程度以上的教育是非常理想和切实可行的。初等教育的个人费用或许仍应由家庭担负，但对于有才能的贫穷学生给予补助的制度仍然必要。

2. 缩小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收入差别，在现代部门中应保证对教育的预期收益有更现实的估计

在这里，详细地考虑方法问题会使我们离开教育领域太远（可参见第10章中关于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建议及第9章中关于减少国内人口流动的政策建议）我们只需注意这些措施比不现实地、直接猛烈地削减现代化部门的货币工资的方法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这些措施包括，在农村的生产率和价格上调的情况下，需要消耗许多时间去把握现代部门中的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水平的过程。

3. 保证职业对教育程度的要求不过分

不应该鼓励学生去追求超过他希望得到的工作所要求的高学历。为此，有一点是必须的，这就是经济制度在解决就业问题时不能过份强调教育程度这一先决条件。政府在这方面可以直接采取措施，取消在政府部门内按文凭分配工作的做法。政府行政部门占据了现代部门就业的很大一部分，在那里，获得工作只是靠由正规学校教育堆积起来的文凭。

4. 保证工资与工作相联系而不是与学历相联系

如果其它政策是有效的，那么这一条就应成为必要的临时措施。当过度教育不断增加，当从这种教育中毕业出来的学生不得不接受只需要较低教育程度的工作时，就产生了一种把工资和学历简单地联系起来倾向。在教育 and 政府部门这种倾向尤其突出，

它会使工资不合理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结果是导致更多的学生走上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代价的道路。

#### 5. 增加农村和城市中的就业供给

除了前几章已经提到的，政府还应该：(a)减小要素价格的扭曲，使之在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就业决策当中能够起作用。(b)对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给予更多的考虑，同时，将新的现代部门建立在工资还没有象老城市中心那样扭曲的地区。(c)与过去10年的格局相比，今后将财政预算的较大部分用于增加生产性就业，较小部分用于扩大教育。“(c)”并不意味用在教育上的资金不创造新的就业，我们认为它能够创造就业。确切地说，“(c)”只是表明过去用在教育上的资金，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用在更合理、更有生产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包括用来为毕业生的生产性就业提供追加的资源。超出读写以外的教育应该按照社会成本收益的原则，通过竞争取得，而不应该成为不从社会和经济利益考虑的特权活动。

由于对教育和就业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现在可以对教育、社会和发展之间的更广泛的相互关系加以考察。

## § 6 教育、社会和发展：一些问题

不把教育体制的结构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及经济特征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讨论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体制通常是一个社会基本性质的反映，例如，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非常不平等，那么，看什么人在这种教育体制中畅通无阻就可以反映出这种制度的偏向。同时，教育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社会未来的形式和方向。因此，教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教育是它所在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反映来说，它的作用（不管是平等还是不平等）将有助于保持、加强

和再生产那个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无论是来自教育系统内部还是外部的教育体制改革，都很可能引起整个国家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改革。

让我们带着这个总认识，进一步考察影响经济发展的六个具体问题——增长、贫困与不平等、人口和人口出生率、国内人口流动、农村发展以及国际性人口流动——看看这些问题以什么方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又以什么方式被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所影响。这个考察还将表明教育与发展之间重要的双向联系。并对前面各章已经讨论过的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有更广泛的了解。

### 6.1 教育和经济增长

多年来人们毫不怀疑扩大教育能够促进，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个命题，因为这个命题的逻辑非常清楚，第三世界国家极为缺乏熟练和半熟练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被假定只有通过正规化教育系统才能造就，没有这些劳动力，公营和私营部门的发展将会严重地缺乏主导力量。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统计资料和有关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量数量研究突出证明：发达国家经济进步的主要来源不是物质资本的增长，而是人力资本的增长（计量经济学生产函数估计值中的“残值”）。<sup>⑥</sup>无疑，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提供本国的主导力量不但要建立起物质资本的基础设施，同样需要为人力资本的形成创造基本条件。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劳动力资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迅速扩大注册学生的人数，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尽管要用统计方法来证明扩大教育对加速经济总增长的影响很困难，但扩大各级教育很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总增长发挥作用：（1）造就了更有生产效率的劳动力，并赋予他们更多的知识和技能；（2）为教师、勤杂工、建筑



工、书报印刷工和校服制作工等提供了广泛的就业和取得收入的机会；（3）造就了一个受过教育的领导者阶层，用以填补由移居国外者遗留下来的，以及政府部门、国营公司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存在的大量空缺；（4）在向社会各阶层宣传“现代化”观念的同时，能够提供读写和其它基本技能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尽管可供选择的投资如果用于经济部门，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否定教育在经济和非经济方面的重大贡献。教育能够促进而且已经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受过教育有技能的劳动力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另一方面，对于教育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评价，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加速经济增长一个方面的统计分析，必须同时考虑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模式及分配关系对谁有利。

## 6.2 教育、贫困和不平等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教育经济学著作都把注意力放在教育、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相互关系上。这并不奇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的增长率。结果，就大大地忽略了教育在收入分配和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与其说是缩小不如说是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sup>⑥</sup>

正规教育之所以给收入分配带来了违背人意愿的消极影响，其基本原因是，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的程度成正比。特别是那些完成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工资收入能够超过只受过部分或全部初等教育的工人工资的300—800%。由于收入水平如此显著地取决于正规学校教育的程度，如果大中学校在校学生中中上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占多数，那么，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会加剧。如果穷人因为经济和其它的原因实际上被取

消了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那么，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在事实上就保持甚至加剧了不平等。

例如，教育经济学家约翰·西蒙斯对穷人如何看待教育作了如下描述：

在大多数国家，穷人很快就明白，通过正规学校教育摆脱贫困只是一条少数人有可能实现的道路。穷孩子首先退出学校是因为他们需要去工作，首先被赶出学校是因为营养不良而上课打瞌睡，首先法语或英语考试不及格是因为上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已在家里获得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建立小学校给农村家庭的父母所带来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看来，使他们的儿子（从不考虑他们的女儿）受到足够的正规学校教育，以便获得稳定的即使是下贱的工作，对他们来讲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过去只要接受一点正规学校教育就可以实现这一愿望，现在则必须完成初等教育。当听说甚至中学毕业生都得不到稳定的工作时，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送儿子到城里受中等教育的。<sup>⑥</sup>

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制一开始就不平等？为什么与较富裕的学生相比穷学生很少有机会完成一定阶段的正规学校教育？这里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穷学生初等教育的个人成本比富裕学生高（特别是贫穷家庭的儿童劳动所形成的“机会成本”）；第二，穷学生初等教育的预期收益比富裕学生低。这种较高的教育成本和较低的预期收益的结合，意味着贫穷家庭在儿童教育投资上的“收益率”低于富裕家庭。因此，贫穷家庭的儿童更可能在学习初期退学。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贫穷家庭儿童的教育成本较高而预期收益较低的原因。

首先，对于贫穷家庭较高的机会成本意味着，尽管教育在最初几年对他们的孩子免费，但是，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并不是没有花费，典型的初等教育适龄儿童要在家里干农活——与此同时他

们需要去上学，如果孩子因上学不能去干活，那么，家里就要损失一部分宝贵的维持生计的产量，或者就要花钱雇一个劳动力接替上学孩子留下的工作。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对一个地里有好多事要做，而身体健康的孩子又要上学的家庭来说，儿童教育确实是一笔真实的费用——对高收入家庭来说，这笔费用与学费无关，因而对他们没有意义。很多城市儿童是不需要工作的。

较高的机会成本使贫穷家庭学生的出勤率，从而学业完成情况都比富裕家庭的学生差。因此，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免费普及初等教育，但贫穷家庭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很少能完成他们最初几年的教育。所受的一点可怜的正常教育对于他们认识事物的能力不会有什么帮助，相反只是反映了他们不利的经济地位而已。

在最初几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淘汰比较贫穷学生的经济过程常常与中学学费昂贵联系在一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年的中等教育学费大体相当于人均国民收入，因此，许多低收入家庭对中等教育不敢问津。这实际是一种严格按照家庭收入水平而不是依据择优录取的原则选拔学生的制度。这种状况会导致收入进一步集中于某些社会阶层，并且意味着“劳动收入”首先保证那些已经占有大量“非劳动收入”和财富的社会阶层，即那些财富已经使他们处于十分优越的分配地位的社会阶层。

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的不平等性质在大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里政府不仅支付所有的教育费用和学费，而且还以助学金形式向学生提供补助。由于大多数学生来自高收入家庭（在中等教育程度上已经历了筛选），这种高补贴的大学教育表明，用公共基金建立的高补贴的大学教育，实际上是穷人对富人进行补贴或者救济的一种形式——以“免费”高等教育的名义！<sup>⑥</sup>

与富人相比，穷人在收益方面也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即使他们能够完成初等教育，但是，在农村或城市的就业竞争中，他们

比富人面临更多的困难，因为他们的影响和接触面都没有别人大，换言之，无论在哪一级文化程度上（或许大学是例外），同更有影响的富裕学生相比，穷学生更不容易被录用。即使有人认为教育在农业方面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收益也不会自然地成比例增加。那些拥有自己的土地，并有充裕的资本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的农户（即富有的大农场主）能获得优厚的收益，而少数无地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用所受的教育在地主土地上创造出了较高生产率，其收益的最大部分也会被富有的地主占有。

由此我们说，以个人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相当高的中等教育学费和被资助的高等教育为特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尤其在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上，很可能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使贫困永久化。但应该强调的是，这不是教育体制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它所在社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当不顾失业水平的不断上升而人为地扩大不同文化程度就业者的工资时，当文凭几乎是获得工作的唯一依据而不考虑文化程度与实际工作需要之间的联系时，当家庭收入成为攀登教育阶梯和取得高薪工作的标准时，由公众维持的教育体制就只能是再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工具。这种制度至少从理论上说将造成社会对抗。如果货币财富和劳动收入是在非常不平等的情况下分配的，那么，平等的教育机会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即使排除所有有利于富人的成本收益分配制度（例如，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对穷人实行教育补贴，对所有人扩大就业机会，让富人承担自己全部的教育费用），使升学严格按照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标准，穷人仍会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营养不良、拥挤的没有文化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行为和能力都有消极的影响。

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正如制定以改善生活、缩小家庭为目的并与经济刺激相联系的计划生育纲领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最有

效方法，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最终也要依靠以消除不平等和贫困为目的的直接措施，并辅之以诸如普及教育等间接措施。只要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和经济结构主要是迎合高收入集团的愿望和需要时，那种被认为是社会进步、民族骄傲和平等手段的，至少在原则上说是面向所有阶级、部落和种族的 教育制度，实际上仅能短时期掩盖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且，随着失业率的提高，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绝对贫困的长时期存在，由第三世界隐蔽的不平等教育体制所提供的薄薄的政治面纱就将越来越难以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常常是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先锋。近几年这种由学生领导的运动已经激发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些国家包括：泰国、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

### 6.3 教育、国内人口流动和出生率

看来教育是影响农村—城市人口流动和人口出生率水平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教育与人口流动的联系比起它与人口出生率的联系要紧密得多。此外，现有经验也表明，教育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即通过它对预期高工资的影响）比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更直接。

对不同国家人口流动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偏好成正比。一般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比起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面临着更大的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有更多的在现代部门中获得工作的机会（回忆一下第9章收入差别和就业机会的相互作用是怎样决定人口流动格局的）。特别是这些概率变量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城市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的失业水平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受教育较多的人向外迁移的越来越多。

关于教育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目前尚缺乏科学的论证，虽然大多数研究已经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尤其在较低教育程度上与她们家庭的大小成反比关系。但是，对教育在生育决策方面的作用机制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臆测的性质。

假设较低的城市失业水平（特别是受过教育者的失业水平）和较低的生育率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那么，基本问题就是：数量上继续迅速膨胀正规化教育体系（其中隐含着资源配置的决策）将会改善还是恶化国内人口的加速流动和人口的迅猛增长这两个孪生问题。看来理论和现实材料都再次指出：在政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超出基本教育之外在数量上极度扩大教育设施是不合乎社会实际需要的，也是不明智的。有两个重要理由可说明这个观点。

第一，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揭示的，任何急剧扩大正规初等教育的措施都会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产生无情的需求压力，其最终结果是，普遍出现超出第三世界国家实际需要的教育高度膨胀现象，并造成农村—城市人口流动率上升和文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上大喊大叫的失业移民增多，这样一些进退两难的问题。

第二，如果象许多人所证明的，妇女教育确实通过提高她们抚养孩子期间的机会成本的作用机制，对她们的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见第7章），那么结论是，除非为妇女（也为男人）创造出充分的就业机会，否则，依靠扩大教育作为降低生育率的政策，即使不是完全无用，也是非常软弱的。

#### 6.4 教育和农村发展

在第10章我们证明，要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实，需要较好地保持农村和城市的平衡发展。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大多数的发展计划都集中在城市部门的发展和现代化上，今后许多年需要更多地把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为重点。农业发展之所

以构成农村发展的主要内容，完全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70%的农村人口被吸附在直接或间接的农业生产中，然而，农村发展必须从更广阔的前景上加以考虑。

首先，需要对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制度、相互关系以及发展进程方面所进行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有所认识。农村的发展目标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农业增产和经济增长，确切地说，必须按照社会和经济平衡发展的原则来考虑农村的发展目标。不仅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强调分配的平等。因此，更为广泛的目标应该包括：在农业和农业以外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机会，更公平地取得可耕地，更公平地分配农业收入，更广泛地改善卫生、营养和住房状况，最后，向农村儿童和成年人提供更广泛的与他们的需要和志向直接有关的正规学校教育（在校的）和非正规教育（校外的）。

如何使第三世界现有的教育体制适应农村发展的整体意图？一般来说不很容易。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规小学教育体制是直接来自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仅仅作了一些次要的、很小的改动。它压倒一切的目标是为所有学生通过中学入学考试作准备。因此，课程具有很强的城市色彩，对占有最大比例的那部分学生——那些注定要在农村生活和工作一辈子的学生——的优先需要只给予了最小限度的注意。农村的离校儿童、青年、妇女和小白耕农是农村人口最重要的部分，然而非正规教育教学大纲的编制者们却大大忽略了这些人对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的大量需求。其结果是，在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村学生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初等教育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那么就农村的发展来讲，什么是真正的、持续的教育需求呢？著名教育经济学家菲利浦·H.库姆斯对教育作了一个很吸引人的分类<sup>①</sup>，他把青年人和成年人、男性和女性的教育需要分为以下

4类:

1. 一般的或基本的教育 (读写、算术、对科学和周围环境的初步了解等等) —— 这是大多数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目前所致力目标;

2. 改善家庭的教育: 基本目的是教授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方面的知识、技能和观念。这方面的课程有: 卫生和营养、持家和抚养孩子、房屋的修缮和改进、计划生育等等;

3. 改善村社的教育: 为了改善地方和政府的制度、加强它们的作用, 讲授关于地方和国家的政府、农村合作社、以及诸如此类的课程;

4. 职业教育: 教授与谋生的各种经济活动有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一般只有第一类教育——一般教育——得到了重视。但是, 农村中三个主要职业集团——农场主和农业工人, 在农村中非农业企业工作的人, 农村的一般成员——的学习需要却是现实大多数的正规学校教育所无法满足的。表11.4表明农村中各职业集团的学习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教育准备为农村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那么, 为这三个不同的职业集团设计一个理想而有效的教育方案是完全必要的。

表11.4 农村各职业集团及其对学习的需要

职业集团	学习需要的类型 (不同复杂程度和专业水平)
A 直接从事农业活动的人: 1. 商业化农场主 2. 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	农业计划和管理、合理决策、记帐、费用和年收入计算、信贷使用; 使用新投资、改良品种和改进耕作习惯; 食品贮藏、加工和保存; 农具维修和改进、家庭副



(续表一)

职业集团	学习需要的类型 (不同复杂程度和专业水平)
3. 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	业; 有关政府机构、政策、计划和战略目标方面的知识; 改善家庭状况的知识和技能 (例如, 卫生、营养、家政、抚养孩子和计划生育等); 公民技能 (例如, 相互合作的方式、有关地方和中央政府职能等)。
B 从事非农业的商业活动者: 1. 农业设备和用品、日用品及其它商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 2. 维修服务工 3. 农产品加工、储存和运输经营者 4. 银行和信贷服务的提供者 5. 建筑等方面的技术工人 6. 一般运输服务经营者 7. 小制造商	用于专门商品和劳务的新技术、或改进了的技术; 质量管理; 向消费者介绍产品及产品的使用、维修方面的技术和知识; 管理技能 (企业计划、帐务、成本核算、采购和库存管理、市场分析和销售方式、与客户和雇员的关系、信贷使用和有关政府机构、条例、税制等方面的知识)。

(续表二)

职业集团	学习需要的类型 (不同复杂程度和专业水平)
<p>C一般劳务人员 (农村行政、计划和技术人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1. 一般社会行政人员、地方统计和计划人员</li><li>2. 社会部门 (农业、运输、灌溉、保健、小工业、教育、计划生育以及地方政府) 的管理、计划、技术和培训人员</li><li>3. 合作组织和农民协会的管理人员</li><li>4. 信贷服务部门的管理和工作人员</li></ol>	<p>行政管理、计划及实施技术、信息交流、宣传鼓动； 适于特殊专业的技术和管理技能； 激励社员热情和组织他们共同行动的领导艺术，团结工作人员，取得上级支持的工作方法。</p>

资料来源：P.H.库姆斯和曼佐尔·阿迈德：《向农村的贫困进军：非正规教育做些什么？》，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7页。

### 6.5 教育和国际性人口流动：在知识方面的依赖性和人材外流

除了生产技术和消费方法（即生产方法和消费习惯）的转移外，国际体制上的转移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外正规教育制度的移植。正如外国生产技术可能还适合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

禀赋和对产量的优先考虑一样，高度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的西方国家正规教育制度也往往不适合打算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人力资源要求。本章的前面几节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正规教育制度如何在本质上不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地区。

但是，除了富裕国家在国际开发、技术和知识转让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外，目前还存在着高等文化程度的人力资源从穷国向富国流动——所谓的人才外流问题。这种情况在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和医生中更为突出。他们当中数以千计的人在本国教育机构中，以非常高的社会成本受到专门的训练。但是，他们却只想从中取得私利，为那些富裕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力。表11.5提供了1962年到1973年期间专业技术人员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北美和英国的数量。请特别注意1966年美国放宽了移民入境法律后，移民数量猛增的情况。

这种国际性人材外流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因为它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构和速度发生影响，而且因为它会对发展中国家教育体制的特点和发展前途发生影响。进一步说，人材外流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宝贵的专业技术人员减少，而且，或许更为严重的是，它把本国科学家、医生、建筑师、工程师和大学教师的注意力从民族发展的目标和重要的国内问题上转移开来。这些重要的问题和发展目标包括：发展“适用”技术，采用低成本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措施，建设低成本的住房、医院、学校和其它服务设施，设计和建造使用大量劳动力，实用低廉的公路、桥梁和机器设备，以及编写用于普及教育的，诸如《经济学入门》这样的适用教材，鼓励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在追求本专业的国际先进水平的思想支配下，一些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专业技能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家，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成为国际性人材外流中的移民，但实际上却以他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了“智力”移民。这种“内在”人材外流比国际性人材外流更为严重。

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发达国家向美国、加拿大、  
英国移民的总数 (1962—1973)

年 度	美 国	加 拿 大	英 国	三个国家总数
1962	9 024	1 381	—	—
1963	11 029	1 525	4 600	17 154
1964	11 418	1 873	—	—
1965	11 001	3 707	3 230	17 938
1966	13 986	5 548	—	—
1967	23 361	7 897	2 900	34 158
1968	28 511	6 930	2 400	37 861
1969	27 536	7 585	1 720	36 841
1970	33 796	6 118	1 000	40 914
1971	38 647	5 184	1 270	45 101
1972	39 106	5 360	377	44 843
1973	31 939	—	—	—

资料来源：埃德温·P·鲁本斯：《专业人员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见 J.N.巴格韦蒂主编：《人材外流与税收》，北荷兰阿姆斯特丹1976年版，第 220 页表 1。

例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医生热衷于研究心脏病，而“预防热带病学”却被认为是第二流的专业；建筑师致力于国家纪念馆和现代化公共建筑的设计，而对低成本的住宅、学校和门诊部却很少关心；工程师和科学家醉心于最新式、最现代化的电子设备，而把简单机床、人力或畜力农具、基本卫生设备和水净化系统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手工操作工序都交给“外国专家”去管；最后，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研究和讲授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毫不相干、根本不存在的“高深的”竞争经济数学模型，而对贫困、失业、农村发展和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却毫无兴趣。

这些不同的专业行为准则与其说是建立在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国际社会（即：发达国家的同行朋友）的赞扬之上。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者被邀请到伦敦、巴黎、纽约或者莫斯科参加学术会议要比发现和解决一个本国工业、农业、医学或者经济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要重要得多。

发展中国家（尤其前身是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的学术方向受国外学术潮流左右的不利于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倾向，曾一度渗透于整个教育界和科学界。人材外流和眼睛外向选择研究方向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是难以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贫困程度来衡量的，这种状况无疑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不发达状况的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近来，学生和教师要求更切合实际的教材、课程设置和科研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精神的出现。看来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中，这种精神正在聚积起来。正如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曾经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和专业学校应该在促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真实需要方面起重要作用。

## § 7 概括和总结：主要教育政策的选择<sup>②</sup>

在解决教育问题的政策上，发展中国家面临两个基本的选择，他们可以象过去一样继续在数量上扩大正规化教育体系，只是对于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考试制度作一些细致的修改，并保持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教育费用政策；或者全面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并根据本国实际需要改进课程内容。我们相信，第一种选择只能加剧失业、贫困、不平等、农村发展停滞和科研受国际学术潮流左右这样一些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境

地。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的是第二种选择。

由于教育体制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影响并再生产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因此，任何使教育更为适应发展需要的规划 and 政策都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同时发生作用：1. 修正来自教育系统外部的社会、经济信号和刺激。这些信号和刺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对教育总需求的大小、结构和方向，从而也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教育设施方面的政治反映。2. 促进教育系统内部的平等和效率。这主要是通过安排适宜的课程内容（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课程内容），调整社会和私人的教育成本—收益结构，改革升学录取制度和社会部门根据文凭安排工作的传统来进行的。

只有制订同时能达到上述两方面的要求的政策，教育与发展之间的积极联系才能真正成功地建立起来。因此，作为本章的结束，我们应简单评介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的政策应该包括的具体内容。

### 7.1 教育系统外部的政策

**调整不平衡的信号和刺激** 纠正经济不平衡和刺激的扭曲（例如，收入和工资差距）、减轻要求多受教育的社会政治压力的政策能够取得增加就业，缓和农村—城市人口流动，推动与发展相联系的教育体制改革等多种有益的效果。

**修改根据文凭分配工作的制度** 为了打破招工对文凭的过度要求造成的为了就业就得接受过度教育的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引导或者要求国营和私营部门的雇主按照实际工作要求录取人员，尽管这样做可能比较麻烦。首要的步骤是取消许多工作对文凭的要求，尤其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传达室、收发员、文件管理员等等），因为政府部门往往是私人部门模仿的对象。

**控制人材外流** 对本国培训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外流进行控制或者征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在无形中侵犯人

权，干涉个人选择工作性质和地区的自由。在约束很紧的社会制度中，这种限制政策可能引起心理上的对抗。但是，从社会方面讲，国家把非常有限的财政支出投入到教育之中，培养造就了她的人民，结果却得到人材外流的报答。因此为了社会利益，或者暂时限制人材外流，或者最好是在可能情况下对外流专业人员的海外收入征税，并把这笔收入再投到国家的发展规划中去。这种方法在经济上和道义上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外流人员的海外收入征税的经济限制措施，无论如何也应得到接受外流专业人员的国家政府的配合和帮助。②

## 7.2 教育系统内部的政策

**教育预算** 在可能的情况下，使教育预算比过去增加得缓慢些，把更多的国家收入用于创造农村和城市的就业机会。此外，应该把大部分的教育预算用于发展初等教育，初等教育不仅是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基础，而且也是自学和农村应用技术学习和交流的基础。

**津贴** 为了克服在教育总需求方面出现的扭曲，应该削减对高等教育的津贴，使教育的受益者（相对于他的家庭和社会整体）承担更大、并随教育进程按比例不断提高的教育费用。可以直接采取借款偿还的方式，或为农村地区服务的方式。同时，对于低收入阶层应该提供充足的津贴，以抵消相当大的个人教育成本（包括“机会成本”）。

**与农村需要有关的初等教育课程** 为了使农村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初等教育以及为中途辍学者和成年人举办的非正规教育应该更加直接地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无论他们是小农、手工业者、企业经营者，还是公共部门或商业部门的工作者。但是，除非创造出更多的农村经济机会，并使小农、手工业者和企业经

营者能够利用他们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和所获得的专业知识从经济机会中得到好处,否则,这种课程和应用技术教育的重新调整将不可能得到广泛而有效的支持。没有这些刺激,人们会很自然地对这种正规和非正规的职业训练持相当大的怀疑态度。他们或许宁愿去追求正规学校教育的文凭,然后到城里去碰碰就业的运气。

**限额分配** 为了纠正大多数正规学校中存在的平等状况,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限额分配来保证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起码应该接近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在现有体制下,由收入地位决定的“间接”地分配限额的制度往往决定了学生所能接受的教育程度。通过改变现行限额分配制度,保证有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够克服经济障碍完成学业,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遇,这将对使教育成为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媒介起很大作用。各国限额分配制度的性质虽然有明显差别,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现有的保持贫困,扩大不平等以及对经济的全面发展起暧昧作用的教育体制,会比按收入水平分配入学比例的教育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分配平等方面更为有效和更有积极意义。

## 注 释

① 弗雷德里克·H·哈比森,《作为国家财富的人力资源》,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页。

② 对教育状况的介绍和分析还可以参阅世界银行报告,《人类发展的问题和政策:教育》,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23。

③ 乔治·萨卡罗波洛斯,《教育的收益:国际性比较》,阿姆斯特丹埃尔塞维尔1972年版。

④ 了解70年代的经验研究,可参阅G·萨卡罗波洛斯,《教育的收益:最新国际比较》,见《比较教育》1981年6月第17期。克里斯托弗·克尔克拉夫,《初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情况的评论》,《世界发展》1982年4月第10期。



⑤ 杰里·贝尔曼和南希·伯索尔：《正规学校教育的质量：数量第一走入歧途》，《美国经济评论》1983年12月第73期第5号。

⑥ J.西蒙斯在《为发展而进行的教育：再思考》中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经验作了深刻批评，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24。

⑦ 尼古拉斯·贝内特：《村社的初等教育：对愚昧的投资》，国际教育计划研究所巴黎1972年版，第5—6页。

⑧ 朱利叶斯·尼雷尔：《大学在新兴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世界大学行政大会1966年6月27日。

⑨ 参阅肯尼思·W.汤普森：《国家事务中的教育：为促进发展在高等教育中所做的试验》，在教育开发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纽约1975年5月。

⑩ 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可参阅J.西蒙斯和L.亚历山大：《学校成功的决定因素：教育生产函数分析》，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1974年6月。

⑪ 这一节中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作者与E.O.爱德华兹合写的论文：《在不发达国家中教育的供给和需求与不断增加的失业之间的联系》，《世界发展（1）》1973年第3期和第4期。

⑫ 事实上大多数人对未来的期望是建立在对流行的就业形势的“静态”分析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当就业形势日益恶化时，人们倾向于高估其预期收入，而且，即使个人对教育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正确”的，他们对教育的需求也会超过实际需要。

⑬ 对印度教育和就业问题的深入分析可参阅马克·布朗基：《印度毕业生失业的原因》，伦敦企鹅出版社1967年版。

⑭ R.艾伦：《孟加拉毕业生失业问题初析》，《孟加拉发展研究》1980年秋季第47—74页。

⑮ 可参阅爱德华·F·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纽约1962年版；和罗勃特·索洛：《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经济与统计评论》1957年8月。

⑯ 可参阅杰格迪什·巴格瓦蒂：《教育、阶级结构和收入平等》，《世界发展（1）》1973年第5期。

⑰ 约翰·西蒙斯：《教育、贫困和发展》，《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报告32》1974年188号。

⑩ 对拉丁美洲教育补贴性质退化问题的一些证明可参考琼·皮埃尔·贾拉德：《哥伦比亚在教育方面的政府开支与收入分配》，巴尔的摩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巴西的基础教育和收入不平等：长期分析》，见：《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报告》1977年6月第268期；特别见：《为经济发展而斗争》阅读材料25（《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⑪ 有关坦桑尼亚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就业专辑》1975年10月；H. N. 巴纳姆和R. H. 萨布特：《人材流动、教育和城市剩余劳动力》。

⑫ 菲利浦·H. 库姆斯和曼佐尔·阿迈德：《向农村的贫困进军：非正规教育怎样起作用？》，巴尔的摩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5页。

⑬ 如同其它章节一样，这里提出的政策主要供小组讨论和个人分析。虽然我们相信这些政策具有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而且切合实际，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们看成是绝对的和不可变动的，更不必看成是无可争辩的。

⑭ 如果要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可参阅杰格迪什·巴格瓦蒂和威廉·德拉尔法：《人材外流和所得税》，《世界发展（1）》1973年第1期和第2期第94—101页；也可参阅《发展经济学杂志》1975年9月号，这期专门讨论国际性人材外流问题。

## 概念复习

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s)

学校教育 (Schooling)

正规教育体制 (Formal educational system)

“非正规”教育 (“Nonformal” education)

人力规划 (Manpower planning)

普及教育 (Universal education)

注册率 (Enrollment ratios)

辍学率 (Dropout (or wastage) rates)

识字 (Literacy)  
认识能力 (Cognitive abilities)  
派生需求 (Derived demand)  
教育收益率 (Educational rates of return)  
教育的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of education)  
文凭 (Educational certification)  
基础教育 (Basic education)  
改善家庭教育 (Family improvement education)  
国际性人才外流 (International brain drain)  
对教育灵活性的社会政治约束 (Socio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educationac mobility)  
职位的教育替代现象 (Educational job displacement phenomenon)  
个人与社会的教育收益对比 (Private versus social benefits of education)  
个人与社会的教育成本对比 (Private versus social costs of education)  
经济信号和刺激 (Economic signals and incentives)  
过度教育 (Overeducation)  
按学历分配工作 (Job rationing by education)  
在职培训 (On-the-job training)  
高级劳动力 (High-level manpower)  
平等受教育机会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早期幼儿环境对学习能力的影晌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ability to learn)  
偏重现代化部门或都市的教育体制 (Modern sector or urban bia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教育制度的内部有效性 (Internal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村社的提高教育 (Community improvement education)  
职业教育 (Occupational education)  
国内的人才外流 (internal brain drain)

教育补贴 (Educational subsidies)

限额分配制度 (Quota systems)

## 问题讨论

1. 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如此之高的辍学率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方法可以降低辍学率?

2. 正规化教育和非正规化教育之间有何区别? 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3. 人们常说, 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 特别是农村中的教育体制“机能失调”——即: 它们不适合社会和经济的实际需要。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请说明你的理由。

4. 你对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的相对“成本”和相对“收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这种状况如何解释?

5.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资助高等教育的基本理由是什么?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你认为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 说明你的理由。

6. 早期幼儿的环境因素被认为对完成学业有重要决定作用, 这些因素是什么? 它们的重要程度如何? 怎样使它们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7. 教育经济学的含义是什么? 你认为教育计划和教育政策的选择应在多大程度上由经济决定? 解释你的观点, 并给出假设的或者实际的例子。

8. 所谓“教育的需求是为了寻找现代部门高报酬的就业机会而产生的‘派生需求’”是什么意思? 许多教育专家声称, 在发展中国家, 家庭和儿童对教育的需求主要不是为了投资的利益而是为了消费的利益。你认为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在你们的同学中, 对教育的消费需求的相对重要性如何?

9.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体制、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决定之间有什么联系? 描述“职位教育替代”过程。

10. 注意区别个人的和社会的教育成本和收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哪些经济因素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对成本收益评价的脱节? 政府是否应该通过它的教育政策和经济政策来缩小这两者之间的距离? 请作出具体解释。

11. 论述有关教育与发展之间联系的各种问题。

- (a) 教育和经济增长：教育能否和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 (b) 教育、平等和贫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典型的教育体制是减缓还是加剧了不平等和贫困，或者与不平等和贫困根本没有关系？联系你的国家作出详细的解释。
- (c) 教育和人口流动：教育是否刺激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为什么？
- (d) 教育和生育率：妇女教育是否有助于降低生育率？为什么？妇女教育是如何导致生育率降低的？
- (e) 教育和农村发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正规化教育体制对促进农村的发展是否有实际的贡献？请具体说明。
- (f) 教育和人才外流：什么因素导致受过教育的高级劳动力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国际性流动？国内人才外流含义是什么？举例作进一步的解释。

12. 政府通过操纵和调节教育体系内外经济、非经济的重要因素或变量，能够影响教育体制的特征、性质和内容吗？这些内外因素是什么？政府政策怎样才能使教育更加符合发展的真正内容。